

Collected Essays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Built  
Heritage  
Summit  
2022

# 大灣區 文物建築高峯論壇 論文集

中文版





Collected Essays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Built  
Heritage  
Summit  
2022

# 大灣區 文物建築高峯論壇 論文集

中文版

古物古蹟辦事處編製，二零二二年。  
版權屬香港特別行政區發展局所有。本刊物任何部分的文字及圖片，  
如未獲書面允許，不得以任何方式轉載或翻印。

## 工作小組

蕭麗娟  
楊可欣  
李少媚  
袁賜弟  
江詠雯  
劉思詠  
吳卓瑩  
姚金隆  
姜耀麟  
葉碧芬  
劉國偉  
鍾婉儀  
蔡映麗

## 編輯小組

蕭麗娟  
劉思詠  
葉碧芬  
陳韻詩

## 學術顧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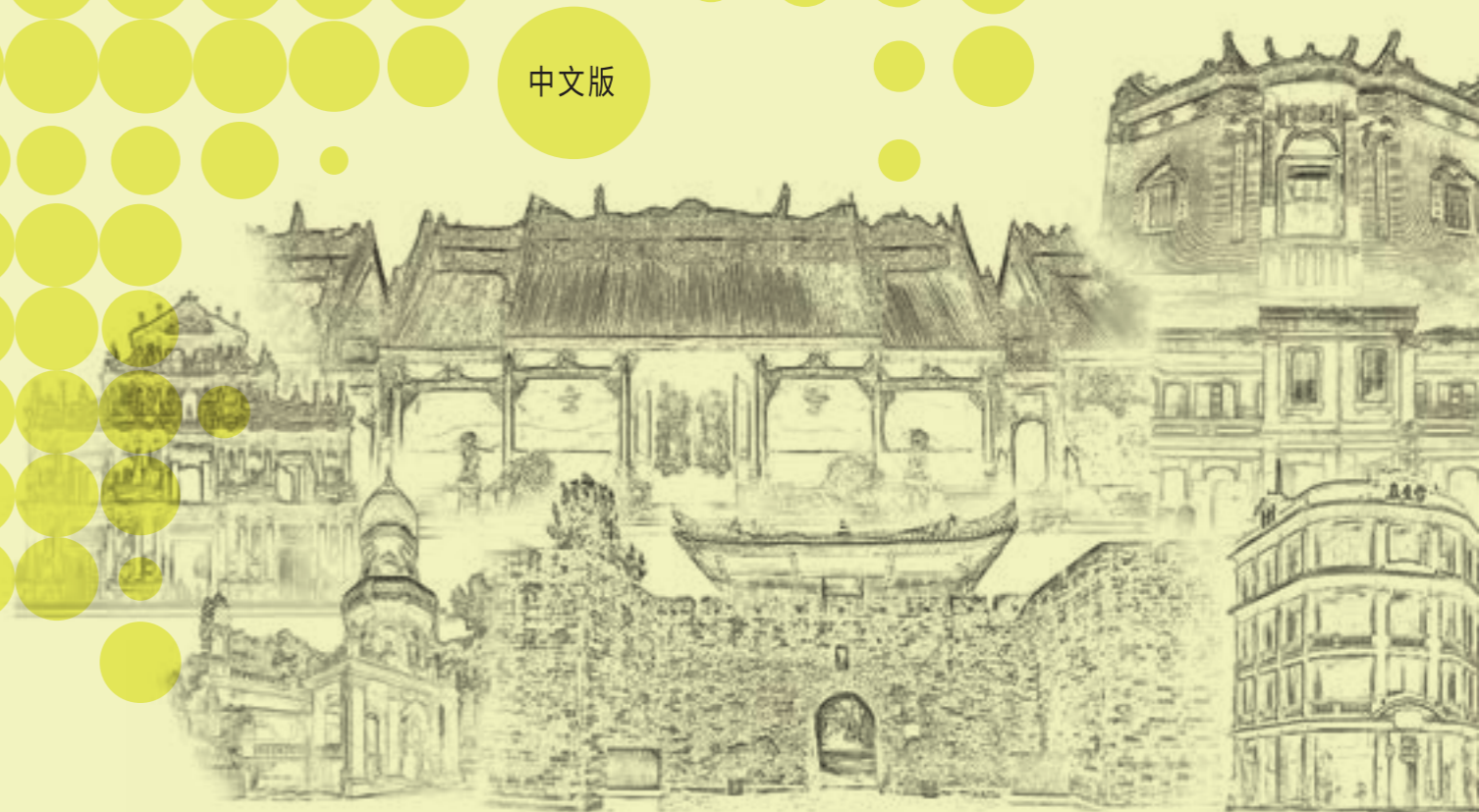
夏思義博士 (Dr Patrick H. HASE)

## 平面設計

姚金隆  
藍河創作有限公司

## 印刷

政府物流服務署印務科



# 目

# 錄

## 獻辭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	6
文化和旅遊部副部長、國家文物局局長李群先生.....	8
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廳長李斌先生.....	10
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局長梁惠敏女士.....	12
香港賽馬會主席利子厚先生, JP.....	13

## 序言

香港特別行政區發展局局長甯漢豪女士, JP.....	14
香港特別行政區古物諮詢委員會主席蘇彰德先生, BBS, JP.....	15
香港特別行政區保育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主席劉智鵬教授, BBS, JP.....	16

## 文物建築保育和活化再利用的新發展

香港的文物建築保育與推廣.....	20
蘇彰德	
澳門歷史建築的活化與利用.....	28
蔡健龍	
大館解鎖.....	40
鍾妙芬	
文物保育與活化歷史建築—中環街市的故事.....	60
蔡宏興	
廣州泮塘五約：尋常巷陌與日常生活的風景.....	74
馮江	
重現「省港秘密大營救」艱險革命歷史 打造大灣區革命教育熱門打卡點 —廣東惠州東湖旅店保護和利用簡況.....	90
劉淑瑜	
婆仔屋文創空間文物復修與活化經驗（摘要）.....	100
Carlos MARREIROS（馬若龍）	
活化薄鳧林牧場：構築交流平台 營造地方文化樞紐.....	104
冼昭行、高永康、林社鈴	
活化再利用的數十年：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	114
馮紫珊、羅嘉裕	

## 知識分享和公眾參與—文物建築教育的新策略

文化遺產的價值認識、保護與社會參與—以北京中軸線為例.....	138
呂舟	
文物建築的教育與推廣—以澳門為例.....	154
呂澤強	
澳門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管理及活化再利用.....	162
朱蓉	
沿海所城 大鵬為最—深圳大鵬所城保育與活化實踐.....	178
黃文德	
香港大學校園的歷史建築.....	190
周穎	
百年樹人：從文物建築看香港早期教育.....	202
蕭麗娟、劉思詠	

## 應用於文物建築保育和教育的新科技

文物建築的科技保護—以廣州陳家祠為例.....	244
黃海妍、石浩斌	
文物保育的教育新趨勢—如何以傳統技法創建可持續未來.....	260
葉健雄	
應用創新科技對香港高地歷史景觀進行特徵研究和測年及保護.....	276
Mick ATHA (范旼濤)、Sam TURNER	
都爹利街石階及煤氣路燈修復工程.....	294
江詠雯	

## 跨地域合作

粵港澳大灣區文物建築跨地域協作.....	318
蔣志豪	
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行動助力 亞洲文明交流互鑒 —以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在亞洲地區的文化遺產國際合作實踐為例.....	330
李六三	
中國的「海絲」遺產與遺產管理.....	340
沈陽、趙雲	
共同的記憶 共同的遺產—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教育文化遺產遊徑.....	352
曹勁、張羽	
以開創性思維構建香港成為大灣區文化遺產樞紐.....	372
鄭志剛	

作者名錄.....	382
-----------	-----

獻

辭

歡迎大家參加首屆「粵港澳大灣區文物建築高峯論壇」。

文物建築滿載歷史、文化和市民的集體回憶，是建構和傳承文化身分的要素。其建築風格、建造技術、用途等，均深受傳統、文化、宗教、環境等影響。粵港澳大灣區（大灣區）的城市區處嶺南區域，文化一脈相承。大灣區內許多歷史建築均反映嶺南文化的特色，訴說嶺南的歷史故事。

香港位處大灣區內，但其發展史造就了中西薈萃的特色。香港文化一方面與內地同氣連枝，另一方面，香港是近代中西文化薈萃之地，我們不難在街道巷里找到中式、西式或中西合璧的文物建築。這些建築物仍然充滿生命力，不但是市民生活的一部分，亦是香港獨特歷史中不可或缺的文化遺產。

本屆政府致力保護和推廣文化遺產，發展局轄下的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及古物古蹟辦事處負責文物建築保育、活化、教育推廣等工作，務使香港的文化瑰寶得以傳承後世，並說好香港故事。

發展局舉辦是次論壇，有助促進大灣區在文物建築領域的交流和協作。討論內容涵蓋文物建築保育及活化、新技術應用、文物教育和推廣、社區參與、學術研究、人才培訓和交流、文創產品研發等各方面，定可讓大灣區城市開拓更多協作機會，加強相互融合，善用各地優勢。

我衷心感謝國家文物局、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大灣區文博單位和香港賽馬會鼎力支持，令論壇得以順利舉行。我深信香港定可繼續發揮所長，為推動大灣區文化協同發展作出貢獻。



李家超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獻

立  
碑

梁思成先生曾在《我國偉大的建築傳統與遺產》一文中，讚美中國建築乃「世界上最古、最長壽、最有新生力的建築體系」，認為中國古建築代表著「我們的歷史，我們的藝術，我們祖國光榮的文化」，指出「我們更要懂得怎樣去重視和愛護我們建築的優良傳統，以促進我們今後繼承中國血統的新創造」。今欣聞首屆粵港澳大灣區文物建築高峯論壇即將在香港召開，甚為讚賞，願與諸同仁分享良多之思緒。

一思文物人之恆心。早在2002年，習近平主席在任福建省省長時專為《福州古厝》作序，指出「古建築是科技文化知識與藝術的結合體，古建築也是歷史載體」、「保護好古建築、保護好文物就是保存歷史，保存城市的文脈，保存歷史文化名城無形的優良傳統」。近年來，內地穩步推進文物建築重大保護工程和開放利用，啟動文物建築預防性保護試點，為守護城鄉歷史根脈做出積極努力。此次論壇聚焦文物建築保護與活化利用，分享前沿科技和理念，交流挖掘闡釋價值的新手段，啟迪文物「活起來」的新思路，以期傳承文物及其承載的歷史和文化，這是一代代文物人持久不變的追求與探索，是文物人的恆心之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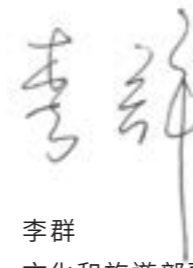
二思中華民族之同心。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和澳門回歸祖國二十周年之際，習近平主席深情說道，「有史以來，香港同胞始終同祖國風雨同舟、血脈相連」、「回歸祖國後，廣大澳門同胞 … 更加堅定地把愛國愛澳排在核心價值序列的第一位」。此次論壇彙集內地、香港和澳門等地的專家學者，共襄盛舉，互學共進，是為同心守護中華文化遺產。多年來，內地、香港和澳門合作開展多層面多類型的文物交流，更攜手推動「海上絲綢之路」遺產保護和申遺、「亞洲文化遺產保護」等國際合作，是為同心傳承弘揚中華文化。近年來，內地、香港和澳門致力打造「血濃於水：香港歷史建築中的家國情」展覽、「文化遺產進港澳校園」等「知史愛國愛港愛澳」項目，是為同心牢築同胞誼、家國情和民族魂。

三思中華文明之信心。習近平主席語重心長地與濠江中學的年輕一代交流，「中華文明是唯一沒有斷流的古老文明。五千年的歷史是我們文化自

信的源泉。」憶古思今，中華文明始終以厚重的歷史、獨特的魅力和包容並蓄的胸懷屹立於世界文化的激蕩，並以強烈的文化自信和時代擔當，宣導和致力於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粵港澳大灣區是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交流互鑒最為活躍的地區之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與國家「十四五」規劃中擘畫的建設「人文灣區」、香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澳門「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為大灣區在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的浪潮中發揮更為積極作用注入了新動力。我們已經或即將見證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建成、澳門世界遺產監測中心成立等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盛事，是以進而期待大灣區根植祖國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依託香港、澳門得天獨厚的國際交流優勢，致力中華文明繁榮，展現中華文明自信，促進世界文明交流互鑒。

踐文物人之恆心，聚中華民族之同心，揚中華文明之信心，此為餘心之所善，相信亦為諸同仁心之所善。期待與諸同仁攜手，「文物」以載道，「交流互鑒」以弘道，為擴大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推動世界文明交流互鑒作出新時代的貢獻！

最後，特別感謝香港特區政府發展局及其下轄的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和古物古蹟辦事處為組織籌辦首屆粵港澳大灣區文物建築高峯論壇所付出的努力。預祝高峯論壇圓滿成功！



李群

文化和旅遊部副部長、國家文物局局長

獻

慶

今天，在黨的二十大勝利閉幕不久，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之際，期待已久的大灣區文物建築高峯論壇開幕了。這次論壇的舉辦是貫徹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重要體現，是推動大灣區文物保護利用的有力舉措。在此，我謹代表廣東省文化和旅游廳，向高峯論壇的舉辦表示熱烈的祝賀！向長期以來關心、支持廣東文化和旅游事業發展的國家文物局、香港發展局、澳門文化局，以及社會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謝！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實施三年多來，粵港澳三地在文化和旅遊交流合作上進入全新階段、取得重大進展。我們成功召開二十次粵港澳文化交流會議，推動博物館進行深度合作，舉辦「東西匯流」、「海上瓷路」、「嶺南印記」、「三城記」等文物大展，推出四十多條粵港澳大灣區文化遺產遊徑，舉辦粵港澳青年文化之旅，規劃「一程多站」多條旅遊線路，開展研學培訓等系列活動，大灣區世界級旅遊目的地建設取得重大進展，人文灣區、休閒灣區呈現光明前景。

習近平主席指出：「文物承載燦爛文明，傳承歷史文化，維繫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近年來，廣東堅持「保護第一、加強管理、挖掘價值、有效利用、讓文物活起來」的新時代文物工作方針，文化遺產資源得到有效的保護利用。目前廣東共有不可移動文物2.5萬餘處，其中文物建築約佔83%，為實現活化利用提供了豐富載體。我們大力推進分級分類保護管理，設立公園、博物館、旅遊景點、文化創意園區、客

棧民宿等多種活化利用平台，推出了一系列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典型案例，在廣州永慶坊、潮州古城、汕頭小公園開埠區、江門開平倉東教育基地等保護利用中取得了成功實踐。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潮平兩岸闊、風正萬帆懸，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進入了全新階段，我們真誠期待，粵港澳三地進一步精誠合作，聯手開拓更多元的文物建築保護利用模式，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遺產煥發出更具魅力的時代價值，更好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下去」、「活起來」、「走出去」，面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灣區故事。

最後，祝本次論壇取得圓滿成功！祝粵港澳大灣區的明天更加美好！祝各位嘉賓朋友身體健康、工作順利、萬事如意。



李斌  
廣東省文化和旅游廳黨組書記、廳長

獻

慶

國家致力傳承弘揚中華文化，推動文明交流互鑒正時代潮湧，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活力迸發，此際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發展局舉辦「大灣區文物建築高峯論壇」，研討大灣區文物建築的保育、活化、教育推廣及數字科技應用，促進跨領域、跨地域合作，對於加強嶺南文化遺產的保護利用，構建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遺產保護傳承體系，具有重大意義。借此機會，本人謹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熱烈祝賀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五周年，祝願「大灣區文物建築高峯論壇」圓滿成功！

四百多年獨特的對外交流歷史，造就了今日澳門和諧的社會文化底蘊，世界遺產「澳門歷史城區」、六百多座的中西文物建築、華洋共融的非遺風俗，印證著澳門始終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和諧共存的歷史，展現了中華民族開放包容、兼收並蓄的廣闊胸懷。

國家也因此賦予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打造「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使命。立足於這一文化發展定位，澳門文化局積極在文化遺產領域，開拓與大灣區各兄弟城市的合作，在世界遺產推廣、文物建築修復、青少年文化遺產教育上，分別開展或參與了「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藝術節」、「粵港澳大灣區世界文化遺產嘉年華」、「內地與港澳中學生文化遺產暑期課堂」、「內地、香港與澳門歷史建築活化再利用研討會」等項目，並以傳統嶺南建築修復為主題，邀請廣東省專家赴澳開展多項人員培訓。同時，發揮澳門中外文化交流平台作用，積極開拓與內地海上絲綢之路申遺城市聯盟、國外海絲沿線城市、葡語國家、國際世遺保護組織等之間的交流合作，參與舉辦各類以世界遺產、文物建築為題的文化論壇、培訓交流等活動，着力發揮澳門在大灣區中的「一基地」作用。

澳門自古至今作為嶺南地區的一員，與大灣區城市在文化上同根同源，面向未來，特別是為共同響應國家號召，推動文明交流互鑒、促進中外民心相通，擴大與「一帶一路」國家在文物保護領域的交流合作，澳門將更加積極地攜手各大灣區城市，建設人文灣區，做好大灣區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和活化利用，着力深化對中華文明的認知，着力提升中華文化影響力，為新時代文物事業發展作出新貢獻，譜寫新篇章。

梁惠敏

梁惠敏  
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局長

獻

慶

香港賽馬會很榮幸贊助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及古物古蹟辦事處，舉辦首屆「大灣區文物建築高峯論壇」。

大灣區歷史文化豐厚，是次論壇將專題討論保護區內文物建築的重要性，並藉此良機，從現有保育項目中借鑒學習，以及推廣區內各地的文化旅遊產業。

論壇將匯聚多位決策制定者及業內專家，探討歷史建築保育的新策略。論壇亦歡迎公眾參與，藉此提升市民對保育的關注及支持，包括舉辦展覽，展示香港的歷史古蹟，以及特設互動環節，供學生參與。

香港賽馬會對香港文物建築及傳統文化方面的保育工作一直不遺餘力，並積極為香港注入文化活力。

其中，香港賽馬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合作推行的中區警署建築群活化計劃，成為今日的「大館—古蹟及藝術館」（大館）。大館不但榮獲201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卓越獎項，至今更錄得超過1,000萬人次到訪。比較近期的捐助項目則有翻新「美荷樓生活館」，呈獻香港首個公共屋邨的歷史。

香港賽馬會多年來亦大力支持「大澳端午龍舟遊涌」、「大坑火龍盛會」及「長洲太平清醮」等本港三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

香港賽馬會支持的藝術、文化及保育項目不勝枚舉。除了以上提及的項目，香港賽馬會亦透過其慈善信託基金，撥款35億港元興建早前開幕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並支持香港特區政府，舉辦一系列紀念香港特區成立二十五周年的藝術文物展覽及文化活動。這些均有賴香港賽馬會獨特的綜合營運模式，透過稅款及慈善捐款，將博彩及獎券收入回饋香港。

本人衷心感謝香港特區政府對這次高峯論壇的支持，並對所有演講嘉賓提出的真知灼見，表達謝意。祝願論壇圓滿成功。

利子厚

利子厚, JP  
香港賽馬會主席



# 序 言

香港於一九七六年實施《古物及古蹟條例》，同年成立古物諮詢委員會和古物古蹟辦事處，肩負古蹟文物保護工作；換句話說，香港在文物保育的路上已經走過了四十多個年頭。隨着社會發展，古蹟文物保育工作日趨繁重，涉及的範疇不單只是歷史和文化，也包括土地規劃、土地行政、建築工程等，加上公眾的文物保育意識日漸提高，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遂於二零零八年，在發展局設立了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以審視、推行及完善文物建築保育政策；同時也成立了保育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為活化歷史建築提供專業意見。

今年適逢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五周年，發展局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和古物古蹟辦事處籌備了首屆粵港澳大灣區文物建築高峯論壇，以回顧和分享文物建築保育和活化的經驗，更希望藉此平台，加強區內交流，共同探索日後的協作，以發揮大灣區的優勢，達致協同效應。

文物建築的選址、設計、空間、用材、使用、擴建、改動等，與周邊環境、使用者和當代文化及現況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建築的組合、空間序位等會構成群組、社區，以至城市和國家的歷史印記、文化脈絡和社會記憶，是建構文化身份的要素；當文物建築完成原有的使命後，適切的活化再利用，不單可賦予它們新生命，還可以豐富它們的歷史和社會回憶，更可以成為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日新月異的科技讓文物保育工作有所突破，例如透過地理資訊系統可為歷史研究和文物保育提供整合平台；先進的三維數碼技術可幫助預防和及時處理文物建築的隱患、建立文物檔案，以致應用於文物教育及推廣，和推動社區參與。然而，傳統工藝的傳承也不容忽視，應用先進科技的同時，不單要尊重建築原結構和原貌，亦要結合傳統工藝和材料。因此，加強保護文物建築和傳承傳統工藝是重要課題，好讓文物建築既保留過去的痕跡，又能融入現代社會，達至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這論文集收錄了二十四篇由政策官員、專家和學者在首屆粵港澳大灣區文物建築高峯論壇發表的文章，他們從「文物建築保育和活化再利用的新發展」、「知識分享和公眾參與—文物建築教育的新策略」、「應用於文物建築保育和教育的新科技」；及「跨地域合作」四大範疇分享經驗和專業見解，以促進彼此交流，加強大灣區的凝聚力，發揮大灣區的優勢，共同為區內的文化發展創建更有利條件。

我和團隊會繼續努力做好文物建築的保育和推廣工作，加強區內的協作和交流，提高區內人民的文化修養、身分認同和歸屬感，以傳承及弘揚中華文化和歷史。

甯漢豪

甯漢豪, JP  
香港特別行政區發展局局長

# 序 言

很高興古物諮詢委員會能參與首屆「大灣區文物建築高峯論壇」（下簡稱「高峯論壇」），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在文物建築保育、活化、教育和社區參與、科技應用等多個範疇的協作，達致協同效應。高峯論壇是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的重點項目之一，又得到香港賽馬會獨家贊助，我衷心祝願高峯論壇順利舉行，並加強大灣區各城市在文物保育方面的協作。

今屆高峯論壇在香港大會堂舉行，實在饒有意思。在今年三月，古物諮詢委員會向古物事務監督（即發展局局長）建議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香港法例第五十三章），將有六十年歷史的香港大會堂列為法定古蹟。古物事務監督於今年五月刊憲將香港大會堂及另外兩幢一級歷史建築，即回教清真禮拜總堂及雷生春，一同列為法定古蹟。

香港大會堂落成啓用雖只有一個甲子，但它是香港現代主義建築的地標，又是首座向全港市民開放的多用途文娛中心和中外藝術的交流平台。大會堂圖書館曾收藏弘揚國學的學海書樓藏書，公開給市民借閱；大會堂音樂廳又曾舉行多項重要典禮、會議和音樂會，因此，香港大會堂滿載着香港市民美好的集體回憶。今天，它又見證了另一場盛事，就是第一屆大灣區文物建築高峯論壇！

首屆的大灣區高峯論壇以文物建築為主題，包括保育、活化、教育推廣和社會參與、高科技應用等。三十位政策官員、專家、學者聚首一堂，交流及分享保育的經驗、知識和新策略，並共同探索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之間，在未來跨地域合作的契機，以發揮大灣區的優勢，促進彼此之間的了解，並激發創意思維，在現有的良好基礎上，深化區內各市多方面的合作，例如展覽互換、學術研究、人材培訓和交流、文創產品研發、文物建築保育科技研究等，攜手推展文物保育、教育、推廣和研究的新里程，讓大灣區市民相互認識和彼此欣賞各地的獨特文化遺產。

我藉此機會衷心感謝國家文物局、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澳門文化局和大灣區內各文博單位，讓首屆的大灣區高峯論壇得以順利籌備和推展；也特別感謝香港特別行政區發展局，和轄下的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和古物古蹟辦事處，為籌辦這次高峯論壇不遺餘力、廢寢忘餐；古物諮詢委員會委員身體力行，主持高峯論壇討論環節；保育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和香港賽馬會在籌辦論壇所給予的大力支持和協助。

在此預祝「大灣區文物建築高峯論壇」圓滿成功！

蘇彰德

蘇彰德, BBS, JP  
香港特別行政區古物諮詢委員會主席

# 序 言

香港雖是彈丸之地，但蘊含豐富的歷史及文物，既有新石器時代古遺址、青銅器時期石刻、千年歷史的宋元考古遺存，也有近代的中、西式建築，這些歷史文物均見證香港的發展，是本地珍貴的文化遺產，要適切保護和傳留下去；當中，保育和活化歷史建築，讓它們融入社會，更是近年公眾和政府十分關注的議題。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發展局於二零零八年成立保育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專責為歷史建築活化向政府提供專業意見。同年，發展局推出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冀盼透過適切的修繕和活化工程，為歷史建築注入新生命，延續它們的使命，豐富它們的歷史，更令它們融入市民的生活，成為大眾生活的一部分。我十分榮幸自二零一六年起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委任為保育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的主席，領導委員會就活化計劃向政府提供專業意見，包括評審活化計劃的申請、監察現有活化項目和歷史建築維修資助計劃的運作，以及就公眾參與項目及主題研究資助計劃提供建議。

活化計劃自推出以來，已有超過二十幢歷史建築活化成不同用途，有效地連繫社區，活化後的建築會對外開放，讓公眾透過展覽、導賞和多元的活動，加深認識地區歷史、文物保育和活化的重要性。現在營運的活化歷史建築項目中，有五項活化工程曾榮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獎項，包括灣仔的「We 嘩藍屋」藍屋建築群於二零一七年榮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卓越獎項，是首次香港保育活化歷史建築項目獲得此殊榮。藍屋建築群是二戰前的民居，香港俗稱唐樓，約有百年歷史；經活化後，成為多功能建築組群，為社區提供居所和多元化服務，與社區緊密相扣，歷久常新。

保育和活化歷史建築涉及多個專業界別的範疇，包括歷史研究、建築、工程、測量、城市規劃等；在科技的日新月異和不斷提升的公眾期望下，對保育和活化工作帶來新挑戰，亦同時帶來了新機遇。這次首屆大灣區文物建築高峯論壇正好提供了專業和開放平台，讓北京及粵港澳大灣區的政府官員、學者、專家聚首一堂，交流和分享經驗，在保育和活化文物建築、教育推廣和社區參與、新科技應用的研究成果等方面進行交流，並探討怎樣利用大灣區的優勢，促進跨地區在文物建築領域的協作，增進區內對歷史文物的認識和興趣，亦可推動經濟發展。

論文集匯集了多位北京及粵港澳大灣區的政策官員、專家、學者及業界人士的文章，闡述他們對文物建築保育、活化再利用、文物教育及推廣、高科技應用、跨地域協作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並分享他們的經驗和願景，期望讀者從中得到啟迪，為將來粵港澳大灣區或其他地區在保育文物建築方面的工作，帶來更多新契機。祝願首屆大灣區文物建築高峯論壇圓滿成功！



劉智鵬教授, BBS, JP  
香港特別行政區保育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主席

11

# 文物建築保育和 活化再利用的新發展

# 香 港的文物建築 保育與推廣

蘇彰德先生熱愛文物保育、博物館、藝術和文化，並具有相關的豐富經驗。蘇先生於2019年獲委任為香港古物諮詢委員會主席；蘇先生亦是博物館諮詢委員會主席和西九文化區M Plus Collections Trust 主席、香港演藝學院校董會副主席、保育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成員、團結香港基金顧問、香港建築中心顧問等。為表揚蘇先生在公共事務的貢獻及出色表現，政府分別於2019年委任他為太平紳士及2021年頒發予銅紫荊星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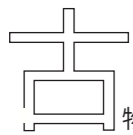


蘇 彰德, BBS, JP

# 摘要

古物諮詢委員會是根據1976年生效的《古物及古蹟條例》（香港法例第53章）成立的法定組織，就香港的文物保育向政府提供專業意見，在文物保育上擔當著重要角色。古物諮詢委員會主席蘇彰德會從委員會的法定職權範圍、歷史建築評級機制、挖掘及搜尋古物牌照審批、文物影響評估機制、推廣保育意識及保育政策等方面分享成果，讓大家了解委員會在推動文物建築保育、活化和教育的角色；以及與粵港澳大灣區日後的合作和交流的願景。

## 前言



古物諮詢委員會（下稱「古諮會」）是根據1976年生效的《古物及古蹟條例》（香港法例第53章）（下稱《條例》）而成立的法定組織，就文物保育事宜，向古物事務監督（現為發展局局長）提供專業意見。保育事宜的範圍隨著時代發展而有所遞增，現時香港特區政府會就古蹟的宣布、挖掘及搜尋古物牌照的批發、歷史建築的評級、保護、推廣和公眾參與，以及文物影響評估報告等諮詢古諮會。古物古蹟辦事處（下稱「古蹟辦」）也於1976年成立，以執行文物保育工作和擔任古諮會的秘書處，提供專業支援。政府於2008年成立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專責文物保育政策、活化歷史建築和歷史建築維修資助計劃等工作。

古諮會現時有委員（包括主席）二十名，來自不同專業界別，包括歷史和考古、法律、建築、工程、測量、規劃、社會服務、出版、商業等，是極具廣泛代表性的委員會，猶如社會縮影。



古諮會會議

## 古諮會在文物保育的角色

### （一）法定職權

古諮會屬法定組織，它的法定職權包括就古物、暫定古蹟或古蹟有關的事宜，向發展局局長提供專業意見，例如古諮會會就具重大文物價值的歷史建築及考古遺址，向古物事務監督建議根據《條例》第3(1)條宣布為古蹟；或根據《條例》第2A(1)條建議宣布為暫定古蹟。列為法定古蹟的建築及遺址必須永久保存，除非得到古物事務監督批准，不能改建或拆遷。直至2022年11月，經古諮會的詳細審核和建議下，古物事務監督已將132項重要歷史建築和考古遺址列為法定古蹟，這些法定古蹟種類繁多，有史前石刻、漢代古墓、宋代刻石、清代炮台等遺蹟，又有中式傳統建築如祠堂、書室、廟宇、衙門，以及西式建築如教堂、清真寺、法院、監獄、警署及學校等，反映香港的歷史和發展；值得注意的是，佔約半數的建築類古蹟屬私人擁有，反映私人業主愈來愈重視保育所擁有的歷史建築。在「尊重私人產權」和「平衡文化遺產保護與發展」的政策下，政府提供經濟誘因，使愈來愈多私人業主願意與政府商討「寓保育於發展」的方案，以保護他們名下的歷史建築，讓文化遺產保育持續發展。每項法定古蹟都得來不易，可幸，在各方努力下，法定古蹟的數量還是每年在遞增。

### （二）歷史建築評級

除上述法定職權外，古諮會也擔當另一個非常重要的職能，就是為歷史建築進行評級。歷史建築評級制度屬行政性質，目的是要建立客觀基礎，來釐定建築的文物價值和保育需要，評級不會影響建築物的業權、管理權、使用權和發展權。古諮會定期召開公



古諮會到般咸道官立小學實地視察

開的季度會議審核歷史建築的評級，並在會議前實地視察將被評級的建築，在會議時從「歷史價值」、「建築價值」、「組合價值」、「社會價值和地區價值」、「保持原貌程度」，以及「罕有程度」六項評審標準，深入討論建築的文物價值，為歷史建築擬定評級，即擬議一級、二級及三級（或不予評級）。會後，古諮會通過的擬議評級和歷史建築的資料會上載到古諮會網頁，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公眾諮詢。古諮會會考慮在公眾諮詢期間收到的所有意見和資料，才確定有關的評級<sup>1</sup>。截至2022年10月31日為止，已評級的建築超過1,530項，其中屬一級的有199項、二級396項、三級603項。

### (三) 審閱挖掘及搜尋古物牌照的申請

古諮會為發展局局長就挖掘及搜尋古物牌照申請方面提供意見。現時，考古學家在香港進行挖掘或搜尋古物工作前，必須根據《條例》向古物事務監督申請牌照。申請人須向古蹟辦提交相關考古工作的計劃書，詳列考古挖掘方法和程序，古蹟辦會根據三大因素審閱申請，包括申請者是否有足夠的科學訓練或經驗、是否有足夠人手及財務資源或其他資源供其運用，以及能否對挖掘及搜尋所發現的古物進行或安排進行妥善的科學研究；待古蹟辦審核後，會再交由古諮會審閱，並會對有關申請提出意見。若申請得到古諮會過半數支持，發展局局長會根據《條例》第13條向申請人批出挖掘及搜尋古物牌照。

### (四) 文物影響評估

為了確保在發展需要和文物保育之間取得平衡，自2008年起，特區政府規定所有新的政府基本工程項目的倡議部門和工務部門，必須先研究工程項目會否影響具有歷史或考古價值的地點或建築物（下稱「文物地點」）。若有影響，便須進行文物影響評估，並訂定令古蹟辦滿意的緩解措施。古蹟辦審閱及滿意文物影響評估報告後，新基本工程項目的倡議部門和相關工務部門便跟進向古諮會提交並講解其報告。古諮會審視有關報告及緩解措施後，會提供意見，及決定是否通過該份文物影響評估報告。新基本工程項目的文物影響評估報告必須得到古諮會的核准後，才可以向立法會申請撥款；新基本工程項目倡議部門亦須參考古諮會的意見，以確保文物地點受到適切的保護，傳留給後代共享。

### (五) 推廣保育意識

在文物保育方面，古諮會大力支持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和古蹟辦的文物教育、推廣和社區參與的工作，例如在古蹟辦最近與有線電視拍攝的八集大埔區古蹟的特輯中，古諮會委員與古蹟辦專業人員攜手合作，從「商貿和交通」、「祠堂和圍村」、「廟宇和社區」和「英國管治」四個主題；以「點」、「線」、「面」方式，並肩講解十多項大埔的古蹟、歷史建築和考古遺址，解構大埔的悠久歷史和重要文物，加強市民對大埔區的古蹟文物的瞭解。

古諮會亦透過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的Instagram社交媒體平台—「活歷·香港」(hkheritagelive) 及在網上報刊專欄，向市民推廣文物保育訊息和發放最新資訊，增進公眾參與和互動，使文物古蹟能活潑地呈現在市民，特別是年輕人的面前。

古諮會不時獲邀出席文物保育的活動，例如就歷史建築復修或活化工程提供專業意見、主持文物保育展覽和活動的開幕典禮、接受傳媒機構訪問、出席公私營機構的講座及分享會等。例如我早前以古諮會主席的身份出席了多場活動，當中包括代表香港在國家文物局舉辦的「亞洲文化遺產保護對話會」發表演講、為「百載鐘鳴—前九廣鐵路鐘樓銅鐘聲啟典禮」主持啟動儀式及接受香港恆生大學「恆傳感言」訪問等，期望能增進香港文物保育傳承和推廣工作的廣度和深度。

古諮會亦積極推動以「點」（即個別建築物）、「線」（即街道）、「面」（即地區）的理念來保育歷史建築。早於1990年代初已向政府建議設立文物徑，串連多座歷史建築，讓市民更全面認識該區歷史、傳統文化和生活。政府接納了古諮會的建議設立了三條文物徑，即屏山文物徑、龍躍頭文物徑和中西區文物徑。我很高興政府為了配合今屆「大灣區文物建築高峯論壇」（下稱「高峯論壇」），開展新猷，推動香港大學歷史建築群（「面」的保育）的欣賞，將香港大學內的歷史建築串連起來，活潑生動地講好它們的故事，使文物活起來之餘，更推動和培育靜態悠閒式參觀古蹟，鼓勵市民和遊客在參觀大學古蹟建築時，充份尊重在校園上課或工作的師生，確保他們不受影響。我誠邀各位出席「高峯論壇」的嘉賓到香港大學歷史建築群走走，一邊聽著古蹟建築的故事，一邊悠閒地欣賞建築的特色，體驗香港中西文化的交融和教育類歷史建築的美和深厚的文化沉澱。

### (六) 檢討保育政策

古諮會是特區政府在文物保育政策和工作的諮詢組織和合作伙伴，在政府的邀請下，古諮會於2013年協助檢討歷史建築保育政策，以應對保育的挑戰。古諮會於2015年公布《歷史建築保育政策檢討報告》，從歷史建築的保護、資源和公眾參與等方面提出建議。古諮會建議政府應提供更具吸引力的經濟誘因，例如維修資助、放寬地積比率、換地等，以吸引業主保護及適時保養私有的歷史建築；但古諮會認為政府不應強制購入或徵收私人歷史建築，亦不應使用公帑直接購入歷史建築。

古諮會的建議獲得政府接納，並逐步落實進行，包括於2016年成立保育歷史建築基金，除資助政府推出的歷史建築保育和活化措施（包括「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和「歷史建築維修資助計劃」）外，亦為公眾教育、社區參與、宣傳活動、學術研究提供資助。政府亦接納建議優化歷史建築維修資助的申請程序、放寬申請資格和資助上限，以更便利已評級歷史建築的私人業主、租用政府的法定古蹟及已評級歷史建築的非牟利機構申請資助、維修和保養歷史建築。此外，政府因應歷史建築的具體情況，例如文物價值、建築所處地段的發展潛力和價值、地段在規劃方面可提供的空間、業主意願等，制定合適的經濟誘因，並成功保存了多幢私人擁有的歷史建築，例子包括景賢里（法定古蹟）、太子道西179號店屋（三級歷史建築）、瑪利諾神父宿舍（一級歷史建築）、薄扶林 Jessville 大宅（三級歷史建築）及甘道23號大宅（一級歷史建築）等，反映新的文物保育政策的成效。

總括而言，古諮會在法定的職權範圍、歷史建築評級機制、挖掘及搜尋古物牌照審批、文物影響評估機制及保育政策方面均擔當積極和重要角色，並與政府攜手推動文物保育和教育工作。



景賢里

薄扶林道128號Jessville大宅  
(攝影: Kevin Mak, 相片由Purcell提供)

## 前瞻未來

2021年3月，國家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到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包括加強文物科技創新、實施中華文明探源和考古中國工程、加強文物和古籍保護研究利用等。國家其後於2021年10月發佈的《「十四五」文物保護和科技創新規劃》，落實文物工作的具體規定。

今年，香港政府提議發展「文化古蹟本地遊鼓勵計劃」，鼓勵旅遊業界開發和推出具文化和古蹟元素的旅遊產品，致力把香港定位為「一程多站」示範核心區及國際城市旅遊樞紐，以實踐2019年2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及國家文化和旅遊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和廣東省人民政府聯合公布的《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和旅遊發展規劃》。從國家頒布的規劃，充分看到國家對文物保育的高度重視。

古蹟、文物建築是歷史文化的載體，建構文化身份認同，我們必須繼續積極推動本地文物保育和教育工作，讓文化遺產薪火相傳，傳承下去；也透過古蹟文物吸引遊客到訪，了解香港的歷史、古蹟文物和氛圍，並與粵港澳大灣區共同建設世界級旅遊目的地。

古諮會會繼續發揮重要功能，透過委員的專業領域和網絡，在文物保育領域向政府提供專業意見，並積極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專家的合作和交流，分享在文物保護、研究和教育方面的經驗及成果，促進文物保育的協同效應，並注入創新意念，為共建人文灣區目標努力。這次的高峯論壇，古諮會也身體力行地展示對深化大灣區文物保育、活化和教育的支持。委員在這兩天的講座環節擔任主持，發揮專業所長，讓講者深入分享他們在文物研究、保育和再利用方面的經驗、挑戰、體會和見解，及分享最新修復技術和文物科技的經驗，為這個高峯論壇增添動力。

粵港澳大灣區藉著今次的高峯論壇簽訂合作意向書，加強在文物研究、歷史建築保護、考古技術、文物資源管理、文創產業、展覽、公眾參與等各方面的合作和交流，強化大灣區文化軟實力。

這次高峯論壇是粵港澳大灣區在文物保育方面的新篇章，期盼高峯論壇日後在粵港澳大灣區的不同城市舉行，增進區內的經驗和人材交流，並且加強合作。我熱切期盼古諮會在這嶄新的合作框架下，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文物保育、活化和教育上增添色彩。

## 結語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的重要發展政策，以進一步深化粵港澳合作，充分發揮綜合優勢。這次「大灣區文物建築高峯論壇」開展了區內文物保育的新篇章，藉著大灣區的發展和「十四五」的機遇，粵港澳將有更多機會在文物保育上合作和交流，驅動區內的深度融合，讓粵港澳大灣區共同推動市民互相了解和欣賞區內獨特的文化遺產和歷史，強化文化身份認同和優化文化遺產旅遊。

- 1 歷史建築評級的行政指引列明，一級歷史建築代表「具特別重要價值而可能的話須盡一切努力予以保存的建築物」；二級歷史建築代表「具特別價值而須有選擇性地予以保存的建築物」；三級歷史建築代表「具若干價值，並宜於以某種形式予以保存的建築物；如保存並不可行則可以考慮其他方法。」

# 澳門歷史建築的 活化與利用

蔡健龍工程師，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文化遺產廳廳長，多年從事澳門文物建築的修復及活化工作，負責執行澳門文化遺產保護的相關政策。



蔡 健龍



# 摘要

活化利用一直是澳門特區政府保護歷史建築的重要方式之一。本文將通過扼要回溯澳門歷史建築活化利用的發展歷程，以及介紹澳門近年開展的活化利用案例，包括：傳統中式圍里建築「永福圍」、原麻瘋病院舍「九澳聖母村」、手工業遺址片區「荔枝碗船廠」及「益隆炮竹廠」作為引子，結合以科技提升文遺傳播力及開放民間參與活化的新方向，淺析澳門歷史建築活化利用的社區連結、建築價值的重現以及活化利用的新發展。

## 一、前言



澳門特別行政區第11/2013號法律《文化遺產保護法》明確提出維護和弘揚文化遺產的一系列措施，包括識別、建檔、研究、保存、維護、保養、修復、宣傳、展示、弘揚、傳承等，以及尤其指出包括對文化遺產的各方面進行活化。多年以來，活化利用一直是澳門特區政府對保護歷史建築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當下以至未來，澳門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重點。

事實上，以「澳門歷史城區」為核心的歷史建築群是中西文化生活社區有序的組合，從歷史到今天，都與居民的生活習俗、文化傳統密不可分，由於歷史建築的文化價值是其所在社區與相關建築和場所，經長時間持續相互創造和連結所產生的結果，且隨著社會大眾對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認同及意識提高，澳門特區政府將持續推動和促成多個可連繫周邊社區的片區式歷史建築群組之活化利用工作，讓歷史建築重新融入現代社會生活，在活化功能上更著重考慮其與社會發展、社區居民生活生產活動方面的提升與促進，從而賦予歷史建築更多的社會價值和意義，促使歷史建築與社區居民兩者緊密關聯，共同發展，相得益彰。

另外，我們注意到過去三年疫情期間，人們對遠程文化遺產的體驗需求有所變化，文化遺產數字化利用的前景和潛力愈加提升，諸如透過歷史建築線上導覽和虛擬實景等技術應用和項目實施，將文化遺產從固定的地理空間搬上無空間限制的網絡平台，大大拉近居民和歷史建築之間的距離，也為闡釋理解歷史建築提供更寬闊的途徑和技術工具。以下，本文將以澳門近年開展和實施的活化利用案例為引子，試析澳門歷史建築活化利用的社區連結與建築價值的重現。

## 二、簡要回溯

回顧澳門歷史建築活化利用工作的歷程，在1999年以前，歷史建築的保護和再利用較側於關注葡式建築，其中較具代表性的項目，包括對位於荷蘭園大馬路建於二十世紀初的葡式住宅改建成為今日的塔石中央圖書館及澳門檔案館，對位於氹仔同樣屬二十世紀初興建的五間葡式住宅別墅，改造為土生葡人生活展示館、舉辦展覽和活動的空間，成為今日澳門八景之一的龍環葡韻，亦是每年舉辦「葡韻嘉年華」的最佳場所。對於原屬私人空間的葡式住宅，加以活化利用成為對社會開放的公共空間，既保留了葡式建築的面貌及其所在片區的人文氛圍，更為社會增加了可以共享利用的空間，並成為城市的地標，因此可說是澳門上世紀活化再利用工作中，成功的嘗試和較經典的案例。

澳門歷史建築活化工作在2005年「澳門歷史城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後有了長足的發展，澳門社會對本土文化的自豪感逐漸增強，居民越加關注社區歷史。2014年《文化遺產保護法》正式實施，為澳門的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據，大大提速了不動產類文化遺產的普查、評定、修復和活化利用的進程，為歷史建築活化利用提供了更廣闊的發展條件與契機。自上述法律生效至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已完成三個批次以及荔枝碗船廠片區的不動產評定工作，讓全澳被評定的不動產（文物建築）數量由《文化遺產保護法》生效前的128項增加至目前的159項，日後亦將會持續豐富。在此期間，澳門文化局對文物建築進行了大量的保護工作，秉持尊重建築「原真性」和歷史脈絡，結合社會對公共空間使用的實際需求，完成了不少對提高社區生活品質、展現社區歷史痕跡的活化再利用項目，如沙梨頭圖書館、更館、草堆街80號中西藥局舊址、戀愛·電影館等。

這時期的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吸取了國際上相關的前沿研究和保育理念，對於建築遺產活化利用的範圍和方式屢有創新，清楚瞭解到活化利用所帶來的效益，不僅有利於保護歷史建築本身，同時成功的活化利用項目對提升城市在外形象、為居民營造更好的生活品質有著顯著作用，為社會和經濟的長遠發展帶來綜合效益；同時，活化利用的對象亦從回歸前較著重的葡人大宅，擴大至昔日華人社區中具代表性的尋常民居建築。此時期的活化形式大致上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建築具有較重要的歷史和藝術價值，矢志完整保存建築物的歷史痕跡，此類項目主要由政府主導，如鄭家大屋、葉挺將軍故居、盧家大屋等，修復後成為向公眾開放的博物館式地方歷史展示、教育、觀光休閒場所；第二種是致力保留建築具文化價值和特色的部份，並因應社區對空間使用的需求加入與建築氛圍相協調的新功能，使之成為社區具特色的公共空間，例如沙梨頭圖書館、戀愛·電影館、海事工房、望廈山房等；第三種是保留建築物具特色或歷史意義部份，並通過將原建築的附屬空間進行合理改造，優化了原建築的佈局，同時增加了展示社區和團體歷史、開展推廣活動的空間，如大三巴哪吒展館、沙梨頭更館、魯班先師木工藝陳列館等，這些活化再利用案例主要是由社區或行業團體自發性為保護自身歷史，主動尋求政府支持下合作的活化項目，其相較於完全由政府主導的活化利用方式，得到社區居民和民間團體更高的參與度和投入感。



鄭家大屋



戀愛巷建築群

在不斷的活化實踐中，不難發現能夠與社區居民之間形成緊密連繫與互動的活化項目，具有更強的活力、生命力和適應性。正如沙梨頭圖書館和沙梨頭更館兩個案例，其皆位於內港一帶鄰里關係相對緊密的舊區之中，沙梨頭圖書館原建築由七幢騎樓建築組成，是昔日內港典型下鋪上居式的建築物，經修復並銳意保留原立面後，活化為社區圖書館，一方面保存了維繫社區居民情感的內港建築舊貌，另一方面通過將原屬於私人的建築活化為對社會開放的公共空間，解決了沙梨頭一帶舊區缺乏閱讀空間的實際需求，成功贏取了社會大眾對活化歷史建築的好感與支持，以實踐證明活化歷史建築對社區居民產生的多重效益。沙梨頭更館是由文化局和沙梨頭土地廟慈善會攜手合作的項目，通過對現存位於昔日華人村落，已經空置多年的更館建築進行活化，成為展示澳門更練歷史及昔日華人社區文化的「沙梨頭更館」，並由當地社區團體和居民參與日常管理，並親身述說自身社區的歷史和故事，對延續和維繫社區和民眾的歸屬感有著重要的作用。綜觀之，歷年來相較成功的活化再利用形式和案例，不論最初的保育目的為何，其均離不開社區和居民的參與，透過社區居民的帶動，新功能才能凝聚人氣，煥發活力，亦較好切合社區的真實需要。

因此，近年澳門文化局的歷史建築活化項目在規劃階段，十分注重活化目標與社區的契合度，把廣泛聽取社會各界意見，尤其當地居民對文化保護和空間利用的實際訴求與期望作為依據，同時致力推動社區居民及社會對歷史建築、社區環境的熱愛和關心，促使社區居民自主地、自覺性地推動社區歷史建築活化和文化傳承保育，協力構建在功能上受廣泛居民青睞的、與社區共生的、具有可持續性的活化方案或運營模式。

澳門居民的文化自覺性在「澳門歷史城區」申報成為世界遺產和《文化遺產保護法》的有效推行實施後逐步構建和成長，公眾對社區文化遺產、歷史建築的熱愛是澳門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歷年耕耘的豐碩成果，也為更多正在實施和未來規劃的歷史建築保護和活化利用工作帶來積極作用。接下來將透過介紹澳門文化局新近實施和規劃中的活化項目，試簡析澳門歷史建築活化利用工作的新形勢。

### 三、 片區式歷史建築的活化利用

片區式歷史建築指歷史建築相對集中、能夠較完整和真實地呈現傳統歷史建築風貌和城市肌理的片區，片區中包含不同類型的建構築物、街道和自然物，也包含當地生活文化、風土人情、生產關係，以至宗教信仰等精神內涵。歷史建築群以片區方式作保育並非新鮮事物，片區式歷史建築相比單體建築遺產所產生的區塊效應能夠更好地縫合和突出城市的整體文化價值，其包含的範圍、建築物更廣也必然與社區的記憶、環境和文化關係更緊密，更能引起居民的關心和依戀。而澳門歷史建築的文化價值大多不局限於單幢建築，還包括相連結的街道肌理以及在其中傳承的生活文化，澳門現時亦較關注上述活化利用方式，例如與昔日澳門海上貿易和經濟生產有密切關聯的內港碼頭片區、華人聚居的傳統圍里建築群、近代手工業遺址，以及糅合了中式和早期現代主義元素的葡式宿舍群建築等。

然而在片區式歷史建築活化的考慮上，不僅涉及建築本身的修復，還需對片區內在的基礎設施、公共空間與交通網絡、居住或生活條件等進行更新和優化，促使其傳統文化得到延續和重塑，亦需與社區居民進行更緊密的溝通與合作。實際上澳門一直有片區式文化遺產的保護經驗，澳門的世界遺產——「澳門歷史城區」本身就是一個片區式文化遺產網絡，城區的保育工作也涉及方方面面，通過法律、規劃、約束力意見、修復、支援等不同手段和措施，多年來對其實施了有效的保育維護、活化更新和延續傳統。所以，片區式歷史建築的活化利用成效必然將對社會發展和居民生活環境創造更大效益，從而能夠更有效地宣揚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提升居民在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的主動性和參與度。

在近年推展的片區式歷史建築活化項目，有傳統華人聚居的圍里空間「永福圍」、痲瘋病院舍舊址「九澳聖母村」、上世紀炮竹生產和木船製造業遺址「益隆炮竹廠」和「荔枝碗船廠片區」，這些尋常樸實的建築實不及教堂廟宇般宏偉，亦未如富人大宅的精緻氣派，但其承載著澳門城市發展、社會生活、經濟生產、公共衛生、慈善救濟的歷史，展現了澳門作為多元文化城市立體生動的一面，也緊緊連繫著澳門以至鄰近地區居民的情感和記憶，值得通過修復維護，注入與社區環境、文化環境和市民訴求相合的新功能，延續其連結社區關係的作用，發揮彰顯城市個性和魅力的功能，繼續為現今以至未來社會可持續發展服務。

## I. 個案一：永福圍

永福圍是澳門保存較完整的華人傳統民居和生活空間，其緊鄰「澳門歷史城區」及內港舊城區，與社區關係密切，2019年6月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將永福圍的十三間房屋捐贈予澳門特區政府，作文化保育之用。

「圍、里」有三個層面的含意，第一是地塊層面，是指填充劃分在由馬路、街道所分割的城市街廓，所形成的基層鄰里單元；第二是建築層面，是指地塊內一系列緊密排列的聯排式房屋，配套門樓、通道、水井、土地神龕等建構築物和公共空間的組合體；第三是道路層面，形態多樣，寬度約1.5米至3米，屬最小層級的道路。現時澳門約有兩百多條以「圍」或「里」命名的街道，大多在1869年前已經存在，是昔日澳門居民主要的居住空間，圍里內的公共空間更是居民日常生產作息、社交活動的重要場所，因此，對「圍、里」的保育、研究，可以尋找到昔日澳門華人社群的居住模式和生活習俗，保護「圍、里」，不僅是保護澳門特色的老民居建築，更是保護澳門傳統的鄰里生活文化。

永福圍是本澳現存較為完整、保存面積較大，較典型的傳統圍里空間，其坐落於大炮台山山腳，房屋依山勢而建，具有高低錯落、步移景換的空間佈局特色，有竹筒屋、明次間等不同的建築組合，又有水井、過街樓式門樓、西式構件等豐富的建築和裝飾元素，唯近年一直處於空置狀態，因此對永福圍開展修復活化，是社會和政府均樂見期盼的。澳門文化局於2019年初分階段進行清理、測繪、規劃、加固、修復等工作後，於2021年初將永福圍10號房屋和鄰近的公共空間闢作臨時展覽和活動空間，成為展示澳門特色圍里建築和社區鄰里生活文化的活態展示。

自2021年至今，永福圍已經舉辦了多場展覽和文化推廣活動，包括「永福圍——昔日圍里生活展」、「街坊鄰里——陳顯耀紀實攝影展」，以及與社團合作的「說書人說故事」、「永福圍——澳門高校巷、里、圍軟文及短視頻特展」，主題圍繞「圍、里」居民的生活場景、社區故事、老建築、節慶、百業興衰等內容，給予社區訴說自身故事的平台，加深公眾對傳統圍里文化的瞭解，感受「老澳門」的生活風情。

永福圍的活化讓居民重新使用社區老建築，鼓勵公眾走進澳門的老區，體驗老澳門的鄰里氛圍，增強社會對文化保育工作認同感的同時，也讓公眾欣賞、共同保育和傳承本土珍貴的文化遺產。未來，永福圍將會規劃加入與之相融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創等可持續發展元素，使之成為社區居民、本土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基地和展演平台，讓永福圍重現活力，延續其空間特色並發揮區域節點的角色和作用。

## II. 個案二：九澳聖母村

九澳聖母村（舊稱九澳痲瘋院）位於澳門路環島，是澳門痲瘋病醫療史僅存的實物見證，該院舍始建於1885年，1930年擴建成五間具折衷主義風格的房舍、活動中心（舊教堂）、連接院舍至澳門的碼頭（今已不存）及其他生活設施等，1964年痲瘋院更名為「聖母村」，並於1966年增建立面呈三角形的七苦聖母小堂，成為一個具備生活、醫療、宗教、生產的綜合型社區，並一直使用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澳門文化局於2016年起分階段對片區建築進行修復，希望讓九澳聖母村這處具有濃厚人文主義的建築片區再次煥發活力。

澳門的痲瘋病防治可追溯至十六世紀，由天主教澳門教區首任主教賈尼路，在1568年創辦仁慈堂後開始收治痲瘋病患。因痲瘋病具有傳染性，因此收治病患的院舍一直建於離群僻靜之處，其從最早期於澳門城外的望德堂坊興建聖拉匝祿痲瘋院，輾轉至1878年在橫琴舵尾島白沙欄設院舍，至1885年選址於路環島三面環海的九澳山崗興建專門收治女性痲瘋病患的院舍，並逐步成為集中收治男女病患的場所。至上世紀八十年代痲瘋病絕跡澳門，九澳聖母村完成其收治痲瘋病患的歷史任務。

自2016年文化局開始分階段對聖母村建築進行修復，為儘快開放更多文化休憩空間予公眾使用，於2019年先行開放已完成修復的空間，於2021年底正式全面開放。九澳聖母村得到教區、政府社福部門及民間社服團體的大力支持，使活化工作進展順利並得到社會積極正面的反饋，此外，該組建築群亦因其歷史價值於2021年被列為本澳被評定的不動產。

活化後的聖母村除了七苦聖母小堂仍作為宗教場所使用外，其餘建築則融入了展覽、藝廊、餐飲、銷售等新功能，其中康樂室舊址設置為展覽空間，展出了澳門檔案館近百份館藏檔案和許多珍貴照片；而四間院舍平房則成為「握緊希望」職訓實習計劃的實驗空間。該計劃是由民間機構負責管理營運，由澳門社會工作局提供支援的合作項目，為戒毒康復人士提供個別化職業康復計劃，實踐項目包括咖啡廊、展藝廊、休閒和親子活動空間等，提供包括導賞、銷售、維修、營銷和管理等職業培訓項目的實踐機會予戒毒康復人士，讓他們學習和發展不同方面的能力和專業技巧，協助其逐步重投社會。

九澳聖母村片區活化後成為政府、宗教團體、社服團體共同使用管理、運營的項目，現時每周平均到訪人流約六百人次，公眾假期達八百至一千人次。聖母村的活化不僅是使建築物得以重新利用，也不只是讓公眾走進和欣賞到片區的歷史建築和特色空間，而是承傳聖母村慈善救濟事業的初衷，記錄澳門痲瘋病慈善救濟事業的開拓性，延續其所承載的希望與愛德精神，這才是活化九澳聖母村的理念核心。

### III. 其他個案：荔枝碗船廠片區、益隆炮竹廠、媽閣塘建築群片區

除了上述兩項已局部開放的片區活化項目外，現時澳門文化局正全力推進三項工業遺產片區的活化工作，以下作簡單介紹。

荔枝碗船廠片區位於澳門路環西側海岸，是澳門現存最大的造船廠片區舊址。路環荔枝灣在二十世紀初已建有船廠，二十世紀中後期是其興盛時期，以製造各式各樣的木質漁船為主，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逐漸式微。現存船廠片區由十七個廠房地段所組成，以聯排方式沿海岸線連續展開，部分延伸至水面，構成了人工和自然環境相互融合的特色景觀。



荔枝碗船廠片區

荔枝碗船廠片區於2018年列入本澳被評定的不動產，並因應片區以及沿岸水體的價值特色，將整個船廠片區分為五個區域進行保護，製定了相應的保護條件和要求，以維護整個荔枝碗船廠片區的價值及其特色風貌。澳門文化局在2021年初接管片區部分地段後，隨即開展對片區的前期調研、場地清理、加固維護、活化設計等工作，並主動與各界溝通收集社會對活化利用的意見和期望，在地居民、造船業和漁業團體一直自發性提供活化意見，經廣泛聽取在地居民、團體組織、專家學者以至社會各界的意見及建議，現計劃優先對其中的五個地段（X-11至X-15號）進行活化，打造為既有個性化特色，傳承傳統文化，又集文創市集、休閒廣場等多功能於一身的活動空間。

益隆炮竹廠舊址位於澳門氹仔舊城區，是澳門昔日較具規模的炮竹生產工場，自1925年開業至1984年結業為止經營近六十年，是澳門僅存的炮竹工場廠房舊址，至今仍大致保留了昔日炮竹工場的佈局及環境，也由於炮竹工場土地低密度使用的特殊性，也保留了昔日氹仔的自然面貌，是一個文化遺存和自然生態共存的片區。

澳門文化局於2020年底接管炮竹廠片區共兩萬五千多平方米的土地，由於片區面積大且包含古樹名木、池塘水道等豐富的生態資源，在接管片區後隨即開展包括進行生態調研、清理和結構修繕等前期工作，為儘快開放更多文化休憩空間予公眾使用，益隆炮竹廠舊址的活化利用採取分階段的形式進行，計劃優先圍繞整個片區設置參觀步道，並對鄰近入口廣場的三間舊廠房建築優先進行修復活化，作為舉辦展示和工作坊、旅客資訊中心、文創禮品店及休閒咖啡廳等用途。益隆炮竹廠的遠期活化目標是打造成以本澳炮竹業展示為主題的特色休閒活動園區，為配合遠期規劃，澳門文化局亦已委託專業機構對炮竹廠的生態、地質、水資源等自然環境進行詳細的調研，作為炮竹廠未來在修復、活化或新增功能等長遠規劃工作的參考。由於益隆炮竹廠位處氹仔舊城區中心，對其開展活化將有利於老區活化更新、優化環境和周邊街區的整治，提高生活質量，因此受到社區居民、公眾的關注。

另外，位於澳門半島南部鄰近媽閣廟的嘉路士一世船塢及周邊建築（以下簡稱「媽閣塘建築群片區」），是一組以政府船塢舊址為中心，包含船排、牛隻和豬隻屠宰場舊址，以及昔日澳門海事辦公樓等一系列建築的片區，在空間佈局、建築設計上均具有整體特色和文化價值。建築群早年經過修復後，成為用於舉辦視覺藝術展覽、表演藝術，以及開放本地藝團借用的場地。為進一步提升片區的社會參與利用，澳門文化局正對該建築群進行活化利用規劃，並擬開放部分空間由民間及業界參與營運，以帶動該區整體活力，並綜合周邊豐富的文化與旅遊資源，營造親子遊樂、藝術與文創產業一體的多元文化設施綜合體，從而推動歷史建築的可持續利用及發揮其社會價值。

澳門的現代城市化進程起步於十九世紀末，以上的三個工業遺產包括公私營造船廠和炮竹業生產工場，都是本澳城市發展早期的工業遺存，它們的廠房過去一段時間給予公眾的印象是過時、荒廢的代名詞，然而它們卻是承載著澳門社會生產力的變革，也記載著澳門城市的發展歷史，伴隨著社區發展和成長，保護工業遺產就是保護澳門的城市發展軌跡和記憶，是澳門城市未來發展的重要資源。澳門文化局希望通過工業遺產的活化工作，挖掘和喚起公眾對自身城市和文化發展的記憶和認同感，也為工業遺產的活化利用探索更多的出路和方向。

## 四、 協力公眾參與活化保育，共創雙贏的新格局

在近年實施和正在進行的活化項目，尤其是上述片區式歷史建築的項目，不論在活化目標、挖掘新功能、管理運營等方面均看到社區居民、公眾的參與投入，隨著公眾更全面和深入地參與活化保育工作，使活化的方向走向多元化和個性化發展，逐漸轉變過往由政府主導文物建築活化工作的角色。未來，澳門文化局將會持續提升歷史建築保護和利用的公眾參與度，例如透過開放部分具條件的歷史建築予民間和業界參與運營，使其能以更符合社會需求的利用方式進行活化，實現由社會保護、由社會運營、由社會利用的目標；同時，澳門文化局正加強應用創新科技，陸續為更多對公眾開放的文物建築、文化設施增加線上虛擬導覽及現場互動體驗，豐富文化遺產和歷史建築的呈現方式，通過合適的利用，發揮文化遺產在地方文化推廣、文遺教育和文旅體驗方面的作用。澳門文化局藉著歷史建築開放民間運營、加入創新科技拓展利用和傳播的新嘗試，不斷向前推進文化遺產為社會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可持續發展、促進產業多元、擴大社會參與文化保育的願景和目標。

### I. 歷史建築維修及活化資助計劃

2022年1月1日正式投入運作的文化發展基金，優化及重新整合了澳門政府文化範疇的資助資源和職能，並新增設了支持開展有助保護文物及歷史建築項目的職能，為進一步推動社會參與活化歷史建築、使業權人更主動開展文物的維修保養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契機。

為此，澳門特區政府正在籌備推出歷史建築維修及活化資助兩項計劃，維修資助計劃是擬由政府提供具上限的資金方式鼓勵私人文物建築業權人自主開展定期維修保養，活化資助計劃擬由政府提供其擁有的歷史建築空間及適度財政扶持為誘因，鼓勵社會善用歷史建築，推出對社會經濟、文化旅遊具裨益的活化項目，以更好地推動社會參與歷史建築保護，並讓文化遺產成為支持澳門產業多元發展的動力。其中，歷史建築維修資助計劃的支持對象主要為文物建築或具文化價值建築的業權人，支持其自主開展維修保養工作，包括進行定期檢查、外觀保養及小型室內外維修等，讓他們面對建築物需要維修保養時可透過相關資助計劃申請，並讓更多從事文化遺產修復的業界共同參與。

在歷史建築活化資助計劃方面，首階段將先針對政府擁有的片區式歷史建築開放社會參與活化和經營，計劃以先行先試方式將澳門的望廈山房十二幢建築物中的十幢作為試點，當中三幢規範作為藝文展演或文化親子活動空間，其餘七幢則可靈活規劃，供申請人提交活化計劃，開發以社會需求為導向的文化消費項目，豐富澳門特色文化經營，藉着社會參與為歷史建築重新注入功能之餘，並帶來更多符合社區需求的功能和效益。

### II. 建築遺產應用創新科技增強闡釋傳播

自2020年起，澳門文化局陸續對轄下文化設施的展覽和文遺景點應用創新科技，開發線上和現場的體驗項目，包括2021年為「世界遺產——澳門歷史城區」中兩處重要景點「東望洋炮台」及「鄭家大屋」推出線上VR虛擬導覽功能。世遺景點VR虛擬導覽的開發，可讓市民在線上飽覽如東望洋炮台的風光，欣賞鄭家大屋庭園建築之美，突破地域局限獲得參觀體驗。除了持續開發VR虛擬導覽文物建築外，更將文化創意融入歷史建築中。在2021年推出鄭家大屋AR手機應用程式，公眾在現場觀賞大屋時，可通過手機應用探索屋內不同擴增實景場景，並與當中的虛擬人物和場景進行互動，鼓勵參觀者發掘屋內不同角落發生的故事，提升世遺的「耐玩性」。

現時澳門文化局正進行聖保祿學院遺址（大三巴牌坊）VR模型重構，期望透過虛擬實境技術，重現聖保祿學院遺址，尤其是天主之母教堂遭火災焚毀前的面貌。由於教堂焚毀後只剩下前壁，故此為能夠盡可能準確地呈現昔日情景，VR重構工作需要對大量歷史文獻及繪畫進行研究。此項大三巴牌坊VR項目，將會為公眾帶來全新的參觀體驗，除了重新認識聖保祿學院的範圍外，亦可探索大三巴牌坊後的教堂內部，讓參觀者重返四個世紀前，欣賞中國第一座巴洛克式教堂建築，體驗遠東第一所大學的生活場景。

## 五、 結語

一直以來，對歷史建築的活化利用，澳門特區政府皆認真貫徹執行中央政府有關《「十四五」文物保護和科技創新規劃》、《關於加強文物保護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見》、《關於讓文物活起來擴大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的實施意見》、《關於進一步加強文物工作的指導意見》的指導，加強對歷史文化資源的活化利用，大力推進讓文物活起來，不斷推進歷史建築的活化和開放利用，鼓勵並積極引導社會力量參與建設，近年亦積極透過運用創新科技，以線上線下結合的推廣方式，加強文物價值的闡釋和傳播，促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創新利用。與此同時，讓文化遺產成為促進澳門城市面貌和社區環境、提升生活質量，為諸如文化旅遊、文化事業及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動力。今後，我們將在更廣泛、更有效促進文遺資源的社會參與和利用方面不斷進行探索，期望通過開拓更多可融入都市發展的保育工作和政策，營造積極進取的歷史建築保育氛圍，讓文遺保護成為社會共識，並和社會一同前進發展。

# 大館解鎖



鍾妙芬 博士

現職大館古蹟及藝術館文物事務主管，此前曾擔任香港何鴻毅家族基金會的營運總監、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亞洲藝術部主管及中國藝術部策展人、蘇格蘭國家博物館的中國藝術部策展人、英國愛丁堡大學講師。她為一名藝術史學家，研究範疇包括中國藝術和建築，曾發表大量相關著作。

# 摘要

中區警署建築群保育活化成為大館古蹟及藝術館，獲譽為保育計劃中的典範，榮膺國際獎項和認可。中區警署建築群包括三座法定古蹟——前中區警署、中央裁判司署和域多利監獄，原本設計作多種維護法律及秩序的用途，高牆內大部分建築並不對外開放。香港賽馬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合作保育活化建築群，為古蹟賦予新生命與特色。大館成功轉型為展現原真性和充滿活力的文化體驗勝地，貢獻香港文化活力和創意才能，自2018年開幕以來接待超過一千萬位訪客。

這篇論文強調大館的保育與活化再用，背後必要和互相關聯的元素，以及當中艱難的抉擇：古蹟的意義和價值——保育計劃如何使用國際規範及延續原址的歷史、建築和社會文化價值，管理層面和文化節目決策是如何尊重古蹟的意義；更新變化——如何採納與協商改變，順應多變脈絡下的新用途；連結大眾和都市環境——考慮到場址與周圍都市景觀的關係，這個計劃怎樣引入公共參與；文化介入——各種歷史詮釋和藝術節目、活化空間、其他用途和措施，如何平衡文化、社會以及經濟效益以持續發展。

在解鎖重開後，另作新用的大館依然擁護昔日的精髓，不只透過歷史建築展現那無容置疑的古蹟意義，更透過與香港這座演變之城，還有香港和大灣區以及全球脈絡關係下，定義更廣泛的藝術文化，與社會急切議題作當代互動。

## 高

牆重圍，座落在中環山坡上的中區警署建築群由前中區警署、中央裁判司署和域多利監獄組成，其歷史可追溯至1840年代。建築群經歷不同時期的發展階段，曾作多種維持法律與社會秩序的用途（圖1）。堅固高牆以及巨大雄偉的建築，代表著權威、安全和穩定。本地華人稱警察總部大樓為「大館」，在一般人心目中，此地是權力與階級的象徵。

這座歷史建築群在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仍在使用的。1995年，香港政府將中區警署、中央裁判司署及域多利監獄列為法定古蹟。2003年，政府開始考慮古蹟的活化計劃。2006年，建築物正式退役騰空。2008年，香港賽馬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合作，並領導大館古蹟保育與活化再用計劃，願景旨在保護、修復與轉化這座歷史古蹟為「大館古蹟及藝術館」，成為為香港注入文化活力與培育創意才能的文化樞紐。

保育計劃由三間著名建築師事務所——赫爾佐格和德默隆（建築師及總體規劃）、貝美建築（保育顧問）、嚴迅奇建築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執行建築公司）與香港賽馬會、發展局和古物古蹟辦事處合作而成。大館獲譽為保育項目的典範，榮膺多個國際獎項與認可，包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卓越獎項、2020年度香港優質建築大獎香港建築項目（翻新及活化類別）、2021年度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國際卓越獎。這

些獎項和認可「讓人們有信心相信香港能實現國際級的保育項目」（Phillips, 2021）。此外，正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獎項評審表示：

中區警署建築群蛻變為世界級的古蹟及藝術館，在城市商業區創造了一個充滿活力的全新公眾空間。<sup>1</sup>

前身為集合執法、司法與監獄的深鎖禁地，如今解鎖開放，成為古蹟、藝術與消閒的勝地。更重要的是，透過活化再用，它為大眾提供了一個無障礙及共融的開放空間。自2018年開幕以來，大館已接待超過一千萬位訪客（圖2）。



圖1 中區警署建築群由三個法定古蹟組成：前中區警署、中央裁判司署和域多利監獄。

從一張大館航拍照片可以察覺一個驚人的現實：這座歷史建築群，在現代高樓簇擁下變得相形矮小（圖3）。遙想在十九世紀中期，這裡本來是「寬敞，而高聳」（*Chinese Repository, Vol. XII,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1843*; 引自Holdsworth & Munn, 2020, 頁4）。當時贊善里民居能清楚瞭望南面的監獄操場，這引來疑慮，因此設計上曾考慮圍牆高度與望向監獄的視線（圖4）。時至今日，今昔建築的高矮差異更為明顯，列為古蹟的低矮歷史建築群被摩天大樓圍繞，這種城市新面貌，被喻作「城市遺產浴缸」（Turner, 2021, 頁16）。就像201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關於歷史性城鎮景觀的建議書》所述，歷史古蹟與周遭城市景觀具有一定的相互關係，這提醒了我們保育與活化再用必須考慮更廣泛層面的環境變化。歷史性城鎮景觀提倡以整全概念看待都市遺產，視古蹟為城市發展的文化、社會以及經濟資產。

這篇文章深入研究大館保育與活化再用，其背後必要和互相關聯的元素，以及為回應二十一世紀的挑戰所需要的重要考慮。文中亦就以下問題作探討：古蹟保育除了保護與復修歷史建築，還有什麼目的？若然推行古蹟保育和活化再用是為了服務社會，那麼大館為誰服務，又如何能成功做到這一點？



圖3 2018年航拍圖像，顯示大館歷史建築群及其周圍的城市環境。



圖2 自2018年開幕以來，大館古蹟及藝術館已接待超過一千萬位訪客，成為香港一個受歡迎和充滿活力的文化目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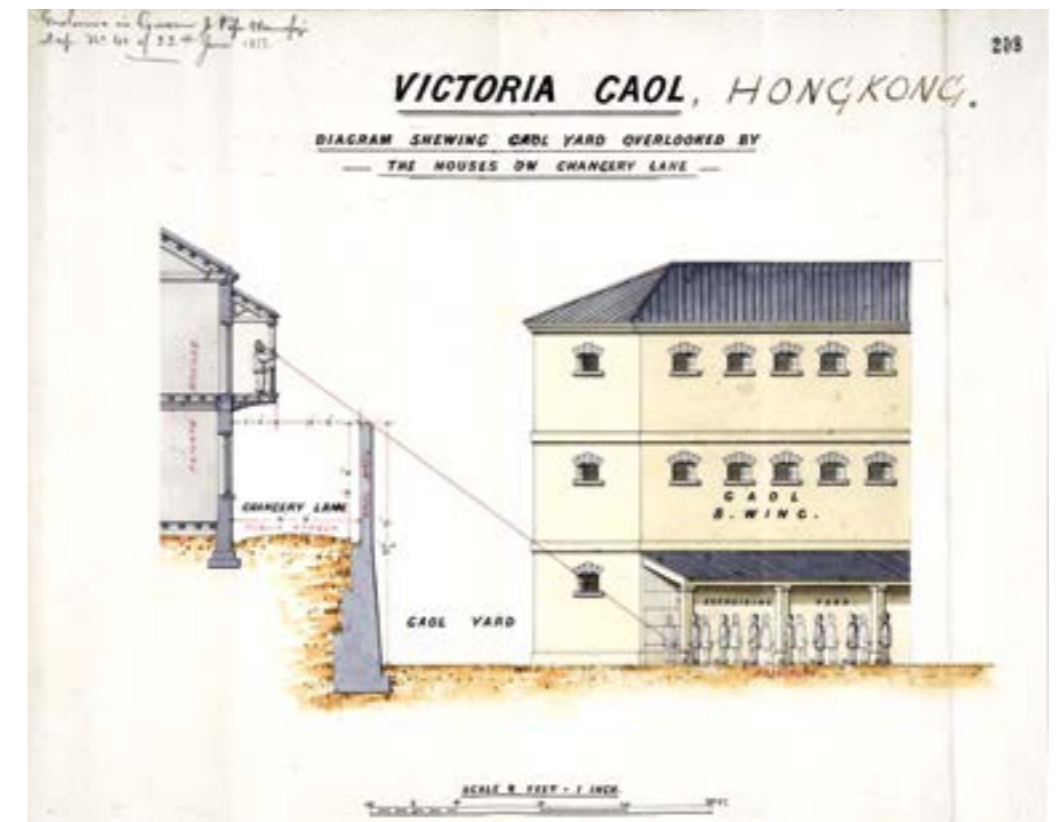


圖4 圖中顯示了監獄操場能被贊善里民居清楚瞭望。圖片由英國國家檔案館提供。



## 古蹟的意義和價值

大館保育計劃採用了價值為本的方針，遵循國際規範與原則，例如：《布拉憲章：澳洲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文化遺產保護憲章》（2013）；由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中國國家委員會制定、經國家文物局批准的《中國文物古蹟保護準則》，或《中國準則》（2015）以及Historic England制定之《保育原則、政策以及指引》（2018）。

保育活化大館的關鍵在於確立古蹟的文化意義，透徹理解它為何如此重要、對誰而言重要。這個方針呼應近年的保育思潮，思考保育古蹟的意義和目的。《布拉憲章》（2013）提出：

「保育」是指保護某一場所以保存其文化意義的一切過程。

貝美建築所撰寫的《大館保育管理方案》，提出了全面理念框架以確立古蹟的文化意義。<sup>2</sup>此總體規劃是制定保育建議和方案的重要工具，指導有關過程和持續管理的決策，以確保古蹟的意義與價值為未來得以保存、詮釋和揭示。

除了到英國國家檔案庫和香港多個檔案庫進行文獻研究外，前期工作亦包括實地調查、搜集原址證據、考古發掘以及分析建築元素，以制訂總體規劃（參見Purcell, 2019）。保育管理方案從多個角度界定大館的文化意義，包括歷史、建築、社會文化、技術、證據和考古價值。然而需注意的是，保育管理方案並非是古蹟意義的唯一論述。它提供了參考框架，並沒有排除其他歷史詮釋和文化遺產的多元論述。



圖5 域多利監獄多元族群的員工，由歐裔人、印度裔人和華人組成，約1905年。



圖6 設計風格結合了歐洲建築元素、中式瓦頂和在地適應性的考慮，如通風遊廊和百葉窗。

大館的歷史價值，部分來自它原來作為執法和刑事司法的場所，建築群見證警察、司法與監獄文化隨年月流逝而演變。它也提供了不同族群在此地交匯的故事背景，這些相遇塑造出香港多元族群和文化歷史，並以不同形式呈現，如隔離、歧視、共存及包容（圖5）。

建築群的地理環境與都市歷史息息相關。大館位處中環核心地段，沿著荷李活道是對比鮮明的鄰里社區（Holdsworth & Munn, 2020, 頁6）。它的東面是洋人區，西面是華人區，北面一直延伸至海邊是商業與金融區（現在依然如是），南面有著傳教士和宗教機構用地，以及富商在半山的房產。時至今日，大館建築群與其他重要文物古蹟，連同自然風貌和文化景觀一同建構香港的城市遺產。

二戰時期香港保衛戰期間，建築群曾被炮彈擊中受損，亦曾被日軍警察（即憲兵隊）佔用。1970和80年代因應越南難民潮和無證移民人數激增，監獄囚室被改建為拘留間，供入境處作遣返安排之用。這一切和大館相關的歷史，是香港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些片段將戰爭、管治、機構制度發展等重要主題，以及本地和國際史上重大變遷和當中許多人的命運編織在一起。

與此密切相關的是場址的考古價值，它為部分建築地基提供了實質證據（如C倉監獄以及域多利監獄放射型囚倉）。另外亦有檔案和建築考據，證明建築物的歷史用途（Purcell, 2019, 第1卷，頁195）。

就建築價值而言，大館對香港建築史尤其珍貴。香港都市發展如此急速，現今尚存的歷史建築，無疑是都市變化的印記。大館建築群展現了十九世紀中期至二十世紀初特有的多種設計風格、建築材料和技術發展，其中許多是融合英式（歐州式）和中式的獨特結合。不論是採用歐洲古典風格造出令人目眩的外觀和佈局（如營房大樓、中央裁判司署和警察總部大樓），或展現建築獨特概念、設計和功能（如放射式囚倉），又或是適應本地環境的實用考慮（如寬敞遊廊、百葉窗和中式瓦頂），大館建築群是中環商業中心珍貴宏偉的建築地標（圖6、7）。



圖7 中央裁判司署立面，建於1914年。



圖8 這幅位於域多利監獄入口處的小教堂壁畫，在保育過程中被發現和修復。

此外，大館的建築歷史讓我們理解設計風格、工藝技能、物料技術在香港、亞洲和國際的跨區域網絡之間的傳播。以物料為例，建築群展示了花崗岩、木材、石灰泥、粉刷砂漿用的波特蘭水泥、混凝土、鋼鐵、鑄鐵、磚瓦等建材的歷史（Purcell, 2019, 第1卷, 頁193），顯示出建築發展兼容本地知識與海外技術的特色。

大館的社會文化價值與它在香港人心中的地位息息相關，這一點從公眾對保育古蹟所表達的強烈意見和深厚情感可見一斑。2006年，正當政府決定活化大館時，中區警署古蹟關注組因而成立，為建築群的未來用途提供公眾意見。經過網上問卷調查以及登報邀請市民發表意見後，社會大眾表達了對建築群應予以妥善保存。公眾尊重文化遺產的聲音舉例如下：

這座百年歷史古蹟見證了香港發展，充滿了香港市民的集體回憶，亦是我們和後代的無價遺產。<sup>3</sup>

總結上述內容而言，所有這些價值建構出大館建築群的重要文化意義。透過深入理解其有形和無形的價值，才能令保育計劃實現古蹟的完整性和原真性。

保育過程是跟隨有條不紊的程序，包括評估建築物的元素和結構狀況，識別復修需要，進行科學研究與分析，而得出工程的解決方案。一如既往，保育過程包括專業判斷，有時還需要作出艱難抉擇，以平衡保育的完整性、原真性、安全性，以及遵守新建築條例和無障礙設施等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保育研究過程，加深了我們對古蹟特性的認識，特別是建築結構和所用物料。例如通過油漆分析和重新應用早期配色（早於「警察藍」之前的配色），部分歷史建築外觀大幅改變，其美學風貌得以恢復。復修過程中發現新的實物證據，例如教堂壁畫和D倉拱頂磚砌天花，亦加深了我們對過往活動和設計的認識（圖8）。同時，工匠在修復石膏線及傳統中式瓦頂過程中，使用的工藝已不復當年般常用，他們的參與有助保存這些特有的工藝和技法。

## 更新變化

在建築遺產保育當前趨勢中，活化再用被視為「保育建築物的方式，同時容許尊重性的適度改動」(Cummer & DiStefano, 2021, 頁8)。《布拉憲章》(2013, 第14條)容許在保育過程中，有「重新推出某一用途」和「改造」的可能性。《憲章》(第15.1條)進一步提出：

改變程度與用途應取決於古蹟遺產的文化意義及其合理詮釋。

保育計劃一開始已經考慮活化再用大館成為一個文化樞紐。因此，保育過程謹慎考慮結合復修工作、改建和再利用，藉此地盡其用。監獄囚室便是一個好例子。監禁囚犯在重圍內的囚房，如不作出空間改動，則難以改作其他用途。解決辦法是保留部分監倉建築物(B倉及E倉)以及現存D倉部分囚室，同時接受其他區域可以作改動(圖9)。



圖9 其中一座監獄建築物B倉保留了其原真性，以作古蹟詮釋。



圖10 「賽馬會藝方」設有展覽廳展示尖端的當代藝術，是創新和實驗的活躍場所。

另外，復修大館作新用也包括現代基建和設施建設、解開原來大樓之間曲折的路線、開設新入口和橫跨整個場址的直接通道、建立天橋連接建築群到中環至半山自動扶梯系統和中區人行天橋系統等等。

當中最顯著的改變，無疑是兩座標誌性建築物的落成：「賽馬會立方」和「賽馬會藝方」，為公眾參與藝術文化活動提供了全新設施(圖10)。考慮到場地是高牆重圍內的封閉空間，增加新設施需要拆除部分重要性較低的後期建築。由赫爾佐格和德默隆設計的大樓以鋼筋水泥建造，表面是鋁質鍍層，使用回收工業物料(汽車輪胎)循環再用而成。鋁質磚形成的立面呼應紅磚大樓的磚塊和花崗岩牆。兩座大樓在古蹟添上新改變，其設計和特徵明顯與歷史建築和而不同。這兩座標誌性建築設有數個白立方展廳提供當代藝術展覽，以及一座綜藝館作表演藝術和文化活動。大樓作為嶄新的建築表現，把大館重新詮釋為前衛大膽、凝聚創意的文化目的地。

這個遵從業內最高標準而獲國際獎項的保育計劃，加深了公眾理解古蹟保育如何促進文化發展。終究，保育與活化再用能讓大眾不斷建構文化遺產賦予的身份認同和意義。

## 連結大眾和都市環境

大館保育項目及其文化介入視大眾為計劃核心。自從政府決定重新發展大館，公共參與反映了強烈社區感情，對大館的保存和活化期許甚高（參見Purcell, 2019, 第1卷, 頁88）。當香港賽馬會和政府合作，領導大館保育活化計劃時，過程包括持續諮詢專家和持份者，同時亦委託專家撰寫報告，舉行會議和收集意見，廣邀建議，共同塑造計劃成果。

以赫爾佐格和德默隆建築師事務所的當代建築設計為例，早期建議書曾提出以鋼筋玻璃建造的高塔構架，樓高約426呎至525呎，綽號「竹棚大樓」。當公眾對這個方案表達了不同的觀點，指大樓的高度且設計概念與周遭社區格格不入，設計概念最終被捨棄（Law, 2008）。同樣的公共參與可見於討論F倉去留所引起的辯論（參見Purcell, 2019, 第1卷, 頁88）。曾有建議拆除這棟大樓，以騰出空間予新大樓。F倉在1931年建成，曾一度用作印刷工場，後來改為收押中心，設有探訪問讓親友探訪囚犯。在這些例子中，讓公眾參與決策過程，意義何在？專家和市民一起理解建築物的歷史，藉此根據古蹟意義輕重，決定何者需要保存。在價值為本的保育過程中，公眾參與可以提供與廣大持份者交流的新模式，回應古蹟所處的環境挑戰，令古蹟更適切現今世代（Avrami等, 2019）。

昔日對外封閉的大館多年後終於開放，其中一個挑戰是締造和加深場址與社區的關係。這意味著重新確立公眾與大館新身份的關聯性，並尊重古蹟的價值。建構與社區的關係是持續不斷的過程，這過程尤其關係到大館的周遭鄰里。早在2018年5月對公眾正式開放前，大館設立兩日特別預覽，讓街坊與大館重新接觸，享受全日節目、娛樂活動和茶點。開放前的傳訊策略是讓市民大眾看到大館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遺產，而不是另一個為外地遊客而設的旅遊景點。因此大館特意安排首場古蹟文物展覽《大館一百面》，展示超過100位街坊的故事，以突顯他們與大館無數的聯繫。而當代藝術的開幕節目之一，則為本地新秀藝術家蘇詠寶（生於1985年）的個人藝術展，作品著重她在附近一帶的成長經歷以及家族與中藥的淵源。這些均為建立社區連結，讓古蹟的意義和價值提升，成為整個社區的資產。

隨著大館開幕後正式營運，就場地啟動對鄰里的影響，不斷與社區交流，邀請他們提出意見，如在噪音管制和地方營造這兩方面。久遠的從前，犯人受體罰叫喊聲與瘋子「可怕的哭聲」交織，「使整個醫院或監獄陷入一片騷動」（*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6 July 1878; 引自Holdsworth & Munn, 2020, 頁4）。如今監獄操場、檢閱廣場和其他區域為社區提供了新的公眾空間。為籌備第一屆大館操場音樂節（2019年11月柏林藝術節）（圖11），館方在贊善里的數個大廈天台安排一系列聲音測試，以選出最理想的聲響系統，平衡觀眾最佳體驗同時堅持不干擾附近居民。大館操場音樂節為鄰居獻上預演音樂會，表達善意，致力讓大館成為負責任的鄰居。

此外，大館亦舉辦社區工作坊，邀請鄰居和居民重新想像監獄操場和E倉低層（前身為監獄洗衣房），以啟發大館開放空間的創意運用。這些工作坊為配合特設專題展覽《街角巧現》（2021年夏）而設計。展覽發掘社區內公眾空間活用的巧思，以顯示人與地方的聯繫。展覽和相關工作坊跨越大館的圍牆，展示都市空間的流動性和創新，並發揮社區潛能，引發意義深遠的轉化。公眾對大館開放空間重新構思，帶來更多綠化地帶和戶外公共座位。



圖11 Ute Lemper在大館監獄操場的現場表演，是2019年柏林藝術節的重點之一。

## 文化介入

透過保護古蹟、推廣當代視覺與表演藝術的各類型文化節目、以及提供休閒活動、創意行業及公共服務（書店、畫廊、零售商店、餐飲和款待），大館是一幅文化拼圖，蘊含各種有形和無形的複雜性，亦是一個豐富文化和都市體驗的綜合環境。

當原址的歷史用途不可重現，而新用途另有不同節奏和形式，到底該怎樣延續歷史建築的價值？如何繼續建構古蹟被賦予的新意義，以及延續建築本身承載的記憶？

透過詮釋歷史古蹟、表達創意等文化介入方式，輔以數碼技術，可以加深理解歷史及古蹟的不同層面。古蹟詮釋是大館文化節目的重要一環，以揭示和加深古蹟的意義，目的在於激發思考和反省歷史、培養尊重古蹟之態度、建構切合當代的意義、以及促進跨領域對話。此外，教育項目和公眾學習能引領訪客欣賞人類共同遺產，衍生出額外的社會價值。

必須承認，歷史與文化遺產總是有爭議的。《大館保育管理方案》或許已清楚闡明古蹟的文化意義，提供保育管理決策方針。然而大館歷史錯綜複雜，自然而然衍生出多種論述。有關大館歷史的近期學術研究，提供了更多具代表性的故事，同時提醒我們在建築群磚石下亦有一些昔日痛苦的故事（Holdsworth & Munn, 2020）。提升古蹟之價值不僅是由專家領導，亦可以由社區帶動，尤其通過口述歷史，容納公眾多元聲音。這樣，對文化遺產的詮釋，不但保留了歷史尊嚴，亦可以「賦予新精神和情感，以確立新價值」（Turner, 2021, 頁15）。

如今，大館是香港最多人到訪的文化地標之一，過半數訪客是再次到訪的參觀者。除了精心保存歷史建築之美學魅力，大館更以365日不間斷的節目展示文化活力，持續吸引訪客再度來訪，當中大部分都已成為「大館Fans」。透過當代視覺與表演藝術節目和其他生活時尚活動，凝聚創意、才智與沉思，使大館的潛能得以發揮。除了藝術節目憑藉啟迪與沉思的力量滋養靈性，亦有傳統節日特色的慶祝活動，以及一些社會參與項目，如「動戲·童迷香港藝術計劃」藉戲劇和藝術為兒童和青年賦能（圖12）。大館提供了文化對話的平台，對現今社會重要議題作跨學科探索，並將古蹟和藝術融合可持續發展。當中相關主題包括公共衛生、勞工、科技、邊界、自然、性與性別、身份認同以及多元文化等等。可以說，大館作為香港重要文化地標，其獨特潛能是在當代社會關連性、文化節目優越性、以及古蹟原真性三者之間作出平衡。

這種整全策略，強調以古蹟與藝術為主題的文化項目不只帶來內在轉化經驗，改善生活品質和身心福祉，同時亦透過創新、公共參與、社會共融、社區營造、推廣創意文化產業和服務行業，以創造其他社會、環境和經濟效益。在這方面，古蹟保育呼應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倡「文化是可持續發展的動力」，亦肯定「以人為本的城市，同時也是文化為本的空間」的理念（參見UNESCO Director-General, 2016, 頁1、28；UNESCO Director-General, 2018）。

相當重要的是，正如Richard Engelhard (2020) 在分析古蹟保育的未來方向時提出，除了平衡保護文化遺產和其他社會經濟效益，更要認識到「保護社區資產在未來可持續發展中所扮演的根本和關鍵角色。」如此一來，古蹟不但受尊重和保護，作為社區資產，同時與反映當代社會的新價值互相影響。這一切相輔相成，使古蹟得以長存。

大館古蹟及藝術館的使命如下：

我們通過保育、活化和持續發展大館，令其成為香港最真實和充滿活力的藝術文化目的地。透過與眾不同和多元全面的文化體驗及創新合作、守護和傳承寶貴的共同回憶及起源、激發公眾的好奇心和無限創意，以及培育人才和成就非凡卓越，務求令大館成為國際知名的香港文化及消閒地標，從而提昇本地社區之自豪感和凝聚力。

如何可知大館成功實現其願景和使命？觀眾又如何評價大館？觀眾在大館的文化體驗中獲得什麼意義？為了評核節目成果和整體機構影響力，大館採用了「Culture Counts 評核系統」，一個由業界開發的衡量框架來進行以觀眾為本的項目評核，以理解參觀者的體驗。觀眾問卷囊括「文化」、「社會」、「經濟」、「公共」和「環境」等多個領域。2021年度調查結果顯示，觀眾一致強烈同意大館的文化節目豐富了「美學體驗」（96%）及「意義」（84%），激發了「創新」（95%）與「好奇心」（88%）。評核大館能否讓觀眾感受「人類共同遺產」或者「歸屬感」時，總體中位數為81%。評估「地方感」總體中位數為82%。由國際評審撰寫的數據分析所得，證明「大館（在2021年）非常成功地確保觀眾在參觀過程中感受到喜悅、美和靈感啟發。」而且「大館成功幫助訪客了解、欣賞、並且感到與建築群的連繫」（Culture Counts, 2022）。2021年期間另設有一份額外問卷評核觀眾對大館的體驗，訪客給予非常高的82%中位數，肯定大館成功「增添了此地方的文化生活色彩」。

總結而言，活化再用作為保育方針是持續不斷的過程，遠超出只為修復建築的工程項目。守護、保存、長期管理古蹟需要一種駕御變化的能力，以回應社會需求和21世紀的挑戰。大館依然擁護昔日精髓及其無容置疑的古蹟意義；同時與當代社會、文化、環境等急切議題作互動，為場址添加新價值，豐富未來的遺產。這一切都回應香港這座演變之城，還有香港和大灣區以及全球脈絡關係下的新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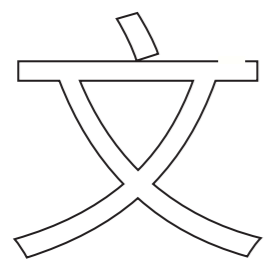


圖12 「動戲·童迷香港藝術計劃」藉戲劇和藝術為兒童和年輕人賦予能力。

## 參考書目

- Australia ICOMOS. (2013). *The Burra Charter: The Australia ICOMOS Charter for places of cultural significance*. Burwood: Australia ICOMOS.
- Avrami, E., Mason, R., Macdonald, S., & Myers, D. (Eds.). (2019). *Values in heritage management: Emerging approaches and research directions*. Los Angeles: The Getty Conservation Institute.
- China ICOMOS. (2015). *Principles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heritage sites in China* (rev. ed.). Beijing: Wenwu Chubanshe.
- Culture Counts. (2022, February). Tai Kwun annual report [2021]: Tai Kwun Centre for Heritage and Arts.
- Cummer, K., & DiStefano, L. D. (Eds.). (2021). *Asian revitalization: Adaptive reuse in Hong Kong, Shanghai, and Singapor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Engelhardt, R. (2020). Overview: Twenty years of the UNESCO Asia-Pacific Awards for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2000-2019). In UNESCO Office Bangkok and Regional Bureau for Educ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Asia conserved, vol. IV: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UNESCO Asia-Pacific Awards for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2015-2019* (1-4). Paris, Bangkok, and Nanjing: UNESCO, UNESCO Office in Bangkok, and Nanj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 Historic England. (2008, April 23). Conservation principles, policies, and guidance for the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historic environment. <https://historicengland.org.uk/images-books/publications/conservation-principles-sustainable-management-historic-environment/conservationprinciplespoliciesandguidanceapril08web/>
- Holdsworth, M., & Munn, C. (2020). *Crime, justice and punishment in colonial Hong Kong: Central Police Station, Central Magistracy and Victoria Gaol*.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Law, V. (2008, Feb 6, correction appended Feb 14). Herzog & de Meuron face opposition in Hong Kong. *Architectural Record*. <https://www.architecturalrecord.com/articles/4220-herzog-de-meuron-face-opposition-in-hong-kong?msclkid=bc32b954a8d711ec854cca87d41f1dbd>
- Phillips, S. (2021, July 22). Tai Kwun wins RIBA International Award. <https://www.purcelluk.com/news/tai-kwun?msclkid=7c5343e9aa8a11ecb06167dbdb8ce964>
- Purcell. (2019, May). Tai Kwun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Plan. 2 vols.
- Turner, M. (2021). Adaptive reuse within urban areas. In K. Cummer & L. D. DiStefano (Eds.), *Asian revitalization: Adaptive reuse in Hong Kong, Shanghai, and Singapore* (13-17).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UNESCO. (2011). *Recommendation on the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Paris: UNESCO.
- UNESCO Director-General. (2016). *Culture: Urban future; global report on culture for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Paris: UNESCO.
- \_\_\_\_\_. (2018). *Culture for the 2030 Agenda*. Paris: UNESCO.
- UNESCO Office Bangkok and Regional Bureau for Educ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2020). *Asia conserved, vol. IV: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UNESCO Asia-Pacific Awards for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2015-2019*. Paris, Bangkok, and Nanjing: UNESCO, UNESCO Office in Bangkok, and Nanj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 1 有關由國際保育專家組成的評審團的完整評論，參閱UNESCO Office Bangkok and Regional Bureau for Educ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2020, 頁290。
- 2 最初的保育管理方案由Purcell (當時的Purcell Miller Tritton LLP) 於2008年6月制定。2013年進行了中期回顧，以審查建議和政策。在2019年5月準備了進一步的撰寫，納入了十年保育過程中獲得對古蹟的大量知識，加深研究。參見Purcell (2019)。
- 3 摘自關注小組為保存中區警署建築群而製作的小冊子 (2003年)；引用於Purcell, 2019, 第1卷, 頁192。



# 物保育與活化 歷史建築

## ——中環街市的故事

蔡宏興建築師是華懋集團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在物業發展範疇擁有超過30年的管理經驗，並曾於世界各地擔任專業建築師。他曾任南豐集團董事總經理及福斯特建築事務所董事，亦曾為香港政府、機場管理局、港鐵公司、市區重建局、加拿大公共工程、卑詩省建築公司提供專業服務。專業職務以外，他亦在多個非政府組織和專注於社區、設計和創新範疇的專業機構中，擔任領導職務。現為香港建築師學會及香港城市設計學會會長。



蔡 宏興



# 摘要

毫無疑問，每個地方的文化遺產和具歷史價值的舊建築都應得到保育。然而，並非所有歷史建築都可復修或重新營造，故此全面的復修不一定要使建築物回到從前最原本的面貌。不適當的復修甚至可能無端破壞建築物的部份歷史價值，而這些價值是來自該建築長期在社區所擔當的不同角色。而且建築物就原設計所曾作出的部份改動，可能已變得具有相當藝術價值或歷史意義，如此我們更不應堅持將建築物回復原貌。

隨着時間推演，人們的需求亦與過去不同。歷史建築需要現代元素的介入才能延續生命，而非如同木乃伊成為博物館收藏品。本文將以香港中環街市為例，討論活化歷史建築面對的挑戰，包括如何做到保存建築物的原貌並帶出其歷史內涵之餘，亦可滿足當前功能上及活化再利用所需。

## 在

這篇短文中，我將分享最近我在中環街市活化項目獲得的經驗，探討香港現時對歷史建築、文化遺產保育的實踐。自2020年起我參與中環街市活化的策劃，包括將之翻新及改造後的後續營運，當中有三個要點可作分享。第一、我們應當將建築環境的保育項目，看待成一項集體參與的社會實踐，為市民的共同回憶注入新生命力，而非單純一個孤芳自賞的建築項目。建築物可以是一個地方引以自豪的地標，勾勒出最初建造時的社會面貌、歷史和往後的變化；第二、隨著時代變遷，並非所有舊建築都需要保存或恢復原貌。個別情況下，基於安全角度以及功能過時等因素，堅持將建築完全保護或保育復修也不合時宜；第三、「活化再利用」(adaptive reuse) 是保育歷史文物建築的一種實用策略，翻新後的建築更可滿足當下社區需求。而在「活化再利用」過程中，慎防「偽修復」(fake restoration)，以免翻新時破壞舊建築的歷史價值。然而，建築學上的「抹去重寫」(palimpsest) 概念，對舊建築翻新和活化都有著重要參考價值，透過這概念有助為歷史建築加添多層意義，更好地向對社區道出其背後故事。

## 將保育建築環境作為集體參與的社會實踐

中國建築及文物保育運動泰斗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1972年1月9日)，深受父親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的「國家重生」政治改革思想所影響，曾提及：「建築之規模，形體，工程，藝術之嬗遞演變，乃其民族特殊文化興衰潮汐之映影；一國一族之建築適反鑒其物質精神，繼往開來之面貌。<sup>1]</sup>」

毛澤東(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於1942年5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也為文學藝術明確了方向，文藝都是為人民大眾的，不能脫離民眾生活。在毛澤東的思

維中，藝術的成品(於本文章而言就等同於建築環境中的建築物)，無論是初階還是高階，均是堅持以服務人民為導向、呈現出人民思想、反映出當刻的大眾文化，以達致團結人民的效果<sup>2]</sup>。

建築作為團結人民、令國家自豪的象徵，實非只出現在東方社會的新事。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建築師和史上其中一位最偉大的博學家——阿爾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 1406年2月14日-1472年4月25日)在其建築論文《建築十本書》中總結：「可以說，共和國的安全、尊嚴、以至榮譽，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建築[師]<sup>3]</sup>」。而在1666年倫敦大火後重建了聖保羅大教堂及51座教堂的天文學家兼建築師、皇家學會創始人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1632年10月30日-1723年3月8日)，於1670年代中期曾經提到：

「建築有著獨特的政治作用。公共建築是一個國家的點綴：它能夠建設出一個國家，滙聚人流和商機；令人民熱愛他們的國家，而這份熱情就是推動聯邦強盛的源泉。城邦競賽是令希臘偉大的真正原因，猶太人頑強不屈的精神，是源於對聖殿的鍾愛，即使跨越多個年代，依然能繼續將整個民族凝聚在一起。滿足社會體統和便捷性的需要，實乃許多城市出現的原因。現代羅馬仍在舊廢墟和仿古物中存活下來；而耶路撒冷也同樣在聖墓教堂和海倫娜其他遺跡中存續。<sup>4]</sup>」

我們應該認清，藝術和建築除了是具備功能性，在設計及建構過程中亦別具意義。所以，我們別過分沉迷於歷史決定論的教條主義思潮，要敞開心扉，抱持開放態度。195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和描繪了俄羅斯40年歷史的史詩式小說《日瓦戈醫生》作者帕斯捷爾納克(Boris Pasternak)(1890年1月29日-1960年5月30日)說：「藝術『是一種想法，一種生活的表達』，而『我從未為藝術設限，而是將之視為作品的情感羈絆和隱含意義。』<sup>5]</sup>」。

由此可見，保育文物建築不應只是建築師緬懷舊建築的興趣，更是一種集體參與的社會實踐，以利用建築環境建構共同回憶和歷史意義。建築可以為社區帶來自豪感，而建築物興建時，更是當下社會的印記。這種在特定時期的保存、變革、改寫和缺失，在歷史長河中同樣別具意義，反映社會進程期間的各種優次選擇和價值觀。更重要的是，它實際上是一個譜寫歷史的過程，而非一種靜態的歷史記錄，本文將在較後部分作進一步討論。

以中環街市案例來說，特區政府於2003年3月決定將1856年5月建成第二代街市<sup>6]</sup>、隨後於1939年重建，在同一地點營運一個多世紀的街市停運，是有揭示性的。政府原先考慮拆除建築物，並出售土地以開發甲級寫字樓，透過這項市區重建計劃為庫房帶來最大的經濟回報。儘管中環街市於1990年獲列為三級歷史建築物，原址亦具有一定社會意義，但當時政府仍相信通過招標將土地出售予價高者來充實庫房較為恰當。2004年政府恢復賣地後，該土地便被列入俗稱的「勾地表」中<sup>7]</sup>。1997年席捲亞洲的金融危

機令香港經濟持續下行，一直未見明顯復蘇跡象，這對政府而言是「憂」，但對中環街市而言卻是「喜」，當時香港樓價相比1997年的高位下跌六至七成，大家都不確定跌勢會否持續，到2003年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sup>8</sup>進一步加劇了投資風險和憂慮，導致發展商出價未能達到政府設定的底價，致中環街市多年來一直未能售出。

過去英國殖民地政府並不十分重視保育香港建築文物，保育建築文物的法例直至1976年，才在《古物及古蹟條例》（第53章）的制定下得以確立，隨之設立了古物古蹟辦事處（古蹟辦），負責保育城中的古蹟。古蹟辦對其他政府部門既沒有管轄權，亦缺乏資源，在這種情況下，由訂立《古物及古蹟條例》至1997年6月30日殖民時代結束的21年期間，香港數千座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築物當中，僅65座被評為古蹟保育。每年平均僅3項的保育成果，保育似乎是姿態多於實際。在1980至1990年代期間，多座極具歷史意義的建築物，包括具有維多利亞時代建築細節的香港會會所（建於1897年）和以豐富中國文藝復興時期美學風格設計的中華衛理會教堂（1994年拆除）都相繼被拆除。

1997年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未有即時修補殖民地時代文物保護政策的不足，直至2000年代中所發生的兩個碼頭拆卸事件，終於成為喚醒公眾對保育歷史建築文物迫切關注的分水嶺。香港舊區重建的粗暴方式，讓許多目睹自身熟悉的地方、以及身份認同被消失的市民感到無言以對。保育運動尤其得到年輕一代的支持，聲勢逐漸浩大，社區對保育文物建築的聲音也越來越高漲。隨著天星碼頭（2006年）和皇后碼頭（2007年）的拆卸引起司法覆核挑戰、靜坐和抗議，令2006至2007年成為了重要的分水嶺。儘管市民的抗議未能成功阻止拆卸，但公眾的聲音迫使政府重新審視其文物保育政策，並就如何保育歷史建築制定新方案。

2007年10月，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在其施政報告第53(2)段，宣佈將荷李活道中央書院舊址、前已婚警察宿舍（PMQ），由勾地表中剔除，逃過拆卸命運，顯見政府對遺址保育的重視。行政長官《施政報告》第51段亦公佈了項目以活化為重點，強調經濟和社會效益的全新建築文物保育政策：

「我認為歷史建築物不應單單保存，而是應該活化，發揮它們的經濟及社會效益，這樣才符合可持續保育概念。<sup>9</sup>」

此外，報告第55段確定了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的成立，以協調長遠的保護育方針：

「未來五年政府將會全力開展各項文物保育工作。為了方便公眾參與及集中統籌各項行動，我宣佈在發展局之下開設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這表示文物保育工作將會是政府長遠的工作承擔。<sup>10</sup>」

香港建築文物保育從此進入了活化保育新時代，荷李活道活化項目經已上馬；古蹟辦於2010年將已婚警察宿舍評為三級歷史建築，2012年在建築署的監督下展開復修工程，2014年改建成為「元創方」重新開放予公眾，作為「創意產業」和「創意生活體驗」的地標。

值得留意，中西區區議會於2005年至2007年期間，曾就上述荷李活道用地的未來發展，包括提供游泳池、社區會堂、公共圖書館等進行過討論。區議會進一步建議，該類公共設施將來或可設於荷李活道項目或中環街市<sup>11</sup>。稍後我將討論這個偶然性的游泳

池意念，如何在隨後的中環街市設計中重新展現。儘管中環街市較元創方更早被評為三級歷史建築，但中環街市用地直至《二零零九至一零年施政報告》才得以從勾地表中剔除，比荷李活道用地遲了足足三年時間。其後，市區重建局（URA）獲委託進行保育和活化中環街市大樓。由於項目融資過程中面對種種挑戰，期後改為公私營協作模式，讓華懋集團終有機會一同參與活化中環街市項目。在我進一步闡述中環街市最終的活化方案前，我們應先了解何以一些歷史建築或不需要全面作保育修復。

## 並非所有建築物都需要保存或全面修復至原狀

2013年澳洲 ICOMOS《文化場所憲章》（又稱《Burra 憲章》）第1.7條列明：

「修復即透過移除層跡，或在利用新物料的情況下重建，將一個地方還完到已知的最初狀態。<sup>12</sup>」

此外，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於1965年通過的《1964年威尼斯憲章》第9條清楚指出，修復是對過去的尊重，在保育歷史建築旅程中，包含著美學和歷史等雙重價值。

「修復過程是一項非常專業的操作，以保護和突顯出歷史遺跡的美學和歷史價值，及基於對原始材料和真實文獻的尊重。一旦有所遲疑便應立即停下來，任何額外工序，亦會與原本建築有別，並留下烙印。無論如何，遺跡進行修復前，都必須進行考古和歷史研究才推進。<sup>13</sup>」

城市的文化遺產和歷史建築承載著我們的集體記憶，因此有著保育的需要。由於缺乏昔日的材料和工藝，我認為要在現代進行保育復修殊不簡單。而在某些情況下，將舊建築全面修復、恢復至其原始模樣，可能並無需要或並不合適。我們應留意，改造舊建築以滿足當時社會對新功能和經濟所需是常態，建築保育概念直到18世紀仍未受到重視。隨著法國大革命（1789-1799年）期間，公物遭受到大肆破壞，才驅使了革命政府以公眾利益為由，在沒收貴族物業和教會財產的過程中進行文化遺產保護。

Henri Gregoire (1750年12月4日-1831年5月28日) 於1791年擔任國民議會主席，他提出歷史建築不但記錄了人民的成就，甚至具歷史文獻價值，因此國家應該重視文物保育，不應將之破壞<sup>14</sup>。Gregoire在其1794年發表的《關於破壞行為所帶來的破壞和鎮壓手段的報告》中創造了「破壞文物行為」(vandalism) 一詞，並總結道：「野蠻人和奴隸厭惡科學，破壞藝術遺跡；自由人則會愛護並守護它們。<sup>15</sup>」Gregoire的報告，推動了議會成立一個歷史建築委員會，負責制定防止破壞歷史遺跡的法規。Ludovic Vitet (1802年10月18日-1873年6月5日) 於1830年被任命為歷史古蹟總監督，及後於1840年擔任歷史古蹟委員會主席，在Eugene Emmanuel Viollet-le-Duc (1814年1月27日-1879年9月17日) 的協助下，修復工作得以進一步鞏固。1844年，Viollet-le-Duc 與他的導師 Jean-Baptiste Lassus (1807年3月19日-1857年7月15日) 攜手贏得設計比賽，奪得建於12世紀的法國最著名大教堂——巴黎聖母院的修復工程。該工程讓 Viollet-le-Duc 能夠促進科學地採用歌德式建築方式，實踐和完善了他的建築修復理

論。在其開創性的著作《建築學辭典》中「關於修復」章節曾提及，修復不僅僅是修復歷史建築物，當中還包括要使用更好的材料，以及更現代化的設計，藉以優化歷史建築。舉例，Viollet-le-Duc認為原建築師若果已經懂得現代排水系統，必會將現代排水溝應用於所有哥德式和羅馬式教堂建築當中。對Viollet-le-Duc來說：

「復修，s.f.，這個詞彙和這件事也是十分現代。修復一座建築物，既不是要去維持現狀、不是維修、也不是重建；這意味著要將它重新造成一個完成的狀態，實際上它在任何特定時間上或許也從未真正存在過。<sup>16</sup>」

Viollet-le-Duc認為復修師已具備原建築師的所有知識和技能，應可「以原建築師角度想像，如果他回到過去獲委派同樣的工作，會如何處理…修復對比於複製，意義應該更廣闊。<sup>17</sup>」復修可以是一種創造性行為，「重建」昔日尚未存在的東西有著其正當性。

與此同時，也有另一種與Viollet-le-Duc相反的意見。與Viollet-le-Duc同樣主導了19世紀的修復理論的拉斯金（John Ruskin，1819年2月8日-1900年1月20日），不但反對修復，亦不同意Viollet-le-Duc的修復方法。在其著作《建築七盞燈中的記憶之燈》（*The Lamp of Memory in The 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第六章中，拉斯金提出不適合修復的原因：

「要修復昔日偉大或美麗的建築，就如讓逝者復活一樣，不大可能。我在上文所堅持視作生命的東西，其意義正是由工匠的巧手和眼界所賦予，這是永遠無法複製的。另一個時代只能賦予到另一種精神，即為一座新建築，而已逝的工匠將不能重生作指揮…我們無權觸碰過去的建築，他們其實並不屬於我們。它們有一部分屬於其建造者，一部分則屬於往後不同世代的人們。<sup>18</sup>」

拉斯金反對復修，因為他看到了虛假修復所帶來的破壞，以及很容易在有意或無意間建造欺詐性的昔日建築，扭曲了人類活動的歷史認知。更重要的是，修復建築物並不保證復修後的建築物，能重新將過去的人類活動恢復，或重新再次引入建築物當中。對於拉斯金來說，復修無異於為屍體注入生命，僅僅是一個謊言。

「那就別再談復修了，這種事情從頭到尾都是騙人的。你可以做一個建築物的模型，就像你可以做一具屍體；你的模型可能有著舊牆的外殼，正如屍體可以有著骨架般，這樣有何意思？我既不在乎，也看不到其價值。但是一座舊建築被摧毀，較沉入一堆塵土、融化成一團粘土更加徹底和無情。從荒涼的[亞述城]尼尼微拾遺所得，定必較在重建後的米蘭為多。或許總有人堅持修復是必需的！儘管如此！也要檢視當中的必要性，理解其本身的價值。這必然會引來破壞，接受的話，就將建築物拆毀，將它的石塊扔掉在被忽視的角落，若然你想，就用它們做壓載物或砂漿；但請老實地做，不要編織謊言。在它發生前檢視進行破壞的必要性，你或許還能夠阻止這種情況出現。<sup>19</sup>」

顯而易見，拉斯金不認為修復是在保護歷史建築，實際上會對保育文化遺產和建築的歷史價值構成威脅<sup>20</sup>。在中環街市的修復上，我反對偽修復，將其恢復至原本的狀態，因為此舉會削弱建築物在社區中扮演不同角色所產生的歷史意義和美學價值。Viollet-le-Duc的修復方法也不提倡完全恢復到原來的狀態，而在改建過程中應謹守這一點——「我們必須嚴格尊重所有對結構添加或修改的痕跡或印記。<sup>21</sup>」

以下有兩個例子，說明舊建築經改建後，令其更具歷史意義和審美價值，說明將之復修至原狀並不合適。第一個例子是1881-1885年以新古典主義風格建造，位於上亞厘畢道的禮賓府（前總督府）。其附加建構便令建築物增添了歷史意義和美學價值。除了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日本佔領香港時期，此處直至1997年期間一直是英國殖民地港督的官邸。日本佔領者在此原始建築物基礎上所增添的一座高塔和日本屋頂，至今依然保留著。拆除塔樓和恢復原始設計，將抹去佔領時期的重要歷史印記，以及減少建築的美感。

另一個例子，正正是中環街市昔日的改動。位於中環街市二樓的24小時公共通道，及面對德輔道中改造後的門面，顯然不是1939年時原建築的特色。相關改動源於政府舊日致力興建設有自動扶手電梯行人道，以克服香港島陡峭的地形挑戰，連接半山和中環的南北。中環街市此通道，是中環至半山自動扶梯系統的其中一個部分。自1990年代初啟用以來，此系統已為數百萬香港市民和遊客所使用。自動扶梯系統的特色別具歷史意義，更曾獲CNN評為世界七大最型格的通勤路段之一<sup>22</sup>。若果因為要將中環街市恢復至1939年時的原貌，而取消這條24小時通道，將會抹去香港城市發展進程的重要標誌。我亦想藉此機會糾正公眾普遍存在的誤解，即中環街市是香港僅存的包浩斯（Bauhaus）風格建築物。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副教授李浩然於其合著的《保舊創新：香港建築保育與城市發展》中指出，舊灣仔街市和中環街市都是摩登流線型風格，屬於裝飾藝術（Art Deco）風格建築的一個派系，而非包浩斯風格建築<sup>23</sup>。

若果我們真正關心城市古蹟的保育，就必須重視修復中必不可少的元素——給予足夠資源為建築物進行適當的維修和保養。我們須謹記，建築物必然會老化，時間的流逝本身也是構成建築物的一個過程。如果我們可防止建築物老化到破舊的狀態，避免到進行修復的需要，便更理想和划算，而拉斯金和Viollet-le-Duc在這看法上也是一致，他們分別提到：

「好好保護你的歷史建築，你就不再需要復修它們了。及時在屋頂上放幾塊鉛、從排水道中掃走枯葉和枯枝，將可拯救屋頂與牆壁免於破損。<sup>24</sup>」

「事實上，保育建築物的最佳方法就是找到其用處，然後好好加以善用，從此便不再需要對建築物作進一步的改動。<sup>25</sup>」

儘管拉斯金和Viollet-le-Duc對修復和保存的見解看似大相逕庭，但當中也有兩個共通點值得借鏡。第一，他們均不主張把有關建築修復至原本的狀態。對於Viollet-le-Duc而言，復修是一次現代的嘗試，旨在將建築物「重建」到它從未「在任何特定時間實際存在」的狀態。而對於拉斯金來說，修復從一開始便不切實際，因為「我們無權去

觸碰舊日的建築」。其次，如果我們真正希望保育我們的建築環境，就必須好好保護它們，並找到其用處，而活化再利用就是其中一種保育方法。與完全保留原作品真實性的修復工作不同，活化再利用最重視的是延續建築物生命，而透過運用最新的建築干預，則可為建築物加添意義層次，記錄著人類活動隨時間推演的變化。

2021年，經活化後的中環街市重新開幕時，出現了一些對項目如何進行「復修」的尖銳批評，質疑為何項目沒有將全部歷史遺蹟、以及營運模式再融入建築當中。我會視之為善意批評，但無疑他們跌入了誤區，誤會這是個單純的修復項目。我們的確可以爭論2009-2010年時採用活化再利用的決定是否正確，但毫無疑問當前的中環街市就是一個活化再利用的項目。在活化再利用的標準下，最重要是通過結合當代的建築方法活化中環街市，從而滿足現今社區的需求，而非將一座歷史建築「木乃伊化」，成為博物館內了無生氣的收藏品。

## 活化再利用和建築學上的「抹去重寫」概念

隨著2009-2010年落實活化中環街市，時任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在2011年鋼筋混凝土建築活化再用國際研討會上，進一步確認：「『城中綠洲』」（指中環街市）並非一個由保育主導的項目」<sup>26</sup>。為鼓勵公眾參與，遂推出了一項關於中環街市用途的持份者調查，而市建局亦展出了四個建築師團隊的保育方案，邀請公眾提出意見<sup>27</sup>。在當時來說，加入民意調查和讓公眾參與決策過程是非常大膽的舉措。調查結果顯示，公眾對休閒、文化和綠色公共空間的興趣，遠高於餐飲和購物等商業活動<sup>28</sup>。2011年，最終採用由Arata Isozaki和AGC設計方案「漂浮綠洲·新市集」（UFO計劃），會在原建築的頂部增設屋頂花園、新增額外結構和地面空間。不出所料，2000年代中期中西區區議會的泳池願景雛形，在「漂浮綠洲·新市集」方案中再度重現。遺憾地，此不凡的計劃經不起經濟壓力，隨著建築成本持續上漲，加上地政總署要求市建局因改變用途和增加樓面面積支付額外地價等原因，都過於棘手，難以處理。市建局終在2015年放棄了UFO計劃，採用一個更溫和且改動最少的活化方案。市建局在2017年亦宣佈了自負盈虧的經營模式，強調不再耗用公帑，「活化後中環街市的營運，是以能夠達致長遠收支平衡而無須政府資助為目標」<sup>29</sup>。尋找私營機構的招標工作於2020年9月展開，並於2021年2月8日公佈結果。根據營運合同，營辦商將負責對建築物進行翻新和裝修，以作預期用途，並需要向市建局繳納租金。

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我在羅德島設計學院（RISD）的學習，影響了我對中環街市項目活化再利用的建築方向。回首往事，有兩個片段仍記憶猶新，為我們策劃中環街市項目提供指引。羅德島的普羅維登斯（Providence），是由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1603年12月21日-1683年1月/1683年3月）於1636年建立的一座城市，也是RISD的所在地。位處於市中心的普羅維登斯購物中心樓高三層，建於1882年，是美國最古老的室內商業購物中心，它擁有希臘復興式建築風格的外牆，以及在具天窗的山形屋頂下的精選商店。我還記得在那陽光充沛的中庭放鬆身心的時光，欣賞著雄偉愛奧尼克（Ionic）柱和帶有桃花心木頂軌的精緻鑄鐵欄杆等歷史建築元素，觀察著各年

齡層的人以不同的節奏在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和韋博塞特（Weybosset）街之間穿梭，感受著時間的流逝，反思生活。遠離煩囂、在一個合群且令人安心的環境中能按自身節奏享受生活，正是我所冀望能在中環街市所能提供得到的。中環街市支持本地小店和文化，歡迎各行各業，是一個「Playground for All」。對我來說，保育中環街市只是過程而非目的：我們應珍視的是人文精神，一切從人出發。

另一段記憶，是來自我的老師馬查多（Rodolfo Machado）。他和拍檔席爾維蒂（Jorge Silvetti）於1980年，憑藉「普羅維登斯天梯」（The Steps of Providence）獲得第27屆年度先進建築獎（Progressive Architecture Awards）一等獎。該項目貫穿了建築和城市設計的理論與實踐<sup>30</sup>。以當時技術來說，該項目是切實可行的，但就顛覆了所有常規，使其成為城市中前所未有和陌生的建築故事。對我來說，這是一個美妙時刻，可體會到馬查多無論在物理上抑或是精神上，都希望讓建築成為「對現狀的介入」。這種「前所未有的現實主義」<sup>31</sup>，正是我想為中環街市所帶來的一種驚奇感，有別於一般重塑歷史建築的模式。

在中環街市室內建築翻新中，我採用了馬查多在 *Progressive Architecture 1976* 文章中發表的概念原型，《邁向重塑理論：將舊建築抹去重寫》，這被認為是「一個決定性的文本，超越了修復運動和反修復運動之間的『內在衝突』，以及就建築設計是否必須從原點出發的外部爭論」下了定義<sup>32</sup>。隨著中環街市在新的現代計劃中增添了全新功能，例如增加了文化和活動空間；將昔日的後院單車泊位加入綠色元素，成為公眾休憩空間；引入東華三院文武廟特色小店到其中一個保存完好的舊攤位，將過去在歷史悠久的中環街市成為可以重新繪製的「畫布」。



中環街市活化計劃剖面圖示  
© SHADOW DESIGN



入口處的傳統紅色塑膠燈罩  
© SHADOW DESIGN

根據馬查多的看法，「為構建一套重塑理論，考慮一系列隱喻富有意義，包括本文標題中使用的隱喻《作為建築的抹去重寫》…倘若原建築被視為首個話語，並影響著未來的話語銘刻在它之上，那麼重塑就可以被視作重寫。<sup>33</sup>」

此外，根據建築內容的變化：

「重塑可以被視為重寫、間線、部分擦除、填空式寫作（行與行之間書寫）、界定、強調、引用、評論、作為題外話、插曲或間隔、作為插入式書寫，或通過標點符號襯托，將舊故事以新形式出現…[或]當建築物被重新功能化時，就會誕生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由舊詞組成的一個新情節，一個全新的詮釋便應運而生。<sup>34</sup>」

活化中環街市採用了多種設計策略，透過更新建築干預方式，準確記錄各種持續進行的市民活動，重新譜寫中環街市的故事。中環街市內部特意保留了開放式設計，透過最少的實體間隔佈局，大大提升視覺透明度，令保存完好的昔日原始結構柱網受到尊重，

且易於觀賞。在多間本土品牌的小店前，擺放了滿滿的外地仙人掌植物，將看似不協調的元素共存，增強超現實主義的效果。而本地濕街市常見的傳統紅色塑膠燈罩，經過重新演繹和設計後，安裝了在租庇利街和域多利皇后街的入口處。對於外行人來說，以重新設計的紅色燈罩作為標誌或許未夠突出，並可能會招致不當批評<sup>35</sup>，但它確實為中環街市的用家提供了多種符號學意義，包括作為標誌、索引還是符號。而紅色塑膠燈罩標誌的成功和受歡迎程度毋庸置疑，旋即成為社交媒體上其中一個最熱門的帖子，令廿一世紀的中環街市得以烙印在香港集體記憶之中。

記錄過去傳之於未來，並不代表要將歷史「木乃伊化」、造假、根除和邊緣化我們當下生活的價值。許多年後，子孫後輩將會問及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以及我們對人類文明的貢獻。我們不需要把神話般的過去浪漫化，因為我們就是歷史的一部分，記錄我們在人類進步過程中的貢獻毋須感到羞恥。建築本身就是人類活動的象徵。建築藝術品與相關人類活動的結合，就是很值得講述的故事，令這些活動能夠為後世所銘傳。在活化再利用中，建築師不僅要解決技術問題或複製過去，其參與還可以通過增加或改變舊建築物在社會中的現有實用性和紀念性功能，為古蹟注入全新價值和創造新生命。拉斯金的看法，不論在過去或現在依然適用：「正正是我們作為這種神聖作用的守護者，更應以最嚴肅態度看待建築。沒有她，我們可以繼續生活，沒有她，我們仍可以敬奉，但沒有她我們就容易遺忘」<sup>36</sup>。作為進行活化再利用的我們，應該尊重並包容不同的建築方式，自我覺悟當代與過去和未來的潛在對話，以塑造未來記憶。

最後，我希望以雕塑家Claes Oldenburg (1929年1月2日-) 的名言作結：

「我所追求的，並非要一屁股坐在博物館內的一種藝術。我所追求的，並非一種刻意的藝術，一種可從零開展的藝術。我追求的，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藝術。我追求的是一種有血有肉的藝術，必要時可以是喜劇形式，或是暴力形式甚至以任何形式展現。我追求的一種藝術，猶如生命軌跡般，曲折延伸出各種可能性，不斷累積成果、經歷低潮與分叉，就像生活般甜美又愚笨…<sup>37</sup>」

- 1 梁思成：《梁思成文集》（三）（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5年），頁3。
- 2 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毛澤東分別於1942年5月2日和5月23日，在延安整風運動上發表講話。講話首次發表於1943年10月19日，即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逝世七週年。原版是毛澤東1950年前著作的一部分，於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進行了修訂。
- 3 原文載於《建築的十個要素》序言，1755年Leoni版（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86年）：“for the Service, Security, Honour and Ornament of the Publick, we are exceedingly obliged to the Architect”。本文引用的版本來自Leon Battista Alberti: *On the Art of Building in Ten Books*, translated by Joseph Rykwert, Neil Leach, Robert Tavernor (The MIT Press, 1988), p. 5.
- 4 Transcription of Tract I in Lydia M. Soo: *Wren's "Tracts" On Architecture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53.
- 5 Cyril Birch: “The Particle of Art”, *China Quarterly*, No. 13 (January-March 1963), pp. 3-14, esp. pp. 4-5.

- 6 原公共中環街市靠近皇后大道和砵甸乍街，由政府於1842年5月12日刊憲設立，並命名為「香港街市」。附近進一步建立了兩個私人市場Morgans Bazar和Canton Bazar，與政府市場一起服務社區的日常需求。如果這市場是第一代，那麼1895年的街市應該被認為是第三代，因為在原始的1842年和1895年公共街市之間，曾出現一個重建的街市。對於1895年的街市，我用「第二代中環街市」的描述，是因為是現址第二個重建的街市。有關中央市場演變的更詳細的早期歷史，請參閱 Bill So, Thomas Chung: “Sanitising Central Market – An early history of Hong Kong Government market No.1”, *HKIA Journal*, Issue 76, 2020, pp. 120-122.
- 7 政府於1999年2月推出《供申請售賣土地一覽表》(俗稱「勾地表」)，以穩定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的房地產市場。2003年因非典型肺炎(SARS)進一步暫停政府賣地。
- 8 香港在2003年3月至6月的短短三個月內，有1,750名感染者和286人死亡，是世界上SARS死亡率最高的地方。
- 9 行政長官《二零零七至零八施政報告》，<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710/10/P200710100098.htm>。
- 10 行政長官《二零零七至零八施政報告》，<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710/10/P200710100098.htm>。
- 11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文物保護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荷李活道前中央書院遺址」，第16段，2008年2月22日，立法會CB(2)1105/07-08(03)號文件，[https://www.heritage.gov.hk/filemanager/heritage/News/tc/upload/25/LegCo%2022\\_2\\_08%20HCC%20paper%20on%20Central%20School%20\(Chi\).pdf?year=2008](https://www.heritage.gov.hk/filemanager/heritage/News/tc/upload/25/LegCo%2022_2_08%20HCC%20paper%20on%20Central%20School%20(Chi).pdf?year=2008)。
- 12 2013年澳洲ICOMOS文化場所憲章第1.7條，<http://openarchive.icomos.org/id/eprint/2145/1/ICOMOS-Australia-The-Burra-Charter-2013.pdf>。
- 13 《1964年威尼斯憲章》，ICOMOS，第9條，[https://www.icomos.org/charters/venice\\_e.pdf](https://www.icomos.org/charters/venice_e.pdf)。
- 14 1794年，Henri Gregoire (又稱Abbe Gregoire) 向國民議會提交了三份報告，其中包括關於《關於破壞行為所帶來的破壞和鎮壓手段的報告》，和關於平息手段的報告，以解決歷史保育的需求。欲了解更多激發和鞏固他對歷史保育的理念和貢獻，請參閱薩克斯Joseph L. Sax: 〈將歷史保育視為一項公共責任〉“Heritage Preservation as a Public Duty: The Abbe Gregoire and the Origins of an Idea”, *Michigan Law Review* Vol. 88 No. 5 (April 1990)(The Michigan Law Review Association), pp. 1142-1169。 <https://repository.law.umich.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5365&context=mlr>。
- 15 Abbé Henri Grégoire: 《關於破壞行為所帶來的破壞和鎮壓手段的報告》*Rapport sur destructions opérées par le Vandalisme, et sure les moyens de le réprimer* (巴黎：國民大會，14 Fructidor 會議)。
- 16 Eugène-Emmanuel Viollet-le-Duc: *The Foundations of Architecture: Selection from the Dictionnaire raisonne*, translated by Kenneth D. Whitehead, George Braziller, introduction by Barry Bergdoll, (New York, 1990), p. 195.
- 17 Eugène-Emmanuel Viollet-le-Duc: *The Foundations of Architecture: Selection from the Dictionnaire raisonne*, translated by Kenneth D. Whitehead, George Braziller, introduction by Barry Bergdoll, (New York, 1990), pp. 222 -223.
- 18 John Ruskin: *The 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 first published 1849 (Century Hutchinson National Trust Classics 1988 edition), pp. 194-197.
- 19 John Ruskin: *The 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 first published 1849 (Century Hutchinson National Trust Classics 1988 edition), p. 196.
- 20 讀者可以參考我在《反復修：向 Ruskin 學習》“Anti-Restoration: Learning from Ruskin”, *HKIA Journal* Issue 77: Reuse, pp. 50-53. <https://hkia-journal.net/anti-restoration-learning-fromruskin-%e5%bb%ba%e7%af%89%e4%bf%ae%e5%be%a9%e7%9a%84%e5%8f%8d%e6%80%9d-%e5%90%91%e7%ba%a6%e7%bf%b0-%e6%8b%89%e6%96%-af%e9%87%91%e5%ad%b8%e7%bf%92>。
- 21 Eugène-Emmanuel Viollet-le-Duc: *The Foundations of Architecture: Selection from the Dictionnaire raisonne*, translated by Kenneth D. Whitehead, George Braziller, introduction by Barry Bergdoll (New York, 1990), p. 213
- 22 “Seven of the world’s coolest commutes”, CNN, 23 February 2015, <https://edition.cnn.com/travel/article/worldscoolest-commutes/index.html>.
- 23 「不過，舊灣仔街市與舊中環街市常被稱作「包浩斯」建築，這實在是一個誤解。...其實這兩座街市的正確風格是屬於在30年代中至40年代末風行的「摩登流線型」(Streamline Moderne)」。李浩然、黎志邦：《保舊創新：香港建築保育與城市發展》(香港：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2021年)，頁87。
- 24 John Ruskin: *The 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 first published 1849 (Century Hutchinson National Trust Classics 1988 edition), p. 196.
- 25 Eugène-Emmanuel Viollet-le-Duc: *The Foundations of Architecture: Selection from the Dictionnaire raisonne*, translated by Kenneth D. Whitehead, George Braziller, introduction by Barry Bergdoll (New York, 1990), p. 222.
- 26 林鄭月娥，鋼筋混凝土建築活化再用國際研討會2011年1月22日。
- 27 四個主題分別是：「破繭都市」、「城中綠門」、「漂浮綠洲·新市集」、「保育回憶，活化中區」。請參閱展覽刊物，[www.centraloasis.org.hk/chi/doc/brochure\\_a2.pdf](http://www.centraloasis.org.hk/chi/doc/brochure_a2.pdf)。
- 28 只有12%的人喜歡餐飲和購物場所，而88%的人喜歡休閒娛樂、文化藝術和公共綠地。《城中綠洲》設計概念巡迴展覽小冊子，第7頁。[http://www.centraloasis.org.hk/chi/doc/brochure\\_a2.pdf](http://www.centraloasis.org.hk/chi/doc/brochure_a2.pdf)。
- 29 市建局2017年3月29日新聞稿：<https://www.ura.org.hk/tc/news-centre/press-releases/20170329>。
- 30 27th Annual P/A Awards, Progressive Architecture, January 1980. The award for The Steps of Providence was not without controversies and generated heated debates in both the academic circle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 as to the boundaries of architecture.
- 31 For a more in-depth discussion on the unprecedented realism in Machado and Silvetti works, please refer to Michael K. Hays: *Unprecedented Realism: The Architecture of Machado and Silvetti*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97).
- 32 Bie Plevoets and Koenraad Van Cleempoel: *Adaptive Reuse of the Built Heritage: Concepts and Cases on an Emerging Discipline* (Routledge, New York, 2019), p. 15.
- 33 Machado, Rodolfo: “Toward a theory for remodeling: Old buildings as palimpsest”, *Progressive Architecture*, November 1976, p. 46.
- 34 Machado, Rodolfo: “Toward a theory for remodeling: Old buildings as palimpsest”, *Progressive Architecture*, November 1976, p. 48.
- 35 Hong Kong Free Press的一篇文章批評了該裝置：「當你看到了在Instagram等最熟悉的裝飾元素：大量的紅色市場燈，全部擠成一個緊密的橢圓形，試圖尋找美在模式重複中。但這些燈並不是你在香港濕貨市場隨處可見的那種，而是一個優雅的版本，一個定制的複製品，小而傻，甚至沒有做它應該做的事情：發光。(譯文)」2021年9月11日，<https://hongkongfp.com/2021/09/11/a-gentrified-mess-how-hong-kongs-central-market-restorationtarnished-an-architectural-gem/>。
- 36 John Ruskin: *The 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 first published 1849 (Century Hutchinson National Trust Classics 1988 edition), p. 178.
- 37 我要感謝把Claes Olderburg介紹給我的 RISD 老師Judith Wolin。引自《邊緣建築》，Michael Hays、Shayne O’ Neal、George Wagner和Judith Wolin工作室的學生作品展，羅德島設計學院 Woods-Gerry畫廊，1986年2月19至25日。

# 廣

## 州泮塘五約： 尋常巷陌與 日常生活的風景

馮江<sup>1</sup>為建築歷史與理論博士，華南理工大學建築學院教授，曾訪學香港中文大學和意大利都靈理工大學，廣東省文物專家委員會委員，《建築遺產》、《建築史學刊》及《新建築》編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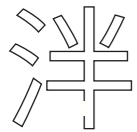


馮江 教授

# 摘要

泮塘五約位於廣州西郊荔枝灣畔，是一座多姓宗族聚居的水鄉村落，保存有較多明清、民國建築遺存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從2010年以來，泮塘五約漸次開展了以歷史格局整理和日常生活空間品質改善為目標的微改造，從看似十分普通的巷道、共有空間入手，適當引入院落，吸引了喜愛樸素和雅靜的人士前來經營和遊賞，與居住於此的村民共處，融入尋常巷陌和日常生活的風景。回顧泮塘五約微改造與社區營造這一仍在持續進行中的過程，可有助於討論平常、日常在歷史環境保育中的重要性。

## 引子



塘是廣州西郊荔枝灣畔的一處村落，梁、劉、黃、李等宗族共居於此，由東至西形成了首約、二約、三約、四約和五約，歷史上以水鄉風光和「泮塘五秀」而聞名。

荔枝灣一帶曾經名園薈萃，歷史上的唐荔園、海山仙館、小田園、荔香園、彭園等園林均分佈於此，荔枝灣涌東側密佈西關大屋和公館，大多為商人所建，是官員、商人、文人雅集和宴樂的處所。而一涌之隔的泮塘則是尋常人家聚居的鄉土村落，尤其是以半島狀伸入湖中的泮塘五約，掩映在荔灣湖公園的婆娑樹影之中，仿佛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圖1）。

從2013年開始，圍繞泮塘五約，開展了一系列的文化遺產保育行動，涉及現場調查與歷史文化資源評估、願景構想、保護規劃、基礎設施改善、設計工作坊、微改造和社區營造等，尤其是2016年以來，採用非營利性的微改造方式改善空間環境品質，吸引喜愛樸素和雅靜的人士前來經營和遊賞，促成端午扒龍舟、北帝誕水上巡遊、舞獅等傳統習俗的復興，並逐漸在專業領域和公共領域引起了關注與討論。

作為泮塘五約再生行動全過程的主要參與者之一，我願在此為大家回顧行動的過程，並分享一點思考。

## 泮塘五約的格局、肌理與建築

無論是在地方志所附的輿圖中，還是在西人所繪的地圖中，作為最靠近西關的西郊村落，泮塘都被清晰地標注了出來（圖2）。從現藏於澳洲國會圖書館的一張廣州地圖中，可以看到當時的水系和主要建築的情況。

經過了一百餘年，泮塘五約仍然較好地保存了歷史上的整體格局和肌理，也有一些明顯的變化，村內的小河涌被填埋或者覆蓋，部分地塊出現了洋樓和多層的集體住宅。



圖1 鳥瞰泮塘五約，2012年



圖2 1860年Daniel Vrooman所繪廣州地圖上的泮塘  
(來源: Collection of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圖3 半溪五約亭 (修文文攝)



圖4 泮塘五約的村落格局與肌理 (徐好好繪)

泮塘五約主要為李、黃兩姓聚居之處，西頭大榕樹下有一座「半溪五約」小亭（圖3），起著類似鄉約的作用，門上的楹聯為同治年間的進士黃其表所撰，描述了村落的風水：「門接水源朝北極，路迎金氣盛西方」。有趣的是，對聯並未出現「東」和「南」兩個通常有著良好寓意的方向，而是實事求是地表達了因地制宜所取的北向和西向。

楹聯中的「路」所指的是被村人視為「龍脊」的五約直街，西起五秀橋頭和在牛脚嘴的河涌急轉彎處為鎮水而建的三官廟，東至奉祀北帝的仁威祖廟，正是村廟、宗祠、社稷壇等神聖性的空間和主要的街巷構建了泮塘五約的骨架，廟壇鎮守著邊界，而敦本堂等宗祠建築則引導著住宅的秩序。

縱橫交織的長街短巷按照儘快排乾雨水的原理編成了村落的紋理，五約直街沿線及以南主要取西北—東南朝向，而五約八巷一帶則取東西朝向（圖4）。約內有五約直街、五約外街、涌邊街、三官廟前街和五約新街五條街，以及一巷至八巷等主要的巷道。作為龍脊的五約直街也僅縱鋪三塊麻石板，寬度為八尺左右，真可謂尋常巷陌。涌邊街因為填埋了原有的河涌而成為寬度最寬的街巷。

泮塘五約的住宅建築既不是西關大屋，也不是鄉村常見的三間兩廊民居，而以聯排的單開間竹筒屋和兩開間明字屋為主，顯示出近郊村落的特點。從宅地劃分來看，單開間竹筒屋一般面闊3至4.5米，約在13個瓦坑至19個瓦坑之間，進深長短不一，短則6米左右，長者可達20米；明字屋面闊約8至10米，也多與鄰家共牆，一般面闊約8至10米；僅有的幾座三開間院落式建築均為祠廟，足見居住於此的是多個宗族的平常人家。

除了傳統的青磚老屋之外，泮塘五約有民國時期所建的紅磚洋樓，在仁威廟附近，還有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興建的多層住宅。因為疊加了不同風格和體量的建築，泮塘五約的風貌並不統一，但總體上仍較好地保存了傳統風貌的基調，且格局清晰可辨。

## 行動與過程

關於泮塘五約的空間改造計劃經歷了漫長的討論和實施過程，早在2007年前後，荔灣湖公園計劃擴建，位於公園圍牆外的泮塘五約舊村被列入徵拆範圍，用地性質調整為綠地，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房屋被收歸公有，涉及兩百多戶，後公園擴建計劃擱置。

2010年廣州亞運會前，荔枝灣涌成功揭蓋復涌，給泮塘地區的保護與改造提供了新的動力。2012年，廣州市提出整合資源打造西關文化中心的構想，著手編制西關廣場概念規劃（圖5）。2013年7月，專家們對「西關廣場」的命名和做法開展了持續的討論，認為大規模的廣場不符合西關的特點，對泮塘五約的定位逐漸從博物館式的建築集萃轉到面向真實的村落歷史。

在概念規劃開展的過程中，我們採用了「『一屋一表』現場調查與歷史價值研究先行，分類推薦遺產線索，分級落實保護措施」的工作方法，對泮塘三約和五約進行翔實的歷史文化資源調研（圖6）。調研記錄728處建築，其中包括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仁威

廟和兩處區級登記文物，推薦15處文物線索和57間傳統風貌建築。建議保留的村落建築約佔泮塘五約總量的百分之四十六。最後以此為基礎編制形成了《廣州市荔灣泮塘地區改造規劃歷史文化保護專章》。隨後該成果進行了公示，被《廣州日報》、《南方日報》、《新快報》、《新浪網》等多家媒體報導。泮塘西關廣場的文化遺產調查與評審工作被認為是廣州市首個真正意義上的「文評」專案，為「文評」工作奠定了技術範式。

2013年9月5日，第二屆廣州市城市規劃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了荔灣區泮塘地區改造（西關廣場）地塊控制性詳細規劃調整，規劃將該片區定位為「展示嶺南和廣府文化的嶺南園林式城市客廳」，製定了四大原則：保存格局，修復肌理；政府統籌，連片改造；減量規劃，疏解人口；民生優先，配套完善。明確提出泮塘地區的保育物件包括「荔灣湖、青磚屋、黑瓦頂、荔枝紅、麻石路、古樹木、泮塘人」，恢復和整理歷史水系，保留古樹名木以及北帝誕等道家文化、廟會、祭祖、舞獅、龍舟競技、泮塘五秀等非物質文化遺產。規劃建築面積比現狀建築面積減少2.3萬平方米，公共綠地增加1.7萬平方米，比原有規劃抽疏外來人口1,031人，被認為是廣州市城市規委會通過的第一個減量規劃。其後，在概念規劃基礎上編制完成了修建性詳細規劃。

2014年，由華南理工大學、廣州美術學院、象城建築等合作發起「翻屋企」公益計劃，建立政府與產權人之間的中間平台。2015年2月，華南理工大學完成泮塘五約傾斜攝影建模，並對仁威祖廟等代表性建築進行了精細測繪和建構分析（圖7）。2015至2016年，依靠微媒體，在公眾平台和固定展場對泮塘五約的保護和發展提出討論，開展百餘次本地居民訪談與調查、村居日常生活空間觀察，口述史以及二十二場村民公共討論與公眾參與活動，如泮塘五約微改造茶話會、照片模型展等（圖8）。



圖5 2012年泮塘地區概念規劃願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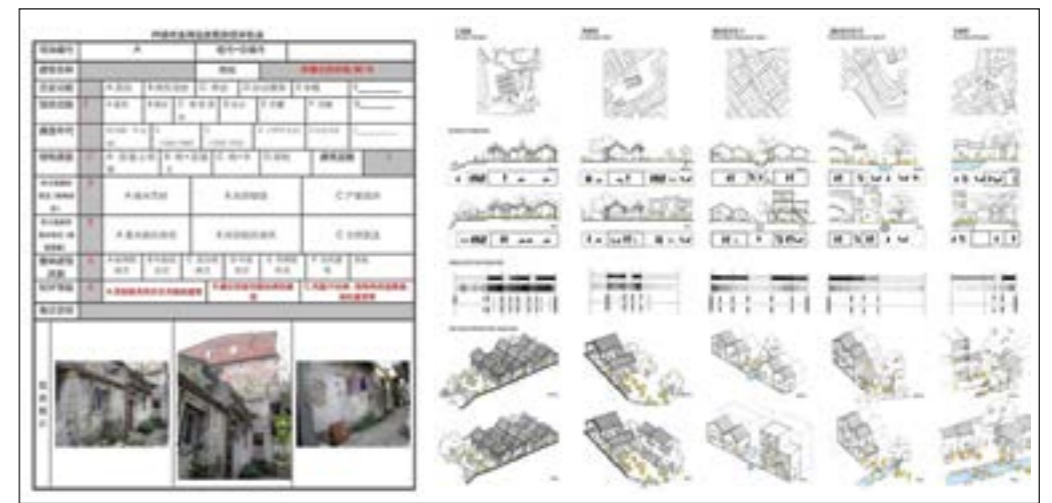


圖6 「一屋一表」與建築類型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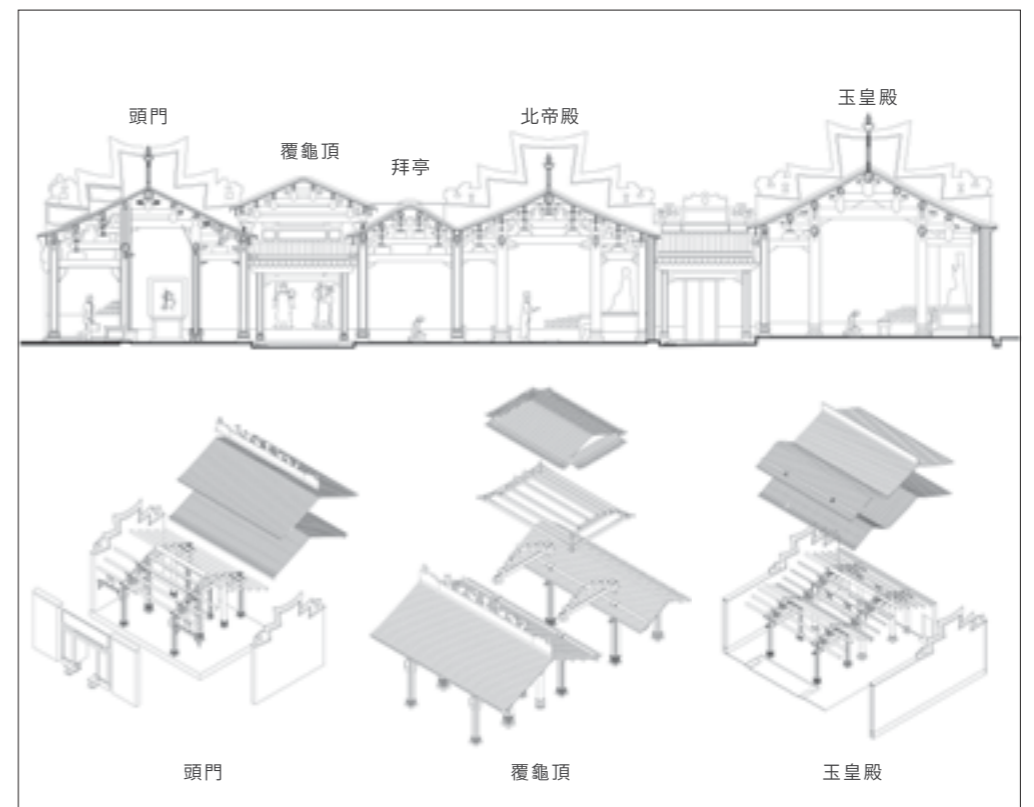


圖7 仁威廟中路測繪圖  
(來源：華南理工大學建築歷史文化研究中心)



圖8 公眾參與活動現場  
(來源：翻屋企)

2016年1月1日，《廣州市城市更新辦法》施行。泮塘五約成為同期啟動的38個微改造試點項目中唯一一個依靠公共資本進行實質空間干預的歷史城區微改造項目，以改善居民民生為目標，第一期以相對集中連片的公產房為物件，改造後從居住轉變為文化展示和文旅商業功能。探索以文化保存和民生改善為導向的更新模式。2018年12月底，泮塘五約所在的逢源大街——荔灣湖歷史文化街區的保護利用規劃編制完成。

泮塘五約的更新是多方行動者共同行動的過程，涉及多所大學、村民與租客、道教信眾、規劃與建築設計機構、志願者組織、文化遺產專家和地方政府。華南理工大學建築學院先後與挪威貝根建築學院、哈佛大學GSD圍繞泮塘地區從不同角度開展了聯合設計工作坊；2018年11月，華南理工大學、淡江大學、逢甲大學、銘傳大學開展海峽兩岸都市設計聯合工作坊，進行泮塘五約微改造設計。在泮塘五約的微改造初步完成之後，村民和租客繼續居住於此，同時吸引了喜愛樸素和雅靜的人士前來經營和遊賞，也在城市規劃、建築學和文化遺產類學術期刊上引起了一定的討論，也獲得了廣州社會創新大獎、WA城市貢獻獎等獎勵。

## 尋常巷陌

泮塘五約通過修繕歷史街巷來鞏固村落的歷史空間結構，連通龍脊巷道，保留、恢復麻石街巷1,525米。如前所言，泮塘五約內的街巷很窄，一方面需要維持巷道尺度上很親切的特點，同時又需要在相對人流較為密集的五約直街、涌邊街提供更加友好的街巷介面，這主要體現在對門、牆、院子和植栽的精細考慮上。



圖9 泮塘五約微改造片區總圖(深灰色為公產房)



圖10 泮塘五約微改造片區一層平面

項目分為兩期，一期用地面積22,500平方米，建築面積25,600平方米，改造建築面積8,900平方米，涉及歷史建築線索514.8平方米，為已徵收建築修繕、主要街道整修、管線鋪設、主街兩側房屋改造，分四個組團進行，實際改造的地塊面積2,097.74平方米、建築面積3,196.08平方米，干預的程度較輕，主要以「針灸」療法推動泮塘五約建築的保護與活化(圖9-10)。

五約直街46號，是一棟傳統明字屋的明間，微改造前後其正立面圖完全一樣，似乎並未發生明顯的改變。但若從剖面圖看，則可以發現原建築的簷口位置、屋面高度與形式不變，而外牆和大門的位置向內移動了三桁約1.63米，創造了更多的簷下空間，為原本逼仄的巷道提供了緩衝和過渡的餘地。宅門仍依舊制，安裝著廣府傳統建築中頗有地方特點也最為常見的趟欏門三件套(圖11)。相鄰的數座建築也採取了相似的做法，將原本屬於室內的空間讓渡一部分給公眾，是設計上一個小的善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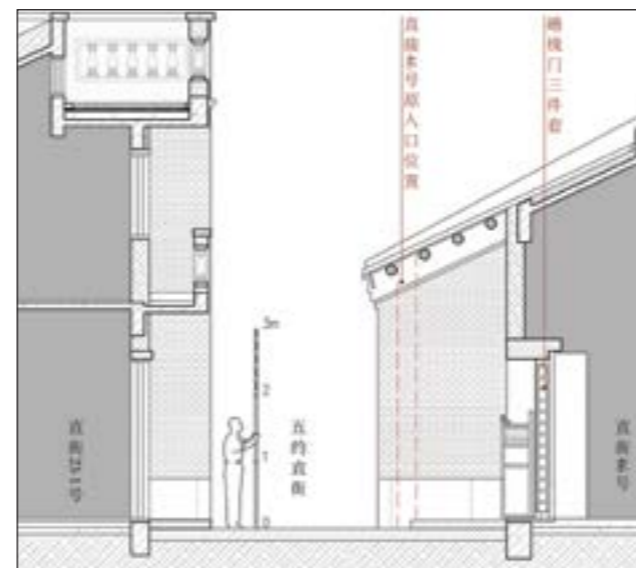


圖11 五約直街46號入口簷下空間剖面圖及改造前後對比

泮塘五約的傳統民居直接向主要街巷開門，通常會選擇將牆體砌築於宅地的四面邊界以求私有面積的最大化——牆是道德、美學和社會排斥的手段。在微改造中，通過「窗」的置入，消解了山牆對建築內外關係的隔絕，形成了連通室內外視線的介面，讓室內的公共性與街巷的公共性產生交融的可能。直街11號和三巷13號的改造均採用大面積鋼框架玻璃取代原有的實牆面（圖12），營造了五約外街新的街道介面感受。微改造還將部分原有的私人居住空間公共化，以期產生啟動的效應。

與傳統民居中的天井有所不同，庭院作為一種建築元素在泮塘五約只出現在祠廟等具有公共性或紀念性的建築內部。對於祠廟來說，除了提供採光、通風等基本功能以外，庭院更加具有一種空間精神性的追求。利用拆除原有危房後的空地，五約外街30號引入了7米見方的內庭院（圖13），意在營造面向公眾和四周建築的開放空間。庭院面向五約外街設置院門，將與院門相對的鋼結構「廳堂」作為庭院的視覺中心，背靠外街28號的山牆設計了遊廊，庭院中則用鋪裝暗示平面輪廓和巷道尺度，傳遞歷史訊息。

總體而言，泮塘五約的街巷保持著原來的尺度（圖14），介面公共性和友好性的改善帶來了微妙的變化，使得尋常巷陌更加有利於人的來往、停駐和交流。



圖14 改造後的尋常巷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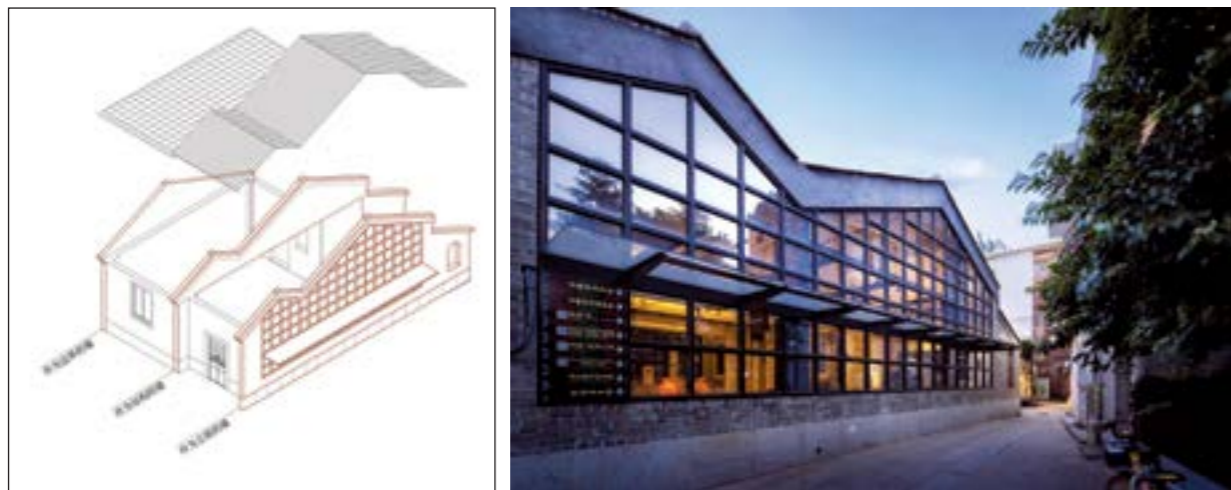


圖12 五約直街11號的山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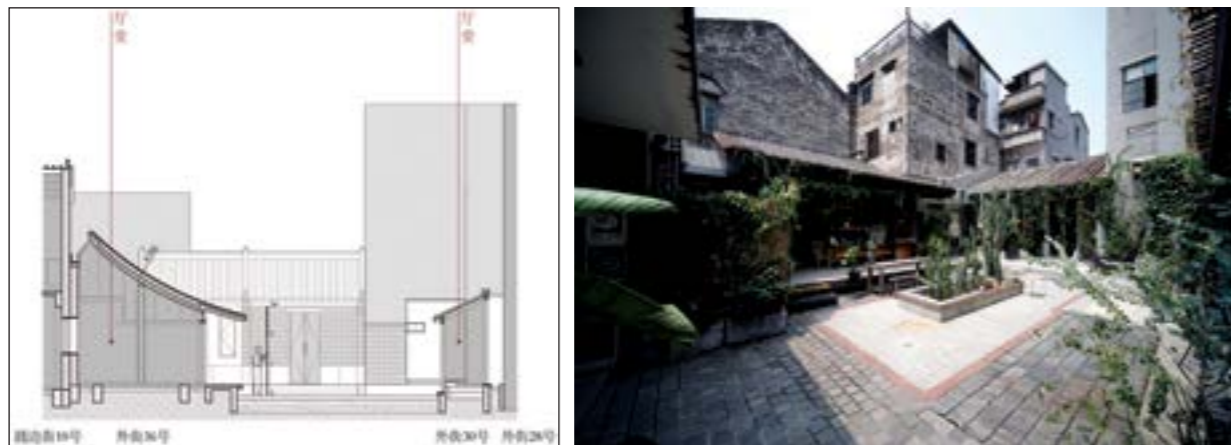


圖13 五約外街30號的庭院

## 日常生活的風景

泮塘五約的「約」，即鄉約，是多姓所共同制定和遵守的契約。鄉約可刻字成碑，置於以「鄉約」為名的建築之內，供鄉人閱讀，起到教化的作用。「約」實質上包含了三重意義，即鄉約本身、放置鄉約的空間和鄉約所管理的社區。

微改造前的居民構成與廣州大多數城中村相似，除公房外，半數以出租的形式供外來工務人員居住，半數由村內原住民居住。一期微改造工程主要集中在公用生活設施、公共空間的改善上，關注居民的日常生活，維持村落原有的空間結構、相對緩慢的生活節奏和安靜恬淡的氛圍，重視對尋常巷陌的細微改善。村落與公園之間的圍牆被打破，二者更加自然地交融在一起，成為可以相互觀望的風景。2019年6月一期工程完工，至年底已有近六成公房出租，活化後的商業空間集中於五約外街兩側的改造空間內。經過半年多的經營，商家對這些空間也做出了一定程度的二次「微改造」。

作為一種有別於傳統拆建模式的城市更新方式，泮塘五約的保育強調以「微」的方式介入，不涉及用地功能或規劃指標重大調整，注重在微觀層面構建社區內部的參與、協商機制，重視居民，尤其是原住民的意願表達，旨在培養和提升社區意識、社區認同、社區精神。社區微更新的本質是社區治理，是社區不同利益得以調和並採取聯合行動推進社區發展的持續過程。



圖15 泮塘五約的日常  
(來源：華南理工大學建築學院)



圖16 改造後的泮塘五約  
(來源：象城建築)

社區營造嘗試讓公眾理解和加入有關泮塘五約過去與未來的討論，這與歷史上的「約」頗有相似之處，訂立共同遵守的契約，在鄉規民約的約束之下延續公序良俗，村民重新進入一種類似立約和守約的過程，帶來了重建社區的認同感。傳統節日和地方信仰中的神誕為日常生活設定了時間上的節奏，北帝誕、端午龍舟、南獅、祭祖等等習俗應節發生；廟、祠、社、約建立了空間上的結構，在保持格局和肌理的前提下適當引入更具有公共性和開放性的空間；而人們的日常生活，則成為了時空中的風景（圖15-16）。泮塘五約的保護與再生邀請人們走入風景，加入風景營造之中，而不是消費或者圍觀風景。

## 寫在最後

泮塘五約與喧鬧的西關僅一路之隔，因半島狀的特殊地形而隱藏在荔灣湖邊的樹叢之中，水鄉村落的日常親切、安靜而祥和，但也由於建築和基礎設施的老化而漸趨衰退。微改造通過改善基礎設施、整理街巷空間和引入文旅小店，將村落的集體記憶適度公共化，將原本屬於村落的習俗和記憶與城市共用，在維持生活氣息的同時增加了老村的活力，突顯了平常建築和日常生活的價值。

若對泮塘五約到目前為止的保護與有機更新進行批判性的反思，會發現未來仍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在整體風貌改善方面，歷史上的河涌未能恢復，且荔灣湖邊新建的大量仿唐風格的園林建築與鄉土村落之間存在較強的反差；在民生改善方面，菜市場和停車場問題仍有待解決；在建築改善方面，由於微改造使用的是公共財政資金，主要針對公有產權的房屋進行改造，對於一些具有重要意義的集體產權建築和私有住宅的改造未能開展，如村民一直希望能夠將多年前被拆卸下來的三官廟石門框重新豎立起來，還用足尺模型類比了擺放在不同位置的情況，然至今尚未安放。據了解，即將開展的下一期「西關記憶」將一部分集體產權的歷史建築列入了修繕清單，對私有民居的改善也在商討之中。

此外，泮塘五約引起了越來越多的商業關注，有可能打破相對平靜和平衡的狀態，希望這樣的擔心只是杞人憂天。

注：文中未標明來源的插圖均為作者提供。

## 鳴謝

- 文中資料主要來自以下不同階段的工作，謹致謝忱！
- 歷史文化資源調查與評估、保護專章、泮塘地區概念規劃：華南理工大學建築學院
- 建築測繪：華南理工大學建築歷史文化研究中心、方輿丈量
- 泮塘地區控制性詳細規劃調整：廣州市規劃勘測設計院、華南理工大學
- 逢源大街——荔灣湖歷史文化街區保護規劃：華南理工大學建築歷史文化研究中心
- 微改造設計：廣州市城市更新規劃設計研究院、象城建築
- 社區營造：翻屋企

## 參考文獻

馮江、蒲澤軒、汪田：「門·牆·院——廣州泮塘五約『微改造』三辯[J]」，《建築學報》，2020(10)：頁43-48。

徐好好、李芃、李睿、五圖五書：「泮塘五約微改造記錄[J]」，《建築學報》，2017年01期：頁113-117。

新快報·深讀新聞：「泮塘五約改造：公與私，新與舊，如何平衡？」，2019年12月10日。

Jiang Feng, Ke Chen. “Cooperative Historic Landscape Rejuvenation in China: The Litchi Bay Project in Guangzhou [J]”. *BUILT HERITAGE*, 2019 (1).

芮光暉：「基於行動者的社區參與式規劃『轉譯』模式探討——以廣州市泮塘五約微改造為例[J]」，《城市規劃》，2019，43(12)：頁88-96。

張振華、關菲凡：「控規編制與歷史文化街區保護的融合探索——以廣州西關泮塘為例[J]」，《廣東水利電力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7，15(02)：頁25-29。

李芃：「另一種公共空間——廣州泮塘五約村微改造初探[J]」，《美術學報》，2021(01)：頁123-128。

楊文君、吳簡池：「『文評』制度的廣州實踐與反思[J]」，《建築遺產》，2019(02)：頁124-130。

1 華南理工大學建築歷史文化研究中心

# 重

## 現「省港秘密大營救」 艱險革命歷史 打造大灣區革命教育 熱門打卡點 ——廣東惠州東湖旅店 保護和利用簡況

惠州市文化廣電旅遊體育局文化遺產保護科負責人，長期從事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負責文物修繕保護和活化利用、博物館建設與管理等業務，完成了東湖旅店營救中國文化名人陳列館、惠州蘇東坡祠、東坡紀念館等的保護與陳展。



劉 淑瑜

# 摘要

東湖旅店建於1935年，是惠州最早的歐式建築。1941年冬，日軍攻陷香港，被困的文化界名人和愛國民主人士處境危險，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對此極為關注，時任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多次電示中共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廖承志迅速將他們營救出來。在中共中央的指導下，東江抗日遊擊隊開展了一場被茅盾譽為「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搶救文化界名人和愛國民主人士800餘人。東湖旅店作為秘密大營救惠州接送站，成為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見證地。惠州對東湖旅店進行了修繕，開闢為營救文化名人陳列館，成為大灣區紅色教育基地最熱打卡點之一。

## 2

20世紀三十年代，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偉大的衛國戰爭在神州大地壯烈展開，全國各族、各地人民在各戰線浴血奮戰。1941年香港淪陷時，困於香港的文化界名人和愛國人士約有300多人，處境十分危險。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對此極為關注，時任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多次電示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廖承志迅速將他們營救出來。在中共中央的指導下，中共廣東地方組織、香港中共地下組織和東江人民抗日遊擊隊組織開展了一場被茅盾譽為「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sup>1</sup>，搶救文化界名人、愛國民主人士、國際友人及其眷屬800餘人，其中100多人經轉廣東惠州東湖旅店。作為秘密大營救惠州接送站的東湖旅店，成為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重要見證。

### 一、東湖旅店建築的由來

東湖旅店位於廣東省惠州市惠城區橋東街道水東東社區上塘街70號。據《惠城文史資料》記載，建築始建於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為惠州籍鄉紳翟雨亭所建，是當時惠州最早的歐式建築之一<sup>2</sup>，建築坐西北朝東南，原佔地近1,000平方米，整體格局為前庭後院。現存建築主體總面闊23米，總進深13米，佔地面積約300平方米，平面呈長方形，是一棟三層半中西式洋樓，懸山頂，轆筒瓦滴水剪邊，用青磚砌牆，白石灰描邊，堅固美觀，構造別緻，在後門左側有廢棄井一口。

翟雨亭，是民國時期惠州名紳，惠州東平鄉南津村人，清光緒七年（1881年）出生，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考入廣東高等師範學堂學習新學（數理科），畢業後回到惠州任教員。民國三年（1914年）起，其先後到海南島瓊山中學、廣東省立女師、廣東工業專門學校等學校任教。民國八年（1919年），應同鄉同學、閩南護法區工務局局長周醒南之邀，翟雨亭離開教壇到福建漳州工作，任閩南護法區工務局總務科長，開闢公路、建設城市，其後還參與了廈門的城市建設。1935年，翟雨亭全家遷回惠州，購置了惠州橋東東湖塘邊1,000多平方米的荒地，建造了一座私人別墅，就是後來的東湖旅店。



民國時期的東湖旅店



修繕前的東湖旅店

### 二、東湖旅店功能的變化

東湖旅店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功能，從其主要使用功能上來劃分，可以粗略分為五個不同階段，在這五個階段這棟建築也有不同的名稱。

第一階段，私人別墅時期。1935年—1941年，為翟雨亭私人別墅，主要功能是翟家居住，建築具體名稱暫未考證。



第二階段，東湖酒家時期。1938年10月，侵華日軍在惠州大亞灣登陸，惠州及東江中下游地區先後淪陷。1941年5月，惠州第二次淪陷，城內水東路、塘下、打石街、萬石路的商店民房，以及棲禪寺、永福古寺、元妙古觀等西湖名勝古蹟遭侵華日軍縱火焚毀，人員財產損失慘重。惠州城內原有的酒店和旅店無法復業，部分鄉紳將倖免於難的自有房屋改為旅店經營，其中翟雨亭也順勢而為把自己的私人別墅改為了東湖酒家。1941年香港淪陷後，很多戰亂難民逃回內地，惠州成為一個重要中轉站，旅店業興旺一時。東湖酒家因地理位置好，整體佈局高雅，全店20多間住房常常客滿。這個階段的主要功能是酒店經營場所。

第三階段，翟氏民居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直至20世紀九十年代，為翟氏後人使用。20世紀九十年代售予惠州市民陳志強。這個階段基本上是作為住宅功能。

第四階段，水東院子咖啡館時期。21世紀初至2017年，這棟建築迎來了它的第一次活化利用期，經過基本修繕和維護，作為咖啡館經營，其中一樓是咖啡館，二樓是琴行、婚慶化妝間、攝影工作室等創意空間<sup>3</sup>。這個階段是餐飲及服務業經營場所。

第五階段，東湖旅店營救中國文化名人陳列館時期。2017年3月，惠城區政府完成對東湖旅店產權的認定與收購。2018年惠州市政府出資800萬元，並向廣東省相關部門申請資金開展了保護修繕和陳列佈展等工作。2019年1月30日，東湖旅店營救中國文化名人陳列館正式對公眾開放。

### 三、東湖旅店歷史地成為「省港秘密大營救」惠州交通站

#### 1. 一批文化名人和愛國人士因故到港

在民國30年（1941）國民黨當局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許多著名學者、教授、作家、戲劇家、音樂家、美術家及各界愛國民主人士，因宣傳抗日愛國主張遭到迫害，在內地難以立足，在中共中央的幫助下，從上海、武漢、廣州、桂林、重慶、昆明等地輾轉撤到香港。他們在香港創辦了進步的報刊和社團，帶來了香港抗戰文化的興旺，對推動抗日救亡運動、爭取港澳同胞、海外僑胞以及國際人士的同情和援助，起了重大的作用。

#### 2. 香港淪陷加劇了文化名人和愛國人士的危急處境

當國民黨當局蓄意製造「皖南事變」時，宋慶齡、柳亞子、何香凝、彭澤民等聯名給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出公開信，表示抗議，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鄒韜奮、茅盾、金仲華、惲逸群、范長江、於毅夫、沈志遠、沈茲九、韓幽桐九人發表了《我們對國事的態度和主張》。這些抗日討頑的檄文，震動中外，所以日偽和國民黨反共頑固派都把這些愛國人士看作眼中釘、肉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香港淪陷時，困於香港的文化界名人和愛國人士約有300多人，處境十分危險<sup>4</sup>。

#### 3. 惠州位於抗戰時香港北上的關鍵交通位置

為做好營救工作，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部署，東江抗日遊擊隊開闢了從九龍港九大隊交通站到惠陽寶安東江抗日遊擊區的東西兩條線路：東線從九龍市區經牛池灣、九龍坳到西貢，然後在企嶺下或深涌灣乘船過大鵬灣，在大梅沙、小梅沙或沙魚涌登陸，轉入惠陽地區遊擊隊駐地。西線從九龍市區穿過上海街入青山道，過九華徑到荃灣，再經大帽山到元朗十八鄉，然後渡過深圳河，入梅林坳到白石龍遊擊隊根據地，再轉入惠陽地區遊擊隊駐地。東西兩線，無論水路、陸路都必須經過惠州。而惠州是一座千年古城，因其位置險要，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日軍侵佔惠州後，一度切斷了石龍與廣九鐵路的運輸連線，東江一時成為運送抗戰物資北上的惟一交通。故在東江流域數百里的水陸輾轉中，惠州的秘密交通站便成為地下黨組織「迎來送往」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的主要陣地。

#### 4. 東湖旅店歷史偶然地成為了「省港秘密大營救」惠州交通站

東湖旅店（當時為「東湖酒家」）位於惠州繁華的水東商業街旁，地處西枝江、東江交匯處，水陸交通便利，便於人員、物資南來北往。日軍侵佔香港後，國民黨駐軍187師師長張光瓊奉命率187師駐防惠州。日本侵略者從惠州撤走後，張光瓊即把師部遷回惠州城郊，期間租下了東湖旅店頂層作為玩樂留宿場所。負責營救活動的惠州地方黨組織負責人盧偉如、藍造將計就計虎穴建點，決定把東湖旅店一二層全租下來設立秘密交通站<sup>5</sup>。鄒韜奮、茅盾、孔德沚、胡風、葉以群、胡仲持、廖沫沙、韓幽桐、胡繩等都曾入住東湖旅店，並留下了許多令人難忘、膾炙人口的營救故事。

### 四、「省港秘密大營救」的重要作用

「省港秘密大營救」具有突出的歷史價值。一是保存了文藝抗戰、民主建國和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堅實力量。營救的數百名文化名人和民主愛國人士，他們在日後的文藝抗戰、爭取國際輿論支持和其後的打倒國民黨反動派、民主建國以及新中國建立後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建設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正是此次營救保存了這股中堅力量。二是宣揚了中國共產黨為全民族命運、全人類事業奮鬥的崇高精神。整個營救行動，是抗日戰爭史和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史上一次具有國際影響的偉大的行動，這次營救工作充分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為人類正義事業拋開政見之爭，一切以民族大利為重，顧全大局，愛惜人才的崇高情懷。三是鍛煉了東江抗日遊擊隊敢於戰鬥、勇於鬥爭的能力。這次大營救沒有一人被捕，沒有一人犧牲，營救行動反映出黨的隱蔽戰線、忠誠於黨、勇於擔當、冒險犯難的革命精神和過硬的對敵鬥爭能力，受到了中共中央來電表彰，贏得了國內外各界人士讚揚。鄒韜奮題寫「保衛祖國，為民先鋒」八個大字贈給東江遊擊隊領導曾生。

## 五、惠州深入貫徹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積極推動東湖旅店在新時代再利用

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重大國家戰略。2017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見證發展改革委與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標誌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對大灣區建設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明確提出了「建設富有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一流灣區」的目標要求，為推進大灣區建設指明了方向。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涉及到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面臨著世界上其他灣區建設所沒有的新情況。因此，它既是新時代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嘗試，也是推動「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幾乎是同時，惠州開展了東湖旅店保護利用工作。

1. 東湖旅店保護簡況。抗戰期間，惠州城內很多房屋被日軍炸毀，幸運的是東湖旅店屹立在戰火之中，保存完好。解放後，其所有權、使用權幾易其手。在保護修繕過程中，存在諸多困難，如房屋產權確定難、房屋收購難、解除租約難、收集物料難等。惠州市、惠城區兩級黨委政府高度重視，把東湖旅店的保護、修繕工作提上重要議事日程。2012年，東湖旅店被惠城區人民政府認定為尚未核定公佈為文物保護單位的不可移動文物。在惠城區政府的統籌下，歷經數年完成了產權確定，出資750萬元於2017年3月完成對東湖旅店的收購。2018年，惠州市委、市政府決定開展東湖旅店的保護利用工作，由惠州市政府出資800萬，並向廣東省委宣傳部申請專項資金260萬，進行了修繕保護，對當時只是尚未核定公佈為文物保護單位的不可移動文物的東湖旅店，高標準、高要求的由具有文物保護工程資質的單位進行設計、施工和監理，同時市文物行政部門和有關文物專家還全程參與、全程把關，其後進行了陳列佈展。2020年12月，東湖旅店被惠州市政府公佈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2021年推薦申報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列入了第十批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公示名單。

2. 合理開展活化利用，變身歷史教育最熱打卡點。為了讓東湖旅店紅色基因鮮活起來，惠州市委、市政府下足了功夫，廣泛發動社會各界徵集了一批圖片及實物史料，走訪了一大批文史專家，將修繕後的東湖旅店建設為營救中國文化名人陳列館。全館展陳面積1,200平方米，分為「營救之路」、「轉移惠州」和「統一戰線」三大展區，採用文字講述、圖片佐證、實物展示、多媒體演繹等方式，借助雕塑、模型等，全面真實展示秘密大營救歷史。陳列館中，廖承志的「惠州詩草」、鄒韜奮的「早出晚歸」、廖安祥的「源吉行」、茅盾夫婦親自烹飪的「年夜飯」等故事，都通過各種各樣的表現形式展現在廣大觀眾面前。該項目在展陳上體現一個「舊」字——展出了一萬多張舊照片及一批革命戰士使用過的刀槍炮等實物；在宣傳上體現一個「真」字，邀請當年參加營救的老戰士老黨員講述護送文化人士的故事；在傳承上體現一個「活」字，東湖旅店——營救中國文化名人陳列館在2019年初開放，一年的時間，接待國內外遊客超過10萬人次，後因受疫情影響開通線上參觀，線上觀眾超過百萬人次。此後還不斷提升講解服務品質，探索針對不同人群的個性化講解，分別推出了不同版本的四套講解詞，並且選拔出一批綜合素質高的「紅領巾」志願講解員，在節假日期間為黨員群眾進行講解服務，成為惠州乃至粵港澳大灣區重點紅色教育基地、黨史學習教育最熱打卡點。2020年底，東湖旅店以優異成績獲評「2020全國革命文物保護利用十佳案例」之首。



東湖旅店年夜飯場景



修繕後的東湖旅店

## 六、由「省港秘密大營救」衍生的其他文化藝術發展

根據秘密營救香港淪陷區文化知名人士、愛國民主人士及國際友人的英雄事蹟，惠城區文化廣電旅遊體育局計劃重點打造的革命歷史題材文藝精品——大型原創話劇《大營救》（暫名），已於2021年與隸屬於國家文化和旅遊部的中國煤礦文工團進行了合作簽約。中國煤礦文工團還將指導排演由惠州本地文藝人才出演的「惠州版」大型原創話劇《大營救》（暫名），爭取在惠州進行常態化演出，彰顯紅色文化優勢，轉化為城市形象美譽度。此外，惠州市文化廣電旅遊體育局還創作了原創小舞劇《東湖旅店1942》並進行展演。惠州本土作家陳雪創作了《穿越封鎖線》等文學作品。

## 七、東湖旅店保護利用未來發展方向路徑

「省港秘密大營救」是一座寶貴的精神財富豐碑，東湖旅店作為「大營救」惠州交通站，是難得的珍貴歷史實物。未來，惠州將繼續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用好紅色資源賡續紅色血脈的講話精神和對革命文物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把紅色資源利用好、把紅色傳統發揚好、把紅色基因傳承，進一步保護利用紅色資源，傳承弘揚紅色文化，計劃著重開展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強研究深度。依託政協學習和文史委等惠州重要的文史相關單位的力量，會同黨史研究部門，組織文史專家，認真做好秘密大營救革命歷史研究，深入開展與其相關的文物、文獻、檔案、史料調查徵集研究工作，更加充分挖掘大營救歷史文化資源的豐富內涵。

二是加大保護力度。營救中國文化名人和民主愛國人士從香港進入今深圳坪山，途經惠陽淡水、茶園、周田、永湖、惠城三棟、東湖旅店等，再從東新橋碼頭乘船沿著東江抵達河源老隆，現存重要節點還有：茶園村、周田村、東新橋碼頭等。惠州經過這幾年的努力，現在東湖旅店已經得到較好的保護與利用。下一步，應加強「大營救」路線其他重要節點的保護，住建、農業農村等相關部門做好秘密大營救途經的茶園村、周田村等傳統村落保護，對茶園村、周田村等村落開展環境整治、完善基礎、亮點提升等工作。另一方面是惠陽區有序開展榴兆樓、會新樓、嗣前新居等整修點的修繕。通過兩個方面，形成工作合力，使秘密大營救重要節點、重要遺存得到良好的保護、保存，將路徑串珠成鏈。

三是拓展利用廣度。目前，惠城區文廣旅體局正在籌備啟動東湖旅店二期工程建設，現已完成項目建議書，已入庫惠城區發改委重點專案庫。與此同時，根據營救行動設計路線讓廣大遊客「重走營救之路」，充分發揮場館優勢，為各單位團隊拍攝教學視頻、微黨課等提供便利，使東湖旅店成為粵港澳大灣區黨史學習教育網紅打卡點。探索舉行「文化名人作品讀書會」、「青少年尋寶」等各類群眾喜聞樂見的活動，全面拓展東湖旅店活化利用的廣度。除了重點推進東湖旅店的活化利用，還將會同相關單位，推動營救中

國文化名人路徑惠州段和周邊綠道、村道串聯形成系統，打造惠州全域旅遊、鄉村振興、紅色教育、生態文明建設的示範區。

四是豐富文藝創作作品。深入發掘秘密大營救革命歷史感人事蹟，組織創作更多電影、電視劇、紀錄片、舞臺藝術、歌曲等紅色文藝作品，尤其是叫得響、傳得開的文藝精品。整合惠州各類文藝資源，依託惠州交響樂團、合唱團等專業組織，以秘密大營救為主題重點扶持打造出一台紅色文化精品劇碼，以文藝精品講好惠州紅色故事，傳承弘揚革命精神。

2021年，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對革命文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革命文物承載黨和人民英勇奮鬥的光榮歷史，記載中國革命的偉大歷程和感人事蹟，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是弘揚革命傳統和革命文化、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激發愛國熱情、振奮民族精神的生動教材。一直以來，惠州市委、市政府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文物保護特別是革命文物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中央和省的工作部署，在上級主管部門的精心指導和大力支持下，惠州全市各級各相關部門以高度的文化自覺與人文擔當，深入挖掘紅色革命文化遺產價值，持續推進革命遺址的修繕保護利用，圍繞營救中國文化名人的光榮革命歷史，做了一系列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惠州應以此為契機和新起點，進一步夯實革命文物工作基礎，繼續加強革命文物保護修繕，精心打造革命文物保護利用精品工程，努力創建東江紅色革命旅遊名片，全面推進革命文化傳播傳承，使得革命文物工作基礎更加夯實、成果不斷顯現。

- 1 茅盾：《脫險雜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
- 2 謝超平，宋日文：〈惠州曾在敵人眼底下上演「暗度陳倉」〉，《惠州日報》，2011年05月18日，A03版。
- 3 賴瑛，許秋娟：〈民國時期惠州城市建築的文化地域性格分析〉，《華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18(05)，頁87-92。
- 4 麥婉華，陽博騫：〈香港民主文化人士大營救〉，《小康》，2021(20)，頁16-17。
- 5 王國梁，鄒韜奮：〈脫險走東江(下)——長篇紀實文學《文化人大營救》節選〉，《紅廣角》，2014(05)，頁47-53。
- 6 劉芳，胡新民，駱佛華：〈惠州革命遺址成為「網紅打卡點」〉，《源流》，2021(06)，頁18、20。

# 渡 安仔屋文創空間 文物復修與 活化經驗



馬若龍以其優秀及極具創意之作品成為國際知名之得獎建築師、城市規劃師、設計師及藝術家。出生於澳門，曾就讀於澳門、葡萄牙、德國及瑞典，1983年返回澳門工作。他經常應邀於歐洲、美國及亞洲之美術館及大學參展及演講。他是一名大學教授及社會領袖，並服務於多個民間組織及政府委員會。

在1987年獲澳門總督頒授文化功績勳章，1999年獲澳門總督頒授澳葡政府最高榮譽——「英勇勳章」，以及獲葡萄牙總統頒授「葡萄牙共和國大爵士勳章」。2002年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頒授「專業功績勳章」。2019年獲澳門國際研究所頒發「2019年特徵獎」。

Carlos MARREIROS 馬若龍 大爵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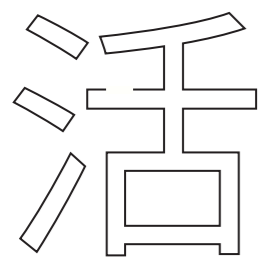
## 摘要

澳門望德堂區是擁有450年歷史的文物地點，位於北段城牆外，建立於十六世紀，為方便收容澳門麻瘋病人。該區毗鄰城牆北段，由大三巴炮台一直延伸至東望洋炮台。望德堂區於1903年重建，是澳門首個有效實施城市規劃的地點，涵蓋社會住房和長者住宅，是現今婆仔屋文創空間位置所在。整個婆仔屋建築群於2004年進行復修，靠近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澳門歷史城區，現已成為地區和澳門整體的文化創意產業的中心，吸引了不少文化和藝術協會進駐。雖然擁有複雜的文化藝術背景，但項目只花了三年時間便完成復修工程，取得非凡成就。整個工程曾由多個國際媒體拍攝紀錄，並榮獲2009年澳門建築師協會建築設計金獎。

除了尊重所有原始的建築設計、材料和技術外，我們還着意保留平凡建築的謙遜特徵。這種做法在這裏並不常見，因為人們總希望炫耀財富，為建築物複製或添加不必要的巴洛克和黃金裝飾。

婆仔屋文創空間不僅公認是建築復修工程的典範，更促進了整個片區的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 活化薄鳧林牧場： 構築交流平台 營造地方文化樞紐

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高級督導主任，曾長駐薄扶林村服務達11年，現為薄鳧林牧場督導委員會成員。



洗 昭行

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會員，薄扶林村文化地境保育有限公司創始主席及薄鳧林牧場有限公司董事。



高永康

文物保育建築師、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士、香港明愛產業主管及薄鳧林牧場有限公司董事。



林社鈴

# 摘要

「薄鳧林牧場」（鳧音同扶，取自一八一九年版本新安縣志的薄鳧林舊名）標誌二十一世紀香港文物建築保育趨勢上的一個里程碑。這幢一級歷史建築建於一八八七年，為現存唯一舊牛奶公司高級職員宿舍，在牛奶公司一九八五年關閉牧場後一直空置，日漸殘破，幸至二〇一五年香港政府才在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下，批出交給香港明愛及薄扶林村文化地境保育有限公司組成的「薄鳧林牧場」營運，復修工程二〇二一年九月竣工，並已於二〇二二年四月開展試業。

薄鳧林牧場的保育動力源自薄扶林村地方社群，居民小組搭築交流平台集結力量，將她營造成獨特的地方文化樞紐：既深入探索地方歷史文化脈絡，從中參考前人克服困境的經驗，建立對未來的信心與希望；又以「點一線一面」方式，帶動社群與訪客嘗試理解牧場與周邊文物的關連，從而建立保育整全文化地境的觀念與視野；並運用牧場的空間結連交流平台，傳承開拓精神與生活之道。這些嘗試的目標是希望令社區成員對地方歷史文化價值感到自豪，聚合而成柔韌社群應對未來挑戰，成為由社區主導文物建築保育及活化再利用的一個有用參考例子。

## 香港文物建築保育活化再利用的歷史發展脈絡與趨勢



香港文物建築保育方式隨時代推進而演化。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前，無論公私營機構皆傾向拆卸文物建築，以現代主義建築取而代之。後來公共文物建築開始被保留下來，以收取象徵式租金的模式交予慈善或教育機構作公益用途，部份則會以短期租約出租作商業用途。上述安排沒有要求營運單位對建築的歷史價值作出詮釋；除結構維修外，也沒有為租用團體提供資源作文物建築保育復修。無論業主與租戶，只把文物建築視作樓面空間，呈現歷史價值與否，取決於租用團體的抉擇。

九七後社會開始重拾本地歷史，發展局於二〇〇八年推出「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為推動文物建築活化再利用制訂政策方向，促進社區參與，並創造就業機會。此計劃迄今涵蓋廿六幢文物建築，目前已進行了六期，將文物建築交給非牟利機構營運，由相關機構在政府資助下自行設計並完成建築復修工程，繼而以社會企業營運方式進行業務。此計劃不單引起公眾對文物建築的關注，同時因著PMQ與大館等大型活化項目落成，加上陸續出現的保育私人文物建築案例，帶動公私部門、專業界別與公眾更重視文物建築作為公共文化資產。

不過，承辦計劃的非牟利機構必須具備足夠的人力及財力條件，才能應對經年的審批程序及進行復修工程，加上要業務需要自負盈虧，故此計劃有一定的入場門檻，獲選的機構以中至大型慈善、文化及學術團體，或由企業支持成立的機構為主，地方社群的參與機會不多。另一方面，活化再利用的業務安排多以獲選機構本業為依歸，多不符合文

物建築本來的使命與用途；它們也未必需要與文物建築周邊社區生活的社群進行任何結連，這樣容易使文物建築失去其與社群過去累積的連繫。

## 薄鳧林牧場帶來三個突破點

舊牛奶公司高級職員宿舍是第四期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其中一個項目，原名 Braemar，取名自蘇格蘭鴨巴甸郡一條村落，建於一八八七年，原為牛奶公司牧場經理宿舍，在牧場成立後翌年落成，場地面積近兩萬三千平方呎，文物建築平面約佔四千二百平方呎。Braemar位處薄扶林谷沿海小山崗上，海拔四百九十英呎，現址旁邊的職業訓練局建築，昔日為牛奶公司薄扶林牧場核心建築群（The Mains）。

白文遜醫生（Sir Patrick Manson）一八八六年在港創辦的香港牛奶公司牧場，就是先建成這個核心建築群，再向南北輻射開發出去。截至一九八五年牧場關閉為止，該處成功發展成由沙宣道至華富邨一帶山坡佔地三百英畝的大牧場，最高峰時期飼養牲畜達三千頭，於四十七個牛房建築群內分隔飼養，工人從這個核心建築群派出飼料及一應所需；而每間牛房的鮮奶，也收集到這處消毒、入樽及運送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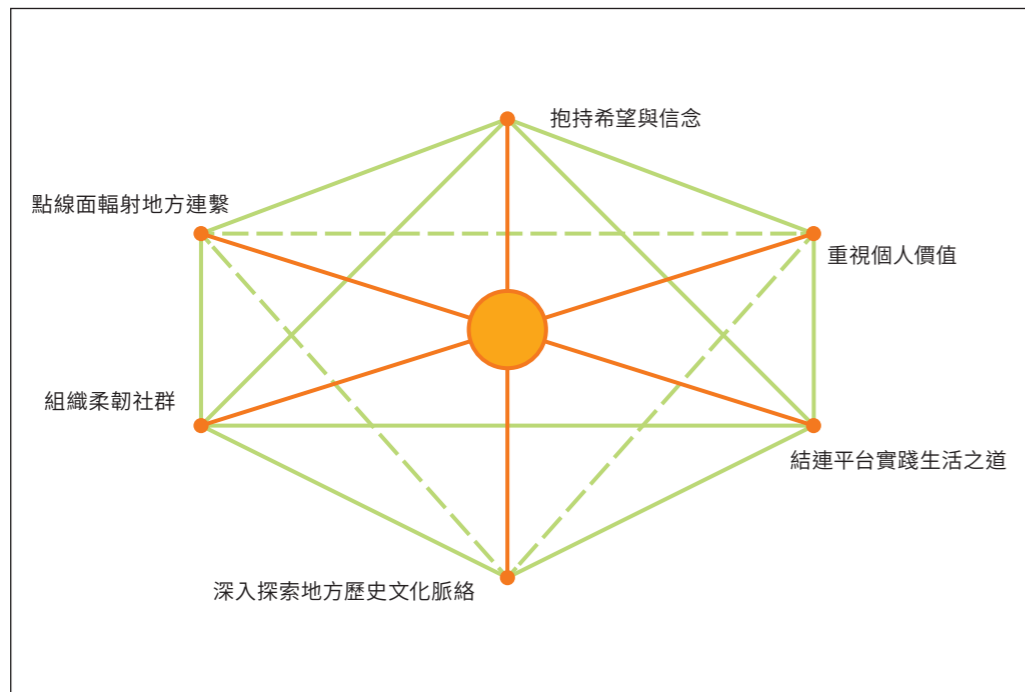
牛奶公司牧場核心建築群的周邊，有香港開埠時期吸引歐洲商船靠岸的瀑布灣，有反映香港早期城市規劃的第一個水塘，有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一八七五年建立的伯大尼修院，有曾印刷遠東多種語言聖經的納匝肋印書館，也有相信早於一七三〇年立村的薄扶林村，她是在二〇一四年獲世界文物建築基金會列入其世界文物建築監察名單的歷史聚落。港島這個西南角落，早在開埠初期已是華洋企業家、傳教士與拓荒者聚集交流之地，留傳了一份開創精神。薄扶林村人自發成立非牟利組織薄扶林村文化地境保育有限公司，尋求駐村推行社區發展的香港明愛合作，伙拍申請活化牛奶公司高級職員宿舍，也是這份精神的延續。

### 一、 地方社群主導：為文物建築重新注入靈魂

薄鳧林牧場的第一個突破點，就是她的活化再利用，由始至今都是由薄扶林村人主導推動，香港明愛則發揮社區組織與促進的載體角色。由地方社群主導開展策劃這個原發點，注定牧場的發展是另辟蹊徑，其路向與所呈現的面貌都與其他保育項目截然不同。

薄扶林村原居民共有三十六個家族，是香港首個按集體官契認可土地權益的地主。當初這裡只是一條客家多姓聚落，村民多以種菜養豬維生。牛奶公司牧場出現後，大批外來牧場工人入村租房，令村內農地逐漸建出平房以應付需求。二戰後大量大陸平民移居香港，部份在村界周邊搭建木屋，令公眾漸漸忘記這是一個歷史聚落，而只視之為過渡性寮屋區，造成刻板的印象。一九六〇年代至九〇年代期間，一直有傳政府計劃收回村北「菜





圖一 薄鳧林牧場的三維宗旨路向

園」的土地作公共發展用途。至二〇一三年，特首施政報告才明確提出解除薄扶林發展限制。村民遂發起「留住薄扶林村」運動（下稱「留住運動」），希望向公眾重新展現這條三百年歷史聚落的文化價值，獲得公眾認同與支持。

剛好在這時候，Braemar被納入「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香港人早已忘掉過去香港島上曾有一座遠東最大規模及先進的牧場經營，每日生產牛奶供應本地及遠東市場。另一方面，牛奶公司亦經歷了企業併購與業務轉型，現已成為跨國零售企業，其乳製品業務及品牌早已售出。惟這段牧場記憶仍留存在薄扶林村人心裡，因他們大多曾在牧場工作、生活與嬉戲，對牧牛經歷仍有深刻的感情聯繫。當牧場終結營運，牛奶公司將Braemar交還政府後，其歷史文化歸屬彷彿重新開放，虛位以待，直至活化計劃的出現，村民得以突破與跨越障礙，於文化層面承繼Braemar與她所負載的歷史意涵與價值，村民有合適空間訴說他們的牧場回憶。這個跨血緣承繼，整合了整個薄扶林工農業文化地境的保育與詮釋。

這個項目能成功推動，亦有賴項目成功聚集五十多位曾參與留住運動的活躍村民，他們組成了達人口六十份之一的關鍵小數，促成系統的轉變。當時村民根據個人志趣而組織成不同核心小組，包括展現村文化價值的「保育小組」、彰顯女性巧思手藝的「村姑工房」、集結建造力量的「魯班門人」、維持傳統節慶風俗的「樂根源」、愛惜享受自然生活的「樂山林」。這些小組意義先行，無分上下，也無分大小，橫向平等地連結成村民平台。經與眾人多次商議與想像，確認申請營辦活化計劃是有利「留住運動」的一個大膽而有效的策略，然後再開始構思計劃細節及劃定路線圖。在隨後的日子，這個溝通平台有效協助牧場團隊為重要的營運與內容呈現訂定方向。

薄鳧林牧場有限公司成立時，由兩位村民及三位香港明愛管理層組成董事會，指導公司的發展。其轄下成立了八人督導委員會，由三位村民、兩位邀任成員及三位明愛職員組成，作出有關業務營運的決策；至於六人受薪團隊，則由兩位為村民組成。薄鳧林牧場成為由下而上村民展現地方歷史價值的實踐平台。由過去十年到未來，村民嘗試，累積了堅實的文化、歷史、建築保育經驗，不單重建了公認的地方價值，更促進了社群凝聚，在逆境時展現柔韌互助。

## 二、 點線面連結：輻射周邊文化地境成為入門樞紐

薄鳧林牧場的第二個突破點，就是策劃團隊不再只以保育單幢文物建築作為著眼點，而是以「點—線—面」為基礎，以Braemar作為核心，輻射結連一整片香港罕見的工農業文化地境。

文物建築的重要性在於其身處的文化歷史肌理中的位置，以及隨歲月而沉澱的一層層人類生活痕跡。人的生活所經歷的不只是一幢建築，而是一個地方，所以這些累積下來的生活痕跡必然會將這幢建築物與地理或文化意義上周邊的地景相連。例如村民會到牧場工作，而牧場工人則會到村內消費；又例如法國傳教士為牧場設計纜車，牛奶公司則邀請他成為公司董事；薄扶林村用來網紮中秋節火龍的禾草，也是從牛房取用。這些連線頻密地將薄扶林山谷內的薄扶林村、牛奶公司、巴黎外方傳教會及政府建築一一連結起來。

可惜至今牧場遺蹟與傳教會歷史建築都因幾許易手，歷史脈絡日漸隱沒，有的建築雖然仍然尚存，可供公眾欣賞，卻多未有安排給公眾理解背後的故事，有的甚至給山林吞沒，公眾不得而知。幸而這三百年來不變的，是薄扶林村人一直在地繁衍，代代相傳，使這山谷裡的故事得以承繼和傳頌。

明愛為推動社區發展，在村民發掘與展現的過程中提供協助，也參與其中。二〇一二年，《薄扶林村：太平山下的歷史聚落》出版，村民以口述歷史梳理這裡的歷史脈絡和大綱；同年，與村民共建村內四千平方呎的公共空間，促進村內外交流；自一三年起，籌組村民導賞，向公眾細數家珍；在一七年協助村民紀錄中秋舞火龍傳統，促成該活動被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香港代表作；在一九年與村民一同帶引古物古蹟辦事處職員探索牛奶公司牧場遺址，促成四十多個牧場遺蹟獲得歷史建築評級，也使薄扶林成為香港古蹟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這些活動正好見證村民如何以整個薄扶林谷地文化地境為視野，因此薄鳧林牧場早於構思之初已不是單幢建築的活化計劃。我們希望藉著這次文物建築活化再利用的機會吸引公眾到訪，更在牧場試業之初率先推出收費導賞，藉著村民的用心介紹帶引訪客認識周邊文化地境，以發揮輻射性的樞紐作用。

## 三、 保育未來：成為結連交流平台推動承傳開拓精神與生活之道

薄鳧林牧場的第三個突破點是她的營運。活化再利用的對象不只是文物建築本身，更是這個地方社群的人心，藉以開拓思維與生活之道，建立結連交流平台，好使這個地方的價值有渠道承傳下去。這樣看來，我們更似是在保育社區的未來。

明愛過去十二年與村民共同發掘與累積，總結出在這地方生活的人，從過去到現在最能呈現三個關鍵價值：開拓精神、堅毅求存與相互尊重。這些正是過去一直成就香港的價值，現在我們也正需要這些價值來鼓舞港人。然而，價值觀與生活實踐經驗的傳承，不能只靠文字與圖像來「言教」，更需要人與人之間互相學習，交流身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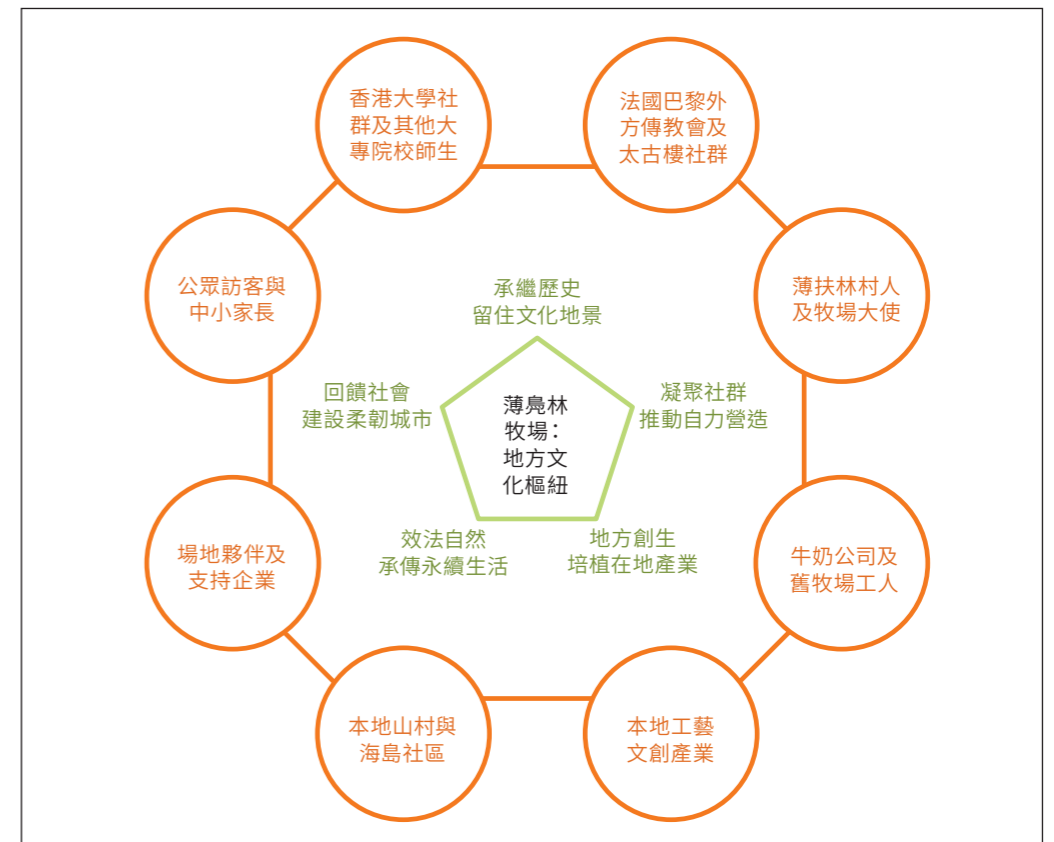
故此，薄鳧林牧場是一個以社群自主為內容「活著」的博物館，同時亦是「沒有牆」的博物館，能將訪客帶到周邊地方社區延展參觀。其實它不只是一間博物館，她亦是一個地方社群延展生活的空間。村民要熟悉地活在這個空間，才會將對家的感情投射在這個空間之上，視之為一個更大的家。直至村民視之為家和村一部份的時候，薄鳧林牧場的靈魂才得以重新傾注。

試想像某個日落傍晚，從事竹藝紮作的吳師傅在牧場削竹紮竹、村姑工房在養好一缸藍染料、甘老師為學員燒好一爐陶藝作品，都不是討好觀眾的表演，而是實實在在的實踐自我。他們開放接受訪客旁觀交談，甚或歡迎對方落手跟隨學習，成就切身的文化體驗交流。村民在地生活時刻累積，令牧場變化多端，春夏秋冬四時日夜都有新的經驗與體會，內容自然更新，也自然可令訪客回留。這樣的設計是行銷地方社群原來的特色，反映計劃的最初的理念是相信地方社群本來就具備足夠條件，欠的只是一個展現的機會。

四、五十位核心村民懷抱內在動力，持續驅動留住運動十年，當中關鍵是一直保持開放態度，主動邀請不同持份者伙伴協作，結連成一個行動與交流平台以承托支持。在這個平台的基礎上，村民開放村外團體參與村內事務並累積經歷，由日常決策會議，到村民聚會及活動慶典，逐步讓村外人首先認識這個地方的人情，然後才進行創作或開發。過去村民便曾與香港大學及多間大專院校、香港青年藝術協會、香港檔案學會等團體和機構建立許多創設。由內而外發，先安內而後向外，是村民總結下來的心得。

為強化核心動力，薄鳧林牧場更在去年八月起開展【生生不息】計劃，帶動二十位村內新一代及周邊關注文化地境發展的鄰居，一同與核心村民接受培訓，以在地實習及實踐創新逐步令新舊融合，使村民在各營運事工上得到支援。如此體驗式教育歷程不單能鞏固運動核心，更可抽取當中部份實踐經驗，構思針對大、中、小學及幼稚園學生以至公眾人士的設計，以體驗式教育作為活動安排，令訪客有深刻的地方文化體驗。

薄鳧林牧場自二〇二二年四月開展試業，依據上述三個突破點設定未來路向大綱。惟目前社會及經濟形勢遽變，業務如何能維持足夠收入，在自負盈虧的前提下肩負維修保養等營運開銷，仍需要團隊持續探索。如何取得平衡收支是團隊這兩三年需要嘗試和尋索的理想業務模式。薄鳧林牧場由保育有形文化資產，至涵蓋相關的無形文化資產，不斷以地方社群內在動力推動自我更新，開拓了一條創新的文物建築活化再利用路向。



圖二 薄鳧林牧場的「五花八門」：五個發展目標與八個主要持份者



薄鳧林牧場高級職員宿舍

# 活化再利用的 數十年： 前法國外方 傳道會大樓

現職香港特別行政區建築署總工程策劃經理，自1994年起成為註冊建築師，1995年起獲得認可人士（名冊1）資格。她在建築署從事專業建築及項目管理工作超過25年，在不同類型的公共建築工程方面擁有豐富和廣泛的經驗，包括文物建築的活化再利用。



馮紫珊

文物建築保育顧問，負責建築署的改建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項目。從事文物建築相關工作20年，曾負責多個文物建築保育項目，涵蓋傳統中式本地建築、殖民地建築和現代建築，當中有簡單的維修和改造、全面的保育工程，亦有詳細可行性研究及大規模的活化再利用項目，規模各異。



羅嘉裕

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矗立於小山崗上，可欣賞維多利亞港的景色。大樓始建於1917年，由花崗岩和紅磚建成，屬新古典主義建築風格。由於大樓具有極高的歷史和文物價值，政府於1989年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將大樓列為法定古蹟。

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的活化再利用始於1953年，為配合不同政府部門的用途，曾在內部進行多項改造。最近大樓已進行全面修復，為新的用途作好準備——供法律相關組織作辦公地方，作為香港法律樞紐的一部份，協助法律相關組織的組成、發展及作其他相關用途。

我們將以活化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的經驗，分享如何在保育歷史建築的同時，修復大樓以符合現行的法例規定和用途所需。我們亦會分享過程中所用的修復方法和技術，令這幢瑰麗的歷史建築重新綻放光芒。

## 1. 簡介：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的背景及重要性

前

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是一座四層高的大樓，矗立於核心地段的小山崗上，背靠太平山，位於略高的地勢使它坐擁維多利亞港及城市的遼闊景觀。大樓座落的小山崗鄰近分佈着重要的政府建築物包括禮賓府和律政中心，以及聖約翰座堂，當中炮台里因在過去設於該處的美利炮台而得名。

大樓現址的首座建築物，是當時對華商務副監督莊士敦（A.R. Johnston）的府邸，<sup>1</sup>是1840年代域多利城成立後首批興建的房屋之一，它後來成為多位早期總督的臨時官邸。

1860年，大樓被重建成設有地庫及兩個角樓的三層高建築物，成為該地段的第二代建築，當時被私人公司及俄羅斯領事館用作辦公室，其後被政府租用作辦公大樓。

法國外方傳道會於1915年從猶太商人庇利羅士（E.R. Belilios）手中購入該大樓，<sup>2</sup>並改建為四層高的司帳處，作為巴黎外方傳教會（MEP）的區域總部，支援遠東地區的傳教工作。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於1919年啟用，標誌著在同一地段的建築已發展到第三代，也就是今天現址所見的大樓（圖1）。

1915年完成交易後，著名的英國建築師亞歷山大·科爾本·利特爾（Alexander Colbourne Little）受命繪製圖則，在原址的大樓地基上蓋建新大樓，最終成為今日炮台里上別具氣派的紅磚建築。從1917年3月24日鋪砌第一塊石頭開始，到大樓於1919年4月21日正式啟用，<sup>3</sup>標誌著這群來自法國的天主教神父，正式在遠東地區建立了新的總部。儘管大樓由非英國的宗教組織擁有，但它仍能雄踞於作為香港宗教、政治和商業中心的中環區。



圖1 羅伯特·萊昂神父 (Father Robert Leon) (巴黎外方傳道會香港總部負責人) 寄給巴黎總部的照片，攝於1919年第一季。

[來源：羅伯特·萊昂神父致巴黎外方傳道會總部的年度信件，1919年2月27日，檔案編號158，香港教會 316D。巴黎外方傳道會檔案]

法國外方傳道會與香港政府於1952年就大樓簽署交易合約，<sup>4</sup>政府因而重掌管理權，自始大樓成為不同部門的辦公地點。自1960年代起的近四十年間，這裡曾是主要的法院大樓，包括維多利亞地方法院、最高法院和終審法院，因此該建築一直被視為香港司法制度的重要標誌。

大樓於1989年9月14日被列為法定古蹟。在1995至1997年的翻新工程中，其內部空間被改造成終審法院。律政司充分理解其文物價值，遂在2015年決定將大樓活化再利用為法律相關組織的辦公室，以便法律相關組織可在這裡落戶和發展。

## II. 資料研究與實地調查

在眾多歷史資料中的一個意外發現，引領團隊踏上考古之旅，令這座古蹟的活化再利用工程邁向了新的巔峰。

一次在團隊討論這個項目時，辦公室裡一位比利時客席教授<sup>5</sup>無意間聽到團隊提及「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便提出日後在返回歐洲時，可協助到訪巴黎外方傳道會總部查閱檔案。結果這位教授信守承諾，前往教會位於巴黎的總部。經過幾次嘗試，最終蒐集了大批文件，當中包含一些重要線索，後來成為團隊進行全面實地調查的主要資料，對日後構思修復和活化設計至關重要。

就在這機緣下，團隊展開了歷時數月的詳細研究和調查，令團隊在制訂詳細的保育方案前，掌握了廣泛的歷史知識，並透徹地了解大樓原來的結構設計。

在設計過程中，團隊從理解大樓歷史的方法入手——以保育為本進行研究和分析，了解大樓的重要性，繼而找出其定義特徵元素，再制訂具針對性的保育策略與準則。從巴黎外方傳道會總部蒐集所得的檔案包括建築藍圖、信函、照片及其他紀錄等，皆為團隊前所未見的資料，成為團隊進行實地調查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

團隊實地進行了地圖測量及攝影測量記錄、樓宇狀況調查、結構勘察、油漆及砂漿採樣測試、原有屋宇裝備及相關牆體及樓板開洞等調查。由於欠缺本身建築結構資料，我們必須進行廣泛的實地研究，從現存的建築構件推斷原本的結構設計。為了重新審視大樓結構是否依照倫敦郡委員會於1919年訂明的規定而建造，團隊進行了三維測勘、雷達掃描及開鑿檢查。此外，團隊又進行大規模的荷載測試，核實現存紀錄和結構勘察的數據。

在巴黎總部蒐集的建築藍圖中，我們找到當時領導香港總部的羅伯特·萊昂神父 (Father Robert Leon) 與法國同袍之間的通信。萊昂神父寫道，他們「使用最好的材料和最好的工藝。新建的教會大樓是不易倒塌的，即使在幾百年後，它仍然堅固如昔」。<sup>6</sup>他對大樓結構的信心可從對大樓的建造和物料的研究印證。置身於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代，為何法國外方傳道會對香港這個尚未發展成為國際中心的港口城市有如此信心，仍是一個謎。然而時間足以證明，他們將投資押在最好的材料和工藝上，並非來自盲目的信任，而主要是他們能預見香港發展的潛力。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不僅體現當時巴黎外方傳道會的社會影響力和財政實力，亦體現他們對遠東傳教工作的信心和樂觀態度。

近一個世紀後，這項目可說是繼承了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追求卓越的精神，通過周詳的歷史研究和嚴謹的設計過程，希望將大樓雄偉的外觀和輝煌的氛圍重現。團隊為建築進行活化再利用的決定，不僅令這座法定古蹟重現其莊嚴姿態，同時也藉着修復工程將其歷史遺產價值和現代的專業知識結合，使它重新綻放光芒。

## III. 建築風格和文物價值

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以盛行於愛德華時期的鋼筋混凝土結構方式興建，展現優雅的新古典主義特色。於巴黎外方傳道會總部所得的建築藍圖紀錄顯示 (圖2)，原本大樓低層地下是休憩區、廚房、地窖及工人房，低層是圖書館、用餐區、辦公室及接待處，上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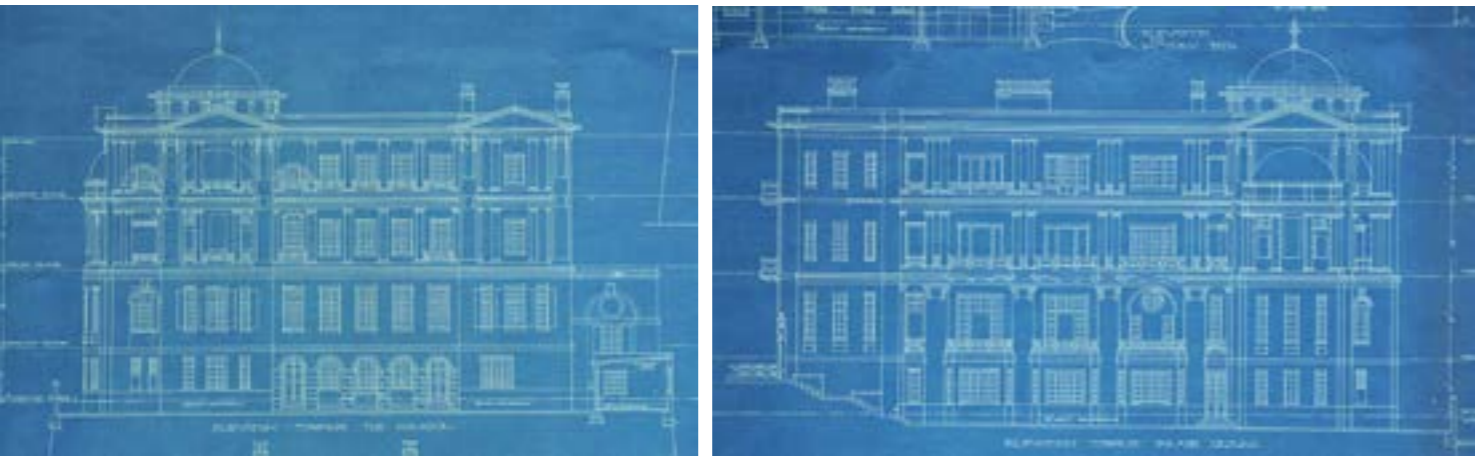


圖2 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的東北立面朝向維港（左）和建有遊廊的東南立面朝向閱兵廣場（右），1915年。這些圖則所反映建築設計意念，與1919年實際落成的大樓基本相同，只是立面沒有入口塔樓。  
[來源：「內地第82號A分段，n1炮台里」1915年，檢索日期：2015年5月27日，巴黎外方傳教會檔案，K CHI 531]



圖3 紅磚砌合的立面。為突出個別位置，採用了不同的砌合模式。攝於2016年。

是寢室。低層至二樓所有房間均圍繞中庭而建，東南立面的房間則通向遊廊。一樓西面的角落建有呈十字形佈局的兩層高小教堂，內設聖器收藏室。這種半宗教半住宅式的設計，既可作私人宿舍用途，亦為傳教工作提供公共空間。它可能是香港唯一現存的司帳處式大樓。

令人歎為觀止的大樓外牆以紅磚和花崗岩築砌，經歷百年而不變（圖3）。多得盛行於愛德華時期的鋼筋混凝土和鋼結構技術，大樓採用了高標準的建築部件，包括厚達五英寸的鋼筋混土地板及天台樓板，和鋼結構橫樑。

各式各樣的新古典主義元素為大樓增添優雅的氣息。除了矚目的圓頂外，大樓外部還有其他顯著的古典主義特徵，包括三角楣飾、古典柱式半壁柱、裝飾牆線等。這些建築特色延伸至內部，包括中庭的柱子和走廊，尤其是裝飾精緻的小教堂。

過去一個世紀，大樓立面的設計大致保持原貌，內部的佈局自政府接手後只進行了少許改動，以配合新用途。至於東南立面的遊廊，自維多利亞地方法院時期開始便被圍封。1995至1997年進行的翻新工程，主要是改動內部間隔作終審法院之用，其中較大型的改動包括在中庭位置興建升降機和小噴泉，並在其頂部加建弧形天窗；在入口上方添加三角楣飾；以及在大部份房間、門廊和走廊添加木製天花。至於小教堂，原有的天窗以空調送風口覆蓋，加設了木牆板、法院傢俱和現代飾面。

#### IV. 方法和主要目標

此保育項目致力為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進行活化再利用，將法院改建為法律相關組織的辦公室的同時，又彰顯它昔日作為司帳處這段歷史。整個保育過程嚴格遵循《布拉憲章》的指引，恪守的原則包括真實性、低度干預、可還原、修復而非替代、新舊融合等。

修復和翻新的主要目標是尊重這座歷史建築的傳奇光輝。團隊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將大樓提升至符合現行法例要求，同時利用現代設計，令已存續百年的建築更切合時代所需：

1. 復原和修復：項目致力將大樓盡量回復至1919年時的面貌，既保留其整體結構和原有建築設計，又在充分研究和評估的基礎上盡量使用原有的物料、技術和工藝，為其定義特徵元素、內部和外部飾面及主要建築構件進行修復。因此，部份後加的新古典主義元素被移除。
2. 尊重建築歷史：在不影響修復的前提下，保留大樓曾作為終審法院的建築元素，紀念它在香港法制歷史扮演的重要角色。
3. 翻新：團隊採用現代的專業知識，令大樓可在應付日常運作及留存典雅歷史感之間取得平衡。團隊致力在不改動大樓整體佈局的前提下，為新增部件選取合適的位置和設計，既不模仿亦不僭越和破壞歷史構件和其定義特徵元素。

## V. 修復和復原

### 1) 小教堂

小教堂是整座大樓的精髓，頂部蓋上圓頂，是香港現存極少數非教堂建築建有圓頂。此外，小教堂內配有裝飾面的拱形天花、簷口、柱頂、門線、垂線、面板，以及多種顏色的紙皮石地磚（圖4）。精心設計的十字形佈局、古典柱式及裝飾豐富的室內立面，均顯示它在整座建築中的神聖地位。

根據1919年原來的設計，小教堂是一個十字形的兩層高空間，十字正中央上方建有圓頂，內有大量裝飾，人們可從大堂或相鄰的房間進入小教堂。巴黎外方傳教會總部檔案館所收藏的一張舊照片顯示，小教堂以強烈的對比顏色突出裝飾線條，地板則鋪上鑲邊的紙皮石地磚，這與大樓其他地方主要用木地板相比，顯得非常獨特。

在1950年代政府接管大樓時，小教堂被改建為法庭。至維多利亞地方法院年代（1968-1979年），原本的聖壇位置被加裝木板裝飾，改作法官專用座位，窗戶則未有改動。1980至1983年間，大樓成為最高法院，窗戶依然未被遮擋，而紙皮石地磚亦無被覆蓋，但後加的一幅平面天花則把上面的圓頂和拱形天花遮蓋。



圖4 小教堂內突出的古典主義建築特徵。  
除了天窗被空調的送風口覆蓋外，所有原有的古典風格裝飾在終審法院時代仍然保持完好。  
攝於2015年。  
[來源：Design 2 (HK) Limited]



圖5 2015年的小教堂，是終審法院年代唯一一個法庭。  
[來源：Design 2 (HK) Limited]



圖6 1919年小教堂的原貌。  
[來源：萊昂·羅貝特神父於1919年2月27日致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年度信件，文件編號nr 158，香港教會大樓 316D。巴黎外方傳教會檔案]

大樓在1997年成為終審法院後，小教堂成為這座香港最高法院的唯一法庭（圖5）。天窗被空調的送風口覆蓋，牆壁被木板局部覆蓋，而十字形的佈局和所有裝飾細節仍然保持完好，沒有被改動。聖壇的窗戶被封，紙皮石地磚地面則鋪上地氈。由於法庭主要由圓頂和拱形天花板所反射的光線照明，因此柱頂須加裝大功率的泛光燈，以增加光源。為了將泛光燈隱藏，令人們往上望時不易察覺，柱頂上方加裝了木板。然而，這樣卻影響了原有呈古典風格的裝飾構件。

團隊將小教堂改建為多功能房間時，力求盡量恢復原來的設計（圖6）——移除所有後加的木造裝飾，拆除於1997年加裝在柱頂的所有照明裝置，回復房間原有的古典風格；按照從巴黎外方傳教會總部檔案館找到的舊照片，修復受損的牆壁裝飾線條；小心翼翼逐層除去裝飾牆線、柱頭、簷口上的舊漆，以重現其精雕細琢的原貌，並採用傳統的礦物漆作新飾面。

團隊花了不少努力改造整個空調系統，將新的送風口隱藏在門的上方，並設有特製的百葉窗。這些百葉窗與周邊的木製品相配合，而天窗位置的舊送風百葉窗則換掉。

因1997年翻新工程而被空調送風口覆蓋的天窗，至今重新開放，陽光可以直接照進小教堂內，法國外方傳道會希望利用天窗連接天地的願景得以重新實踐。從天窗垂吊下來的環形燈具，為房間提供大範圍照明，再輔以周邊的獨立地燈，增加時尚感之餘，亦與室內的古典風格互相協調（圖7）。在圓頂和拱形天花板表面塗上吸音物料，為會議、研討會、演講和招待等新功能提供理想的音效環境。

修復紙皮石地磚是一個費盡心思而又講求工藝的過程。移去法庭原有的傢俱和地氈後，地面原有的彩色紙皮石地磚得以重建天日，而且大致完好無缺。早期為提供法庭所需器材和屋宇裝備而安裝的電線管，只對部分地磚造成輕微損毀。承辦商成功採購尺寸和顏色配合的地磚，按照原來的樣式仔細修補地面，昔日法庭因屋宇裝備而破壞的地面得以修復。熟練的工匠以精湛的手藝及對細節的執着，將地板回復昔日的美態（圖8）。

安裝符合消防條例的自動花灑裝置，同樣是一個艱辛的過程，最終工程既無影響重新開放的天窗，亦無影響室內整體天花的景觀。為安裝側壁式的自動花灑裝置，團隊按照真實比例在另外的工地複製小教堂進行精準的模擬測試，確保分佈在裝飾牆線上方的花灑頭靈敏度和射水模式能符合本地法規。

## 2) 中庭

大樓從底層至二樓的所有房間均環繞中庭而建，故中庭的保育重點，是恢復原有的空間感。大樓作為終審法院時（1997-2015年），中庭的主要改動包括加建小噴泉（圖9）及興建由底層至一樓的升降機（圖10）。小噴泉的建置容易令人對大樓的歷史產生錯覺。團隊將這兩個後加部件拆除，恢復原有空間的完整性，並突出古蹟的莊嚴感。

中庭原本是露天設計，但大樓在1997年被改建為終審法院時加建了弧形天窗。團隊參考了大樓所在地段昔日莊士敦府邸的屋頂設計，以金字頂形天窗取代舊有的弧形天窗，使屋頂與這座歷史建築更為協調。天窗採用低調的炭灰色，以免影響大樓原有紅磚和其他古典建築特色的設計。大樓同時添加了富現代感的幾何形燈具，從而產生有趣的



圖7 按照前小教堂的設計修復多功能房間。  
[來源：Design 2 (HK) Limited]



圖8 修復前小教堂的紙皮石地磚。  
[來源：合利營造有限公司]



圖9 修復中庭。  
左：修復前的狀況。  
右：修復後，後加部件被拆除。  
[來源：Design 2 (HK) Limited]



新舊拼合效果。新的天窗和燈具既和諧地融入歷史建築之中，其非復古的造型又使之容易與舊部件區分。

在1997年的改造工程中，中庭及其周邊走廊被鋪上格子圖案的石地磚。團隊慢慢將之移除，把原有的花崗岩鑲邊石塊顯露出來。團隊經過深入研究和實地驗證，決定依照大樓其他露天／半露天區域的原有設計，以紙皮石地磚重鋪地面。

雖然原有的磚牆、拱頂及其他定義特徵元素被保存下來，但環繞中庭的走廊拱頂石被木製天花局部遮蔽；地面被地氈覆蓋；矮牆旁邊設有地櫃，收納走廊的空調設備；後加的一扇木門將走廊和大堂分隔。

根據修復原則，所有天花被移除，展現原有的拱腹、簷口及拱頂石；安裝設計簡單的燈具；採用圓角設計的木造新地櫃，收納走廊的空調設備，並將此設計概念應用於所有新增設備；保留所有在舊牆壁和地板上的開洞以重用作管道佈線。由於原有矮牆未能完全符合現時防護欄障的規定，放置地櫃可防止人們靠近以符合要求。

與遊廊一樣，這些走廊原本被設計成半露天區域，如今被精心重新鋪上紙皮石地磚。沿走廊可暢通無阻直達大堂，中庭原本通透的設計得以恢復（圖11）。



圖10 修復中庭。  
上：修復前的狀況：當大樓改建為終審法院時，加建了鋼製的升降機豎井，連接底層和一樓。  
下：修復後的狀況：舊天窗被新建的金字塔型天窗取代，舊升降機亦被拆除。  
[來源：Design 2 (HK) Limited]



圖11 修復圍繞中庭的走廊。  
左：修復前的狀況：部分拱頂石被木製天花遮蔽，地面被地氈覆蓋，一扇後加的門將走廊和大堂分隔。  
右上和右下：修復後的狀況：與遊廊一樣，這些走廊原本被設計成半露天的區域，如今被重新鋪上紙皮石地磚。沿走廊可暢通無阻直達大堂。  
[來源：Design 2 (HK) Limited]



### 3) 修復外觀

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的外牆，使用紅磚以雅致的砌合法建造，並輔以不同的砌合模式突顯個別位置。作為定義特徵元素之一，團隊就外部磚牆進行了徹底檢查和精心修復，特意運用不顯眼的現代技術修補磚牆裂縫，而非將整塊紅磚更換，目的是盡量避免破壞原磚牆結構。其中應用到的是專利產品「螺旋桿」以修復裂縫，其後在磚接合處重新批上砂漿，使磚牆回復原貌。



圖12 修復柱廊入口。

左上：正門入口的花崗岩雙柱式門廊，保持了最高法院時代的原有設計。

[來源：政府新聞處，中區區域法院，檔案編號：148J/29719-3和148J/29719-7，1984]

右上：終審法院時代：在柱廊入口頂部，添加了新古典主義的三角楣飾。

[來源：Design 2 (HK) Limited]

下圖：修復後的狀況：原有的設計得以恢復。

[來源：Design 2 (HK) Limited]

圖13 西南立面—重建綠色木造百葉窗。

[來源：Design 2 (HK) Limited]

位於正門柱廊入口的三角楣飾，是在終審法院時期後加的新古典主義裝飾，團隊將它拆除，恢復原本花崗岩雙柱門廊與花崗岩台階的設計（圖 12）。

此外，團隊製作精緻的木百葉窗，配以五金構件，取代破舊的百葉窗。由於百葉窗調較葉片斜度的裝置製作工藝已近乎失傳，團隊在建築署的協助下，從另一幢年代相近的歷史建築得到一扇木百葉窗作參考，仔細研究其操作方法，最終成功令新造的百葉窗配備有關裝置，可調較的葉片可保持於特定角度。這實有賴於工匠們非凡的手藝（圖13）。



圖14 在原主力磚牆上加裝新的鋼製結構構件。  
左：將每個構件的位置準確標示在主力磚牆上。  
右：新的鋼製結構構件安裝在原有的主力磚牆上。只移除受影響的磚塊，並小心保存其周邊的磚塊。  
[來源：合利營造有限公司]



圖15 新的無障礙升降機。  
左：項目進行前的狀況：大樓北面角落的一個房間，在終審法院時代用作辦公室。  
右：改造後的狀況：透視的設計理念，是讓自然光線由周圍的窗戶照進升降機內。  
[來源：Design 2 (HK) Limited]

## VI. 運用新的專業知識進行改造

所有改造工程目的只為符合現時法例要求，以及提升屋宇裝備，方便活化利用。為充分尊重原有的建築特色，加建部分採用現代物料和設計，務求清楚區分新舊之餘，又能與歷史建築融合，容許日後有需要時移除而不損現有結構或整體建築面貌。

改造工程將現代元素盡量無縫地注入大樓，賦予新功能的同時，亦為歷史建築增值。新增設施主要包括無障礙升降機和逃生樓梯，其設計的目標是為用家提供嶄新體驗。圓角的玻璃升降機豎井和鋼製的逃生樓梯經過精心選材和細意打造，體現法國外方傳道會追求卓越的精神，與羅伯特·萊昂神父於1918年提出使用「最好的材料，最好的工藝」如出一轍。

### 1) 將新的鋼製結構構件固定在原磚牆

原有的樓板因加建新升降機和逃生樓梯而須作開洞。團隊以鋼製結構構件為現有的樓板進行加固，位置預先標示在主力磚牆上，然後小心去除牆身上舊有的砂漿，徹底驗查磚塊及磚塊之間的砂漿填料。經過結構工程師實地視察，以及古物古蹟辦事處同意施工方案，團隊便謹慎地將受影響的磚塊逐一拆除並回收，整個過程沒有損壞周邊磚塊或影響整體結構。

結構工程師必須嚴格列明安裝鋼構件的每個步驟及結構細節，工人亦必須在施工時嚴格遵守這些規定。為確保結構穩定，結構工程師須嚴格堅持每次只能安裝一根鋼樑。只有在樓板完成加固後（即安裝所有鋼結構構件），才能在樓板開洞。這是一個繁瑣的過程，需時多月才可完成，卻能確保安全及盡善盡美（圖14）。

原有的磚塊盡量保留下來，當大樓其他地方需要維修時，便可取回重用。那些被移除而狀況欠佳的磚塊，會被磨碎為砂漿，用於磚塊的表面維修。剩餘的磚塊則移交古物古蹟辦事處，用於其他保育項目。

### 2) 新無障礙升降機的誕生

大樓北面一角原是終審法院時代的辦公室，升降機選址於此經過深思熟慮，原因是可以減少對整體建築佈局的影響。升降機的豎井自成一角，沒有觸碰主牆身、窗戶和其他內部裝飾。

採用現代物料如玻璃和鋼材及與別不同的圓角設計，目的是對歷史佈局加入現代詮釋。精心製作的扶手、按鈕及指示燈，搭配木材與黃銅，予人獨特優雅的感覺，與大樓宏偉的氣勢互相輝映。

透視的設計理念透過玻璃和鋼材的運用而實現，自然光線通過周邊的窗戶進入升降機內，令用戶和訪客乘搭升降機穿越不同樓層時，可體驗大樓內部的歷史氛圍。



圖16 新的逃生樓梯。  
 左上：項目進行前的狀況：終審法院時代用作辦公室的房間。  
 右上方和下圖：改造後的狀況：逃生樓梯的設計與無障礙升降機一樣，採用可識別的原則，不同的材料（鋼材）及不同的形式（圓角），視覺上與室內牆壁保持距離。  
 [來源：Design 2 (HK) Limited]

### 3) 新逃生樓梯的誕生

新的逃生樓梯佔用遊廊旁邊的一柱房間，這些房間以前用作辦公室。逃生樓梯的設計與無障礙升降機一樣，遵從可識別的原則，不同的材料（玻璃和鋼材）及不同的形式（圓角），而且視覺上與室內牆壁保持距離。木地板飾面與黃銅扶手，予人溫暖而高雅的感覺，與原有的建築特色互相協調。樓梯精緻的設計和巧手的工藝，雖然代表現代詮釋，卻與昔日大樓宏偉的氣派一脈相承（圖16）。

由於可從相鄰的遊廊引入陽光，這樓梯被設計成「健康樓梯」。它不只供緊急逃生用途，日常使用時亦可體驗室內的歷史氛圍。位於梯間的壁爐是大樓的定義特徵元素之一，被完好地保留下來。

這些新增部件都進行了非一般的荷載測試，可以驗證此前根據有限紀錄及非破壞性的結構調查所搜集的資料是否可信。

測試在一樓房間進行。在拆掉舊樓板及建造新樓梯前（圖17），團隊以防水膠布將地面完全覆蓋，然後將水注滿房間，利用下層房間的監測儀器測量樓板的反應，與結構工程師的計算對照資料。為安全起見，其下的一排房間須作足夠的支撐。



圖17 在一樓房間進行荷載測試。現有的樓板將被拆除，以建造新的逃生樓梯。  
 [來源：合利營造有限公司]

#### 4) 辦公室和會議室的裝修

另一個主要改建工程是翻新辦公室和會議室。其裝修須為簡單而優雅，以配合大樓的整體氛圍（圖18）。在不破壞定義特徵元素如壁爐、木窗及木門的前提下，團隊的目標為能令用戶的辦公室可靈活有效地使用。壁爐所在的牆身沒有加上任何部件，以免帶來影響。原有的木地板狀況大致良好，只須進行小型修復及清潔。

新的地氈只鋪在木地板上，沒有使用任何黏合劑或固定裝置。為提供屋宇裝備而新增的喉管隱藏在新的吸音牆板後面，沒有拼入原有的磚牆。牆身和地面沒有安裝插座，避免對磚牆及木地板造成損害。相反，插座隱藏在周邊的木櫃內，以配合傢俱的不同佈局。由於原有窗台的高度並不完全符合現時法例要求，窗邊地櫃具有雙重作用，既可儲物又可防止用戶走近窗台以符合要求。



圖18 裝修後的辦公室和會議室。  
[來源：Design 2 (HK) Limited]

## VII. 結論：貢獻與評估

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的改建工程提供了寶貴機會，讓我們經歷一趟保育歷史建築的考古之旅，以現代的保育概念重新想像和修飾這座大樓。團隊花了大量時間研究昔日的改動工程，將不合時宜的部分改造，以切合新的功能及達到對保育的期望。在這六年期間，我們根據自身的工程經驗，加上對專業技能、工藝及細節的執着，為這座法定古蹟進行修復和翻新。

團隊為這項目進行的深入研究，糾正了公眾對大樓的兩大誤會。首先，根據從巴黎外方傳教會總部所得由羅伯特·萊昂神父親書的信函，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的落成年份應修正為1919年，而不是一般透過奠基石所認知的1917年。此外，大樓由英國建築師亞歷山大·科爾本·利特爾設計，他是一家名為利特爾、亞當斯和伍德事務所 (Little, Adams and Wood) 的創辦人之一，而不是部份出版物所指的利安 (Leigh and Orange) 顧問有限公司。這個重要發現，有助我們將大樓與其他同樣在二十世紀初由利特爾設計的歷史建築聯繫起來，例如舊贊育醫院和聖德肋撒堂。透過這個項目，我們將這位曾為香港歷史建築付出巨大貢獻的著名建築師，重新介紹給公眾認識。

這個項目亦為本地工人提供難得機會，使他們可以參與工序如製作草根灰砂漿、修補磚塊、重造木百葉窗，以及修復木地板和紙皮石地磚。這些工作均以最高的標準完成。這個項目同時為不同年代的工匠提供平台，令他們可在維修和修復的過程中，分享各自的技能，並透過彼此協作，從傳統的工藝開發新的技術。

這個項目所展示的保育方案，是從二十多年前將大樓改建為終審法院的經驗學習、演變和改進而來。儘管所花的時間很長，投入的程度很深，但為免出現不必要的改造或加固，以下兩個條件缺一不可：嚴謹的研究以及對原設計原理的透徹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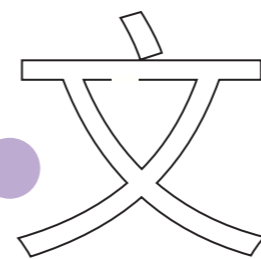
- 1 凱薩琳·馬托克和吉爾·切希爾 Katherine Mattock and Jill Cheshire, 《總督府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Government House* (香港：工作室出版社 Studio Publications, 1994年), 頁10。
- 2 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 *I.L. NO. 82, S.A - 轉讓契約*, 1915年5月21日, 文件編號HKRS265-11A-348-2。
- 3 羅伯特神父 (Father Robert) 於1919年4月27日在寫給巴黎外方傳教會的信件中, 提及新建的教會大樓於1919年4月21日正式啟用。羅伯特神父致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年度信件, 1918年2月14日, 香港教會316 D - 1917至1919年, 1917年, 檢索日期: 2015年5月27日, 巴黎外方傳教會檔案, NR 144。
- 4 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 *I.L. NO.82, S.A - 土地歸還契約*, 1952年12月23日, 文件編號HKRS265-11A-348-3。
- 5 比利時魯汶大學建築系工程科學學院湯瑪斯·庫曼斯教授博士 (Prof. dr. Thomas Coomans)。
- 6 萊昂·羅伯特神父於1918年2月14日致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年度信件, 檔案編號144, 香港教會316D。巴黎外方傳教會檔案。

# 2

## 知識分享和公眾參與—— 文物建築教育的新策略



呂舟教授



# 文化遺產的價值認識、 保護與社會參與 ——以北京中軸線為例

呂舟教授<sup>1</sup>為清華大學國家遺產中心主任，ICCROM Award獲得者。長期從事文化遺產保護教學、研究和實踐，主持大量世界遺產、文物保護單位的保護管理規劃、保護設計，參與多項與世界遺產相關監測、評估、審核及國際培訓專案。

# 摘要

通過保護和參與來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是當代文化遺產保護觀念的內容。北京中軸線作為縱貫北京老城的巨型遺產，它的保護必然對城市產生巨大的影響。北京中軸線通過遺產價值的挖掘、傳播，促進社會對文化遺產保護的關注，參與文化遺產保護。社會參與在北京中軸線申報世界遺產這一文化事件上表現出了生動的多樣化關係。北京中軸線價值認識、遺產保護和社會參與過程，展現了文化遺產保護作為歷史城市可持續發展環節的重要性。



歷史文化遺產是人類在歷史變遷過程中創造和保留下來的遺存。它們與產生的地點、環境、時間、事件、人物、思想相關。具有特定價值的遺存、遺蹟被定義為遺產<sup>2</sup>。這種價值通常包括了歷史價值、藝術價值、科學價值<sup>3</sup>，以及社會價值和文化價值<sup>4</sup>，及其他可能的各類價值。

一座城市中，歷史文化遺產的存在不是孤立的，是伴隨著城市的歷史演化過程產生和發展的物質或非物質遺存（本文主要涉及物質遺產的部分），它們是這座城市歷史的載體。文化遺產保護是從對單體物件的認知開始的，被人們最早關注和保護的往往是紀念物或具有強烈紀念性價值及藝術價值突出的物件。這種情況普遍存在於文化遺產保護的歷史中，不僅存在於各國文化遺產的保護中，同樣也存在於以世界遺產為代表的國際文化遺產保護當中。這一歷史狀況，造成了對保護物件價值認識的碎片化和保護管理的碎片化。隨著保護工作的發展，被保護的物件越多，這種碎片化的狀況也就越嚴重。

北京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城市，其建城史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周代建立之初的第一次城市建設的高峰時期。作為都城它的歷史也可以上溯到西元10世紀的遼代。在漫長的歷史年代中，北京保留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北京現有7處世界遺產、138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407處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在保有數量龐大的文化遺產資源的同時，碎片化的情況也同樣存在。關於單個的文物保護單位與歷史環境之間關係的問題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已經引發了人們的討論。北京的文化遺產保護也從作為個體的文物本體保護，擴展到對一定範圍的歷史環境的保護，進而發展成對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1982年國務院公佈了第一批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的名錄，北京名列其中。

歷史文化名城在保護方法上逐漸形成了歷史文化名城、歷史文化街區和歷史建築三個層級。在實踐過程中無論是歷史建築，還是歷史文化街區更多被強調要保護和延續它們所體現的傳統「風貌」，結合文物保護單位的保護強調的「不改變文物原狀」的原則，就形成了歷史文化名城重風貌、文物建築重原狀的保護路徑。在2000年前後，北京形成了以25片歷史文化街區保護為核心內容的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方法。在最新版的北

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發展規劃》中歷史文化街區增加到了49片，公佈的歷史建築為1,056棟。除此之外還公佈了13片特色地區、68片地下文物埋藏區、1處中國歷史文化名鎮、5處中國歷史文化名村、44處傳統村落，除此之外，還有126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273項北京市非物質文化遺產、197個老字型大小、158處不可移動革命文物，及41,865株古樹名木。

中國文化遺產保護是建立在部門指導、屬地管理的制度設計基礎上的。在運作方式上是按部門職能制定和公佈保護物件名錄，地方政府則對列入保護名錄的物件進行管理。不同部門公佈的不同的保護名錄加劇了碎片化的趨勢。但屬地管理則可能通過建立具有整體性的保護體系改善或消除碎片化，使各類各級文化遺產能夠形成體系，發揮整體的作用。對北京市而言，構建具有系統性、整體性的文化遺產保護體系是提高文化遺產保護水準，發揮文化遺產綜合效益的必由之路。新版《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發展規劃》提出了重點區域保護工作，包括以中軸線申遺促進老城整體保護、三山五園地區保護與山水田園歷史風貌的恢復<sup>5</sup>，以及運河文化帶、長城文化帶和西山永定河文化帶建設的內容。這些文化帶、片區的整合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構建北京的歷史文化保護傳承體系。

北京中軸線位於老城核心範圍，被賦予了帶動整個北京老城保護的作用。北京中軸線申報世界遺產是通過根據《實施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以下簡稱《操作指南》）的相關標準辨識它具有的「突出普遍價值」<sup>6</sup>，並對這種價值進行有效的保護。從實踐的層面，北京中軸線的保護的確對老城的保護、環境提升發揮了重要作用，在促進社會廣泛參與遺產保護、價值傳播、引發全社會對老城保護的關注，進而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等方面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北京中軸線中至北段



## 一、北京中軸線突出普遍價值的再認識

世界遺產的申報和保護管理也是以價值認知為基礎。通過對遺產價值的發掘和闡釋促使人們理解這一遺產對人類文明的意義，珍視它的價值，形成文化認同，參與對遺產的保護。因此無論北京中軸線是申報世界遺產，還是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價值的辨識都是最基本的工作。

北京中軸線是指位於北京老城中心，縱貫北京老城南北、連續的歷史建築群和城市空間。是由古代皇家建築、城市管理設施和居中道路、現代公共建築和公共空間共同組成的文化遺產。

對北京中軸線的認知，源於20世紀40年代後期學者們的研究。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先生在他的論文中提到了元代北京的中軸線<sup>7</sup>，並認為在1420年明代北京重建規劃當中，中軸線對城市佈局和景觀形態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sup>8</sup>。建築學家梁思成先生則在1951年對北京中軸線的空間節奏、起伏變化的建築韻律做了生動的描述，認為它決定了北京「獨有的壯美秩序」，指出「這是一份偉大的遺產，它是我們人民最寶貴的財產」<sup>9</sup>。梁思成先生對北京中軸線在建築與規劃方面的價值表述，構成了2012年國家文物局調整中國申報世界遺產的預備清單時，將北京中軸線納入新的預備名單的基礎。2009年到2012年對北京中軸線的定義、範圍、可能具有的世界遺產價值進行了研究，形成了申報文本的初稿。2013年初北京中軸線被列入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公佈的申報世界遺產的預備名錄，完成了北京中軸線申報世界遺產第一個階段的工作。

2009-2012年申報文本的初稿認為，北京中軸線作為北京舊城嚴謹對稱空間格局的核心，是中國古代和當代都市計劃的無比傑作。它的規劃和發展過程體現出中國人民將科學、美學及古代哲學思想應用於城市設計的創造，以及通過城市規劃建立社會秩序、規範社會生活的方法。反映了人類在城市規劃建設上的傑出才能，符合《操作指南》規定的世界遺產標準<sup>10</sup>中的第一條標準「反映人類創造性才能的傑作」的條件；北京中軸線的空間序列是中國傳統禮制文化的物質表達，反映了以中為尊的傳統觀念，同時也是中國古代皇家文化的空間載體和民俗文化的生存場所，符合世界遺產的第三條標準「是依然存在或已經消失的文化傳統或文明的獨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見證」的內容；從古代城市規劃和建築群的角度，北京中軸線及其周邊地區的宮殿、壇廟、園林景觀、街巷里坊、防禦工程和水系工程嚴格遵循《周禮·考工記》記載的中國古代城市規劃思想佈局建設，是中國封建社會都城建設經過數千年演變發展成熟的典型範式，代表著中國封建都城建設的最高成就，是中國古代都城保存最完整的典型實例，符合世界遺產第四條標準「是反映人類歷史的一個或某些重要階段的某種類型的建築、建築藝術或技術組合以及景觀的傑出範例」的要求；北京中軸線見證了中國歷史上多個不同民族建立的王朝，見證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覆滅，見證了中國社會民主時代的來臨，見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和繁榮發展，反映了世界遺產第六條標準「與具有突出的普遍意義的事件或生活傳統、觀念或信仰、藝術和文學作品有直接地或具體地聯繫」的內容。

列入預備名錄的北京中軸線主要包括了朝堂宮廷區域（故宮、景山）；壇廟（太廟、社稷壇、天壇、先農壇）；「後市」（鐘鼓樓、南鑼鼓巷）；天安門廣場及周邊主要建築（天安門、

金水橋、華表、石獅、人民英雄紀念碑、毛主席紀念館、人民大會堂、國家博物館）；城門（正陽門、正陽門箭樓、永定門）和主要街道以及六海（六海、萬寧橋）。北京中軸線作為決定整個北京城從元代、到明代、清代，一直延續到當代的城形態的規劃方法的歷史遺存，作為從古代延續至今的城市規劃方法的遺產專案具有的獨特價值，是世界遺產名錄中「缺少代表性」的類型，在東亞地區更屬於空白點。

2017年北京市啟動了北京中軸線正式申報世界遺產的程式。對北京中軸線的範圍和遺產構成要素也做了重新修訂：

「北京中軸線位於北京老城核心區域，縱貫北京老城南北，全長約7.8公里，是歷經七百餘年發展、由一系列古代皇家建築、城市管理設施和居中道路、現代公共建築和公共空間共同構成的富於層次和秩序的城市歷史建築群。

北端是鐘鼓樓，向南經地安門外大街、萬寧橋、地安門內大街、景山，過故宮、端門、天安門、外金水橋、天安門廣場建築群、正陽門、前門大街、天橋南大街、永定門禦道遺存，至南端永定門，太廟和社稷壇、天壇和先農壇分列中軸線東西兩側。它以精巧的方式組織起皇家宮苑、禮儀祭祀建築、城市管理設施、歷史道路、紀念性建築與公共廣場等功能空間，聯繫起宏偉、莊嚴的國家場所和繁華、喧囂的市井街市，以嚴謹的景觀秩序統領北京老城空間格局，是中國都城中軸線規劃發展至成熟階段的典範之作」<sup>11</sup>。



鼓樓及鐘樓，約攝於1924至1927年。

這一界定強調了建築群和空間的秩序，在遺產的構成要素中減少了北海公園和前門、鑼鼓巷和後海的歷史街區。遺產的空間範圍和形態特徵也更加清晰。基於這樣的調整，北京中軸線的遺產價值主題被進一步定位在「中國理想都城秩序的傑作」上。

「理想都城秩序」反映在北京中軸線在形成之初（13世紀）就附會了《考工記》中「匠人營國」的內容，構建了「面朝後市，左祖右社」這一源於西周初期等級制度的都城秩序。西周初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城市建設的高峰時期，通過城市規模、佈局形態的等級規定，對因分封爵位而營建的封地城市的等級進行限制。這些規定被成書於春秋戰國時代的《考工記》記錄下來。隨著《考工記》在漢代被作為對佚失的《周禮·冬官》篇的補遺收入《周禮》，《考工記》的相關內容就成為儒家經典的組成部分。《考工記》中關於建設都城的規定作為儒家禮儀制度的組成部分，成為儒家觀念中「理想都城秩序」。

「理想都城秩序」有著深厚的文化淵源。「以中為尊」是中國傳統的空間秩序建立的基礎。古人觀測天象，發現各種星體環繞北天頂中央、位置恆定不變的北極（辰）星不斷旋轉、運動。這被認為是一種永恆的秩序。這種秩序折射到人間世界，帝王就應當處於中心的位置，其他一切事物則圍繞著帝王運行。帝王的住所則被稱為紫禁城對應天上的紫微垣。「中」成為天下秩序的核心。這種「以中為尊」觀念決定了帝王的位置、皇宮的位置以及都城的位置。元、明、清三代，北京都被對應為古人稱之為「帝車」的北斗七星<sup>12</sup>。元代李洵孫在他的《大都賦並序》中有：「昔《周髀》之言，天如倚蓋而笠欵，帝車運乎中央。北辰居而不移，臨制四方，下直幽都，仰觀天象，則北乃天之中也」，明代丘浚說「況居直北之地，上應天垣之紫微，其對面之案，以地勢度之，則泰、岱萬山之宗正當其前也，夫天之象以北為極」<sup>13</sup>，清乾隆皇帝在他的《皇都篇》中也有「惟彼陶唐此冀方，上應帝車曰開陽」的表述。北京中軸線作為確定整個北京作為都城的城市格局的核心是上述這種傳統觀念中天人關係表達，這種天人關係深刻地影響了中華文明特徵的形成。

作為中華文明核心的儒家思想把禮儀秩序作為世界運行的基本規則，在儒家思想觀念中一切事務都要按照自己地位和等級來行事、運行。《論語·顏淵》十一中有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種規則同樣反映在北京中軸線上，北京中軸線及兩側的建築不僅在位置上表達了尊卑關係，在建築的形態、細節上同樣反映了嚴格的等級關係。在北京中軸線上的禮儀活動、生活方式也同樣嚴格遵循了這種秩序關係。

《左傳》中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國家最重要的祭祀建築被佈局在了緊鄰中軸線的東西兩側，而中軸線上的午門廣場則是出征與凱旋獻俘儀式的場所；《禮記》中有「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明史·四十八》中有「敬天法祖，無二道也」，作為在傳統文化中僅次於中心的上首位置——北京中軸線的東側設置太廟和天壇，正是這種「敬天法祖」觀念的表達。社稷作為國家的象徵，設置於與太廟對稱的北京中軸線西側，表達了家國一體的傳統思想。明初在北京城南郊北京中軸線延長線東側設天地壇，西側設山川壇，構建了天地山川的宇宙圖景，也繼承了郊祀的古代傳統。

北京中軸線作為這些反映中國傳統文化核心精神的物質呈現，使北京中軸線成為中華文明和文化傳統的獨特見證。



天壇的內壇中軸線

北京中軸線從「以中為尊」傳統觀念在都城中的長期實踐；逾7個世紀城市歷史不斷累積塑造出嚴謹對稱的規劃格局和秩序井然的城市景觀；不僅見證了延續至今的國家禮儀文化，也見證了傳統的城市管理方式等三個方面對應了《操作指南》中標準三「為延續至今或業已消失的文化傳統或文明提供了獨特或至少是特殊的見證」<sup>14</sup>的要求：

「北京中軸線歷經元、明、清及近現代逾7個世紀城市歷史演進，建築群始終秉持嚴謹對稱的規劃格局，塑造出秩序井然的城市景觀，為城市建設中『以中為尊』傳統觀念的長期實踐提供了獨特的物質見證，表達出中華文明『中正和諧』『美善合一』的核心理念。北京中軸線多元化的空間組織不僅為延續至今的國家禮儀文化，也為傳統的城市管理方式提供了有力的物質見證。自建成至今，北京中軸線持續地對城市發展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力，顯示出這一傳統規劃理念持續的生命力。」<sup>15</sup>

在規劃和建築形態的方面，北京中軸線以中國傳統都城中軸線發展成熟的傑出範例；巧妙因借山形水系，展現中國傳統人與自然的基本觀念；完整展現《考工記》所載理想都城規劃範式，又突顯禮儀秩序；富於層次、秩序同時蘊含對比、變化的整體等四個方面對應了《操作指南》中標準四「是展現人類歷史一個或幾個重要階段的建築類型、建築與技術的綜合體或景觀的傑出範例」的要求：

「北京中軸線以獨具匠心的軸線選址，完整展現出2,000年前《考工記》所載中國傳統都城理想規劃範式，富於層次、秩序而又蘊含對比、變化的建築形態，緊密聯繫的視覺景觀，成為中國傳統都城中軸線歷經千年發展至成熟階段的傑出範例，亦成為東亞地區現存規模最為宏大且保存最為完好的傳統都城中軸線。其獨特的文化特徵與審美意趣突出地展現了13世紀至今中國傳統都城規劃對於禮儀秩序的表達。」<sup>16</sup>

從國家秩序的極致象徵；見證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見證改變中國歷史發展走向、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重大事件等方面，北京中軸線也符合《操作指南》中的第六條標準「與具有突出普遍意義的事件、活的傳統、觀念或信仰、藝術和文學作品有直接和物質的關聯」<sup>17</sup>的要求：

「北京中軸線的選址和基本規劃格局具有極強的建構國家秩序的象征意義，反映出中國傳統的自然觀念和哲學理念。

作為元、明、清及現代中國首都的核心，北京中軸線見證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而作為一系列改變中國歷史發展走向的重大事件的發生地，它更見證了中國社會從封建王朝時代轉變為現代國家這一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歷史變革。」<sup>18</sup>

根據近年在世界遺產的申報和世界遺產大會相關的討論中對第一條標準「反映人類創造性才能的傑作」的運用，考慮到北京中軸線作為一處始建於1267年，並一直延續到20世紀70年代的建築群與城市空間的集合體，遺產各構成要素是不同時期陸續建成的，其中一些部分，特別是一些街區可能會影響到對北京中軸線遺產整體價值的判斷。因此在修訂文本中暫不使用這一標準。

## 二、北京中軸線的保護

對北京中軸線的價值認知是基於把這個由多組建築群、城市空間和歷史街巷組合而成的遺產物件視為一個整體物件的基本方法。對它的保護同樣應該具有整體性。在構成北京中軸線的各個構成要素中，包含了已列入世界遺產的故宮、天壇，包含了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北京市級的文物保護單位，普查文物、歷史建築等多個不同保護要求的保護物件；北京中軸線不僅包括了元代橋樑，明、清時期的古代建築，20世紀的現代建築，還包括了構成北京中軸線功能特徵的沿街商業；作為北京中心區的核心空間，這是一個一直延續著國家禮儀功能，有著豐富的市民生活的當代都市區域，是一處活態遺產。這些特性決定了對北京中軸線保護的複雜性。

1982年中國建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制度時，北京是第一批被列入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名錄的城市。北京在歷史城市保護方面一直發揮著示範作用。1990年代後期，北京將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落實為對25個歷史文化街區的保護，並根據保護要求劃定了保護區域。其中重點保護區用地面積649公頃，建設控制區用地面積389公頃。加上已由北

京市政府批准的舊城內200多項各級文物保護單位的保護範圍及其建設控制地帶，保護與控制地區總用地面積達2,383公頃，約佔舊城總用地面積的38%<sup>19</sup>。針對重點保護區和建設控制區提出了保護、整治和控制的原則：

### 「(一) 重點保護區的保護規劃原則

1. 要根據其性質與特點，保護該街區的整體風貌。
2. 要保護街區的歷史真實性，保存歷史遺存和原貌。歷史遺存包括文物建築、傳統四合院和其他有價值的歷史建築及建築構件。
3. 其建設要採取『微循環式』的改造模式，循序漸進，逐步改善。
4. 要積極改善環境品質及基礎設施條件，提高居民生活品質。
5. 保護工作要積極鼓勵公眾參與。

### (二) 建設控制區的整治與控制原則

1. 新建或改建的建築，要與重點保護區的整體風貌相協調，或不對重點保護區的環境及視覺景觀產生不利的影響。
2. 進行新的建設時，要嚴格控制各地塊的用地性質、建築高度、體量、建築形式和色彩、容積率、綠化率等。
3. 進行新的建設時，要避免簡單生硬地大拆大建，注意歷史文脈的延續性。
4. 要注意保存和保護有價值的歷史建築，傳統街巷、胡同肌理和古樹名木。
5. 什剎海、大柵欄、鮮魚口地區的建設控制區應參照重點保護區的原則。」<sup>20</sup>

這些基本原則至今也依然是北京市歷史文化名城、歷史文化街區保護的基本原則。這種歷史文化街區的方式是否能夠有效地適應北京中軸線的保護、管理要求？如何基於北京中軸線作為文化遺產的整體價值建立一套更為完整和有效的保護方法和體系也是北京中軸線需要面對的問題。

北京中軸線目前劃定的遺產區面積628公頃，緩衝區面積4,449公頃。其範圍已經遠遠超過1990年代劃定的25片歷史街區的保護和建設控制範圍的面積，是2000年前後北京市老城區內包括文物保護單位和歷史街區的保護範圍和建設控制地帶總和的兩倍，覆蓋了約80%的老城面積。面對這樣的一個串聯起整個北京老城南北、規模巨大的遺產物件需要採用一套能夠更好的體現對其整體性價值進行有效保護的方法。

在世界遺產保護中，城鎮類型的遺產從1978年出現在第一批世界遺產名錄中開始，由於這類遺產大多既是重要的歷史遺存，又是當代生活的載體，因此它們與一般的紀念物、建築群和遺址在保護管理上就存在巨大的差異。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在1987年通過了關於歷史城鎮和城區保護的《華盛頓憲章》，提出了整體考慮保護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關係的策略。提出城鎮或城區的功能是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獲得的，對這些品質的威脅都會損害歷史城鎮或城區的真實性<sup>21</sup>。2005年教科文組織（UNESCO）針對歷史城鎮的保護通過了「維也納備忘錄」，提出了「城鎮歷史景觀」的概念，並推動了基於「城鎮歷史景觀」方法的保護實踐。2011年教科文組織在之前相關實踐的基礎上又通過了《城鎮歷史景觀的建議書》。

「城鎮歷史景觀是文化和自然價值及屬性在歷史上層層積澱而產生的城市區域，其超越了『歷史中心』或『整體』的概念，包括更廣泛的城鎮背景及其地理環境」<sup>22</sup>。

「上述更廣泛的背景主要包括遺址的地形、地貌、水文和自然特徵；其建成環境，不論是歷史上的還是當代的；其地上地下的基礎設施；其空地和花園、其土地使用模式和空間安排；感覺和視覺聯繫；以及城鎮結構的所有其他要素。背景還包括社會和文化方面的做法和價值觀、經濟進程以及與多樣性和特性有關的遺產的無形方面」<sup>23</sup>。

「這一定義為在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大框架內以全面綜合的方式識別、評估、保護和管理城鎮歷史景觀打下了基礎」<sup>24</sup>。

「城市歷史景觀」成為世界遺產語境中歷史城鎮保護的重要方法。

2018年在北京市召開的關於北京中軸線申報世界遺產的國際研討會上，有些專家提出北京中軸線是否可以「城鎮歷史景觀」的類型嘗試申報工作，把「城鎮歷史景觀」從一種方法變為一種遺產類型。儘管考慮到世界遺產申報的複雜性，北京中軸線在申報世界遺產的類型表達上，並沒有強調城鎮歷史景觀的類型特徵，但在相關的價值表述中增加了北京中軸線作為北京都城歷史景觀的特質，在保護方法上也採用了相應的原則。

北京中軸線在遺產區的區劃劃定上強調了整體性，通過一個完整的遺產區包括了所有體現北京中軸線遺產價值的紀念物、建築、建築群、遺址、橋樑、河道、街道、廣場等遺產構成要素。緩衝區則不僅涵蓋了天壇、故宮作為世界遺產的緩衝區，而且為了表達北京中軸線對北京老城對稱佈局的影響，增加了西單、西四和東單、東四的區域。在向北京市政府提交相關保護要求時，將整個老城範圍劃為北京中軸線的環境區，並根據首都功能核心區控制性詳細規劃的要求對老城進行整體保護和管控。促進北京中軸線帶動整個北京老城的保護。

以北京中軸線為核心的景觀保護視廊的設置體現了對整體環境的保護，是基於城鎮歷史景觀的保護方法的實踐。北京中軸線的視廊控制不僅對老城區域的建設提出了管控要求，而且對從北京中軸線區域向西、向北與西山和燕山山脈構成對視關係的視線通廊內的建設專案提出了管控要求，實現對北京中軸線與周邊燕山山脈和西山之間景觀環境之間關係的管理。

北京中軸線不僅具有重要的歷史見證和文化表達的價值和意義，它同樣也是當代現實生活的場所與環境。對它的保護不僅要考慮遺產物質遺存的長期延續，同樣需要考慮整體的真實性，包括生活、社區結構、街區功能的真實性。地安門外大街和鐘鼓樓周邊地區是元代以來北京最為重要的商業街區，是北京中軸線城市功能佈局關係中「面朝後市」的「後市」所在。對這一區域的環境整治和保護就必須考慮對商業功能的延續，避免對原有社區的干擾。在保護措施上採用了「微整治」的方法，保持延續原有的業態，最大限度延續了街區的特徵和市井生活。

立法是實現對北京中軸線整體有效保護的基礎。2021年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修訂版的《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條例》，《北京中軸線保護條例》也已經在立法的過程當中。在《北京中軸線保護條例》的初稿中，強調了北京中軸線作為文化遺產與周邊自然環境的關係，強調了北京中軸線物質遺產與相關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關係，強調了北京中軸線作為決定北京老城形態的核心建築群體和城市空間與周邊傳統四合院街區的關係。在《北京中軸線保護條例》的初稿中還特別針對北京中軸線的遺產構成要素涉及多層級、多部門的管理現狀提出了建立保護管理協調機制的制度建設。在《北京中軸線保護條例》的初稿中還列出了「傳承利用和公眾參與」的章節。

北京中軸線位於北京的核心區域，也是當代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區域，對北京中軸線的保護強調價值和形態的整體性是近年歷史城鎮保護觀念發展的趨勢和實踐經驗積累的結果，也是城鎮歷史景觀的保護方法在超大型都市的重要實踐探索。

### 三、 社會參與

社會參與在文化遺產保護中標誌著保護從專業的領域拓展到社會發展的更為宏大的視野範圍。在歷史城鎮的保護中，社區一直是一個重要的要素。如1987年《華盛頓憲章》所說：「所有的城鎮社區無論是經過漫長歲月逐步形成，還是被特意創造而形成的，它們都是歷史過程中社會多樣性的表達」<sup>25</sup>。社區本身就是歷史城鎮保護的重要內容，社區延續的生活構成了歷史城鎮遺產的特色。社區的居民作為城鎮生活的主體，他們也就自然成為歷史城鎮保護的核心。進入21世紀以後，從可持續發展理論出發，遺產保護本身就是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方法，社會各階層廣泛參與遺產保護也就成為了今天遺產保護的一個基本特徵。

社會參與並非簡單的政府與社會的關係，它是涉及社會各個方面的動態的相互作用。作為核心事件的發起者，不僅可能是政府，也可能是專業機構，甚至是社區和市民。北京中軸線的社會參與充分反映了這種社會參與的多維度、多向性互動關係的複雜性。在申遺的過程中政府機構內的各個部門，從文物部門到屬地區政府、國土規劃、城鄉建設、發展改革、財政、文化旅遊，同樣也呈現出利益相關方的特徵，在這個過程中角色在各個構成事件的發展中不斷轉換。當社會的各方面要素參與之後，這種相互作用也隨之變得更加複雜和生動。

遺產價值的傳播是社會參與的基礎。2013年北京中軸線被列入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的申報世界遺產預備名錄之後，對北京中軸線的保護作為政府工作的重要內容，在北京市政府歷年的工作報告中都有所體現。2017年北京市政府提出啟動正式申報工作之後，媒體開始關注北京中軸線的範圍、相應的保護工作以及申報世界遺產對當地居民的影響等問題。地方和國家媒體都對北京中軸線保持了高度的關注，製作了大量新聞、訪談、文化類的節目。電視媒體制作的「北京中軸線」綜藝類節目，形成了一種受到觀眾特別是年輕觀眾喜愛的綜藝類遺產傳播形式。出版界出版了大量從學術研究、歷史圖片到連環圖畫的大量以北京中軸線為主題的圖書。其中繪圖本《中軸線》是一個名為「帝

都繪」的青年藝術工作室的創作作品，他們用繪圖的方式闡釋了北京中軸線的規劃發展過程、建築藝術和豐富的生活。

在文學作品中也出現了大量關於北京中軸線詩歌。網路作家「唐家三少」以北京中軸線保護為背景，創作了講述青年修復師生活的小說《話說京脊》。

北京的許多藝術社團也參與到了北京中軸線主題的創作之中，北京民族樂團創作了名為《中軸》的由九個樂章組成的民族管弦樂組曲，並在2020年10月20日在國家大劇院音樂廳進行了首演。大量以北京中軸線為主題的歌曲也出現在各種音樂節目當中。由眾多年輕歌手參加的「最美中軸線」獲得了市民的喜愛。2021年，一些年輕的音樂人組織策劃了「古建築音樂季」，在北京中軸線上及中軸線周邊的古建築中進行音樂表演。

北京中軸線作為反映中國歷史文化的重要遺產和北京當代生活的載體，它也被多個中、小學納入到了課堂教學和課外活動當中。位於北京中軸線遺產區先農壇內的育才學校把所在的先農壇所表達的中國傳統農業文化作為學校的課程內容，組織學生進行相關的農事活動；燈市口小學、西城外國語實驗學校組織學生通過繪畫和作文描寫「北京中軸線」；黑芝麻小學的小學生自己拍攝了講解「北京中軸線」的短視頻；北師大實驗中學引入了關於世界遺產的課程。

2021年北京市組織的「北京中軸線」文化創意大賽中，在三個月的時間裡徵集到了近三萬五千件作品。2022年北京冬奧會之前，冬奧會組委會專門製作了以「北京中軸線」上各遺產構成要素為題材的冬奧會開幕倒計時紀念徽章，表達了北京的厚重歷史文化特色，傳播了北京中軸線的形象。

在社交媒體中，許多市民拍攝了大量關於北京中軸線中的建築、歷史故事、人物、社區生活的短視頻。博物館、文化機構、社會團體組織了多個展覽，吸引了大量觀眾，一些關於北京中軸線的展覽在春節等長假期時形成了市民排隊觀展的熱潮。在文化機構、社會團體組織的各種報告會中，許多學者對北京中軸線的歷史、文化從不同角度進行了分析和闡釋，許多內容對於深化北京中軸線的價值研究發揮了作用。

北京中軸線位於北京老城的核心區域，部分歷史街區居住密度高，街區環境差。在北京中軸線環境整治過程中，北京電視台通過「向前一步」等社會話題節目，邀請住戶、社區負責人、相關專業人士對話，表達居民訴求，解釋相關政策。居民和社區對生活環境的要求、建議得到了表達，他們提出的訴求也在環境改善過程中得到了反映。例如，飼養鴿子是北京市民的傳統生活方式之一，但鴿籠的設置造成了環境的混亂和污染。根據居民的意見，在街區環境整治過程中為養鴿子的市民設計和設置了鴿籠，在改善環境的同時，延續了北京傳統的生活方式。

在北京中軸線的遺產價值傳播和社會參與過程中，數位化技術運用同樣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一些著名的數位化企業，如騰訊、北京河圖等都參與了相關工作。騰訊公司設計的北京中軸線推介小程序，設計了北京中軸線的數位代言——雨燕，這一數位小程序上線五個小時，點擊人數就超過了54萬。



天安門廣場的設計也遵循了中軸線的設計原則（金東俊拍攝）。

北京中軸線引發的社會參與過程。社會各界、市民已經不僅僅停留在被動的接受的層面（inform），而且進入到了主動認知和參與傳播的過程（consult, involve）當中，在一些事務上更是進入到了合作（collaborate）的層次。

社會參與文化遺產保護，促進文化遺產保護在社會可持續發展中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在中國文化遺產保護中已經是一個受到廣泛關注的問題。在《中國文物古蹟保護準則（2015年修訂）》中就特別強調了文物古蹟的文化和社會價值，強調了社會參與的重要性，強調了對文物古蹟的保護本質是對文化傳統的傳承。自2015年中央政府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推動社會廣泛參與文化遺產保護和在遺產保護中體現人民的基本訴求也成為實踐的重要方面。在中國的世界遺產申報中，2017年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鼓浪嶼——歷史國際社區」，由於遺產的核心價值，社區在整個申遺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社區議事會的設置，使社區和居民能夠在一定程度能夠參與到整個保護管理的決策過程當中（empower），為社區和市民廣泛和深度參與遺產保護積累的經驗。

在教科文組織將文化的內容納入到了實現2030議程全部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踐過程當中的大背景下，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價值發掘、闡釋、傳播，以及基於遺產所承載的文化傳統傳承基礎上的創新無疑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方面。社會參與則是使遺產保護能夠真正發揮這一作用的基礎。

## 結論

20世紀80年代末期，時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的馬約爾 (Federico Mayor) 在「世界文化發展十年」專案中提到「發展的文化維度」。2019年教科文組織將文化指標納入到「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當中，「承認文化作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推進手段和驅動因素起到的作用」「保護和促進文化是目的，但這種保護和促進也通過橫向方式推動了多項可持續發展目標，包括建設可持續的城市、體面工作和經濟增長、減少不平等、環境、促進性別平等、創新、和平與包容的社會等目標。談到文化的作用，它既是直接有助於實現經濟和社會效益的驅動因素，同時也是提升發展干預措施有效性的推進手段」<sup>26</sup>。在2021年第44屆世界遺產大會上通過的《福州宣言》中，世界遺產委員會強調了在新冠疫情流行、氣候變化、武裝衝突等全球性災害影響的背景下，世界遺產所表達的人類共同價值觀的重要性，強調遺產保護在促進建立新的人與自然的關係的意義，強調遺產保護促進國際社會廣泛合作的作用，強調遺產保護促進學術界和民間社團及社區更廣泛的參與、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作用，「維繫一個開放、包容、能夠自我調適、可持續、有韌性、清潔美麗的世界」<sup>27</sup>。

顯然，綜合考慮遺產保護對於文化在推動社會可持續發展方面的作用，遺產保護具有產生重大溢出效益的巨大潛力，如何在遺產保護中最大限度地發揮其可能產生的促進社會整體發展的效益是當代社會發展應當給予關注的方面。從北京中軸線的實踐看，通過發掘遺產的價值，向社會傳遞對遺產的價值認知，引發社會對遺產保護的關注，創造社會廣泛參與遺產認知、保護、發展的條件和機會，通過社會參與提高遺產保護管理水準，促進相關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獲得社會均衡和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續發展推動力。

北京中軸線作為中國申報世界遺產項目已經歷了13年的時間，遺產價值研究和認識是推動遺產保護工作的基礎。在不斷挖掘價值，保護遺產價值真實性、完整性的基礎上創造社會參與遺產價值傳播和保護的條件，鼓勵社區和居民參與與北京中軸線相關的話題和事務之中，形成社會關注的熱點，增加社會共識，形成社會凝聚力，最終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這本身就反映了文化遺產保護從以價值為基礎，到以社區為基礎，再到以人為中心的發展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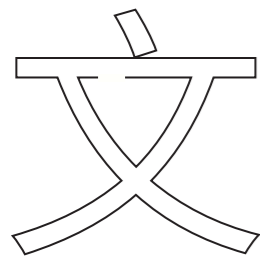
北京中軸線的保護也再次證明了文化事件對社會的影響和意義。

- 1 清華大學教授，北京中軸線文本團隊負責人。
- 2 UNESCO：《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1972年，頁2。
- 3 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
- 4 中國古蹟遺址保護協會，《中國文物古蹟保護準則（2015年修訂）》（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頁6-7。
- 5 三山五園指北京老城西北郊的以萬壽山、香山、玉泉山和頤和園、靜宜園、靜明園、暢春園和圓明園等明清皇家園林為核心的區域。
- 6 《世界遺產公約》和《操作指南》稱之為：「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即OUV。
- 7 「鐘鼓樓坐落在皇城中軸線延長線上，因此這條中軸線與東西城牆等距……」。見侯仁之：《北平歷史地理》（北京：外語教學研究出版社，2013年），頁105。
- 8 侯仁之：《北平歷史地理》（北京：外語教學研究出版社，2013年），頁124。

- 9 梁思成：《梁思成全集（第五卷）》（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1年），頁107。
- 10 WHC (2008),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p. 20.
- 11 北京中軸線申遺文本（第12版），頁25。
- 12 《史記·天官書》：「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
- 13 《治國平天下之要備規制·都邑之建（上）》
- 14 《操作指南》，2021版，頁29。
- 15 北京中軸線申遺文本（第12版），頁112。
- 16 北京中軸線申遺文本（第12版），頁121。
- 17 《操作指南》，2021版，頁30。
- 18 北京中軸線申遺文本（第12版），頁129。
- 19 北京規劃委員會：《北京舊城25片歷史文化保護區保護規劃》（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頁9。
- 20 北京規劃委員會：《北京舊城25片歷史文化保護區保護規劃》（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頁10。
- 21 ICOMOS, Charter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 Towns and Urban Areas (Washington Charter 1987), [https://www.icomos.org/images/DOCUMENTS/Charters/towns\\_e.pdf](https://www.icomos.org/images/DOCUMENTS/Charters/towns_e.pdf).
- 22 UNESCO General Conference, 36th, 2011 [1473],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15084\\_chi.page=73](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15084_chi.page=73), 第8段。
- 23 UNESCO General Conference, 36th, 2011 [1473],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15084\\_chi.page=73](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15084_chi.page=73), 第9段。
- 24 UNESCO General Conference, 36th, 2011 [1473],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15084\\_chi.page=73](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15084_chi.page=73), 第10段。
- 25 ICOMOS, “Charter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 Towns and Urban Areas (Washington Charter 1987)”, [https://www.icomos.org/images/DOCUMENTS/Charters/towns\\_e.pdf](https://www.icomos.org/images/DOCUMENTS/Charters/towns_e.pdf).
- 26 UNESCO, Thematic Indicators for Culture in the 2030 Agenda, 2019.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3501>, p. 12.
- 27 第44屆世界遺產大會（2021年）：《福州宣言》，<https://whc.unesco.org/document/188530>。

## 參考文獻

- UNESCO (2021),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WHC.21/01.
- 北京中軸線申遺文本（第12版）。
- 北京規劃委員會：《北京舊城25片歷史文化保護區保護規劃》（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
- UNESCO (2009), *The 2009 UNESCO Framework for Cultural Statistics* (FCS).
- UNESCO (2019), *Thematic Indicators for Culture in the 2030 Agenda*.
- UNESCO/WHC (2007), *World Heritage—Challenges for the Millennium*.
- UNESCO (2011), *Recommendation on the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 UNESCO/WHC (2014), *Engaging Local Communities in Stewardship of World Heritage*.
- UNESCO/WHC (2002), *Partnerships for World Heritage Cities*.
- UNESCO/WHC (2012),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rough World Heritage*.



# 物建築的教育與推廣 ——以澳門為例

建築師、博士、ICOMOS 會員，除了從事建築設計及保育，近年亦著力澳門城市建築的研究、教育及推廣，出版包括《記憶之外：走向20世紀看澳門建築保育》。



呂澤強 博士

# 摘要

本文以澳門自申報世界文化遺產至今，政府部門、社團及高等院學對於文物建築教育及推廣的主要情況作整理歸納，雖然並未全面，仍一定程度反映澳門在該方面的發展與現狀。

## 前言



物建築的保育，如果只依靠政府部門及專業人員，沒有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和支持參與，保育政策將難以推行，政策的落實亦難以深入與持久。

筆者2003-2005年在法國巴黎修讀關於建築保護的碩士專業課程，留學期間了解到法國的建築保育政策能夠較順利推行，首先是基礎教育普及，而且國民自小對藝術、建築、歷史等知識有較多機會的接觸，相關知識的普及程度較高，在社會形成了對本土歷史、建築保育關心的力量，加上專業人士及傳媒的有效監察，可能影響歷史環境及景觀的項目都被理性討論。

當然，法國的情況與其社會發展有關，未必能將其做法直接移植到亞洲，尤其不可能在發展中國家實行。

澳門的文物建築保育雖然始於澳葡管治的時期，然而，當時關心保育的人士數量極少，社會甚至有建築保育阻礙城市現代化發展的意見。

澳門特區成立後，尤其是透過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工作，澳門的歷史、文化與建築文物保護，開始得到較多的關注，2008年因為東望洋燈塔附近擬興建高層樓宇，可能影響上述世遺建築的景觀甚至評級，澳門社會出現關注的聲音，後來，行政長官透過批示，訂定了東望洋山周邊的樓宇高度限制，以維護世遺的景觀。

澳門自從成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在過去20多年的時間，在社會中萌生、成長及匯聚出一股自下而上的民間保育力量。

本文嘗試透過整理及分析政府部門、社團及學術教育機構在過去20多年的主要工作，探討文物建築教育在澳門的發展情況，及其對建築遺產保育的影響，有助於日後保育政策的制定，亦可作為鄰近地區的參考。



圖1 文化遺產小小導賞員培訓（澳門文化遺產協會提供）

## （一）政府部門

在澳門特區政府，負責文化遺產保護的部門是文化局，雖然其他部門也會舉辦關於文物保護的教育活動，但本文主要集中在文化局的項目，亦會提及其他部門。

對於文物建築教育，2001年文化局開展的文物大使培訓計劃，可算是一項開創性及其最重要的文物建築教育推廣工作。

文物大使培訓計劃正值當時特區政府展開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工作，是「全澳文化遺產推廣計劃」的一部分，該計劃包括關於文物建築的校園巡迴展覽。

文物大使培訓計劃面向中學生，被錄取的學生經過一些關於文物建築知識及導賞的培訓，包括理論課程、導賞實踐和參觀交流，增加青少年對澳門歷史的認識和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同時也培養青少年獨立處事和組織領導等能力。完成課程的一眾學員被授予「文物大使」稱號，並以推廣保育澳門文化遺產為任務。

該培訓課程舉辦了一屆，受培訓的青年人於2004年組成了「澳門文物大使協會」，以「愛護文物·傳承文化」為理念，在文化局的支持下，自2007年開始承辦文物大使的培訓計劃，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培養出一批關心澳門歷史及文化遺產的年青人，並在相關的領域繼續發展。



而文物大使協會亦開展各類的推廣活動，於2010及2018年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世界遺產培訓與研究中心（蘇州）頒發「世界遺產青少年教育基地」，2019年在澳門特區政府支持下，成為「粵港澳大灣區青年行動聯盟」的成員。<sup>1</sup>

除了針對中學生的培訓，自2016年開始，文化局主辦「澳門文化遺產小小導賞員培訓計劃」（圖1），由不同的文化遺產保護團體協辦，面向10至16歲的學生，利用7及8月的暑假期間，結合課堂與參觀，培養學生掌握澳門世遺景點的基本知識及導賞技巧，向公眾介紹文化遺產，傳承中國文化。<sup>2</sup>

對於成年人，自2020年，文化局舉辦「文化傳播大使」代言人計劃，透過理論及實踐課堂，完成計劃的學員成為「文化傳播大使」，積極傳承、弘揚優秀本土與中華文化。文化局與文化傳播大使亦一同策劃「領航計劃」，推出導賞、工作坊及講座等供市民參與的活動，推動文化傳播及傳承。雖然該計劃並非只限於文物建築，然而，澳門世界文化遺產是澳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相關的課程及活動，都有與文物建築或歷史城區有關的內容。<sup>3</sup>

將文化知識帶進校園：自2014年，文化局主辦及由社團協辦的「文化講堂」計劃，向學校提供一系列不同領域的專題文化講座，拓闊學生文化視野，提升創意思維及美學感知能力，促進對跨文化的了解及跨領域知識的運用，達至多元智能發展。

後來，該計劃發展成為面向小五或以上年級之學校、社團、機構及公眾的藝術普及計劃，以小班制的講座形式進行，內容涵蓋本土歷史、視覺藝術、建築、音樂、電影、動畫、街頭文化、文化策劃與文創產業等藝術範疇。<sup>4</sup>

除了文化局，其他政府部門亦有舉辦一些工作坊或講座活動，推廣澳門歷史與建築。

澳門基金會開展的大型文史網站「澳門記憶」致力於蒐集散落的澳門史料，梳理整合成網上多媒體資料庫，以數碼方式永續保存澳門歷史文化，達至共建、分享、傳承的目標。自2020年亦開始邀請澳門文史工作者走進校園，以中學生為對象舉辦主題講座系列，主題涵蓋中西建築、城市變遷、行業發展及人物故事，更橫跨文獻學、口述歷史、建築與城規等多個領域，以期構建立體的澳門史，讓學生藉活動加深對澳門歷史文化的認識和了解。<sup>5</sup>

市政署（前民政總署）於2011年展開「街道研究計劃」，集結成果，向市民推廣澳門街道的往事趣聞，傳承澳門街道的豐富歷史文化底蘊，除出版導賞小冊子、口袋型小書和研究專著，以及籌辦多元化的宣傳推廣活動外，亦建構了「漫步澳門街」手機應用程式，與市民分享豐富的街道資料和今昔照片，一同感受街道風情。

「漫步澳門街」現有19條不同主題路線，其中有涉及歷史建築、圍里等傳統生活空間。

該項目除了設有專題網站，亦定期舉辦導賞及講座等形式的教學活動，面對市民、學校及團體。<sup>6</sup>

## （二）社團

澳門關於文物保護的社團眾多，在文物建築教育及推廣，較有成績的，除了上文提及的澳門文物大使協會，還有遺產學會、澳門文化遺產協會、澳門文遺研創協會等等，主要舉辦課程、講座、工作坊，也會舉辦建築導賞、展覽及出版相關的書籍。其中，澳門文化遺產協會及澳門文物大使協會曾經分別協辦由文化局主辦的「澳門文化遺產小小導賞員」。還有另外的一些社團也會組織涉及文物建築保護教育的活動，最主要是舉辦講座或工作坊。

上文已提及，澳門文物大使協會產生於文化局文物大使培訓計劃，該協會成立後，繼續開展文物大使的培訓，在文物保護教育及普及取得一定的成績。除此，該協會每年組織多項文物知識推廣活動，包括校園講座、各類比賽、夜遊世遺、遺城詩路、書籍出版、文化遺產講座與培訓工作坊，亦對政府的保育政策及發展規劃藍圖作回應。<sup>7</sup>

該會於2014年以「研古創新·永續文城」為理念，創立澳門文遺研創協會，對文化遺產展開研究和創作，承傳推廣澳門歷史文化。



圖2 文物建築講座（遺產學會提供）

遺產學會由一群文化遺產保護專業人員於2014年創立，通過各種活動（包括文化和教育項目）促進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都市遺產、建築遺產及工業遺產等類型遺產的可持續保護與再利用，以提升人們的文化生活內涵和場域。舉辦的活動包括：各類型遺產之調查、紀錄、研究和評估；各類型遺產活化及經營管理策略之擬定和執行；各地遺產保護案例之收集、分析、比較和研究；推廣遺產保護理論和實踐；促進國際交流和建立互助網絡，舉辦研討會、講座、工作坊及展覽等。

除了研究、展覽、講座及出版外，該協會亦舉辦關於文物建築的導賞活動，增加大眾對建築的認識（圖2）。<sup>8</sup>

澳門文化遺產協會成立於2010年，主要以教育推廣文化遺產的保育工作為發展理念，從而提高大眾的保育意識。

該協會除了在中學舉辦介紹文化遺產系列的講座和邀請各地專家舉辦專題講座外，亦增加導賞及工作坊，提升參加者對保護文化遺產的意識；還於大三巴遺址、盧家大屋及松山軍用隧道等文化遺產地點提供定點導賞服務。

在教育推廣方面，該協會於2016及2018年協辦「澳門文化遺產小小導賞員培訓」，亦於2019年開展「澳門博物館兒童導賞員培訓課程」，培養學生對澳門世界文化遺址及文物的認識，加強青年參與澳門文化遺產的發展工作。<sup>9</sup>

### （三）高等教育

相對於政府部門或社團面向公眾的短期教育及推廣，高等教育機構則培訓專業的學術人員。

澳門有開設建築專科的院校數量不多，目前只有聖若瑟大學有建築本科，旅遊學院只有文化遺產管理本科，而理工大學（前理工學院）昔日的設計本科中有空間設計的內容，其中曾涉及歷史建築的改造設計。

對於文化遺產保護，澳門科技大學於2014年開辦文化遺產保護（設計學）的碩士及博士課程，後來亦開設建築的碩士及博士課程，這對建築遺產保護的教育及研究提供了專業的學習交流平台。

另外，澳門城市大學的城市規劃與設計碩士及博士課程，也涉及文物建築的教育。

### 結語

澳門的建築文物保育，需要建立在相關教育的基礎上。

高等學院提供專業的學習與研究，使開展深層次的文物保育及在地研究變得可能。

然而，文物保育不能只靠專業人員，也不能停留在學術的象牙塔，政府部門與社團分別向公眾提供不同形式的學習機會，針對不同的年齡層，制定不同的推廣教育項目，彌補基礎教育對建築知識的不足。經過20多年的努力，現今澳門社會已形成一群關心文物保育的人員，其中也有社團代表進入了相關的政府諮詢組織。

澳門土地資源缺乏，城市發展與保育經常出現爭議的情況，東望洋山及西望洋山的景觀保護、已評定文物建築的活化利用、具價值的未評定建築物的去留…在出現爭議的情況下，社會需要科學理性的討論，而這樣的討論，沒有相關知識的普及是難以實行的。

1 譚志廣、龐朝暉：《護遺路上》（澳門：澳門文物大使協會出版，2019年），頁21。

2 <https://m.facebook.com/icmacao/photos/小小導賞員係我>。

3 <https://www.exmoo.com/article/151510.html>。

4 <https://www.icm.gov.mo/lecture/cn/?id=introduce>。

5 <https://www.gov.mo/zh-hant/news/870094/>。

6 [https://macaostreets.iam.gov.mo/zh\\_mo/index.html](https://macaostreets.iam.gov.mo/zh_mo/index.html)。

7 譚志廣、龐朝暉：《護遺路上》（澳門：澳門文物大使協會出版，2019年）。

8 [https://bo.io.gov.mo/bo/ii/2014/20/anotariais\\_cn.asp#419](https://bo.io.gov.mo/bo/ii/2014/20/anotariais_cn.asp#419)。

9 <http://www.mcha.org.mo>。

# 澳門世界文化遺產 的保護、管理及 活化再利用



朱蓉 教授

江南大學設計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英國愛丁堡大學訪問學者，澳門城市大學特聘教授，澳門遺產學會監事。研究領域包括城市文化遺產保護與管理、景觀環境設計理論與方法。

# 摘要

2005年，「澳門歷史城區」成為中國第31處世界遺產，也是澳門450多年來城市發展的重大事件。作為歷史城鎮型世界遺產，澳門歷史城區兼具遺產保護與經濟發展並重的雙重目標。本論文回顧了澳門世界文化遺產在申遺前後的保護、管理及活化再利用的發展歷程與經驗，同時，針對當前澳門在國家和區域總體戰略規劃背景下的新機遇與挑戰，對澳門世界文化遺產在未來「後申遺」時代的可持續發展方向提出策略性建議。

## 一、引言

# 作

為中國歷史最悠久的歐洲人聚居地以及亞洲早期貿易中轉港口，澳門自16世紀中葉開埠建城至今，其城市街道的佈局、演變、發展模式以及建築的典型風格特徵都代表性地表現出中西方在美學、文化、建築與技術等方面的多元共存性。2005年7月15日，「澳門歷史城區」(The Historic Centre of Macao) 被正式批准作為世界文化遺產列入《世界遺產名錄》<sup>1</sup>，成為中國的第三十一處世界遺產(圖1-1，圖1-2)。澳門歷史城區<sup>2</sup>充分體現出四百多年來東西方文化的共生與交融，其中保留的葡萄牙和中國風格的古老街道、住宅、宗教和公共建築，開創了若干「中國之最」<sup>3</sup>，也見證了東西方美學、文化、建築和技術影響力的交融。歷史城區將港口與葡萄牙城市相連接，它是在國際貿易

蓬勃發展的基礎上，中西方交流最早且持續溝通的見證。澳門世界文化遺產代表了中國與歐洲文明在美學、文化、建築與技術等方面對話交流的發展，同時也是城市文化記憶的重要載體，具有重要的歷史與社會價值。經過幾個世紀的變遷和城市發展，這些中西式歷史建築依然保存完好，並在現代城市環境中交相輝映，延續着東西方文明交流互補、多元共生的城市文化內涵。

作為中國境內現存年代最遠、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和最集中的中西式並存建築群，澳門歷史城區充分見證了中國乃至遠東地區的西方宗教文化和中國民間信仰，同時反映出中西不同宗教、文化乃至生活的交融與尊重。它「見證了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的碰撞與對話，證明了中國文化永不衰敗的生命力及其開放性和包容性，以及中西兩種相異文化和平共存的可能性<sup>4</sup>。」作為世界文化遺產，澳門歷史城區不僅是澳門文化和市民生活的重要部分，更是中國文化乃至全人類文明寶貴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資源。對其進行保護、管理及活化再利用對於傳承民族優秀傳統、保護文化多樣性、營造遺產地地域特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 二、澳門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管理及活化再利用發展歷程

澳門是亞洲較早開展文物建築保護工作的城市之一。在回歸前，澳門基本沿用葡萄牙對建築遺產的保護理念與制度<sup>5</sup>，以自上而下式政府主導、葡國建築文化為主體的保護模式框架進行。早在20世紀初，澳門政府就開始針對建築古蹟進行調研和登記工作。至20世紀中期，由政府任命專門的委員會<sup>6</sup>與工作小組，來對認定具有歷史和藝術價值的保護文物<sup>7</sup>進行研究，並提出適當的措施。基於存續澳門的建築特色和都市景觀等原因，1976年澳門頒佈了首部建築文物保護法令，對澳門的文化遺產保護產生了直接的積極影響，使其進入繁盛時期。在回歸前十年中，政府斥資定期對包括炮台、教堂、廟宇、受保護建築群等在內的一大批重要文物建築進行修復。同時，新馬路的建築、大三巴巷、板樟堂前地及議事亭前地等已評定建築物也都得以保存，並延續其商業及文化用途。澳門整體歷史環境得以保持，成為吸引遊客的景點。這一時期，在修復與改造、保護與適應性再利用方面湧現出諸多代表性優秀實踐案例，如盧廉若花園保護項目<sup>8</sup>、議事亭前地整治性再利用工程(圖2-1，圖2-2)、聖地牙哥炮台古蹟酒店<sup>9</sup>、氹仔龍環葡韻住宅式博物館等。

在1999年澳門回歸後，特區政府依然將文化遺產保護作為城市發展整體規劃中的重要內容，同時，申遺工作也在相當程度上大力助推了澳門文化遺產保護的進程。在理論層面，申遺過程中的各類學術研究、測繪普查、文件材料等均為澳門文化遺產保護提供了重要的基礎資料和依據。從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構想到「澳門歷史建築群」的提出，進而最終確定為「澳門歷史城區」的區域範疇，澳門文化遺產的特殊價值與保護意義不斷明確。在實踐層面，澳門也從對世界遺產的初步認識向努力遵循世界遺產規範的重大轉變，修復文化遺產的態度與方法日趨嚴謹。申遺對澳門遺產保護水準的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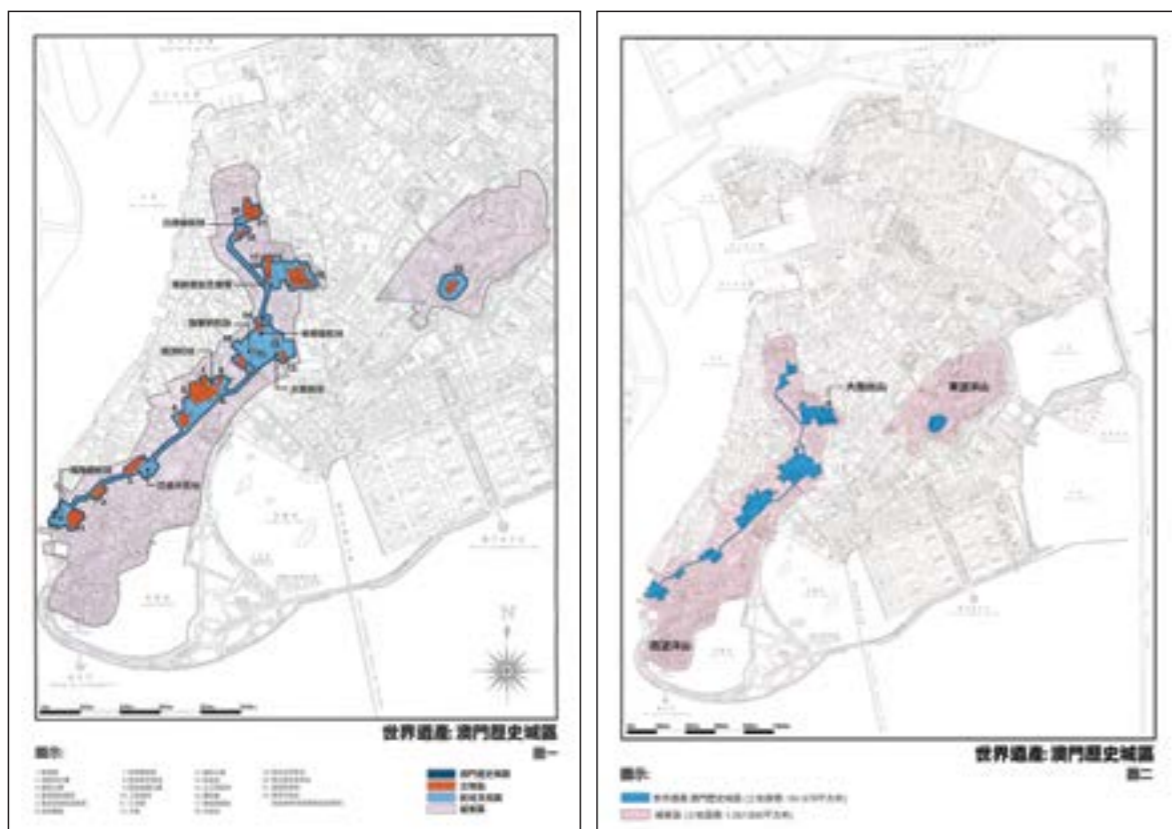


圖1-1 澳門歷史城區

圖1-2 澳門歷史城區緩衝區



圖2-1 澳門議事亭前地整治前



圖2-2 澳門議事亭前地整治後

作用十分顯著，澳門文化局從2000年至2010年間，先後投入1.5億澳門元，實施了100多個保護文化遺產的項目，對歷史城區內的文物點和已評定的建築、區域進行修繕加固，並有效改善其周邊的景觀環境。典型案例包括盧家大屋、塔石中央圖書館、德成按（典當博物館）<sup>10</sup>、大堂前地、亞婆井前地的整治性再利用等。

2005年申遺成功成為澳門文化遺產保護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自此，澳門的文化遺產保護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和轉型時期。政府與市民的遺產保護意識與自豪感與日俱增，在世界遺產的保護管理框架下，澳門文化遺產的保護內容不斷拓展，對於澳門本土文化的身份認同與覺醒使澳門中華傳統文化日益受到重視，對於澳門文化遺產的認知也從傳統葡國文化為核心轉變為中華文化為主、中西多元文化並存的價值內涵，包括鄭家大屋（圖2-3）、葉挺故居、草堆街80號、荔枝碗船廠等一大批澳門華人文化遺產得到有效修復與保護。澳門政府在推進多元文化遺產類型保護工作的同時，還大力借鑒吸納國際遺產保護的先進理念和實踐經驗，對歷史城區部分文物點的旅遊管理和景觀保護展開研究，積極展開文化遺產活化再利用的可行性研究和實施，努力提高科學性保護管理水準。通過採用修復保存、整治改造、增擴建、保護性再利用等多元化模式，使許多功能退化或已遭廢棄的歷史建築與公共空間得到有效保護與活化利用，它們不僅大大改善了城市空間的環境品質、同時也為各種旅遊商業活動、城市公共文化生活提供了發展的可能性。

可以看到，在澳門世界文化遺產的發展歷程中，已經由單幢的「建築遺產」保存轉型為綜合的「文化遺產」保護，遺產保護工作的「內涵」與「外延」都有了全新的嬗變。一方面，保護物件逐步涵蓋不同時期、不同階層的建築遺產，充分體現出對文化主體性、多樣性及價值多元化的尊重。另一方面，針對建築遺產單體的保存也逐步擴展到城市區域性、整體性的歷史環境，並從關注歷史遺產物質形態層面的靜態保存到結合城市發展、社會生活等非物質形態層面，進行綜合動態的保護、管理與活化再利用。這種從「點」到「面」、「靜態」到「動態」的文化遺產保護觀念充分反映出近年來國際歷史遺產保護將過去、現在和未來，作為一個有機整體考慮，並納入經濟、社會、生態等層面，進行可持續發展的趨勢。可以說，澳門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的發展歷程充分印證了世界遺產登錄制度的正面意義，為其他同類型城市遺產保護管理工作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圖2-3 鄭家大屋

### 三、 澳門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管理及活化再利用經驗

#### 1、 基於城市景觀和歷史環境的區域性保護

澳門世界文化遺產是以歷史建築為點、傳統街道為線、城市公共廣場為核心連接而成的一個歷史街區，其核心價值在於體現中西文化交融的城市歷史形態結構層次和文化景觀風貌。對於歷史城區的保護需要從全域角度研究單體歷史建築、前地和街道的空間分佈規律和整合關係，以及各自在歷史城區中的作用和特色定位，從而將孤立散存的點狀和片狀結構變成更具保護意義的網狀系統，充分發揮出文化遺產對提升歷史城區整體價值的重要作用。

作為全球高密度城市之一，澳門歷史城區保護與有限空間資源開發建設之間的矛盾相當突出。在此背景下，城市景觀和歷史環境的區域性保護無疑是使澳門城市整體性風貌與特色得以維護的良好途徑。其實，早在澳葡政府時期，就已認識到建築遺產單體及其周邊環境與景觀的重要性並加以保護<sup>11</sup>，此後，通過法定文物保護清單、澳門申遺過程中從「澳門歷史建築群」到「澳門歷史城區」的更名與緩衝區設定，以及20世紀90年代政府開展的一系列前地整治工程，均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城市景觀和歷史環境的區域性保護觀念。

近年來，澳門政府嘗試從更廣的城市規劃視角對澳門歷史城區保護管理進行考慮，即通過串連、整合及活化區域內具有文化潛力的歷史建築單體與空間資源，進一步加強區域效應，來形成新的文化片區作為澳門世界文化遺產的拓展與補充。通過完善提升澳



圖3-1 望德堂區內公共空間環境品質改善

門歷史城區、緩衝區，以及周邊文化片區的公共設施及環境，改善社區空間環境品質，打造各區文化特色，增強對遊客和市民的吸引力，帶動文化、旅遊等多元產業的發展，形成文物保護與利用的良性迴圈。其中，特別針對傳統圍、里居住空間、具有本地舊城特色的歷史街區等展開改造和活化策略分析研究與設計實踐。例如，對亞婆井及鄭家大屋周邊城市空間展開活化策略研究，結合各區優勢進行功能分區，促使對內港區的活化與保育<sup>12</sup>。同時，對望德堂坊內歷史建築進行更新活化，配合葡國碎石鋪地、古典路燈設施等街道整修改造工程，定期舉行街頭藝術、表演、創意市集等活動，改善公共空間環境品質，營造澳門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圖3-1）。

## 2、 以不斷建設與完善的法律體系作為重要保障

文化遺產的保護與管理需有法可依，有規可循，而健全完善的法律體系則是文化遺產保護在實際操作層面得以落實的前提和保障。澳門的首個文物保護法令為1976年8月7日澳葡政府所頒布的第34/76/M號法令（共16條條文），其中明確指出不能因都市發展而破壞澳門的文化建築、藝術等，並確定了89處受保護文物名單，對文物保護對象作出分類和定義，提出「保護地帶」的規定<sup>13</sup>，同時成立了一個直屬澳督的「維護澳門都市風景及文化財產委員會」（即文物保護委員會）。1982年，文化司署（現文化局）成立，來作為包括建築保護在內所有文化活動的主要政府執行機構，並著手開始對舊法令進行修改。在1984年6月30日的第56/84/M號法令中（共40條條文），對澳門的文物作出更精確、更全面的定義和分類，比較詳細地規定了每一類文物保護的方法，有關法例的附

件更載有已評定的紀念物、建築群及地點的名單（共89項），提出了給文物名單上的物業持有人各種的稅務優惠，鼓勵物業持有人保護文物，並開始在已評定文物建築的周邊劃定「保護區」，具體規定在保護區內行使權利受到限制，以保護其都市環境。其後1992年12月31日的第83/92/M號法令（共11條條文），將「具有建築藝術價值的建築物」增加至受保護的文物建築中，同時補充了第56/84/M號法令中的文化財產清單（合計共128項），成為沿用至2014年的受保護文化財產清單。後兩個法令基本形成了以後澳門遺產保護與行政措施的法律依據。

申遺成功對澳門文化遺產保護管理提出了法制化、程式化的更高標準要求，也促使澳門將文化遺產保護與城市規劃、經濟發展相結合，進行多方位、多視角的綜合考慮。2005年成功申報世遺至今，澳門已在不同層級上相繼制定出台了多項與遺產保護相關的法律法規（表3-1）。其中，澳門政府於2013年頒布了《文化遺產保護法》<sup>14</sup>、《城市規劃法》<sup>15</sup>、《土地法》3項重要法律，對澳門遺產保護和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而《文化遺產保護法》在與文化遺產相關的建設開發和控制方面，具有優先和決定性的作用。與之前的遺產保護法令相比，《文化遺產保護法》具備更高的法律效應，且更具全面性和系統性，保護涵蓋面增大，使文化遺產的概念從有形物質遺產不動產類（建築）延伸到動產類（一切有價值文物），將物質文化遺產拓展至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範疇，同時將世界文化遺產「澳門歷史城區」單獨增設一章內容，對相關的保護原則、制度及系統性管理做出規定。此外，還特別對評定程式、政府諮詢組織「文化遺產委員會」、政府優先權、澳門歷史考古及博物館、圖書館和檔案館的相關規範等作出規定。

作為實施《文化遺產保護法》的重要行政規章，《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已完成公眾諮詢，其頒布將從實際操作層面進一步完善澳門特區的文化遺產保護法律體系。同時，澳門在中、微觀層面的專項文化遺產保護技術管理導則也正在緊鑼密鼓的研究與製定中<sup>16</sup>，這些專項政策法規在技術層面的實踐操作性以及相互銜接方面，尚有待在後期實施中進一步得到社會的認可和時間檢驗，這同時也是未來澳門文化遺產保護法律體系建設中值得繼續探索與發展的核心維度。

## 3、 多元化保護與再利用模式的積極探索

自成功申遺之後，澳門特區政府部門堅持文物建築修復的基本原則，投入大量資金，對世界文化遺產地重點地區的歷史建築與公共空間採取了一系列細緻、周密的保護措施。如對鄭家大屋、盧家大屋、玫瑰堂、聖老楞佐堂、大三巴牌坊等30多處文物建築進行修復；對市政廳前地、亞婆井前地、大堂前地、塔石廣場等城市公共空間進行景觀整治與更新；還對部分歷史建築進行適應性再利用設計，從德成按等小型專案開啟了公私合作方式文化遺產保護管理的新嘗試（圖3-2）。在實際操作層面，澳門世界文化遺產保護採用「重在保護、合理利用」的指導方針，不僅考慮到對遺產原有價值的保留，同時還更加關注其商業開發、利用、運營等問題。政府以土地交換、稅務豁免等途徑，積極鼓勵遺產保護的社會投資，通過購買、協商、置換等方式，政府與私人業主、團體互相合作，對歷史建築進行修復與保護，並採用適當的現代技術、材料、設計語彙來為舊建築尋找適宜的用途，使空間得以再生適應現代生活要求。

表3-1 入遺後澳門文化遺產保護的相關法律法規、指引與批示

排序	名稱	內容
1	第202/2006號行政長官批示	關於被評定屬「澳門歷史城區」的紀念物、具建築藝術價值的建築物、建築群及地點的圖示範圍及有關的保護區
2	2007年工務局內部行政指引	城市規劃總覽及含分區規劃條例簡介
3	第83/2008號行政長官批示	訂定東望洋燈塔周邊區域興建的樓宇容許的最高海拔高度
4	第10/2013號法律	土地法
5	第11/2013號法律	文化遺產保護法
6	第12/2013號法律	城市規劃法
7	第3/2014號行政法規	城市規劃委員會
8	第4/2014號行政法規	文化遺產委員會
9	第5/2014號行政法規	城市規劃法施行細則
10	第172/2015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	根據第11/2013號法律《文化遺產保護法》的規定，在市政牧場舊址及市政狗房的評定程式中訂定臨時緩衝區
11	第1/2017號行政法規	評定紀念物、具建築藝術價值的樓宇和設立一緩衝區
12	第3/2018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	在荔枝碗船廠片區的評定程式中訂定臨時緩衝區
13	第31/2018號行政法規	被評定的不動產及其緩衝區的名錄和圖示
14	第33/2018號行政法規	評定荔枝碗船廠片區為場所並設定其緩衝區
15	第130/2018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	在先鋒廟、東望洋斜巷6號房屋、聖味基墳場（舊西洋墳場）、嘉模墟（原氹仔市政街市舊址）的評定程式中訂定臨時緩衝區
16	第234/2018號行政長官批示	關於編製澳門特別行政區總體規劃草案事宜
17	第31/2019號行政法規	第二批不動產的評定
18	第200/2019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	將多個項目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19	第106/2020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	根據第11/2013號法律《文化遺產保護法》的規定，在石敢當行臺、三聖廟（九澳）、加思欄後新馬路2號房屋、九澳聖母村（原痲瘋院舍及康樂室舊址）的評定程式中訂定臨時緩衝區
20	第37/2021號行政法規	第三批不動產的評定
21	第168/2021號行政長官批示	核准《古樹名木保護名錄》
22	第7/2022號行政法規	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



圖3-2 德成按進行公私合作保護新模式

根據不同區域、不同特色的建築，澳門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及活化再利用的模式也彰顯出板塊個性。例如，依託澳門世界文化遺產品牌，利用知名度高的世遺文物古蹟作為載體設置「論區行賞」步行路線，以文化旅遊精品線路增強遊客的深度歷史體驗感。同時，葉挺故居、德成按、沙梨頭更館、大三巴哪吒展館、魯班木藝展示館、聖若瑟修院藏珍館、草堆街80號（圖3-3）等項目通過改造為專題博物館、展館、陳列館等展示空間，來集中展示近代澳門紅色文化、澳門傳統行業與信仰、中華傳統技藝、中西文化交流、澳門城市發展與海外交通史等歷史教育內容。而塔石中央圖書館、沙梨頭圖書館、澳門演藝學院音樂學校、戀愛巷電影院、饒宗頤學藝館等項目，則更加重視空間與現代

城市、社區生活的連結，通過增加文化、教育、娛樂、公益活動場所來服務於城市居民。此外，瘋堂十號創意園、望德堂區特色店鋪、仁慈堂婆仔屋（圖3-4）、G32影藝廊、牛房倉庫等改造再利用則通過打造兼具文化、藝術、時尚的設計創意產業場地，來營造市民、遊客共用愜意的特色空間。這樣，通過多元化的保護與再利用模式，從以往被動的遺產搶救和保護過渡到積極主動的遺產再利用、管理層面，而其核心即是在整體保護的理念下，以更好地保留和重現遺產的各種價值、推動文化遺產保護利用全面融入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中為目的。

#### 4、 與公眾參與、社會教育緊密結合

澳門世界文化遺產的有效保護管理不僅是澳門政府的重要職責，同時也是全體公民的義務。因此，公眾參與的程度將直接影響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可持續性，而文化遺產的社會教育也將作為促進居民與遺產之間產生良性互動的紐帶。在澳門回歸前，限於澳葡政權長期的精英決策管治模式，市民參與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意識不強。但回歸後，面對急速的社會與經濟發展熱潮與文化遺產保護之間產生的矛盾，澳門自下而上式進行了多次文遺保護運動，顯示出澳門市民特別是年青一代強烈的集體記憶認同與社會參與意識。

自此，澳門特區政府開始主動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的公眾參與，並特別重視世界文化遺產在社區、青少年層面的教育和宣傳推廣工作。在世界文化遺產的社會推廣方面，澳門文化局在申遺前後通過舉辦研討會和展覽、出版刊物、獎勵研究、文化講堂、比賽等一系列活動，持續宣傳推廣文化遺產的保護<sup>17</sup>，並在歷史城區展開一系列有關文化、文遺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等活動<sup>18</sup>。在教育層面，澳門相關政府部門和社會機構結合中高級專業培訓的方式，針對青少年展開「文物大使計劃」、「澳門文物建築展全澳中學巡遊SHOW」<sup>19</sup>、「博物館學生研究員培訓計劃」<sup>20</sup>、「文化遺產專業導遊計劃」<sup>21</sup>、「我們的家園，世界的遺產——澳門歷史城區校園推廣計劃」<sup>22</sup>等豐富多彩各種教育、推廣活動和職業培訓專案。其中，自2001年起實施的「文物大使計劃」頗具特色且卓有成效，通過培養一批具有專業文物導遊知識與技能的青年學生，為社會提供澳門文化遺產的免費導賞服務，以澳門本地人的視角普及推廣澳門文物知識，同時加強澳門青少年對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與文化自信。在此基礎上，澳門文物大使協會與其他文化遺產保護社團協會相繼成立，並成為澳門文化遺產保護中的民間力量發揮積極的作用。



圖3-3 草堆街80號修復與改造項目



圖3-4 仁慈堂婆仔屋



#### 四、 結語：「後申遺」時代澳門世界文化遺產的可持續發展

在400多年的城市發展史中，澳門憑藉國際貿易發展中具有戰略意義的港口城市優勢，經歷了從小漁村到國際化都市的成功嬗變（圖4-1）。隨着1999年澳門回歸祖國，賭權開放及成功申遺，澳門經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發展，並邁進了多元發展的社會轉型期。文化遺產成為澳門城市發展新的驅動力，也使其在國家、區域層面獲得具有規劃和建設意義的新定位。

「後申遺」時代是一個機遇與挑戰並存的階段，立足於新時代發展與澳門城市總體規劃思想，應進一步充分發揮與提升澳門世界文化遺產的多元價值，關注其對於提升城市競爭力與人居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作用。在「一帶一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國家戰略引導下，未來澳門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管理首先需立足於城市和區域總體發展戰略規劃基礎上，秉持區域協作、文旅融合及開放互鑑的理念，充分發揮橋樑作用，提升中華文化和澳門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同時，將澳門文化遺產的合理保護利用與城市規劃、開發建設融合發展，結合城市更新、旅遊經濟、文化產業、綠色低碳、智慧科技等走有效保護、科學管理、創新協同相結合的可持續發展之路。此外，以國際化標準，立足於更加系統化、規範化的法律體系與社會公共管理運行機制，在文化遺產的多元化可適性再利用與社會共同參與實踐中，積極探索建設人、城、境、業和諧發展「美麗家園」、宜居、宜業、宜遊「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最佳路徑和「澳門」模式。相信，隨着《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的頒佈，澳門世界文化遺產在「後申遺」時代將揭開新的篇章！



圖4-1 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及文化之都

- 1 在南非共和國德班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29屆世界遺產委員會上，一致通過將中國申報的「澳門歷史建築群」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同時經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ICOMOS）建議，締約國同意和世界遺產委員會認定，將關聯這一處世界遺產屬性、範圍和內涵的遺產地名稱為「澳門歷史城區」。
- 2 澳門歷史城區位於澳門半島中南部舊城區，總面積為1.23平方公里，由兩個區域組成。一是從大炮台山到西望洋山之間，由8個廣場空間、22處被評定的歷史建築，以及連接各個廣場空間及歷史建築的街道所組成的核心區；二是以東望洋炮台為核心建築物的東望洋山及其緩衝區組成。
- 3 如最早一批天主教堂建築、最古老的教堂遺址、最古老的西式炮台群、最古老的修道院、最古老的基督教墳場、第一座西式劇院、第一座現代化燈塔、第一所西式大學、西式醫院等。《澳門：世界遺產》資料夾（澳門：澳門文化局，2005年），頁135-136。
- 4 《澳門：世界遺產》資料夾（澳門：澳門文化局，2005年），頁132。
- 5 1904年重建聖保祿教堂計劃，以及1926年大三巴遺址的保護政策，均直接反映出在當時澳門建築修復政策中所受到的歐洲和葡萄牙「反修復遺產保存」思想影響。參見：呂澤強：《記憶之外：走向20世紀看澳門建築保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20年）。
- 6 1953年史柏泰（Joaquim Marques Esparteiro, 1895-1976；1951-1955在任）總督執政時期，成立了評定國家紀念物、具公共價值的動產與不動產，以及具有考古、歷史、藝術或景觀價值的元素或組合的委員會，這是澳門有史以來第一次官方以書面形式關注城市的建築文物工作。新的工作組於1960年由總督馬濟時（Jaime Silverio Marques, 1915-1986；1959-1962在任）任命，但當時並沒有制訂澳門本地的文物保護法律。

- 7 當時的保護文物概念僅限於個別教堂、宮殿、堡壘和炮台這些有西方色彩的建築物。
- 8 盧廉若花園與荷蘭園大馬路建築群一起進行修復，於1982年獲得亞太旅遊組織文物保護獎 (PATA Heritage Awards)。
- 9 聖地牙哥炮台古蹟酒店獲得1984年亞太旅遊組織文物保護獎 (PATA Heritage Awards)。
- 10 2004年9月，「德成按」典當業展示館榮獲「2004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文化遺產保護獎」的嘉許獎。
- 11 在20世紀60年代對於文物建築以及保護區的設定，其後，1976年的第一份法定文物保護清單內容也不僅對建築遺產單體進行保護，同時也關注到遺產周邊的景觀環境、前地空間、自然景觀地標的重要性並進行保護。
- 12 有關研究建議按照各區特色及各自優勢，將下環以至主教山一帶規劃為四個功能分區，包括：竹仔室炮台至西望洋山、亞婆井前地周邊地區、太和巷和下環街、光復圍至內港碼頭區，方案提出對內港區進行三個不同研究，包括內港區拱廊、柱廊研究，營造下環街至沙梨頭的柱廊文化；對內港整治提出建議，釋放倉庫空間作為社區設施；對光復圍及下環街一帶圍里進行活化等。澳門：〈亞婆井鄭家大屋周邊活化〉，《澳門日報》，2012.12.13，參見<http://www.zhmo.cn/article-60185-1.html>。
- 13 第34/76/M號法令規定在每幢建築物周圍劃定保護地帶，規定以受保護的屋宇為中心，一百公尺半徑範圍內為保護地帶界限。
- 14 《文化遺產保護法》於2014年3月1日正式生效，其中明確了文化遺產的定義、保護範圍、以及文化遺產的評定程式及標準等，對澳門文物保護工作的執行和開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 15 《城市規劃法》於2014年3月1日正式生效，確定了城市規劃的法律地位，形成了以總體規劃和詳細規劃為核心澳門規劃體系，明確了城市規劃委員會、土地工務局等機構的規劃事權，確定了城市規劃制定和實施的基本流程，並對公眾參與、規劃實施、規劃修改與賠償等方面做出具體設計。
- 16 例如，澳門文化局委託同濟大學編制的《澳門歷史城區建築修復技術指南》(2021年)，以及委託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進行的《澳門歷史城區世界文化遺產監測預警系統》(2020年)等。
- 17 例如在專業學術層面，舉行「近代亞洲建築網路研討會」、「城市文化遺產的保護——澳門視野」國際研討會、「亞洲文化遺產管理學會第二屆研討會：城市遺產與旅遊——挑戰與機遇」、「第七屆世界遺產論壇」等國際學術研討會、舉辦「歷史文化報告考察報告獎」、策劃《文化雜誌》專題文章、資助出版澳門研究的書籍、資助本地社團舉辦活動以開展本澳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及澳門歷史的研究，出版《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圖書等。而面向社會公眾策劃進行了「鏡海瑰寶——澳門歷史風物書畫、攝影、海報展」、「兼容並蓄——澳門歷史城區藝術展」、「中華瑰寶——申報世界遺產藝術作品展」、「非遺零距離」工作坊，並在社區和旅遊景點巡迴設置流動宣傳站、漫畫展板以及親子手偶小劇場等多項活動，普及澳門文化遺產知識訊息和傳揚「文化遺產·共護共享」的理念。
- 18 如多次邀請中國民間工藝家在盧家大屋展示他們的傳統製作技術、在玫瑰堂和尚頂劇院舉辦音樂會、在耶穌會紀念廣場舉辦非物質文化遺產大匯演；進行「澳門文物之旅」路線設計比賽；開通「澳門文物網」；發行《澳門歷史建築群》袖珍書；組織「造船工藝體驗班」、九澳聖母村歷史攝影工作坊、「Fun享文遺」主題講座等活動；回應自2006年開始的「中國文化和自然遺產日」等。
- 19 這是「全澳文化遺產推廣計劃」的兩項活動，由澳門文化局與濠江青年商會合作推出。
- 20 由民政總署與澳門歷史教育學會聯合舉辦，自2006年起，先後培訓了120名青少年參與本地博物館的研究活動，並從中選出優秀學員到民政總署大樓、龍環葡韻住宅式博物館等文物建築擔任解說工作。
- 21 2005年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文化財產保護及修復研究中心成立的亞洲文化遺產管理學會所推出，是一項區域性認證計劃，供有志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遺產專業導遊」的專業導遊修讀。由旅遊學院作為區域培訓中心承擔該課程的教授和認證，2007年7月10日，首批28名學員學成畢業，其中8位榮幸成為全球首批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遺產專業導遊認可導師，20位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澳門歷史城區專業導遊並獲頒徽章和證書。
- 22 由澳門基金會與澳門旅遊學院、澳門歷史教育學會及全澳各中小學校於2007年合作推出，旨在向全澳近10萬名基礎教育的師生宣傳推廣澳門的文化遺產。整個計劃包括出版《澳門歷史城區——校園普及讀本》、培訓校園世遺解說員、澳門歷史城區學界全員考察活動、「澳門世遺知識」校際問答比賽、澳門歷史城區考察報告獎等五項活動，歷時兩年。

## 參考文獻

Anna Leask and Alan Fyal. *Managing World Heritage Sites*. Burlington, Mass.: Butterworth-Heinemann, 2006.

Francesco Bandarin. *World Heritage: Challenges for the Millennium*. France: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re, 2007.

(加) Bob Mckercher、(澳) Hilary du Cros著，朱路平譯：《文化旅遊與文化遺產管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年)。

劉先覺、陳澤成：《澳門建築文化遺產》(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

譚志廣：《澳門的文化遺產保護：問題、政治與政策》(澳門：澳門文物大使協會，2011年)。

林發欽：《澳門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利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郝雨凡等：《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策略與發展，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

朱蓉：《澳門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

張鵠橋：《澳門文物建築活化的故事》(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澳門：澳門基金會，2020年)。

呂澤強：《記憶之外：走向20世紀看澳門建築保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20年)。

張松、鎮雪鋒：〈澳門歷史性城市景觀保護策略探討〉，《城市規劃》，38卷1期(2014年7月)，頁91-96。

郭旂：〈和世界遺產相關聯的澳門城市規劃〉，《城市規劃》，38卷1期(2014年7月)，頁86-90。

鐘宏亮、田恒德、穆雨嵐：〈澳門1999-2009——回歸後第一個十年之建築與城市〉，《世界建築》，12卷1期(2009年12月)，頁18-20。

鄭劍藝：〈澳門後世遺時代建築文化遺產的文化建構與保護困境〉，《世界建築》，12卷11期(2019年11月)，頁44-49，139。

梁智堯、趙雲、張玉敏、馮遠：〈基於城市歷史景觀(HUL)的歷史城區保護策略——澳門歷史城區案例的啟示〉，《中國文化遺產》，6卷3期(2021年5月)，頁4-12。

樊飛豪、周政旭：〈以公共空間修復保持文化特性——澳門歷史城區案例分析〉，《城市設計》，6卷1期(2017年1月)，頁76-87。

崔世平、蘭小梅、羅赤：〈澳門創意產業區的規劃研究與實踐〉，《城市規劃》，28卷8期(2004年8月)，頁93-96。

彭君：〈文化遺產保護立法：制度變遷與澳門實踐〉，《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學報》，16卷3期(2017年7月)，頁96-100。

彭峰：〈文化遺產的法律保護：國際經驗與澳門實踐〉，《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2卷3期(2010年6月)，頁82-86。

傅玉蘭：〈從國家文化遺產保護管理戰略背景看澳門《文化遺產保護法》的修訂〉，《博物館研究》，105卷1期(2009年12月)，頁67-72。

趙崢：〈城市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和開發研究——以澳門為例〉，《城市》，12卷9期(2009年9月)，頁63-66。

吳家權、謝滌湘：〈公眾參與視角下的澳門文化遺產保護〉，《面向高品質發展的空間治理——2021中國城市規劃年會論文集(09城市文化遺產保護)》，20卷9期(2021年9月)，頁435-446。

# 前海所城 大鵬為最

## ——深圳大鵬所城 保育與活化實踐

深圳大鵬新區博物館副館長，副研究館員，長期從事深圳本土歷史、古建築調查與研究，現任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建築史專業委員會學術委員；廣東省南方紅色文化研究會高級研究員；廣東省、深圳市非遺保護協會理事；深圳市古蹟保護協會監事等職。



黃文德

# 摘要

《新安縣志》有云：「沿海所城，大鵬為最」，其原意是「緣為此地，最為險僻。」1996年，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張文彬視察大鵬所城，也題寫了「沿海所城，大鵬為最」，此時則是文物遺產價值中「最」的意思，即大鵬所城是中國18,000公里海岸線上保存最完好的明清海防遺存，是中國「屯兵制」的標本，是中國古代城池類建築營造的重要範例。歷史上大鵬所城與香港九龍寨城、東涌寨城共同扼守珠江口左海路，是省會門戶、珠江鎖鑰，是明清兩代抗擊外來侵略的歷史見證，也是深港歷史文化同根同源的重要載體。大鵬所城的保護以考古和古建築調查作為規劃與修繕的依據，確保保護工作的原真性和科學性，在文物建築的活化利用上「老瓶裝新酒」，盡可能體現其明清海防衛所的文化個性，突出其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功能，服務於深港民眾了解本土歷史文化，並盡可能提供參與、互動體驗的場館與業態，以使得參觀者有異於平時工作與生活環境的感受，打造文化與自然、傳統與現代有機結合的國際旅遊目的地。



大鵬所城，全稱「大鵬守禦千戶所城」，始建於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距今已有近630年歷史。歷史上大鵬所城與香港九龍寨城、東涌寨城共同扼守珠江口左海路，是省會門戶、珠江鎖鑰，在明清兩代抗擊倭寇、葡萄牙和英殖民主義者的鬥爭中起了重要作用，是明清兩代抗擊外來侵略的歷史見證，也是深港歷史文化同根同源的重要載體。

清康熙《新安縣志》有記載：「沿海所城，大鵬為最」，意指其戰略位置最為「險僻」，而今大鵬所城的「最」，則意指保存最完整。大鵬所城是中國18,000公里海岸線上保存最完好的明清海防遺存。大鵬所城佔地約10萬平方米，保存各類建築近千棟，基本上保存了明朝初年建城時的規模、格局和整體風貌。如今城內依然保存清廣東水師提督賴恩爵「振威將軍第」、「劉起龍將軍第」等近十座清代府第式建築、副將署和左堂署等多處衙署遺址以及侯王古廟、天后宮等古代廟宇，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科學價值和藝術價值。2001年大鵬所城被國務院公佈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其所在的鵬城村於2003年被公佈為「中國歷史文化名村」。大鵬所城還是廣東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和「深圳八景」首景、「深圳十大文化名片」之首、深圳「十大特色文化街區」之首等等。

大鵬所城的保護與修繕則以考古和古建築調查作為規劃與修繕的依據，確保保護工作的原真性和科學性，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大鵬所城的歷史訊息，提升了環境和參觀學習活動的舒適性；在文物建築的活化利用上「老瓶裝新酒」，盡可能體現其明清海防衛所的文化個性，突出其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功能，服務於深港民眾了解本土歷史文化，並盡可能提供參與、互動體驗的場館與業態，近距離觸摸歷史，塑造文化自信和文化認同，打造文化與自然、傳統與現代有機結合的國際旅遊目的地。

## 一、大鵬所城歷史沿革

### 1、建置沿革

明朝初年，大鵬半島因「緣為此地，最為險僻」，明朝廷在此設守禦千戶所，「特設專城」，分築墩台，屯種荒田，且耕且守，以備倭寇。大鵬守禦千戶所雖隸南海衛，卻和南海衛一樣設官：「大鵬所指揮高宣，原河南確山人，祖高禮永樂十五年以千戶調本所，至高宣襲升指揮」<sup>1</sup>，從官設「指揮」說明了大鵬所城的重要性。大鵬守禦所指揮以下還設正、副千戶，稱「管軍」。正千戶掌印，正五品，副千戶僉書，從五品；設百戶，正六品；設鎮撫，處理軍中刑獄，從六品；另屬有幕官吏目、司吏等。「大鵬守禦千戶所正千戶一員、副千戶一員、百戶十員、鎮撫一員、幕官吏目一員、司吏一員…」<sup>2</sup>

清朝，大鵬所城的地位不斷得到加強，從清初的防守營到水師營，從城守守備到參將，再由營而協，駐守二品副將大員，大鵬所城的軍事地位不斷加強。後歷經三紙條約，大鵬所城管轄的深港一帶海面被英人割佔和強租，雖然大鵬所城「協」的地位沒有降低，但其管轄範圍內的寨、台、營、汛等軍事設施遭到裁撤。民國時期，大鵬所城失去其延續了五百多年的海防功能，成為一處管轄範圍僅限於大鵬半島的行政中心——大鵬區署所在地，管轄葵華（葵涌）、王母、大鵬、南平四鄉<sup>3</sup>，即現在大鵬新區的範圍。

清朝初年，隨著清政府不斷加強沿海地區的軍事力量，大鵬所又逐漸成為海防重地，其戰略地位也在不斷提高。復界後，大鵬所城為防守營，設城守守備；康熙中期，「大鵬防守營」提升為「大鵬水師營」，並增置大炮至118門，防守力量得到加強。

清初，大鵬所設防守千總一員，兵三百員名，清順治四年（1647年），抗清隊伍李萬榮攻陷大鵬所城，順治十三年（1656年）為總兵黃應傑招撫，新安縣知縣傅爾植奏請改設大鵬所防守營，並設守備一員，把總一員，官兵五百員名<sup>4</sup>。清初「遷界禁海」過程中，大鵬所城作為執行朝廷遷海政策的軍事機構沒有遷：大鵬所由陸路以歸善淡水邊界為口子…以便官兵運糧行走，地方官給予驗票。<sup>5</sup>康熙七年（1668年），大鵬所防守營改由惠州協副將管轄，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改大鵬所防守營為大鵬水師營，提升為遊擊營，兵九百三十一名<sup>6</sup>。其時，該營轄管塘汛九處：九龍汛、大嶼山汛、鹽田汛、上峒塘汛、關湖塘汛、下沙塘汛、老大鵬汛、紅香爐汛及東涌口汛；另炮台三座：大嶼山炮台、沱潭炮台及佛堂門炮台，防所大炮共一百六十八位<sup>7</sup>。大鵬所城防守區域擴大至香港全部海面。

雍正四年（1726年）大鵬營再由遊擊營提升為參將營，改隸廣東水陸提標統轄；嘉慶十五年（1810年），水陸區分，廣東增設水師提督，駐虎門，設五營，左營駐新安縣城，大鵬則另為海外水師營，仍為參將營，兵額八百員名<sup>8</sup>。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隨著鴉片走私及西人東來的威脅日益嚴重，大鵬營管轄面廣，難於防衛，朝廷便將大鵬營分為左右兩營，左營駐紮大鵬城，右營移駐大嶼山東涌寨城。

道光十九年（1839年）九月，英國挑起事端，九龍海戰爆發。中國官兵在九龍山、穿鼻洋和珠江口官涌山一帶擊退了英殖民侵略者的八次進犯，大鵬營管轄洋面日廣，及香港、九龍地區為英人覬覦，為加強防務，道光二十年（1840年），林則徐《奏請把大鵬營提升為大鵬協》：「竊照廣東虎門海口，為中路扼要之區，…西則香山，東則大鵬，形成兩翼」，「應將大鵬改營為協，拔駐副將大員，統帶督率，與香山協聲勢相埒。」闡述大鵬營管轄洋面的重要性。得到朝廷批准後，林則徐將大鵬協副將派駐九龍山，靠前指揮。

大鵬協一直延續到1902年，大鵬協副將陳尚發病逝於任上，接替陳尚發的是大鵬所城何文樸，現所城內仍保存大鵬協副將何文樸故居。至於大鵬協副將何時被終止，沒有明確的文獻記載。

## 2、 歷史事件

大鵬所城建城後，成為南中國海防軍事要塞，明清兩代防倭抗盜、守衛海疆，在明代抗倭、抗葡；清代抗英；近代抗日等一系列抵禦外來侵略的鬥爭中發揮重要作用，成為南疆要塞、粵海門戶。特別是爆發於1839年的九龍海戰，更是一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歷史事件，是大鵬所城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歷史價值所在。

### (1) 築造所城

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廣州左衛千戶張斌奉命開築「大鵬所城」。初選址大鵬半島南部的西涌，後因故停建，復建時選現址。大鵬所城，「在縣東一百二十里<sup>9</sup>大鵬嶺之麓…內外砌以磚石，沿海所城，大鵬為最，周圍三百二十五丈六尺，高一丈八尺，面廣六尺，址廣一丈四尺，門樓四，敵樓如之，敬鋪一十六，雉堞六百五十四，東、西、南三面環水，濠周回三百九十八丈，闊一丈五尺，深一丈…」<sup>10</sup>。城內有衙署、廟宇、民居等建築，有水井水關等設施，以南北街為中軸線，依「左堂右寢」分佈，大小民居一千餘間有序分佈、錯落有致。大鵬所城至今仍保存建城初期的規模、佈局及整體風貌，是研究中國古代城池類建築的重要標本。

### (2) 康公子守城

據康熙《新安縣志》記載，「（明）隆慶五年（1571年），倭賊攻大鵬所，舍人康壽柏禦之。時所城被圍四十餘日，賊具雲梯泊城。柏呼眾堅守，有登陴者，手刃之，即碎其梯，圍乃解。當道獎賞，扁旌之。」康壽柏是城內康千戶之五子，舍人是因襲的銜，而非軍籍，且當時守城的主力部隊被調派他處抗倭，城內防守空虛。在這危急關頭，康壽柏率領全城軍民守城，全城軍民同仇敵愾，康壽柏雖非軍籍，卻因父親是城內千戶大人，康公子從小喜歡武藝，模仿其父排兵布陣，對軍法略知一二，最終拒敵四十餘日，擊退倭賊。

關於大鵬所城康姓，清康熙《新安縣志》職官記載：康仕傑，原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祖康寧，正統九年以副千戶調大鵬所。

### (3) 九龍海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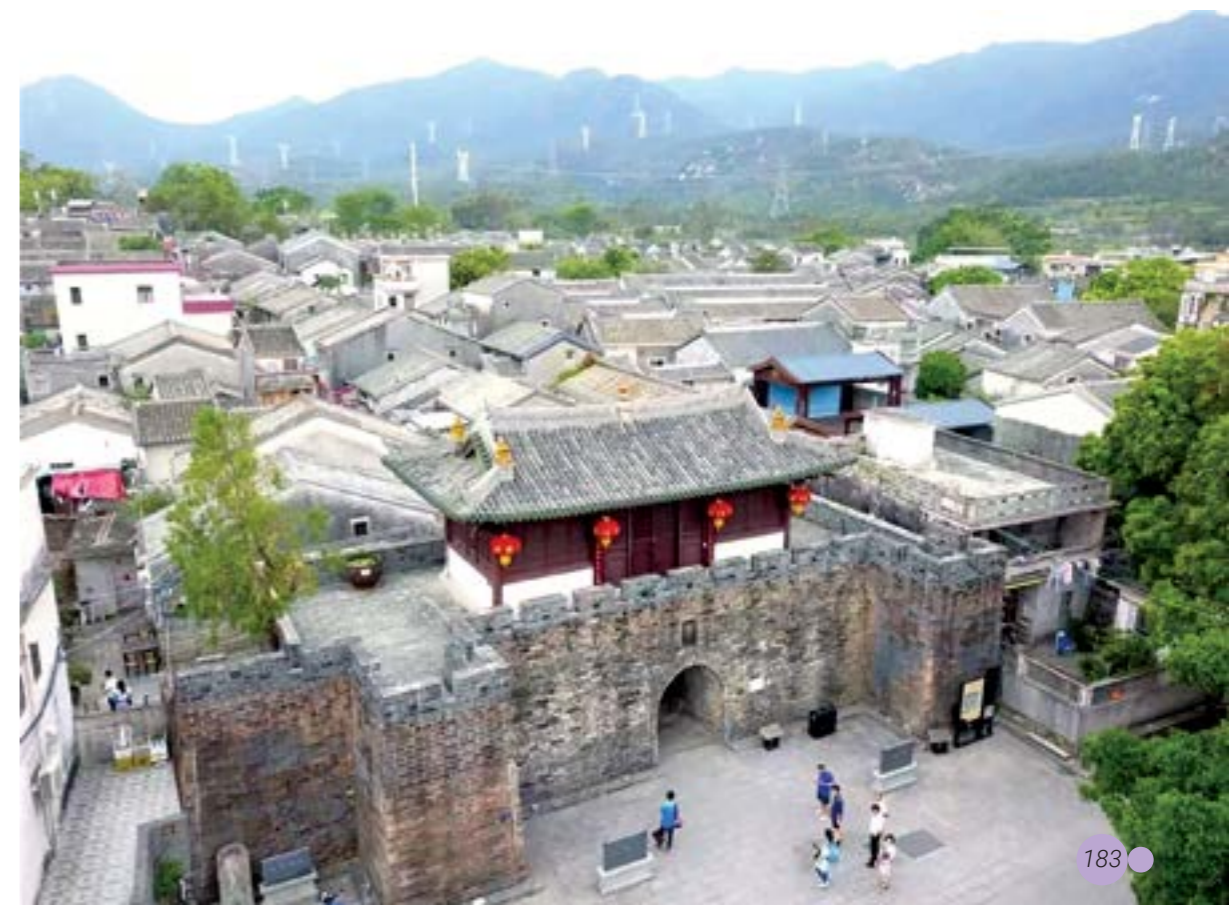
1839年6月，林則徐在虎門銷煙，震驚中外，沉重地打擊了英殖民主義者。以義律為首的西方殖民者不甘心失敗，尋機挑釁。7月7日，數名英國水手在尖沙嘴借酒行兇，毆打村民林維喜致死。林則徐要求英方交出兇手。然而，義律卻拒不交兇。為了捍衛中國司法主權，林則徐於8月15日下令斷絕英人的淡水和食物，同時，通過澳門同知諭令澳門當局驅逐英人出境。這時的義律，處於「於澳門不能陸居，於尖沙咀不能水處」的狼狽局面。

1839年9月4日中午時分，義律率領五艘快船到達九龍附近海面以求食為名，率師炮轟，英國侵略者的行徑激起了中國水師官兵的極大憤慨，大鵬營參將賴恩爵立即指揮各船和九龍炮台反擊，打響抗擊英殖民入侵第一槍。關於九龍海戰，林則徐曾向道光皇帝奏報<sup>11</sup>：「英夷欺弱畏強，是其本性，向來師船未與接仗，只系不欲釁自我開，而彼轉輕視舟師，以為力不能敵，此次乘人不覺，膽敢先行開炮，傷害官兵，一經奮力交攻，我兵以少勝多，足使奸夷落膽。」

九龍海戰是鴉片戰爭的首戰，賴恩爵為首的中國守軍英勇戰鬥，打擊了侵略者的氣焰，充分顯示了中國人民保衛祖國領土主權的力量和必勝的信念。

### (4) 築造九龍寨城

自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英殖民者強佔香港島後，對岸的九龍成了抗英最前哨。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兩廣總督耆英根據廣東巡撫黃恩彤、廣東水師提督賴恩爵建議，向朝廷倡建九龍城，各地官民踴躍捐輸建城經費多達四十六萬八千六百九十三兩洋



銀之巨，據九龍城寨工程監修委員、廣東試用通判顧炳章估算，各項支出包括：「建造九龍城池、神廟、衙署、演武廳、兵房、軍裝藥局、台訊、望樓、快船，另改修九龍舊炮台」等等大約共需工料銀二萬六千七百兩<sup>12</sup>。最後結算工程款僅為三萬六千兩銀。因捐建銀兩已「有盈無黜」，以至於朝廷要下旨停止捐輸，捐款的踴躍，體現了廣東官民對英殖民者的憤恨。

1846年11月，九龍城寨開工，至1847年5月建成。九龍城寨依九龍白鶴山南麓之下而建，城牆周長180，高2丈。城寨的東、南、西、北各建有一門，南門為正門，門首橫額「九龍寨城」四個楷書大字，落款為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黃恩彤、廣東水師提督賴恩爵，城內建有大鵬協副將署及兵房14間，東、西、南三面的牆垣上，安裝大炮32門，使整個九龍海面（維多利亞港）都在其射程範圍之內，從此，九龍城成為抗英最前哨。

### 3、 歷史人物

大鵬所城在600年抗擊外來侵略的鬥爭中名將輩出，有明武略將軍劉鐘、徐勳；清賴氏三代五將、劉氏父子將軍、有楊氏楊耀宗、李氏、鄭氏等等都出過將軍，抗日戰爭時期，大鵬人延續了先輩的「血性」，在抗日戰爭中有戴機、賴仲元、劉黑仔、柯彩鳳等抗日英雄。

#### (1) 明武略將軍劉鐘

劉鐘（1398-1443年），湖廣武昌府江夏縣人，其父劉源於洪武二十九年（1397年）以百戶調大鵬所城，劉鐘於明正統八年（1443年）陣亡，封武略將軍，劉鐘之子劉昌胤襲千戶職。至今大鵬仍保存明武略將軍劉鐘墓，墓碑上書：「大明武略將軍劉公、宜人杜氏之墓。公諱鐘，生於戊寅（1398）八月二十九日戌時，終於癸亥（1443年）年正月初一日。宜人杜氏，生於甲寅年八月二十二日庚時，終於戊子年八月初六日。合葬於祖山松林末坤山丑艮向之原。清光緒元年歲次乙亥重修立三大房子孫全祀」。

#### (2) 清水師名將劉起龍

劉起龍（1772-1830年），字振升，號雲齊，大鵬城人，清一代名將。行伍出身，早年在平定營從軍，作戰勇敢，身先士卒，在抗擊倭寇保衛海防的「前後十八戰中」屢建奇功。清嘉慶八年（1803年）授平海營右哨把總。嘉慶二十年後，歷任廣東水師中營軍守備，南澳總兵等職。道光六年（1826年）升為福建水師提督，封振威將軍。劉起龍將軍戎馬一生、愛民如子、清正廉潔，在鵬城百姓中「有口皆碑」。《中國歷史人名大詞典》載：劉起龍，廣東新安人，行伍出身，屢立戰功，累官福建水師提督。至今大鵬所城內仍完整保留劉起龍「將軍第」，佈置《劉起龍史蹟展》向公眾免費開放。

#### (3) 清抗英名將賴恩爵

賴恩爵（1795-1850年），字簡廷，大鵬所城人，1795年出生於大鵬城內正街「振威將軍第」。清一代水師名將，馳騁海疆三十六戰，戰無不勝，軍功卓著。1839年9月4日，時任大鵬營參將賴恩爵率領大鵬營水師官兵在九龍海面英勇抗擊以義律為首的英殖民入侵，取得鴉片戰爭首戰——九龍海戰的勝利，揭開中國近代史的序幕，賴恩爵英姿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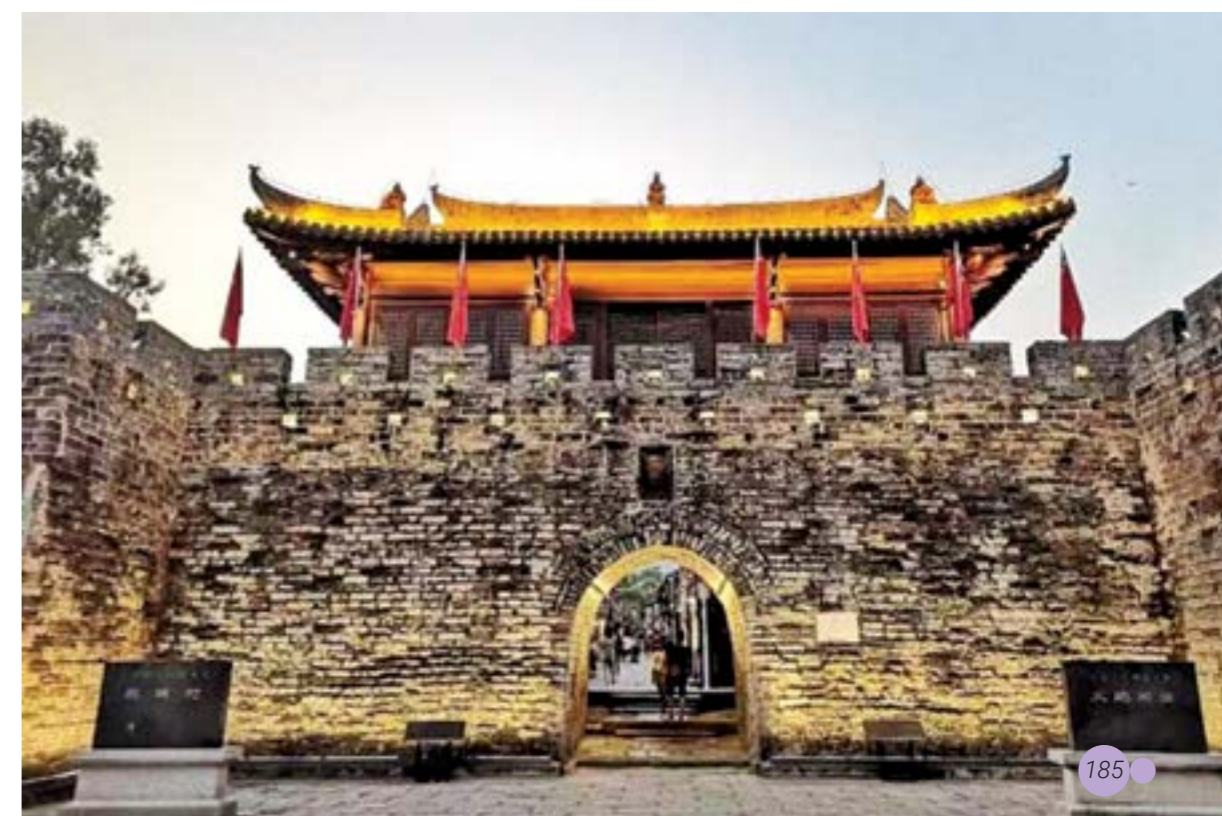
道光皇帝賜予「呼爾查圖巴圖魯」名號，「即升副將」。九龍海戰後賴恩爵領南澳總兵、廣東水師提督等職。因九龍之戰勝利，而清廷割讓香港島，賴恩爵倡建九龍城，籍以抵禦英殖民入侵，終因朝政腐敗、國力衰微，未能收回香港，最終留下「吾憂朝政腐敗而憂，吾樂香港回收而樂」的遺願。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香港海內外賴氏後裔齊聚大鵬所城，舞獅舞龍，告慰先祖。至今，賴恩爵將軍第成為大鵬所城內最重要的國保文物本體，由大鵬博物館主持修繕後向賴氏族人統租，並向公眾免費開放。

#### (4) 工運領袖戴卓民

戴卓民（1892-1931年），又名戴東京，戴卓文曾用名黃季仲，早年參加孫中山的護法運動，後積極投入工人運動，是香港聯義社負責人，在工人中享有極高的威望，在1925年中華全國總工會成立時被選為執行委員，參與組織領導省港大罷工，是早期中國工運領袖。1931年，因被叛徒出賣，戴卓民在山東被捕，敵人對他嚴刑拷打，但戴卓民同志堅貞不屈，即使敵人最後槍殺他卻連他的真名都得不到，以至於中國革命多了一個黃季仲的烈士，而戴卓民卻失蹤了。直至1990年1月13日，經廣州市公安局鑑定，戴卓民與黃季仲為同一人，才確認了戴卓民的烈士身份。戴卓民是大鵬革命者堅貞革命意志的代表。

#### (5) 抗日英雄劉黑仔

劉黑仔（1919-1946年），本名劉錦進，大鵬所城東北村人，被譽為「神槍手」。1938年10月，劉黑仔矢志抗日。1939年春，劉黑仔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12月，參加曾生領導的惠實人民抗日遊擊隊（後改為東江縱隊），後從事地下工作。1941年初，劉黑仔在大鵬王母圩擊斃偽維持會會長袁德等多名漢奸。1941年12月，劉黑仔奉命任廣九短槍隊副隊長、隊長。1946年5月1日，劉黑仔在南雄縣界址圩調解民事糾紛時，遭國民黨軍包圍，在突圍時不幸大腿中彈，後染上破傷風而犧牲，年僅27歲。



## 二、遺產保護

### 1、申報國保

大鵬所城成功申報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大鵬所城保護與利用的一個里程碑。成功申報國保使得大鵬所城的文物價值從國家層面得到認定，這在以「小漁村」自稱的深圳，刷新了深圳人自己以及國人對深圳歷史的認知，當然也包括也是起最重要作用的深圳市政府，於是有了後來深圳市政府層面的保護、宣傳與發展，不管是力度與速度都提升了。也因為成為國保，大鵬所城得到《文物法》最嚴格的、最科學的保護。同時也因為大鵬所城是深圳唯一的國保，所以與之相關的一系列國家級榮譽接踵而來，2003年，大鵬所城被住建部 and 國家文物局共同公佈為首批「中國歷史文化名村」，成為第一批中國12個、廣東僅有的兩個之一的國家級名村，大鵬所城得到文物法關於國保的保護後再加上《名村名鎮保護條例》雙重保障。之後，大鵬所城又陸續得到中國華僑國際文化交流基地、中國傳統村落、深圳八景之首、廣東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深圳十大文化名片之首，深圳十大文化街區之首等榮譽。

### 2、文物徵集

自1997年大鵬所城成立專門管理機構——大鵬古城博物館，博物館同仁就在大鵬所城內進行相關文物的徵集，所幸當時的所城被當成廉價出租屋，租客對屋主的東西很少擾動，所以二十年來，很多所城歷史的見證物被請進了博物館的文物庫房和展覽廳。文物的來源主要來自古城內建築的閣樓、古城及周邊考古出土和田野調查，這些文物是大鵬所城六百年歷史的見證，串起大鵬所城六百年的通史，提升了大鵬所城的歷史內涵，列舉幾個案例：

**建築構件：**收集大量明代城牆磚、卵石、馬道磚等城防建築構件、材料；明代大鵬所衙署瓦當、板瓦等建築構件，並根據需要部分用於展陳，是大鵬所城曾經作為明清海防要塞的證物。

**碑刻：**徵集《重修大鵬所城碑記》、《文廟芳名》、《重修城隍廟樂助芳名碑》、《創建》碑、《劉起龍功名碑》、《趙公書院》等等，還有大量的墓碑。碑刻有著豐富的歷史訊息和書法藝術價值，是研究大鵬所城歷史沿革的文獻資料。

**紙質文物：**在大鵬所城正街賴英揚振威將軍第發現一批賴氏家族的田產、地契、分單、租部等紙製文物；在十字街15號發現兩大箱的書信、老照片、地契等文件；在南門街四號發現曹安《省港工人罷工憑任》、護照、名片、匯票、書信等一批紙質文物。這些紙質文物有著大鵬所城作為海防聚落的社會學意義。

**金銀器：**大鵬所城城隍廟後水井考古出土，這些金銀器考古學地層判斷為明代晚期，製作精美，保存完整，是大鵬所城重要歷史時期的歷史見證。

**瓷器：**大鵬所城北門、城隍廟、趙公祠等遺址出土大量的瓷器、瓷片，這些瓷器瓷片的出現，串起了一部沒有斷層的大鵬所城通史，同時也說明了大鵬所城在明清兩代商業的發達，與海上絲綢之路關係密切。

### 3、歷史研究

開展對大鵬所城相關歷史研究對所城的文物價值是有提升意義的。我們開展了東南沿海明清海防遺址的田野調查，包括從福建龍海的鎮海衛遺址到六鰲所、銅山所、懸鐘所、大埕所、海門所、靖海所、甲子所、捷勝所、平海所，最後到雷州半島的樂民所，通過與大鵬所城進行比較研究；通過文獻研究對賴恩爵九龍海戰的歷史價值進行研究等，形成以下幾個主要結論：

**(1) 大鵬所城是中國屯兵制的標本。**中國古代兵制主要為屯兵制和募兵制兩種，但總體來說以募兵制為主，屯兵制在歷史上一直處於補充地位，如唐代的府兵制和元代的近衛軍制。大規模實行屯兵制的是明朝，「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衛所屯兵制成為明朝國家的軍事常備軍制度。大鵬所城是明衛所制度的產物。明衛所制度是大鵬所城兵的要害。大鵬所城作為中國古代「屯兵制」的標本，完整保存了大鵬所城作為一個軍事防禦城池與三千衛所軍士及其家屬聚居的要素構成，包括城防體系、民居建築群、當年軍士們賴以生存的屯田、驛遞系統的古驛道、古橋以及作為大鵬所城耳目的五處明代烽火台、「水下長城」、屯圍等等，大鵬所城堪稱中國18,000公里海岸線上保存最為完好的明清海防軍事城堡之一，是明清海防遺存中較早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

**(2) 大鵬所城是鴉片戰爭的肇始地，見證了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大鵬所城賴恩爵將軍指揮的九龍海戰被著名的鴉片戰爭專家牟安世確定為鴉片戰爭的開端，即鴉片戰爭三個階段的第一次廣東戰爭階段，在這一階段，因為林則徐佈署得當和賴恩爵、關天培等英勇善戰，英殖民者在這一階段雖有堅船利炮卻也佔不上甚麼便宜，在北上過程中，得知九龍海戰的指揮官賴恩爵鎮守南澳島，英人竟然避南澳鎮不打，也說明了九龍海戰對英人產生的震攝力量。

### 4、文物修繕

因為大鵬所城深圳第一個「國保」的身份，引起深圳市政府的高度重視，甚至深圳市五套班子到大鵬所城開現場辦公會，2005年，深圳市政府召開大鵬所城文物保護專題會議，會上確定大鵬所城保護項目整體立項，立項資金達3.4億，是當時也是迄今為止深圳最大規模的文保項目。

#### (1) 考古先行

為實現修繕的科學性，為修繕方案編制提供科學依據，大鵬古城博物館委託深圳市文物考古鑒定所開展考古調查、鑽探與發掘等各項工作，對大鵬所城護城壕溝、城牆先擇東段、北段選擇合適的位置進行揭露，對南牆西段外側城牆、北牆西段內側城牆、東北角、北門以及西南城區水系等方面的調查、發掘以及鑽探；對整體城牆選點進行打孔，以期搞清楚城牆走向；採取機器鑽孔與「洛陽鏟」探孔相結合的方式對大鵬所城內外有較大研究和保護價值的遺蹟進行全面系統探查，了解遺蹟的年代、性質、範圍、佈局以及功能等各方面的內容。考古結論為大鵬所城保護與維修方案編製提供了必要的依據，也為大鵬所城代表的明清海防的深入研究提供較多的新線索和新認識。大鵬所城是否建於明代早期？大鵬所城是否有護城河？城牆周圍是否設有馬面？北門是否存在

城樓？所城四角是方，還是圓？歷史上，大鵬所城經過幾次修葺和加固？這些問題的解決可以為當前古城保護和開發工作提供科學依據，也可以有效避免文物修繕和保護過程對文物本體造成損毀和破壞。大鵬所城是國內揭露面積最大的一處明清海防遺產，通過考古挖掘，明確大鵬所城內主要官署機構、寺院廟宇以及城牆壕溝等建築的位置與分佈範圍，了解海防建制與設計思想，追溯其歷史根源，可以大大推動我國明清海防方面的研究。

總體而言，這次發掘爭取做到目標明確，點面結合，效率優先，努力實現考古工作效率與文物保護效益的雙贏。

## (2) 建築研究

大鵬所城作為一處建築類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建築研究決定著修繕的科學性甚至保護成敗。大鵬所城地處廣客潮結合部，其建築融合了三種民系的特點，融合後形成了大鵬的特色，主要表現在樑架的做法、垂脊的樣式，廊屋與正屋的接駁方式、平面佈局、建築裝飾等等。為此，我們以所城為中心，分別向三個方向進行古建築調研，同時為沿海衛所遺址進行調研，結果對所城近千棟民居建築、城防類建築、街巷等進行分型分式，根據不同建築等級、不同建築年代結合所城內建築實際將所城內建築分成四十多種類型，並指導修繕設計，避免修繕結果的「整齊劃一、煥然一新」。

## 三、 展示利用

2020年，深圳大鵬所城遊徑入選第一批「廣東省粵港澳大灣區文化遺產遊徑」，大鵬所城活化利用項目入選「2020年度廣東省文物古蹟活化利用典型案例」，2021年，大鵬所城文化旅遊區入選「廣東省文化和旅遊融合發展示範區」和「2021全國文化遺產旅遊百強案例」。2021年10月，國家文物局印發《大遺址保護利用「十四五」規劃》，大鵬所城明清海防類目名列其中。

1、作為鵬城深圳的起源的意義存在。深圳別稱鵬城，即源於大鵬所城，深圳是國內著名的移民城市，而大鵬所城就是政府組織的移民，大鵬所城的衛所軍士來自五湖四海，表現為其姓氏多達七十餘種，區別於以血緣聚居為主體的傳統村落。大鵬所城為深圳作為移民城市的深圳人找到其歷史歸屬感，提升深圳這個現代化都市的文化內涵和歷史底蘊，提升城市文化品味。

2、大鵬所城作為深港同根同源的歷史見證。大鵬所城在明清兩代承擔珠江口左海路的海防安全，其管轄範圍涵蓋所有香港海域，而在香港陸域，也有大量的寨、台、營、訊等防衛設施。

大鵬所城還是新安縣左堂所在地。新安縣於明萬曆元年（1573年）立縣，當時新安縣的範圍就是現在深圳和香港的大部分地區。新安縣的左堂（即副縣長）就駐守在大鵬所城，至今大鵬所城仍保存左堂署遺址，並附有《新安縣左堂署遺址》歷史展。大鵬所城及城內左堂署遺址可以成為深港青年感受同根同源的歷史淵源重要基地。

3、遺址博物館。大鵬古城博物館依託大鵬所城作為博物館展陳的載體，充分利用所城內的建築空間和遺址空間進行相關主題展示，使得遊客走進歷史，近距離觸摸歷史，從而得到深刻的歷史體驗，發揮了大鵬所城作為國保文物的教化功能。

4、遺址公園。遺址是性質，公園是功能。深圳有「千園之城」的美譽，而大鵬所城就是千園中最有特色的園，有著最好的公園配套，在這個「公園」裏可以喝到最高品質的V姐手磨咖啡，可以品到紀念版的威仕忌，還可以吃到其它地方吃不到的本土美食。

5、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大鵬所城歷經629年滄桑，依然保留完整的歷史格局體系，是中國18,000公里海岸線上保存最完好的明清海防遺存，是明清國家防禦體系的象徵，具有重要的歷史、科學、藝術及社會價值。2017年11月7日，大鵬所城——明清海防申遺吹響集結號，全國知名的海防和申遺專家及江蘇省、福建省研究明清海防的專家們，就大鵬所城申遺的可行性和路徑進行了研究探討，並倡議啟動大鵬所城聯合申遺工作。經過對明清海防的調研，著名遺產專家郭旂建議將申遺的範圍界定在珠江口，理由是珠江口見證了中國近代東西方文明的碰撞與衝突。

## 結語

深圳大鵬所城文化遺產保育與活化實踐項目為深圳對全國提供了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實踐的先行示範，該項目既確保文化遺產的原生態保護，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歷史訊息，同時為深圳乃至全國、全世界提供了一處不可多得的主題文化遺產公園，特別是以大鵬所城為代表的珠江口明清海防遺產研究和申遺預備工作，順應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人文灣區、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並促進中西交流的文化戰略，有助於增強大灣區文化軟實力，對塑造灣區同根同源的文化認同，豐富灣區人文精神內涵，將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 1 清嘉慶《新安縣志》卷六。
- 2 清康熙《新安縣志·職官志》。
- 3 民國二十七年（1948年）大鵬魂〈南平鄉籌建新校，美金三萬元年底可匯回〉「大鵬全屬，計有四鄉，1葵華，2王母，3大鵬，4南平。」
- 4 《明實錄·英宗實錄》卷186。張德信：《明朝典章制度》（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頁434。
- 5 《清實錄·康熙實錄》康熙四年四月戊寅（1665年6月5日）。
- 6 清康熙《新安縣志·防省志》。
- 7 清盧坤《廣東海防匯覽》下函，卷四十〈事紀二〉，頁23。
- 8 清盧坤《廣東海防匯覽》卷三。
- 9 清嘉慶《新安縣志》重新丈量為一百六十里。
- 10 清康熙《新安縣志·地理志》。
- 11 《籌辦夷務始末》卷八，頁14-15。
- 12 〈勘建九龍寨城全案〉，《香港雜記（外二種）》，頁174。



# 香 港大學校園的 歷史建築



周 穎 博士

周穎是一位建築師也是一位城市理論家。她對歷史保護、建築重新利用、紳士化 [gentrification]、創意城市等題目的研究在2017年出版於 *Urban Loopholes: Creative Alliances of Spatial Productions in Shanghai's City Center* 的書中。 *Critical Planning*、*Urban China* [城市中國]、*LEAP* [藝術界]、*Art Journal* 等期刊發表過她的研究，她也參展於Rotterdam和深圳建築雙年展、慕尼黑 Haus der Kunst、瑞士建築館等展覽地點。她本科畢業於普林斯頓，碩士於哈佛，博士於瑞士理工，現職香港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

# 摘要

在高速現代化的進程下，市區重建模式一直以清拆為主要手段。不論過去或現在，這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普遍模式。特別在東亞城市，人們逐漸察覺歷史建築的狀況正因城市高速發展而變差。政策制訂者和普通民眾亦越來越重視歷史建築，自覺捍衛其內在價值，因為這些建築是看得見的文物，能真實地呈現一個城市在社會經濟及文化方面的發展軌跡和成就。

香港大學是一所歷史悠久的高等教育學府，在十九世紀末的公民大學運動的背景下建立，以紅磚建築為體現。它既是具文化意義的歷史遺蹟，也是進行當代保育研究的據點，具相當影響力。本文將重點介紹位於香港大學校園內有歷史意義的建築，以及它們如何作為具文化價值的歷史建築的教育和研究重地。

## 簡介



港大學（以下簡稱「港大」）為一所歷史悠久高等教育院校，創立時正值19世紀末公民大學運動，以及民眾對中國現代化的訴求日增之時。這樣的背景不但為港大增添歷史和文化意義，同時亦使港大成為當代保育具影響力的重要研究基地。本文將闡述港大的雙重功能：一方面作為具重要文化價值的文物地點，另一方面作為歷史建築成功保育的案例。本文將強調港大如何透過建造這些建築（部分已被納入兩條新設的文物徑）及校園的拓展，彰顯其對香港及鄰近地區的重要價值。縱然香港以急速淘汰舊物的發展模式而聞名，港大歷史建築所擔當的現代功能及其成功的保育經驗，反映社會對保育這些看得見的文化遺產日益重視，這是古物古蹟辦事處（以下簡稱「古蹟辦」）推動下的成果。同時，港大也透過建築學院建成遺產研究室發揮更大作用，推動有關歷史建築文化價值的教育和研究工作。

## 港大校園的歷史建築及港大本身的意義

在急速工業化和現代化下，建築物因發展而被迅速拆卸及重建，人們往往此時才認識到舊建築蘊含的文化意義。<sup>1</sup>舊建築的拆卸不僅使我們失去其實體（包括其反映的空間意念及建築工藝）而無法彌補；建築物本身所盛載的概念及其社會貢獻，也會隨之被侵蝕和忽略，最終被人完全遺忘。這就是促使我們保育歷史建築的原因。因此，保育歷史建築或建築群的實體，更重要的是保存其所代表的象徵意義及文化意涵。<sup>2</sup>

作為香港歷史最為悠久的高等院校，港大的歷史建築和建築群所形成的校園風貌，無疑具有重要的文化意義。東亞城市在這數十年間快速發展，不少大學建築難逃被拆卸

的命運；相比之下，港大為校園內的歷史建築物設立文物徑，反映香港社會對歷史建築的保育意識正不斷提高。

港大校園的建設，見證著港大於香港這個貿易港發展成為重要的英文高等學府，成為戰後其他大學的發展楷模，並擠身為東亞擁有國際排名的大學。當我們回顧文物徑上不同建築的歷史，其實也在重溫港大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及其與時俱進的信念與願景。

## 本部大樓：一所香港大學的誕生

港大的發展大致可分為幾個階段：構思、創辦到二次大戰結束，<sup>3</sup>至戰後政府開始支援高等教育發展，<sup>4</sup>以及1980年代後大學國際化與校園的蓬勃發展。今天被納入文物徑的建築，除了印證港大校園多方面的成長，宏觀上也體現香港這個城市的發展歷程。

本部大樓是港大校園內首座也是最古老的建築物，位於般咸道轉彎處南面，倚山而建。1910年3月16日，港督盧吉爵士（Sir Frederick Lugard）為大學親自奠基；3月30日，當局頒佈《香港大學條例》。香港大學於1912年3月11日正式成立，本部大樓落成後最先由醫學院、工程學院和文學院使用。

本部大樓的建造費由麼地爵士（Sir Hormusjee Mody）（現今的「麼地道」以他命名）捐資，由1874年在香港成立的利安建築師事務所（Leigh and Orange）設計。這座多層



本部大樓，攝於2015年。

© 古物古蹟辦事處

建築以紅磚建造，採用愛德華巴羅克式建築風格，地下一層由粗面砌築 (rustication) 的花崗石砌成，兩邊各建拱頂角樓，由多條古典的愛奧尼式石柱支撐，正面中央的鐘樓為整座建築物營造了動態。由於英皇愛德華七世 (1901-1910年在位) 對17世紀的建築學家基斯多佛·雷恩 (Christopher Wren) 的新巴洛克建築風格情有獨鍾，故此他以自己的名字為這個時代流行的建築風格命名。該時期的公共建築不僅與此前維多利亞時代富麗堂皇的建築風格形成鮮明對比，它的古典色彩在同期的新藝術建築風格中亦別樹一格。

作為香港這座新建大學的首座建築，本部大樓亦體現了港大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宏大願景。香港西醫書院作為港大前身，於1887年成立，代表著一股高等教育現代化向前邁進的動力。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這股動力促成了不少知名大學誕生，當中包括1890年代末在北京成立的北京大學及在天津成立的北洋大學、1911年在北京成立的清華大學，以及1924年在廣州成立的中山大學等。1907年，德國政府在上海成立德文醫學院 (即同濟大學前身)，則成為英國考慮在香港建立英語大學的一股助力。

民眾普遍期望通過高等學府推進現代化，形成了一股地區性的力量，這股力量促成了港大的誕生。同時，受19世紀在英國主要工業城市發生的「公民大學運動」的影響，高等教育的概念和功能也相應發生變化。<sup>5</sup>隨著一系列大學獲皇家憲章確認大學地位 (包括1900年的伯明翰大學、1903年的利物浦大學、1904年的曼徹斯特大學與里茲大學及1905年的謝菲爾德大學)，學生在工程和醫學方面的科學性及可應用性知識日益備受重視。這些學校以平民教育為方針，取錄的學生來自不同背景和階層，不再強調精英制，與牛津和劍橋等傳統的名牌學府形成強烈對比。香港大學首任校長儀禮 (Charles Eliot) 不但能操二十多種語言，亦曾為謝菲爾德大學首任校長，是一位見識廣博的外交人才，能把港大連繫其他理念相近的人。從建築特色上來說，雖然紅磚的使用不局限於這些新建的公民大學，磚石結構在舊式學院早有應用，但人們仍因這個建築特色而統稱這些公民大學為紅磚大學。作為港大本部大樓的設計者，利安建築師事務所的辦公室也使用這種經典的磚石結構。

由此可見，港大本部大樓就是在兩股發生在英國及東亞地區的力量影響下應運而生。本部大樓的設施一應俱全，涵蓋大學應有的功能，內部空間曾用作教室、行政辦公室、圖書館、診所，甚至學生宿舍之用。三所初期成立的學院 (即醫學院、工程學院及文學院) 均曾設於新建的本部大樓內。這樣的設置體現了港大渴望透過在本地培育良好公民，實現地區性的現代化願景。

## 校園發展進程：生活和學習及研究

一個朝氣蓬勃的城市，應有適當的空間發揮不同功能，如生產業、貿易、商業、教育、休閒及生活等。大學校園的拓展過程，某種形式上亦凝聚了某些特定功能，以實現培育良好公民的使命。港大成立後不久，盧嘉堂、儀禮堂及梅堂分別於1913、1914及1915年在本部大樓東面的山坡上建成，用作學生宿舍。這些現在仍被稱為「堂」(Hall) 的宿舍，分別以港大首任校監港督盧吉、首任校長儀禮和第二任校監梅含理 (Francis

Henry May) 命名。港大作為一所英文大學，許多宿生來自英聯邦城市如檳城、麻六甲、新加坡及仰光等，這些地方的英語教育系統已發展成熟。學生的多元化背景，正好體現港大過去及現在於這些區域內發揮的獨特作用。

盧嘉堂、儀禮堂及梅堂由甸尼臣藍及劫士建築公司 (Denison, Ram and Gibbs) 設計，該公司亦負責設計於1906及1916年建成的明德醫院及梅夫人婦女會主樓。盧嘉堂、儀禮堂及梅堂按照當時盛行的愛德華時代巴洛克風格建造，比例均稱，上面兩層由兩行粗砌的石座形成清晰的輪廓，以拱形窗戶作停頓。這三座建築都以南北為軸，座落於陡峭的擋土牆之上，最新建者位於最高處。儀禮堂和梅堂的設計中軸對稱，與盧嘉堂略有偏移的軸線稍有不同。

校舍持續拓展表明校園生活變得越來越重要。1913年，隨著學生人數增多，克頓道以南的舊馬禮遜堂也改建為宿舍。除了為學生提供住宿外，體育館也於1916年啟用，體現身心平衡發展的教育原則。體育館的外觀為圓形設計，由一系列雙柱支撐，展現新古典主義的特色。其後，本部大樓北面的聯合會大樓 (孔慶熒樓前身) 於1919年建成，供學生會使用。這座樓高兩層的聯合會大樓亦是用紅磚建成，特別之處是其中央的半圓形屋頂與本部大樓圓頂處於相同的軸線上。聯合會大樓靠近本部大樓，面向般咸道，與本部大樓遙相呼應，反映正規課堂學習以外的活動亦是培育學生的重要環節。

除了這些以學生校園生活為本的建築外，大學主要學院的建築亦於建校後數十年間相繼落成。1917年解剖學與生理學館大樓建成後，熱帶病學館與病理學館大樓亦於1919年啟用。工科何東實驗樓和生物學大樓分別於1925和1928年落成。為了應付工程和科學學科不斷增長的需求，大學增建了院系設施。1934年，皮爾工程實驗室 (Peel Engineering Lab) 誕生。文學院建成後，理學院也在1939年成立。兩年後，由利安建築師事務所 John Potter 設計的羅富國科學大樓，於1941年正式啟用。



孔慶熒樓，攝於2016年。  
© 古物古蹟辦事處

作為公民大學的支柱和中國現代化的一部份，與工程和醫學相關的研究所和教學大樓相繼落成。隨著中文學院的成立，鄧志昂樓和馮平山圖書館樓於1931和1932年竣工，標示著作為英語大學的港大，致力實現中國文化研究的現代化。馮平山圖書館為港大的中文圖書館，而鄧志昂樓是為新設立的中文學院而建造。這兩座大樓均以其捐贈者馮平山及鄧志昂命名。馮平山是東亞銀行的創始人，而鄧志昂亦是一位熱心慈善的知名商人。他們的慈善捐贈多少反映大學在時代劇變時的財政困境。有別於胡適及其他當代思想家所批判的中國研究傳統方法，港大通過對中西方文學、哲學、歷史及法律體系的比較研究，推動了中國研究的現代化，這也反映港大作為一所英語大學的獨特視野。1935年，港大向胡適頒授榮譽學位。

鄧志昂樓和馮平山圖書館位於本部大樓的東面，坐落在般咸道的小山崗上，兩者之間有兩座較小的建築。位於山崗東面更高處的鄧志昂樓高三層，屬於平頂建築物，體量較小，附以樸素的現代裝飾。外牆飾以模仿琢石鑲嵌造型的上海批盪，地下和一樓之間的外牆及柱頂有希臘式螺旋紋飾帶，令人想起中國現代建築在摸索階段也曾應用類似的裝飾元素。鄧志昂樓作為新成立的中文學院的處所，無論在建材還是位置方面，都顯得含蓄，恰如其分地表達了該建築類型既現代又富有中國特色的建築意境。由利安建築師事務所設計的馮平山圖書館則是新喬治亞風格，樓高三層，扇形的平面布局沿路內彎，立面以紅磚砌成，輔以大型壁柱、三角楣飾及窗框。獨特的風格成為般咸道轉彎處的獨特景色。馮平山圖書館內部的中庭上層有一個弧形展廳，以八角柱支撐，以屋頂中央的八角形天窗採光。中國傳統裝飾元素只見於建築物內部。

作為一所高等院校，港大在建校初期建造了一些具歷史意義的建築；於此同時，一些重要的城市基礎設施亦在附近逐步建成。如今，這些建築物已成為港大校園內重要的文化遺產。香港首個水庫薄扶林水塘於1863年落成後，四個附設的濾水廠於1890年建成，以供應食用水，其側建有一棟平房作為管理人員的宿舍。<sup>6</sup>當時的平房位置距離港大稍遠，現在已成為龍虎山環境教育中心的一部份。維多利亞城西面原為香港大學獲批的地段，隨著配水庫和濾水廠工程在1910年代中期展開，地段轉移至校園西南面義律炮台原址。<sup>7</sup>1919年，西區抽水站及濾水廠工人宿舍（現為港大訪客中心）建成；1924年，西區抽水站及濾水廠高級職員宿舍（現為香港大學出版社文物館）亦竣工。工人宿

舍是一座單層紅磚建築物，兩旁皆有長廊，用於安置苦力工人和看守人員。樓高兩層的高級職員宿舍外牆以粗磨花崗岩砌成，有多重門式窗，每層容納兩個單位，側翼是工人房。隨著21世紀校園擴建，這些舊水利設施已被納入成為校園一部份，目前更為文物徑上重要的景點。

## 戰後的校園發展和政府資助制度化

在戰爭的艱難時期，不但校園建築展現了靈活性，大學本身也適應了大環境的改變。戰後的重建工作，促使港大對校園進行擴建規劃，並與政府建立的常規化關係。

二次大戰期間，香港大學成為區內學者的避難所，也有建築物被徵作戰時之用。<sup>8</sup>由此可見，大學建築物的功能除了適應大學所需，亦可隨社會需求而改變。儀禮堂在二戰期間曾被徵用為臨時醫院，以支援瑪麗醫院。它曾於1956年被改作體育館，翻新後在1963年重新作宿舍用途。後來一次嚴重的山泥傾瀉令儀禮堂和梅堂部份損毀，港大遂把盧嘉堂、儀禮堂及梅堂合併為大型宿舍群，改名明原堂。1992年，盧嘉堂拆卸重建成莊月明樓；儀禮堂則改造為大學辦公室；梅堂亦被改建，供2001年成立的人文社會研究所使用。



鄧志昂樓，攝於2016年。  
© 古物古蹟辦事處



馮平山樓，攝於2018年。  
© 古物古蹟辦事處



明原堂，攝於1990年。  
© 古物古蹟辦事處

對於建築師來說，建築形式是為其實際用途或功能而生；反之，這些功能也對建築形式產生影響。建築物的形式和功能之間密切的關係正是建築的創作基礎。港大不同時期的建築物所發揮的功能，體現大學的社會角色正不斷轉變。建築物的用途和功能或許隨時間及外在因素而改變，然而建築形式的特殊性必然會反映歷史的影響，而這些歷史因素對當代亦有重大意義。

戰後港大一項主要工作是重修受損的本部大樓。建築師哥頓布朗 (Raymond Gordon Brown) 於1951年開始領導新成立的建築學院，積極參與本部大樓的修繕和擴建工程，以及新校園的規劃工作。<sup>9</sup>本部大樓南面增建了兩個由新翼包圍的庭院，擴建範圍還包括加建了一層。增建部份的外觀與原來建築有所不同，例如採用六角形地磚和水磨石，而且立面的處理也相對簡化。

校園建設的未來規劃也一併考慮了港大戰後的新定位。作為一所高等學府，必然會在重建過程中重新審視其社會角色和對地區的貢獻。宏觀的中英雙語教育問題曾於港大初創階段引起關注，這次又被重新討論。港大採用以英語為主的教育系統，歷年吸納了許多附近地區英文學校的學生，包括馬來亞和新加坡等；中國於1950年代末取消大學對外開放，亦導致香港中學轉向英語授課。此外，大學持續資金短缺，也促使政府重新思考其對於高等教育的應有責任。

1954至1959年間校園的規劃，反映了港大社會角色的轉移，特別是政府對高等教育機構的財政承擔。1963年，政府新設助理輔政司（大學）一職，確認政府對港大的支援。隨後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於1965年成立。此前一年，香港中文大學（以下簡稱「中大」）亦正式成立。港大對中大的創辦，以及香港高等教育生態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這樣的背景下，由周李建築工程師事務所 (Chau and Lee) 設計的香港大學校長寓所於1950年落成。周李建築工程師事務所由工程師周耀年和建築師李禮之於1933年成立，是戰後香港最大的華人建築事務所之一，以參與公共建築設計而聞名。<sup>10</sup>該事務所著名的項目有很多，包括深水埗公立醫局（1936年）、大坑道聖瑪麗亞堂（1937年）及中環干諾道中華總商會大廈（1954年）等。香港大學校長寓所位於校園東南面一角旭龢道的山崗上，其菱形線條和弧形牆身，不但緩和了具歡迎作用的顯著入口，與建築物本身作為俯瞰校園的住處之間的不協調，也使公共與私人空間結合起來。<sup>11</sup>其朝北的陽台及露台可眺望山頂景色，而朝南和面向大路的一面則以實用為主。此外，周李建築工程師事務所還與布朗 (Brown) 合作，於1952年建成現代主義風格的大學道2號教職員宿舍。

現代主義的簡約建築風格呈現在許多戰後的校園建築中。1951年，由Metropolitan Land Company的Hugh Braga設計的新學生宿舍何東夫人紀念堂落成。<sup>12</sup>兩年後，由布朗設計的化學樓正式啟用，該建築亦具有現代主義風格，附設遮陽板，設計以功能主義為主。1959年新開放的病理學樓也同樣採用簡約的現代主義風格。

在1956年，本部大樓的大禮堂改名為陸佑堂，紀念早年捐款支持港大的馬來西亞華人慈善家陸佑。1961年，為慶祝港大金禧慶典，英聯邦大學協會來自吉隆坡、檳城、曼谷、仰光、怡保、新加坡等地的學生在陸佑堂聚首一堂，與大禮堂以陸佑命名一事彷彿有所呼應。<sup>13</sup>



校長寓所，攝於2003年。

© 古物古蹟辦事處

香港大學通過一連串的規劃重整校園建築的功能。1962年，馮平山圖書館的藏書轉移至由甘銘 (Eric Cumine) 建築師事務所建造的港大圖書館大樓，旁邊是本部大樓南面的學生會新樓。<sup>14</sup>1964年，馮平山圖書館改變成為中國藝術及考古學陳列所。同年，原聯合會大樓東面新增了一幢副樓。1966年，儀禮堂和梅堂遭受山泥傾瀉破壞，因而與盧嘉堂合併成明原堂。1967年，由司徒惠建築事務所設計的柏立基學院對外開放使用，該事務所因設計皇后像廣場而聞名，亦為中大校園進行設計。同年，社會科學學院和社會學系成立，隨後法律系亦於1968年成立。1973年，甘銘建築師事務所設計的鈕魯詩樓和包兆龍樓開始投入服務。往後數十年間，港大持續快速增長，校園的實體建築群逐漸成形，成為我們今天所認識的模樣。

## 港大的國際化和對歷史建築價值的認同

1976年，保護本港歷史遺產的首項法例《古物及古蹟條例》<sup>15</sup>正式實施後，古物諮詢委員會（以下簡稱「古諮會」）與古蹟辦於同年成立。八年後，即1984年6月，古物事務監督將香港大學本部大樓列為法定古蹟，予以保護和保育。

中國於1980年代實行改革開放，帶動香港經濟急速發展。中國銀行大廈和滙豐銀行大廈等標誌性建築物在此時建成，彰顯香港即將作為全球經濟增長火車頭的重要角色。

香港大學亦在這段時間進行一連串擴建，實現其作為世界一流大學的宏大願景。1980年，座落於馮平山圖書館和鄧志昂樓之間的太古樓落成；黃克競樓及綜合大樓分別於1982及1985年對外開放；梁銶鋸樓及圖書館新翼分別於1988及1990年啟用；莊月明樓於1994年在盧嘉翼的舊址興建；嘉道理生物科學大樓於1999年落成啟用。此外，薄扶林道的擴闊工程於1980年代中期展開，羅富國科學大樓和史羅司樓因而被取代。隨著香港的經濟由製造業轉型至服務業及創新科技產業，加上1991年成立的研究資助局的支持，港大的校園建築密集發展，不但反映香港大學從1990年代開始全球排名上升，也反映城市本身的急速發展。

在城市快速發展背景下，港大校園內的歷史建築也獲得進一步認可。1986年，港大為感謝孔慶熒的捐資，將原聯合會大樓命名為孔慶熒樓。1995年，古物事務監督將鄧志昂樓與和孔慶熒樓外部列為法定古蹟。到2000年代中期，隨著公眾對歷史建築的關注因經濟增長而日益下降，立法會於2007年5月成立了文物保育小組委員會。同年10月，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強調文物保育對城市發展的重要性，新成立的發展局亦於同日發佈《文物保護政策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前中區警署建築群的保育和修繕工作於同年展開，後來發展成今天的大館，這是香港最大歷史建築群之一。

2009年，作為百周年校園計劃的一部份，西區配水庫進行重置工程。古諮會於同年年底確認西區抽水站高級職員宿舍為二級歷史建築，並於2010年年初確認西區抽水站及濾水廠工人宿舍及濾水廠房為三級歷史建築。這些歷史水務設施除了是當代校園的建設，也是香港歷史的重要組成部份。2012年，新建的百周年校園正式啟用，文學院、社會科學院及法學院分別進駐。

儀禮堂和梅堂於2016年進行翻新後，馮平山圖書館、禮儀堂及梅堂的外部在2018年獲古物事務監督列為法定古蹟，嚴格限制對建築物的改動，保育這些歷史建築。這些20世紀初的歷史建築，與周邊的摩天大廈形成鮮明對比，是香港歷史發展的重要見證。

## 現今對文物建築的研究

在急速現代化的帶動下，為促進經濟增長，拆卸舊建築一直是市區重建的普遍手段。然而，社會漸漸意識到經濟發展往往以歷史建築作犧牲，情況在以急速發展的東亞城市中尤為嚴重。<sup>16</sup>無論是對政策制定者還是對大眾而言，歷史建築作為一個城市社會經濟文化發展與成就曾經的具體呈現，其重要性與保育價值應日益予以重視。

香港大學建築學院HKUrbanLab轄下的建成遺產研究室，是推動歷史建築保育的研究機構之一，提倡保育由單一建築，擴大至涵蓋建築群及其所處地點的特定地理環境，目標是創造具有研究和保育價值的文化景觀。HKUrbanLab通過跨學科的研究，將社會文化發展過程作具體呈現，為香港作為地區一員擔起可持續發展的責任。港大校園各個層面的發展，既反映大學對社會的貢獻，校園本身也是獨特而具體的歷史呈現。目前已被納入文物徑的校園建築，足以證明文物建築對當代城市如何重要。

- 1 參考如Alois Riegl:〈文物的現代崇拜：其精髓與發展〉[Der Moderne Denkmalkultus, Sein Wesen, Seine Entstehung], 1903年, 載《文化遺產保育中常見歷史和哲學問題》*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Issues in the 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Nicholas Stanley Price, Mansfield Kirby Talley and Alessandra Melucco Vaccaro編輯, Karin Bruckner and Karin Williams翻譯 (洛杉磯: Getty Publications, 1996年), 頁69-83; Françoise Choay:《建築遺產寓意》[*L'Allégorie Du Patrimoine*], Lauren M. O'Connell翻譯 (紐約: 劍橋大學出版社, 2001年)。
- 2 參考如P. J. Larkham:《保育與城市》*Conservation and the City* (倫敦: 勞特利奇出版社, 1996年); Nicholas Stanley Price, Mansfield Kirby Talley and Alessandra Melucco Vaccaro編輯:《文化遺產保育一系列歷史與哲學問題》*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Issues in the 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洛杉磯: Getty Publications, 1996年), Salvador Muñoz Viñas:〈當代保育理論〉“Contemporary Theory of Conservation”, *Studies in Conservation* 第47卷, 第1期 (2002年6月1日): 頁25-34, <https://doi.org/10.1179/sic.2002.47.Supplement-1.25>; Gregory Ashworth:〈保存和保育及遺產: 通過文物建築現狀接觸過去〉“Preservation, Conservation and Heritage: Approaches to the Past in the Present through the Built Environment”, *Asian Anthropology* 第10卷, 第1期 (2011年1月1日), 頁1-18, <https://doi.org/10.1080/1683478X.2011.10552601>。
- 3 William Woodward Hornell:《香港大學起源與發展》*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ts Origin & Growth* (香港: 義澳印務, 1925年); Brian Harrison:《香港大學前50年, 1911-1961年》*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First 50 Years, 1911-1961* (香港: 大學出版社, 1962年)。
- 4 Bernard Mellor:《香港大學: 非正式歷史》*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 Informal History* (香港: 香港大學出版社, 1980年)。
- 5 參考如E. Allison (Edgar Allison) Peers:《紅磚大學》*Red Brick University* (倫敦: 費伯出版社, 1945年)。
- 6 何佩然:《貧瘠岩石的水: 香港供水150年》*Water for a Barren Rock: 150 Years of Water Supply in Hong Kong* (香港: 商務印書館, 2001年)。
- 7「香港供水—香港仔水塘計劃」“Hong Kong Water Supply-The Aberdeen Reservoirs Scheme”, 香港工業歷史網頁 The Industrial History of Hong Kong Group, 2022年3月3日, <https://industrialhistoryhk.org/hong-kong-water-supply-the-aberdeen-reservoirs-scheme/>。
- 8 Clifford Matthews和Oswald Cheung編輯:《消失與更新: 戰爭時期的香港大學》*Dispersion and Renewal: Hong Kong University During the War Years* (香港: 香港大學出版社, 1998年)。
- 9 Gordon Brown:〈香港大學新成立的建築系〉“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New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Far East Builder* 第8卷, 第6期 (1950年10月), 頁13。
- 10 Leung-kwok Prudence Lau:〈1933至1991年間現代香港建築實踐蹤跡: Chau & Lee Architects〉“Traces of a Modern Hong Kong Architectural Practice: Chau & Lee Architects, 1933-1991”, 《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會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第54期 (2014年), 頁59-79。
- 11〈校長公寓〉“The Vice Chancellor's Residence”, *Hong Kong and Far East Builder* 第9卷, 第1期 (1951年6月), 頁15-17。
- 12〈香港大學何東夫人堂〉“Lady Ho Tung Hostel for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Hong Kong and Far East Builder*, 第9卷, 第1期 (1951年6月), 頁31-33。
- 13 Mellor:《香港大學》*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14〈香港大學新圖書館和學生會大樓〉“University of Hong Kong's New Library and Students' Union Building”, *Far East Builder* 第17卷, 第2期 (1962年8月)。
- 15《古物及古蹟條例第53章》(1976年)。
- 16 參考如Florian Steinberg:〈發展中國家的城市遺產保育和復修〉“Conserv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of Urban Heritag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abitat International* 第20卷, 第3期 (1996年9月1日), 頁463-475, [https://doi.org/10.1016/0197-3975\(96\)00012-4](https://doi.org/10.1016/0197-3975(96)00012-4)。

# 百年樹人： 從文物建築 看香港早期教育

古物古蹟辦事處執行秘書、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客席副教授、香港教育大學香港教育博物館「教育承傳計劃顧問委員會」委員、國際古蹟遺址保護協會中國委員會 (ICOMOS China) 理事會理事等。曾任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及前民政事務局助理秘書長。近期文章包括〈永續留存——秦文化大遺址保護〉、〈「一統天下：秦始皇帝的永恆國度」展覽的教與學及其超越〉、〈香港的中式傳統廟宇〉、「Application of 3D Scanning Technology in Restoration of Heritage Site Damaged by Natural Disaster」。



蕭麗娟, MH

古物古蹟辦事處一級助理館長，負責歷史建築的保護工作。曾任香港歷史博物館一級助理館長，專責研究及展覽策劃逾十年，參與策劃的展覽包括「『工』不可沒：香港工業傳奇」、「金漆輝映：潮州木雕」、「香港玩具傳奇」、「日昇月騰：從敏求精舍藏品看明代」、「百年時尚：香港長衫故事」及「皇村瑰寶：俄羅斯宮廷文物展」等。



劉思詠

香港的文物建築資源豐富，曾作教育用途而獲評級的接近190項，其中33項已被古物事務監督（即發展局局長）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列為法定古蹟。教育類的文物建築種類多元，將它們串聯起來，可完整勾劃出香港早期教育歷史的輪廓，以至與內地和澳門的關係。

在幅員遼闊的新界，不同氏族承襲祖籍傳統，重視文教，蒙童於學塾或書室接受教育。在它們蛻變成現代村校的過程中，留下了不少文物建築作為歷史印記。另一方面，自十九世紀中期開始，已有外國教會來港辦學，目標是培訓華人傳教士，以促進在內地傳播宗教。不久，政府發展世俗教育，興辦官立學校；教會學校亦在補助計劃下轉型並迅速成長。即使這些學校已多番遷移，部份現存校舍仍有過百年歷史。除了中英語雙軌並行的基礎教育系統外，還有專上教育與師範教育等範疇，均有文物建築作時代見證。

本文將以文物建築訴說香港的早期教育史，期望以此為起點，深入研究和闡釋大灣區的教育類文物建築，打造大灣區教育文物遊徑，與大灣區文化遺產遊徑發揮協同效應。

## 1) 背景

在

香港的文物建築中，截至2022年11月，曾經或現時仍明確用作教育處所的共有114項，當中法定古蹟有21項（佔法定古蹟百分之十六），一級歷史建築10項，二級歷史建築35項，三級（或擬議三級）歷史建築45項，另有3項的文物價值尚待評估，數量甚為可觀。若以建築風格粗略區分，46項為中式建築，60項為西式建築，8項為現代建築。此外，還有部份文物建築，雖然並非明確作為教育處所，卻曾長期作授課或講學的用途；另有部份建築的歷史與教育密切相關，並構成其重要的文化內涵；這類文物建築最少有78項，大部份屬於祠堂一類。在中國傳統社會，祠堂兼作學塾或書室者為數眾多；<sup>1</sup>反之，不少傳統學塾或書室，亦會用作祭祀、舉行儀式及氏族議事之所。此外，一些廟宇和民居亦會充當教室之用，是香港傳統教育的一大特色。

若就香港教育類文物建築詳加研究，便會發現它們的內容豐富多樣。既有中式傳統書室，又有西方的學校，其中不少學校的建築風格又糅合中西特色；由本地氏族及客家族群所建的傳統書室，涵蓋蒙學至專上教育，照顧不同年齡和族群的學子；傳統書室當中，有純粹作教育用途的，亦有隨年月轉變而兼容不同功能的，可說蔚為奇觀，儼然是一部活的香港早期教育歷史書。更難得的是，這些文物建築仍然保存完好，部份更對外開放，實屬香港的文物瑰寶和珍貴的歷史資源。

下文挑選了具代表性的教育類文物建築，以為索引，回溯香港早期教育的歷史軌跡。



學童在祠堂內上課。攝於1969年。  
© 香港政府新聞處



## 2) 傳統教育

香港教育的發展源遠流長。宋元以來，因中原受北方少數民族多番侵擾，不少氏族從中原南遷，部份定居於新界一帶，建村立業。最早南來的氏族是錦田鄧氏，其後新田文氏、上水廖氏和侯氏，以及粉嶺彭氏等氏族陸續遷入。他們承傳中國傳統和文化，重視教化，期望子弟他日科舉中式，光宗耀祖之餘，更可晉身士紳階層，獲得政治及經濟特權，提高氏族的影響力。新界元朗、上水、大埔和粉嶺一帶平原谷地，土地肥沃，宗族生活富庶，文教特別昌隆，學塾和書室林立，成為中國傳統文化陶鎔之地，體現了中央王朝如何通過科舉制度的延伸，將嶺南地區納入教化和管治範圍。

香港最早的學塾可上溯至宋代。<sup>2</sup>學塾皆由宗族興辦，延聘教師，教導族中子弟讀書識字。學塾俗稱「卜卜齋」，主要提供基礎教育。蒙童在學塾學習四書五經，以背誦為本，沒有年齡限制，亦無班級之分，在學時間長短視乎家庭的經濟能力。父母把蒙童送進學塾，大多只為識字和學習基本術算，方便日後謀生。1911年在新界進行的人口普查顯示，雖然約57%成年男子不是文盲，<sup>3</sup>但他們大部份只曾於簡陋的學塾學習，讀寫能力非常有限。部份學塾設有獨立房舍，部份則容身於祠堂或廟宇之內。由於當時應考科舉和當官是讀書人向上流的正途，所以專為應考科舉而設、稱為「書室」或「書院」的學塾便應運而生；<sup>4</sup>同時，為了規避清代中葉朝廷取締合族祠的禁令<sup>5</sup>及對氏族的窺視，「書室」或「書院」也多兼作宗祠之用途。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香港雖然開始有西式學校創立，但仍秉承中國鄉村教育的傳統，以民間籌辦的學塾為主，只有少部份華人學子選擇就讀本地的官立或補助學校。雖然當時提供西式教育的學校數目不斷增長，但與幅員甚廣的傳統學塾相比，入讀的學童始終屬於少數。

雖然學塾遍佈香港，但港島及九龍的學塾規模卻有限，著名的學塾主要集中在新界，至英國於1898年開始管治新界後，新界仍是香港地域的教育中心。<sup>6</sup>當時政府為避免干預新界的傳統生活和文化，地方教育事務遂仍繼續由鄉紳大族主導。學塾長期為本地蒙童提供基礎教育，學生人數眾多，直至二次大戰前未有根本變化。

新界現存的教育類文物建築十分可觀，反映戰前傳統教育在香港的主導地位。傳統中式學塾與書室的建築風格典雅樸實，表現文人精神和學養，並體現等級秩序。佈局大多為以中為尊，左右對稱，以講學的主廳或祖先神龕為主體，兩側廂房作居室。不少學塾與書室豎立碑記或懸掛牌匾，以弘揚儒家思想和傳統文化等理念；亦有懸掛子弟的功名牌匾，以彰顯宗族的成就；部份楹聯和匾額更由本地或廣東功名顯赫的同宗族人或友好所書，除兼具社會教化和裝飾功能外，亦折射出本地氏族跨越地域的文化網絡。<sup>7</sup>

### 2.1 書室及學塾

鄧族祖籍江西，早於北宋（960-1127年）中葉遷居錦田，及後分支散落龍躍頭、廈村、大埔及屏山一帶，子孫遍及東莞和新安縣。清初順治末年至康熙初年（1661-1669年），清廷以「海氛未靖」為由，厲行禁海和遷海，強行將沿海居民內遷，造成香港地域人丁去盡，房舍全毀，幸得兩廣總督周有德及廣東巡撫王來任等陳情始獲復界。<sup>8</sup>位於

元朗錦田水頭村的**周王二公書院**（二級歷史建築），為紀念周、王兩位恩公而建，故又稱「巡撫祠」，書院作教化族人之用，其歷史側寫了香港地域不存留古舊學舍的原因。<sup>9</sup>

同樣位於錦田水頭村還有**二帝書院**（法定古蹟）和**力榮堂**（一級歷史建築）。二帝院屬兩進三開間建築，是當地的最高學府，<sup>10</sup>供奉文昌、關帝及魁星，故又稱為「文廟」。族中相傳十六位水頭村和泰康圍士紳組成「鄧二帝會」，將文武二像和青磚從被拆毀的文塔搬到水頭村，建成二帝書院。<sup>11</sup>書院主廳用於修文，天井及前院的白石巷則用於習武，<sup>12</sup>學子被尊稱為「白石巷子弟」。古物古蹟辦事處和建築署在1994年重修二帝書院時，多次聽到父老憶述白石巷故事，遂移除覆蓋側門窄巷的水泥，發現以白石鋪砌的走道仍然大致完好，遂加以修復展示。



元朗錦田周王二公書院，攝於2002年。  
© 古物古蹟辦事處



周王二公書院內供奉的周王二公神位，攝於2002年。  
© 古物古蹟辦事處



二帝書院的白石巷曾為水泥覆蓋，經復修後回復昔日舊貌。攝於1993年（左）及1998年（右）。  
© 古物古蹟辦事處

力榮堂，俗稱「大書房」，是兩進三開間的書塾，天井月門的上聯：「折桂何其便捷」反映氏族對科舉成就的自豪感；「齒德兼優」牌匾寓意長壽和修養品德俱同樣優越。

清初復界後，經濟復元，人口漸增，元朗屏山鄧族建成**觀廷書室**（一級歷史建築）之時，正值氏族長足發展。書室兼備教育與祭祀功能，除透過儒師教導外，亦透過書室的空間序列和裝飾，達致教化作用。供奉列祖的神龕置於二進正廳，是書室最尊貴的空間，表示對列祖和氏族的尊敬。書室裝飾精巧細緻，有壁畫、木雕和灰塑等，透過主題、題字、色彩帶出教化功能、仕途順遂、學子品德等。根據鄧族長老憶述，書室二進的簷口板以綠色為主，寓意學子入讀前仍未成熟；但學畢離開書室時，面前一進的簷口板以紅色為主，寓意成熟穩重。書室閣樓為圖書館（藏經閣），設有通道通往毗連的**清暑軒**（一級歷史建築）。清暑軒是招待賓客及鴻儒下榻的居所，名字寓意該建築於盛夏時仍然清涼消暑。通道放置子弟的功名牌，盡頭設月門，並飾以灰塑。<sup>13</sup>清暑軒正廳內的對聯是廣東狀元林召棠（1786-1872年）所書。林召棠辭官後受聘於肇慶府端溪書院講學，曾支持林則徐虎門禁煙，<sup>14</sup>可見屏山鄧族與仕宦關係密切。<sup>15</sup>

**敬羅家塾**（法定古蹟）始建於明代（1368-1644年），是大埔頭鄧族的書室和族祠，祖龕置於中進正廳，族人在此舉行聚會和祭祀活動，左方閣樓曾用作塾師和未婚子弟宿舍，左右廂房則是課室。正門門楣石額上「敬羅家塾」書法出自著名書法家鄧爾雅（1883-1955年）手筆，其父鄧蓉鏡（1831-1900年）乃東莞鄧氏族人，於清同治十年（1871年）高中進士，反映大埔頭鄧族廣闊的人際網絡。<sup>16</sup>

新界廖氏於元代（1279-1368年）中葉自福建遷居廣東，輾轉落戶上水。莆上村的**應龍廖公家塾**（一級歷史建築）是上水廖族的學舍，又名顯承堂，塾內展示多塊功名牌匾，後進有「配賢祠」，供奉科舉成績彪炳的先祖。<sup>17</sup>

在客家書室當中，沙頭角上禾坑**鏡蓉書屋**（法定古蹟）甚具特色，書屋由客籍李氏於清初建成，是少數專為教學而建的書室。「鏡蓉書屋」題字由學者李培元於同治十一年（1872年）所題，他曾在書室任教多年。鏡蓉書屋既為區內學子提供基本教育，也提供程度較高的課程，學子在別處修業後，可到這裡準備應考院試，及格者成為秀才。由於鏡蓉書屋聲名昭著，歷年吸引來自大埔、沙田及荃灣的學子遠道前來求學，閣樓可供學子寄宿。<sup>18</sup>據傳鏡蓉書屋之名可能源於唐代宰相李固言（782-860年）的「人鏡芙蓉」典故，<sup>19</sup>書屋正門上的壁畫，至今仍隱見「芙蓉鏡下及第」的題字。亦有說法指其命名與曾到訪禾坑的進士鄧蓉鏡有關。鏡蓉書屋由清代科舉學堂，逐漸演變成二十世紀初的鄉村小學，直至1986年才停止教學用途，歷時超過二百年。

## 2.2 武科舉

除了文科舉，還有為應考武科舉而設的學堂。位於元朗錦田水頭村的**長春園**（一級歷史建築），又稱留耕堂，屬兩進一開間建築，附設練武場供子弟習武，亦用作家祠。三把昔日練武用的百斤關刀至今仍保存於長春園，建築正立面上方的兩個圓孔昔日作防禦之用。<sup>20</sup>水頭村二帝書院旁邊的**沂流園**（三級歷史建築）原為族人解決糾紛的地方，後改成學塾，前廳懸掛的「父子登科」牌匾，由兩廣總督及廣東巡撫送贈，祝賀一對鄧族父子先後高中武舉人。<sup>21</sup>元朗屏山**仁敦岡書室**（法定古蹟），又稱燕翼堂，同樣文武並重，



觀廷書室正廳，攝於2015年。  
© 古物古蹟辦事處



通往清暑軒的通道放置的功名牌，攝於2008年。  
© 古物古蹟辦事處



敬羅家塾正門石額，攝於2000年。  
© 古物古蹟辦事處



鏡蓉學校，攝於1950年。  
© 古物古蹟辦事處



鏡蓉書屋，攝於1993年。  
© 古物古蹟辦事處

現存放於正廳的兩塊大麻石，昔日供武生鍛鍊體能。<sup>22</sup>粉嶺龍躍頭**善述書室**（一級歷史建築），亦曾存放武舉中式族人所用的長刀、劍及弓箭等武器，惟於英軍接收新界時被繳去。<sup>23</sup>

### 2.3 宗祠

新界氏族以宗祠作學塾用途的情況甚為普遍。**廖萬石堂**（法定古蹟）是上水廖族的主祠，相傳宋代遠祖及四名兒子皆任高官，官祿合計萬石，故得「萬石」之名。廖萬石堂除作宗祠之用，亦是教育子弟的學舍，為上水鄉最古老的學校。廖族科舉及第的族人眾多，祠內懸掛的功名牌匾，<sup>24</sup>甚至供奉的神主可以引證。位於元朗新田的**文氏宗祠**（一級歷史建築），又稱惇裕堂，既是該處文氏的族祠，歷代亦用作學舍，是新田文族最早的學塾。<sup>25</sup>元朗**廈村鄧氏宗祠**（法定古蹟）又名友恭堂，中進懸掛多塊功名牌和傳承傳統文化和教養的牌匾，當中不少是曾領導鄉民抗英的鄧惠麟（1839-1908年）的書跡；<sup>26</sup>毗連宗祠的禮賓樓、友恭學校及宗祠本身，均曾闢作課室和教師宿舍。<sup>27</sup>元朗屏山的**愈喬二公祠**（法定古蹟）也是兼具書室功能的祠堂，是鄧族子弟學習的地方。有說英國在1899年接管新界時，曾在毗連的鄧氏宗祠會晤紳耆，更應他們要求，<sup>28</sup>在愈喬二公祠成立「官立屏山英文學校」，<sup>29</sup>是政府設立的分區小學之一。<sup>30</sup>

### 2.4 寺廟

規模較小的村落會利用寺廟作為教學場所，或在廟旁設立學校。<sup>31</sup>例如**西貢糧船灣天后宮**（三級歷史建築）曾是漁民子弟學校；<sup>32</sup>**沙頭角山咀協天宮**（法定古蹟）曾用作福德私塾校舍，抗戰期間（1937-1945年）更曾給予廣州中醫學院使用；<sup>33</sup>又名「大樹下天后廟」的**元朗十八鄉瓦窰頭天后古廟**（二級歷史建築），毗鄰的永安社供奉文武二帝，也曾用作書室。<sup>34</sup>

### 2.5 民房及更樓

以上介紹的傳統學塾，大多可供較年長的學子備試科舉。不過，新界過半的學塾，實際上只能為蒙童提供三至四年教育，傳授基本的讀寫技能。至於較貧困的村落，由於宗祠規模狹小，往往未能提供授課空間，部份熱心族人，便會提供私人居充當教室。這些學校不單面積細小，而且環境昏暗，通常只能容納兩至三名學生，最多也只有五至六名。例如建於1930年的**沙頭角群雅學校**（三級歷史建築），前身是泮林書室，其歷史可追溯至清康熙年間（1662-1722年），當時擔水坑村溫氏利用自己居室的廳堂開辦私塾；<sup>35</sup>上水古洞愛華學校前校舍是建於1933年的**仁華廬**（三級歷史建築），<sup>36</sup>元朗十八鄉崇正新村小學前校舍是建於1936年的**慎德居**（一級歷史建築），<sup>37</sup>兩者均為原籍廣東梅縣的印尼華僑興建的大宅，曾為鄰近村落的蒙童提供教育。

**大嶼山白芒村更樓**（二級歷史建築）樓高兩層，亦是微型學塾的僅存例子。該更樓約建於1940年代，用作防禦海盜、土匪及進犯的日軍。戰後更樓改作白芒鄉學校校舍，地下為課室，二樓為教師宿舍，直至該校於1962年遷出為止。更樓大門上方石碑，至今仍清晰可見該校校名。<sup>38</sup>



長春園，攝於1978年。  
© 古物古蹟辦事處



仁敦岡書室正廳兩旁存放兩塊大麻石，供武生鍛鍊體能。攝於2014年。  
© 古物古蹟辦事處



元朗廈村鄧氏宗祠陳設的功名牌匾，攝於2013年。  
© 古物古蹟辦事處



廖萬石堂，攝於2020年。  
© 古物古蹟辦事處



元朗十八鄉瓦窰頭的大樹下天后廟，攝於1995年。  
© 古物古蹟辦事處

## 2.6 古塔

位於元朗屏山上璋圍的**聚星樓**（法定古蹟），由屏山鄧族所建，雖不曾用作學舍，但供奉主宰功名的魁星，以護佑族人科舉及第；<sup>39</sup>因矗立於河口，面對後海灣，與青山風水遙相配合，可擋北煞及鎮水災。聚星樓是香港現存唯一的古塔，<sup>40</sup>據族中父老憶述，古塔原高七層，因颱風破壞而只餘下三層。

## 2.7 新式村校

隨著清廷於1905年廢除科舉，傳統學塾開始加入現代課程。至1920年代，在新式教育風潮的衝擊下，學塾紛紛轉變教學模式，以銜接內地的「六三三」學制。<sup>41</sup>因應政府的註冊要求，傳統學塾都冠以「學校」之名，<sup>42</sup>惟大部份「學校」最初仍在學塾、宗祠或寺廟等原址上課，例如敬羅家塾於1930年代中轉型為啟智學校，至1954年才遷進獨立校舍，正式蛻變成為新式村校；達德學校源於愈喬二公祠，於1931年創立，至1974年才遷進新校舍；<sup>43</sup>廖萬石堂的學塾於1932年改作鳳溪公立學校，至1974年才遷至新校。其他的例子多如繁星，如惇裕學校源於文氏的惇裕堂、山咀公立學校源於協天宮的福德私塾、永安學校源於元朗十八鄉的大樹下天后廟等。

與此同時，在新時代興辦的村校則以全新面目示人，校舍不再是祠堂或廟宇，而是新建的單層或雙層金字頂平房式獨立建築，例如元朗八鄉**同益學校**（二級歷史建築），建於1921年，設寄宿設施，是新界首間設有現代校舍的津貼學校，由時任港督司徒拔（1919-1925年在任）主持開幕禮；<sup>44</sup>鹿頸谷埔**啟才學校**（三級歷史建築）建於1931年，由政府資助部份建校費用，地下其中一個課室關作協天宮。<sup>45</sup>至此，新界教育逐漸由傳統學塾過渡至現代教育體系。



愈喬二公祠既是元朗屏山鄧族的祠堂，亦是達德學校所在。攝於1957年。  
© 香港大學圖書館



位於元朗屏山上璋圍的聚星樓，攝於1980年。  
© 古物古蹟辦事處



元朗十八鄉崇正新村小學前身的慎德居，攝於1995年。  
© 古物古蹟辦事處



廖萬石堂後進，攝於1982年。鳳溪公立學校遷出後，仍遺留該校的佈置。  
© 古物古蹟辦事處



同益學堂於1921年舉行的開幕典禮。  
© 香港歷史博物館

### 3) 西式教育

#### 3.1 早期教會學校

十九世紀中葉以前，清廷禁止歐美教會在內地傳教，<sup>46</sup>傳教士因而一直只能駐足澳門或馬六甲等處從事宗教活動。至1841年，英國開始管治香港島後，不論是天主教或基督教，均看準香港鄰接內地的優勢，期望以香港為跳板，進而向內地傳教。在教會的支持下，傳教士紛紛來港，他們以開辦學校為手段，目標是訓練華人教士，促進宗教傳播。由於這些學校的辦學目標是招攬本地華人從事宗教事工，上課絕大部份中英雙語並重，只有極少數專為歐裔學童開設的學校，僅以英語授課。<sup>47</sup>

香港開埠初期，政府並無插手教育事務，只透過撥地鼓勵不同教會辦學。早期的教會學校大多建於維多利亞城的中心地段，例如中西區的半山和西營盤一帶。<sup>48</sup>這些學校校舍專作教學用途，除面積寬敞外，設計上亦較佳，有獨立課室、禮堂、圖書館、宿舍等，整體環境較傳統學塾為佳。

很多早期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學校，最初是慈善性質的孤兒院（俗稱「嬰堂」）或女校，<sup>49</sup>目標是培訓青年為傳道人或將來組織教會家庭，協助宣教事工。相對基督教而言，香港的天主教學校起步較慢，<sup>50</sup>當中很多與葡人有千絲萬縷的關係。<sup>51</sup>由於香港鄰近澳門，葡人早於十九世紀中葉已來港定居，是香港早年最大的外籍族群。不過，葡人在香港的社會地位稍低，亦因信奉天主教，葡人學童不能入讀為歐裔學童而設的學校，<sup>52</sup>因而對教育有特別需求。

由於早期來港辦學的歐美教會經費有限，加上本地華人普遍仍不接受西式教育，早期的教會學校很多都慘淡經營，只有少數學校能發展至今，並保留了早期的百年校舍。

#### 聖保羅書院

聖保羅書院的歷史可追溯至1843年，當時英國聖公會（又名英國海外傳道會）委派首位殖民地牧師來港，積極開展辦學事宜。<sup>53</sup>至1848年，聖保羅書院的校舍在中環鐵崗建成，除用作授課外，同時亦作為首任聖公會會督的住所。<sup>54</sup>該校原為培訓本地牧師而設，<sup>55</sup>後來才發展成普通英文學校。毗鄰的**聖保羅堂**（一級歷史建築）及**教堂禮賓樓**（又名馬丁樓）（一級歷史建築）分別於1911年及1919年落成，前者底層曾用作該校課室，後者則曾作宿舍之用。<sup>56</sup>

戰後，聖保羅書院曾短暫與聖保羅女書院合併成「聖保羅男女子中學」，至1950年復校，並遷往般咸道現址，原校舍則成為今天的**聖公會會督府**（一級歷史建築），乃大主教的住所和辦公室。今天，這幢原聖保羅書院大樓，已成為香港現存第三最古老的西式建築，<sup>57</sup>正門仍保留該校的石碑。至於該校的南翼，則於1851年建成，戰後曾用作**聖公會基恩小學校舍**（二級歷史建築），現改由聖公會明華神學院使用，稱為廣傑樓。<sup>58</sup>



聖保羅書院位於半山下亞厘畢道的校舍，約攝於1880年。  
© 香港歷史博物館



教堂禮賓樓曾作聖保羅書院宿舍之用，攝於1953年。  
© 香港歷史博物館

### 英華女學校幼稚園

英華女學校是香港最早興辦的女學，與英華書院堪稱兄妹學校。<sup>59</sup>英華書院早於1818年在馬六甲創辦，是早年西學東漸的見證。書院於1843年轉到香港續辦，只招收男生。三年後，倫敦傳道會創辦英華女學校。

英華女學校曾於十九世紀中葉停辦，至1900年才有正式校舍，並於1911年開辦香港首間華人幼稚園。<sup>60</sup>目前在該校半山羅便臣道校址，仍保留於1926年建成的**幼稚園**（擬議三級歷史建築）校舍，是該校最古老的建築。<sup>61</sup>

### 拔萃男書院

拔萃男書院源於日字樓孤子院，於1869年由英國聖公會創立，招收不同國籍的男女學生。該校原位於**般咸道官立小學**（法定古蹟）現址，<sup>62</sup>1892年學校原址擴建並轉為男校，改名為拔萃書室，女生則轉往鄰近的飛利女子學校。國父孫中山先生曾於1883年入讀該校，翌年轉到中央書院。該校於1926年遷入旺角亞皆老街現址，**主樓**（二級歷史建築）建成於1929年，<sup>63</sup>轉眼快要迎來首個百年。

### 聖若瑟書院

聖若瑟書院的前身是救主書院，於1864年創立，最初專為葡人男童而設。該校於1875年由喇沙修士會接辦，成為英文書院，俗稱「羅馬堂」，<sup>64</sup>是本港現存最早的天主教學校之一。聖若瑟書院位於中環堅尼地道，**北座及西座**（法定古蹟）分別於1920年及1925年啟用，是校內僅存的兩座戰前校舍，已有百年歷史。

### 嘉諾撒孤兒院及寄宿學校（今明愛凌月仙幼稚園）

意大利嘉諾撒仁愛女修會早於1860年來港，曾以葡籍教友捐贈及轉讓的地皮興辦多所天主教學校，統稱「意大利嬰堂學校」。<sup>65</sup>**明愛凌月仙幼稚園**（三級歷史建築）源於1893年由該會修女在西角（今薄扶林一帶）創立的孤兒院及歐裔男童寄宿學校。<sup>66</sup>商人李寶椿（1887-1963年）於1949年出資重建院舍和學校，並以其母凌月仙之名興辦兒童療養院暨托兒所。該院舍曾與嘉諾撒聖心幼稚園合併，分拆後由明愛接管至今。<sup>67</sup>

## 3.2 官立學校

政府參與本地教育始於1847年，當時對港島部份質素較佳的傳統學塾提供資助；至1854年，政府決定直接管理這些學塾，稱為「皇家書館」，是本港最早出現的官立學校。1862年，政府進一步將部份皇家書館合併成為中央書院（今皇仁書院），以便進行分班教學，提高教學水準。政府教育政策的目的，當然並非如教會學校般培養傳道人，而是培訓英語傳譯和中介人才，應付日常行政和對華貿易需要，以回應商界及政府內部的需求。

中央書院是首間由政府直接辦理的官立學校，提供西式的現代教育，課程不著重宗教教義，為世俗教育的先驅。隨後官方開辦了更多英文書館，中文的皇家書館則日漸萎縮。<sup>68</sup>官立學校與教會學校漸成兩個系統，雖然辦學目的有別，但實際上教授的課程並無重大差異。<sup>69</sup>



興建中的亞皆老街拔萃男書院主樓，攝於1926年。  
© 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



位於中環堅尼地道的聖若瑟書院，攝於2016年。  
© 古物古蹟辦事處

至今仍然保存的二戰前官立學校校舍有六座，其中四座為英童學校（將在「外籍學童」部份討論），餘下兩座是英皇書院及長洲官立中學。

### 中央書院

中央書院是香港開埠初年規模最大的書院，學生人數眾多，有「大書院」及「香港大學堂」<sup>70</sup>之美譽，原位於中環歌賦街，1889年易名維多利亞書院（後來再易名為皇仁書院），並遷址至鴨巴甸街及荷李活道交界，校舍後來拆卸重建為**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三級歷史建築）。目前警察宿舍雖已活化成為元創方，但仍保留著中央書院的花崗岩地基、石級與石牆等遺蹟。

中央書院以華籍學童為對象，亦招收歐亞混血兒，規定中英文的上課時間各佔一半，多年來培養出大批具備現代知識及中西文化視野的雙語精英，包括近代史上的顯赫人物如孫中山、何啟、何東、周壽臣、胡禮垣、謝纘泰、王寵惠等，其重要的歷史地位不言而喻。

### 英皇書院

**英皇書院**（法定古蹟）前身是於1879年創辦的官立西營盤英文學校，至1926年遷至般咸道現址，易名英皇書院，有「新書院」之稱，與「大書院」皇仁書院區分。<sup>71</sup>該校校舍被當年政府的行政報告形容為「最優良、最新式的校舍之一」，至今已成為歷史最悠久並仍然作教學用途的官校校舍。<sup>72</sup>

### 長洲官立中學

長洲官立中學（**舊座及管理員宿舍**為二級歷史建築）源於1908年成立的長洲英文學校，是政府為華籍學童而設的分區書館之一，提供小學教育，當地人稱為「英文書院」，以別於島上的中式傳統學塾。<sup>73</sup>該校初時並無永久校舍，<sup>74</sup>現址校舍於1928年落成，戰後才轉為中學。



位於上環鴨巴甸街的中央書院正門，攝於二十世紀初。  
© 香港歷史博物館



元創方保留的原中央書院正門石牆，攝於2008年。  
© 古物古蹟辦事處



英皇書院，攝於2022年。  
© 古物古蹟辦事處



英皇書院暑期義學師生合照，攝於1940年。  
© 香港歷史博物館

### 3.3 二十世紀後建成的教會學校

在發展官立學校的同時，政府於1873年推出「補助書館計劃」，以改善本地基礎教育的落後狀況。後來該計劃經歷幾番修訂，訂明只要教會學校願意推行世俗教育，便可在不放棄宗教教育的前提下，獲得政府經費補助。事實證明，該計劃有效鼓勵教會開辦了更多學校，政府只需提供有限的補助，便能拓展本地教育。學生經過多年西式教育的浸淫，畢業後多在商界或政府工作，充當華洋社會之間的溝通橋樑，在不同領域作出貢獻。

時值清廷推行「自強運動」（1861-1895年），需要大量通曉西方語文與科技的人才。部份香港畢業的學生遊走於香港與內地之間，甚至接受清政府延聘，投身內地的現代化事業，最終成為能獨當一面的重要人物，例如倡議派遣幼童赴美留學的容闈，本身是香港馬禮遜紀念學校<sup>75</sup>的學生，美國耶魯大學畢業後投身曾國藩幕府。在先後四批共120名留美幼童中，有不少曾在香港的學校就讀，並成為歷史上的顯赫人物，例如民國首任國務總理唐紹儀，他曾就讀中央書院，於辛亥革命爆發後代表清廷一方，與曾就讀聖保羅書院的革命代表伍廷芳進行和談。<sup>76</sup>

1905年，清廷宣佈廢除科舉，詔令廣設新學，實施現代西式教育的教會學校獲得進一步發展。此時香港買辦階級興起，部份有基督教背景的華人領袖，深感中國因教育落後而飽受西方欺壓，遂牽頭設立專供富裕子弟入讀的西式英文學校。

另一方面，隨著1898年新界租予英國，本來無甚發展的九龍半島開始市區化，<sup>77</sup>港島人口逐漸向九龍遷移。不少原在港島辦學的教會開始在九龍拓展，選擇在這裡創建新校或設立分校，或因擴建需要而將原港島校舍遷至九龍。由於不少喬遷九龍的人口皆為中層歐籍家庭，這些新建的教會學校皆集中在高尚住宅地段，例如尖沙咀、九龍塘及何文田一帶。<sup>78</sup>當中葡人較早由港島遷移至九龍，<sup>79</sup>與葡人相關的天主教學校隨即在九龍發展起來。與此同時，繼續有新的教會學校在港島創立，至今已成為百年老校。

#### 聖士提反書院

在何啟爵士（1859-1914年）和曹善允博士（1865-1953年）等多位華人領袖推動下，聖士提反書院（書院大樓為法定古蹟，其餘11座校舍建築為已評級歷史建築）<sup>80</sup>於1903年在西營盤創立。該校由英國聖公會營辦，專為家境富裕的華裔男童提供西式教育。由於創校不久已吸引大量來自東南亞的海外學生入讀，為擴充校舍，該校於1930年遷往赤柱現址，為現存仍提供寄宿服務的舊校舍中，歷史最為悠久。<sup>81</sup>

####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主樓為法定古蹟）同樣由何啟爵士和曹善允博士等華人倡議，於1906年由英國聖公會創立，專門招收華裔女童。該校校舍曾兼作香港大學（以下簡稱「港大」）首間女生宿舍，部份學生更是港大首批女畢業生。初期校舍設於堅道，經歷幾番搬遷，最終於1923年落戶半山列堤頓道現址。<sup>82</sup>



聖士提反書院的書院大樓，攝於1995年。  
© 古物古蹟辦事處



於列堤頓道的聖士提反女子中學師生合影，約攝於1923至1924年。  
© 香港歷史博物館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攝於2013年。  
© 古物古蹟辦事處



### 聖保羅男女中學

**聖保羅男女中學**（二級歷史建築）前身是始創於1915年的聖保羅女書院，原位於堅道，至1927年遷至麥當勞道現址。戰前政府規定中學必須男女分校教育，<sup>83</sup>而該校則於1945年成為本港首間男女同校的中學，至1950年更名為聖保羅男女中學。<sup>84</sup>

### 瑪利諾修院學校

瑪利諾修院學校於1925年由瑪利諾女修會創辦，最初是一所天主教葡人幼稚園，在尖沙咀柯士甸道的修院內營辦，後來才容納其他國籍的學生。及後校方認為九龍塘具發展潛力，遂於1936年遷校至現址，提供幼稚園至預科程度教育。戰後中學部遷出，小學部一直沿用舊校舍至今，<sup>85</sup>**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包括修院**，已於2008年列為法定古蹟。2020年，在修院進行結構勘探時，發現修院頂部有隱藏閣樓，閣樓保存了大批與瑪利諾修女曾在修院設立縫紉繡坊有關的珍貴歷史文物和檔案。



瑪利諾修院學校，攝於2015年。  
©古物古蹟辦事處

###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一級歷史建築）於1900年由意大利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創辦，該會早於1860年來港。書院位於尖沙咀，是九龍首間天主教學校，最初僅招收葡籍女生，後來才兼收華人。面向漆咸道南的舊座又稱聖米高樓，於1925年建成，面向柯士甸道的主樓則於1930年興建。<sup>86</sup>

### 協恩中學

協恩中學（**主樓及小禮拜堂**為三級歷史建築）位於何文田，在1937年落成。該校歷史雖短，惟起源可追溯至兩間早期的英國聖公會學校——於1886年創立的飛利女子學校，是為華人基督徒女童而設的中文學校，及於1887年創立的維多利亞女校暨孤兒院。<sup>87</sup>兩校原位於港島薄扶林道，於不同時期遷至九龍，並於1936年合併，協恩之名取自「兩校協作以見證神恩」之意。<sup>88</sup>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的聖米高樓（前方）及主樓（後方），攝於1995年。  
©古物古蹟辦事處

#### 4) 義學

二次大戰前，香港尚未推行義務教育，絕大部份學校，包括傳統學塾、教會學校和官立學校等皆收取學費。華人收入普遍微薄，加上學額不足，導致失學問題嚴重。在這背景下，不少慈善團體積極興辦義學，為貧民子弟提供免費教育。至1935年，香港共有84間義學，受惠學童人數約佔全港學生十分之一，<sup>89</sup>可見在基礎教育尚未普及前，義學擔當了重要的角色和使命。

早年不少義學皆與廟宇有關，例如**上環文武廟**（法定古蹟）側原設有中華書院作為私塾，<sup>90</sup>於1880年轉為義學，以廟宇收入營運，東華醫院則負責管理，是本港開埠以來首間免費學校。<sup>91</sup>**油麻地天后古廟**（法定古蹟）亦有開辦義學，是東華三院九龍第一免費小學的前身；<sup>92</sup>廟宇北側的書院建於1897年，後改為城隍廟；南端的書院則建於1920年，近年改建成展覽中心。<sup>93</sup>此外，**紅磡差館里觀音廟**（一級歷史建築）亦於廟側的「書院」設有義學。<sup>94</sup>

也有義學源於社會賢達的熱心捐輸。位於大坑書館街的舊建築剛活化成為**大坑火龍文化館**（三級歷史建築），為建於晚清時期的孔聖義學舊址。義學由大坑華商和坊眾慷慨捐建，後由創辦香港孔聖會的華人領袖劉鑄伯（1867-1922年）主理。孔教在香港的傳播與晚清康有為鼓吹變法有關，以挽救以儒學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本地華商則期望以孔教團結華人精英，爭取話語權和社會地位。在華商的積極推動下，香港孔聖會於1909年正式創立。孔聖義學所在的街道，也因而命名為書館街，戰後校舍原址重建成現時的建築，並一直作教育用途。

**東蓮覺苑**（法定古蹟）是由何東爵士夫人張蓮覺（1875-1938年）創辦的佛寺，1935年建成後，張蓮覺將她所創辦的寶覺義學校，從波斯富街原址遷入東蓮覺苑，以提倡女子教育。<sup>95</sup>



圖片中央為上環文武廟，義學在其左側，門額可見「書院」二字。約攝於1900年。  
© 香港歷史博物館



大坑火龍文化館內的「倡建大坑孔聖義學碑記」。攝於2022年。  
© 鄒興華



圖中可見寶覺義學校位於東蓮覺苑左側，攝於1950至1960年代。  
© 香港大學圖書館



鹽田仔聖若瑟堂，攝於2010年。  
© 古物古蹟辦事處

長洲公立義學於1921年創辦，經費同樣來自當地鄉紳，部份則由政府補貼。該校位於**大新街18號**（二級歷史建築）的街坊公所內。<sup>96</sup>新校舍於1952年落成，同年易名為**長洲公立學校**（尚待評級）。<sup>97</sup>

部份信奉天主教或基督教的新界村落，也於教堂附設義學，例如**西貢鹽田仔**是香港最早的天主教村落，<sup>98</sup>村內既無寺廟或宗祠，**聖若瑟堂**（二級歷史建築）便曾用作教育用途；<sup>99</sup>**馬鞍山村**則因二戰後有大量開採鐵礦的礦工進駐，教會為居民提供福利資源而開辦義學，村內的天主教**聖若瑟堂**（二級歷史建築）及基督教**恩光堂**（三級歷史建築）均附設學校。<sup>100</sup>

## 5) 高等教育

科舉於1905年廢除後，本地華人對西學非常渴求，惟當時香港的最高學府只有中央書院，<sup>101</sup>學生只可到國外或西方列強在內地租界開辦的高等院校升學。時任港督盧吉（1907-1912年在任）提出本地需要設立一所大學，以鞏固英國的在華的影響力，同時增進中英之間的了解和友好。值得注意的是，籌建香港大學非由官方推動，建校資金由籌募得來，涵蓋不少英資機構和華洋精英的捐輸，當中甚至包括大清廣東省政府，特別是兩廣總督張人駿（1846-1927年）的捐助。關於後者，相信是出於晚清改革期間清廷士大夫對香港大學的美好憧憬，認為港大可培養人才，為中國現代化作出貢獻。<sup>102</sup>

**香港大學**於1912年正式啟用，是本港歷史最悠久的高等學府。大學以香港西醫書院和香港官立技術專科學校為建校基礎，因此，初期只設醫學院及工學院，翌年才增設文學院，並開辦中文課程為選修科目，以吸引華人社會支持大學建設。<sup>103</sup>時至今日，香港大學的校園內，仍保留眾多早期建築，其中**本部大樓**（法定古蹟）原是醫學院及工程學院的課室及實驗室，**儀禮堂**（法定古蹟）及**梅堂**（法定古蹟）為學生宿舍，**孔慶熒樓**（法定古蹟）供學生會使用，**鄧志昂樓**（法定古蹟）及**馮平山樓**（法定古蹟）則分別由後期成立的中文學院及中文圖書館使用。**大學堂**（法定古蹟）原為蘇格蘭商人的公司及寓所，戰後港大購入用作學生宿舍。以上建築皆為戰前所建。至於現有的**校長寓所**（一級歷史建築）則於1950年落成。

二次大戰後，大量內地知識份子來港，國學蓬勃發展。惟港大以英語為重，明顯與社會趨勢背道而馳。當時中文中學的學生升讀港大困難重重，為延續這些學生對知識的追求，同時弘揚中國文化，私營的中文專上學院紛紛成立，當中包括新亞書院、崇基學院及聯合書院。惟當時政府並不承認這些書院頒授的學位，嚴重窒礙了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高等教育發展。直至1963年，由上述三間書院組成的香港中文大學（以下簡稱「中大」）成立，港大壟斷高等教育的情況始被打破。今天，本港仍可找到這三間書院留下的舊日足跡，其中**何文田新亞中學**（尚待評級）是當年新亞書院的校舍；聯合書院在1971年遷往沙田校園前，曾使用般咸道原羅富國師範學院的校舍多年，該校舍即今天的**般咸道官立小學**（法定古蹟）所在；目前沙田中大校園內的**崇基學院**（尚待評級），則仍保留不少早期面貌。這些舊建築正好見證中大成立的崢嶸歲月。



香港大學本部大樓，約攝於1930年代。  
© 黃祖棠香港大學藏品



香港大學於二戰期間遭受嚴重破壞。攝於1946至1947年。  
© 哈佛燕京圖書館



香港大學聯會大樓（後名為孔慶熒樓），約攝於1930年代。  
© 黃祖棠香港大學藏品



香港大學梅堂，攝於1990年。  
© 古物古蹟辦事處



香港大學大學堂，約攝於1950年代。  
© 黃祖棠香港大學藏品



新亞書院位於農圃道的校舍，攝於1963年。該書院於1973年遷入沙田馬料水的中文大學校園後，校舍便成為新亞中學校址。  
© 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



香港中文大學沙田馬料水校園內的崇基學院，攝於1963年。  
© 香港歷史博物館

## 6) 新式漢文教育

踏入二十世紀，內地政局混亂，大量內地儒生來港興學，當中既有新派亦有舊派文人，令香港漢文教育蓬勃發展。<sup>104</sup>特別在民國成立和新文化運動（1915-1919年）後，本地華人民族意識高漲，更多人提倡漢文教育。時任港督金文泰（1925-1930年在任）是漢學家和中國通，也是本地漢文教育的推手之一。1925年省港大罷工後，金文泰認為推動華文教育既可緩和當時社會的反英情緒，亦可借助中國傳統思想防止極端思想蔓延，遂於1926年成立首間漢文官立中學，即後來的金文泰中學。該校是首間以漢文為教學語言的官立中學，除了日常教學，亦同時開辦漢文師範班，藉以提高漢文教育的普及程度。戰後該校曾於1946至1961年長時間以**中環堅尼地道26號**（一級歷史建築）為校址。堅尼地道26號原為香港日本人小學，戰後曾供多間學校使用，現已併入毗鄰的聖若瑟書院作擴充校舍，校舍兼容和洋風格。<sup>105</sup>該建築見證了本港漢文教育地位正式確立。

此外，在金文泰的推動下，香港大學的中文學院於1927年成立。港大成立之初，中文只作為附屬學科。中文學院成立後，延聘大量赫赫有名的宿儒出任教席並研習經史，推動中國語文及文學教學，成為有志研習中文的學生的主要升學途徑。該學院現為本地大學歷史最悠久的中文學系，成立初期的院址即為港大校園內的**鄧志昂樓**（法定古蹟），而**馮平山樓**（法定古蹟）則為當時中文學院的圖書館所在。至此，由中學至大學的漢文升學路徑正式確立。

1930年代初開始，日本對華加緊侵略，國內局勢動蕩，移居香港的人口大增，不少在穗著名而具規模的教會學校為拓展僑胞教育，紛紛前來香港及澳門辦學，令新式漢文學校在香港盛極一時。這些僑校同時在廣州和香港註冊立案，奉行內地的「六三三」學制，與英文學校沿用的八年學制分庭抗禮。<sup>106</sup>它們大多分設中小學，方便學生在港完成學業後到內地升讀中學或大學。數十年來，這些學校在國內僑鄉及港澳兩地各自發展，至今已發展成歷史悠久的學校，包括真光、培英、培正、培道、華英、協和、嶺南、三育等，其中位於何文田的香港培正小學源於廣州，於1933年創校，現存的**牌樓**（三級歷史建築）建於1950年代，糅合中西建築元素；<sup>107</sup>至於**西貢香港三育書院暨三育中學**（二級歷史建築）<sup>108</sup>同樣源於廣州，抗戰爆發後遷港，校園於1939年建成，現時仍保留創校時的部份建築。<sup>109</sup>



中環堅尼地道26號前身是日本人學校，圖片中可見該建築上的日式紋章。攝於2005年。  
© 古物古蹟辦事處



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樓，約攝於1930年代。  
© 黃祖棠香港大學藏品



香港大學鄧志昂中文學院大樓，約攝於1930年代。  
© 黃祖棠香港大學藏品



位於何文田的廣州培正分校（今香港培正小學），約攝於1930年代。  
© 香港歷史博物館

## 7) 外籍學童教育

香港作為遠東繁榮的商埠，除了公職及軍部人員，歷年亦吸引不少外商及專業人士前來尋找機會。不過，早年的人口統計報告顯示，香港的歐裔人士流動性強，而且以成年男性居多，孩童即使在香港出生，到達一定歲數後，普遍會被送返祖家接受教育。<sup>110</sup>故此，早年在港的英童學校寥寥可數，亦往往因為成本問題難以經營。<sup>111</sup>因此，英童大多與本地華籍或歐亞混血學童，在官立英文書館或教會學校分班或混合上課。

直至十九世紀末，香港的英籍常住人口增加，政府才應他們所求，實行種族分流，由官方辦理專為英童而設的學校。<sup>112</sup>這些英童學校自成體系，與其他學校並不相通。<sup>113</sup>**尖沙咀前九龍英童學校**（法定古蹟）是本港現存最古舊的英童學校建築，由何東（後晉封爵士）（1862-1956年）捐款興建，1902年開辦，提供小學教育，舊校舍目前供古物古蹟辦事處使用。<sup>114</sup>該校於1923年改名中央英童書院，轉為招收中學生，並於1936年遷往何文田新校舍，至1948年再改名**英皇佐治五世學校**（二級歷史建築），營辦至今，是唯一現存的英童中學。<sup>115</sup>歐裔社群集中的港島山頂區，亦於1915年由官方成立首間英語學校，即**前山頂學校**（二級歷史建築），現時已改作消防局。<sup>116</sup>**前鰂魚涌學校**（三級歷史建築）亦是政府於二十世紀初創立的英童學校，1926年遷至英皇道校舍，至1980年始遷出。<sup>117</sup>

一如前述，由於香港鄰近澳門，葡人在港亦有悠久歷史。開埠初年，葡人已積極在港辦學，部份著名的天主教補助學校即與葡人有關，它們或專為葡裔學童開辦，或專設葡人班，例如聖若瑟書院、嘉諾撒聖瑪利書院及瑪利諾修院學校等。位於尖沙咀覺士道的**前賈梅士學校**（二級歷史建築），原為建於二十世紀初的私人住宅，戰後由葡國領事牽頭改建成葡人校舍。<sup>118</sup>

二十世紀初，來港經商的日本人持續增加，涉足多種行業，對教育亦有所需求。<sup>119</sup>日本人小學於1917年創立，至1935年遷往由日資公司捐建的**中環堅尼地道26號**（一級歷史建築）。戰後該處曾供多所學校使用，現已併入毗鄰的聖若瑟書院。<sup>120</sup>



重修後的前九龍英童學校現用作古物古蹟辦事處的辦公室。攝於1995年。

© 古物古蹟辦事處



位於何文田的中央英童書院（今英皇佐治五世學校），攝於1930年代。

© 香港歷史博物館



鄉師校長及教師於粉嶺總督別墅的校舍合影，攝於1940年代末。  
© 香港教育博物館 鳴謝：香港鄉村師範專科學校同學會



位於般咸道的羅富國師範學院，攝於1950年。  
© 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

## 8) 師範教育

本港的師範教育始於中央書院時期，最初只是小規模的師範生制度，即挑選優異生在校進行培訓。踏入二十世紀，政府開始為在職教師興辦進修課程，又創立師範學堂，以培訓本地教師。<sup>121</sup>但這些學堂只能借用現有校舍上課，並無固定校址。

由於新界交通不便，政府於1926年成立大埔官立漢文師範學堂（以下簡稱「埔師」），專門為新界各校提供教學人才，以取代舊學出身的傳統塾師。<sup>122</sup>戰後不久，政府決定重新開辦一所鄉村師範學堂，即官立鄉村師範專科學校（以下簡稱「鄉師」）。鄉師與埔師一樣，並無固定校舍。為應付戰後人口激增而衍生對新界受訓教師的需求，時任港督楊慕琦（1941年9-12月及1946-1947年在位）曾將**粉嶺總督別墅**（今行政長官粉嶺別墅）（一級歷史建築）借予鄉師作為臨時校址，車房也曾闢作課室。<sup>123</sup>此外，鄉師曾借用**粉嶺圍彭氏宗祠**（一級歷史建築）等作為附屬實驗小學，鄉師學生輪流前往執教。<sup>124</sup>這兩幢歷史建築，皆因鄉師與本地師訓結緣。

羅富國師範學院（以下簡稱「羅師」）是本港首間全日制師資訓練學院，成立於1939年，<sup>125</sup>最初一如其他師範學堂，只容身於臨時校舍，至1941年遷入專門建造的新校舍，即今天**般咸道官立小學**（法定古蹟）所在。羅師後來於1994年與三所戰後成立的師訓機構及一所語文教育學院合併，<sup>126</sup>成為香港教育學院（今香港教育大學）。羅師曾長時間駐足般咸道，1962年遷往沙宣道後，校舍曾交予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使用，至1973年交還羅師作為分校，再於2000年成為羅富國師範專科學校附屬小學，即今天般咸道官立小學的前身。<sup>127</sup>可見該校舍與羅師淵源深厚。



聖類斯中學的前身是西環養正院，攝於1995年。  
© 古物古蹟辦事處



香港仔工業學校建於1935年的校舍，攝於1995年。  
© 古物古蹟辦事處



孔聖講堂，攝於2019年。  
© 古物古蹟辦事處



原達德學院校舍，今何福堂中心馬禮遜樓。  
攝於2015年。  
© 古物古蹟辦事處

傳統文人推崇的孔教在晚清時期建立的基礎上迅速發展起來；<sup>133</sup>華商為加強團結，爭取社會地位，也接受了孔教。**銅鑼灣孔聖講堂**（一級歷史建築）由多位華人精英如簡孔昭、曾富、周壽臣、羅旭蘇、曹善允和周峻年，以及名儒賴際熙、朱汝珍等創辦，講堂地段則由簡孔昭於1929年捐出。孔聖講堂於1935年落成，是現存歷史最悠久用作發揚儒學的場所。其時日本對華步步進逼，面對民族存亡的關頭，孔聖講堂除了弘揚儒學外，亦舉行文化活動，容納其他思想在此交鋒，<sup>134</sup>使真理越辨越明。在**香港大會堂**（法定古蹟）於1962年開幕前，孔聖講堂一直作為香港主要的社區會堂，是知識傳播重地。<sup>135</sup>

二戰後內地局勢不穩，不少先進知識份子南來香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周恩來指導下，達德學院於1946年在香港成立，校址是抗日名將蔡廷鍇（1892-1968年）慷慨借出位於屯門的別墅。達德學院提倡由師生共同參與辦學，當時學生有曾參與抗日游擊隊的青年，也有來自南洋的華僑及香港本地的學生。達德學院其後於1949年關閉，雖然只營辦了三年，卻曾雲集多位當代知名學者在此講學，包括新華社社長喬冠華、國學大師郭沫若、著名文人茅盾、何香凝、曹禺、侯外廬、千家駒等。<sup>136</sup>師生享受自由討論的學術氣氛，盛況史無前例。三屆學生總數約一千餘人，部份在新中國建立後在地方以至中央機構身居要職。該學院舊址現已成為何福堂中心，作宗教退修之用，其中**馬禮遜樓**（法定古蹟）是當年達德學院的辦事處和教室，學院的其他建築，包括俗稱為紅樓的女生宿舍（現稱**何福堂會所**）及馬禮遜樓外的**涼亭**，已被評為三級歷史建築。這些建築既見證了近代中國重要人物在香港走過的足跡，亦見證了新中國的歷史。

## 11) 總結

本文從香港豐富的文物建築資源之中，舉隅約七十座教育類的法定古蹟或歷史建築，初探香港早期教育的發展歷程，以及建築中反映的中國傳統面貌及西式教育烙印。

香港的教育發展與內地和中國傳統密不可分，當抗日戰爭爆發，內地政局不穩時，廣州不少著名私立學校遷移至港澳；至香港淪陷後，它們又輾轉回到澳門或粵北，部份駐留粵北的學校更曾聯合辦學，藉以加強彼此力量。戰後部份學校選擇留守港澳，穗校亦繼續發展至今。

上述的小篇章，有力地說明了大灣區的教育歷史如何血脈相連。目前內地的文化旅遊部門已按不同主題，發展出多條大灣區文化遺產遊徑。我們希望以本文為引子，將香港的教育類文物建築初步整理及串連起來，與廣東和澳門相關主題的文化遺產遊徑協同互補，共同譜寫大灣區的教育歷史，解說大灣區發展源流。

## 9) 工業教育

香港戰前已有工業發展，從事製造業的人口達四分之一，工業教育應運而生。現存的早期工業學校校舍均屬中等教育學校，是職業先修學校的前身，目標是向青年提供工藝訓練，銜接提供專上程度工科教育的院校。<sup>128</sup>雖然這些工業中學早已主流化，課程與文法中學相近，但其校舍仍見證著香港職業教育的變遷。

**聖類斯中學**（東翼為二級歷史建築）前稱聖類斯工藝學院，前身是西環養正院，1863年由天主教神父創立。養正院即感化院，實質是工藝學校，教授青年木工和造鞋等謀生技能，以導其向善。<sup>129</sup>該校於1927年由意大利鮑思高慈幼會（以下簡稱「慈幼會」）接辦，今天的西營盤校舍於1936年興建。<sup>130</sup>**香港仔工業學校**（大樓及附屬建築物為三級歷史建築）前稱香港仔兒童工藝院，校舍為大成紙廠舊址，於1935年由馮平山（1860-1931年）及何東爵士捐建，與聖類斯工藝學院同由慈幼會管理。<sup>131</sup>**鄧鏡波學校**（三級歷史建築）則創辦於1953年，由工業家鄧鏡波（1879-1956年）捐建，藉以培養工業技術人材，亦由慈幼會營辦。<sup>132</sup>

## 10) 自由講堂

香港地理位置獨特，是全球最負盛名的自由港之一，加上戰前並無邊境管制，故人口流動性極強。另一方面，港英政府主張「非政治化」，沒有推行明顯的文化和宗教措施，因此，香港一直是文化熔爐，不同意識形態皆在此滋長。

隨著清廷覆亡，大量儒生來港定居，香港成為保存及發揚傳統國學的重鎮。前清翰林院編修賴際熙（1865-1937年）與眾學者早於港大中文學院在1927年成立前，已成立學海書樓，邀請名儒講授經典。書樓收藏典籍甚豐，設公眾閱覽室供公眾參閱。港大中文學院成立後，賴際熙出任該學院教授兼中文總教習，遺老區大典、朱汝珍及溫肅也在學院任教。特別自1920年代起，漢文教育的地位逐漸確立，華商積極捐資，鄧志昂（1872-1932年）捐資在港大興建**鄧志昂樓**（法定古蹟）作為中文及其他文科課程的授課地點，1931年落成；馮平山則捐建港大**馮平山樓**（法定古蹟）作為中文圖書館，於1932年落成。1941年日軍侵港時，學海書樓部份藏書及時移至馮平山圖書館，得以保全；藏書其後於**香港大會堂**（法定古蹟）圖書館收藏，現由香港中央圖書館接收。

- 1 王廣武：《香港史新編（上冊及下冊）》（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頁43、55、419。
- 2 力瀛書院是香港已知最早的書院，位於新界錦田（舊稱岑田）雞公嶺（舊稱桂角山），在北宋熙寧八年（1075年）由北宋進士鄧符（字符協）所建。據清嘉慶年間（1796-1820年）王崇熙編纂的《新安縣志》所載：「桂角山在縣東南四十里，多產桂，兩山競秀如角，一名龍潭山。其山有雲即雨，上有仙女梳妝石；宋鄧符築力瀛書院，講學於其下，今基址尚存。」相比於著名的廣州禺山書院和番山書院，力瀛書院的創建還要早百多年。見劉智鵬、劉蜀永：《方志中的古代香港：《新安縣志》香港史料選》（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頁xix。
- 3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the Colony for 1911", in Papers Laid Befor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y Command of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23 November 1911, <https://sunzi.lib.hku.hk/hkgro/view/s1911/2077.pdf>, p. 46. Date of access: 29 August 2022.
- 4 羅慧燕：《藍天樹下：新界鄉村學校》（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頁30。
- 5 文一峰：〈廣州陳家祠的社會學意義〉，廣府文化研究網（2015年10月），<http://gzgfw.hk.gzhu.edu.cn/info/1112/1230.htm>。瀏覽日期：2022年4月6日。
- 6 王廣武解釋，由於香港島及九龍半島的人口以漁民佔多，農業則主要由佃農操作，故未如新界般存在具經濟實力的望族發展文教。見王廣武：《香港史新編（上冊）》（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頁56。
- 7 朱錦鸞：〈香港古建築中的匾額和對聯與香港早期文化初探〉，待刊。
- 8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Chou Wong Yi Kung Study Hall, Kam Tin, Yuen Long",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223\\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223_Appraisal_En.pdf). Date of access: 6 April 2022. 亦見於饒玖才：《香港的地名與地方歷史（下冊）—新界》（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2年），頁13。
- 9 王齊樂：《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香港：波文書局，1983年），頁42。
- 10 王齊樂：《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香港：波文書局，1983年），頁50。
- 11 錦田鄉事委員會：《錦田鄉》（香港：錦田鄉事委員會，2017年），頁55。
- 12 王廣武：《香港史新編（上冊）》（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頁255。亦見於蘇萬興：《坐言集之錦田鄧族》（香港：超媒體有限公司，2008年），頁120。
- 13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Kun Ting Study Hall Hang Mei Tsuen, Ping Shan, Yuen Long",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12\\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12_Appraisal_En.pdf). Date of access: 6 April 2022. 亦見於古物古蹟辦事處：「屏山文物徑」，[https://www.amo.gov.hk/filemanager/amo/common/download-area/pamphlet/PSHT\\_Pamphlet.pdf](https://www.amo.gov.hk/filemanager/amo/common/download-area/pamphlet/PSHT_Pamphlet.pdf)。瀏覽日期：2022年4月6日。
- 14 吳川市人民政府：〈清末狀元林召棠故居紀念館、狀元坊〉（2009年12月7日），<https://web.archive.org/web/20100129073904/http://www.gdwc.gov.cn/file/news/2009/12/07/1251.shtml>。瀏覽日期：2022年7月25日。
- 15 蘇萬興：《坐言集之屏山鄧族》（香港：超媒體有限公司，2008年），頁62。
- 16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Memorandum for Members of the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 King Law Ka Shuk At Tai Po Tau Tsuen, Tai Po" (Board Paper AAB/37/96)(Date of Meeting: 7 June 1990).
- 17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Liu Ying Lung Study Hall Po Sheung Tsuen, Sheung Shui Wai, Sheung Shui",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169\\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169_Appraisal_En.pdf). Date of access: 6 April 2022.
- 18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Memorandum for Members of the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 Kang Yung Shu Uk At Sha Tau Kok" (Board Paper AAB/16/90)(Date of Meeting: 19 December 1996).
- 19 唐代段成式（803-863年）的筆記小說《酉陽雜俎續集·卷二·支諾皋中》描述唐代宰相李固言年輕時曾經落第，遇到年長婦人對他說「郎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李固言翌年果然高中，考題是「人鏡芙蓉」。「人鏡芙蓉」遂成為成語，祝願考試成功。
- 20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Cheung Chun Yuen No. 82 Shui Tau Tsuen, Kam Tin, Yuen Long",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125\\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125_Appraisal_En.pdf). Date of access: 6 April 2022.
- 21 蘇萬興：《坐言集之錦田鄧族》（香港：超媒體有限公司，2008年），頁113-114。
- 22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Memorandum for Members of the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 Yan Dun Kong Study Hall, Ping Shan, Yuen Long, New Territories" (Board Paper AAB/28/2001-02)(Date of Meeting: 27 November 2001).
- 23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Shin Shut Study Hall No. 20 San Uk Tsuen, Lung Yeuk Tau, Fanling",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163\\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163_Appraisal_En.pdf). Date of access: 16 April 2022. 亦見於王齊樂：《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香港：波文書局，1983年），頁63。
- 24 古物古蹟辦事處：「廖萬石堂」，[https://www.amo.gov.hk/filemanager/amo/common/download-area/pamphlet/liu\\_man\\_shek\\_tong.pdf](https://www.amo.gov.hk/filemanager/amo/common/download-area/pamphlet/liu_man_shek_tong.pdf)。瀏覽日期：2022年4月16日。亦見於王齊樂：《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香港：波文書局，1983年），頁54。
- 25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Man Ancestral Hall Fan Tin Tsuen, San Tin, Yuen Long",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75\\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75_Appraisal_En.pdf). Date of access: 16 April 2022. 亦見於王齊樂：《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香港：波文書局，1983年），頁61。
- 26 鄧惠麟，字啓瑞，廈村鄧族二十三世祖，出色書法家。咸豐五年（1855）成秀才，十一年（1861）中舉人；與其中三名考獲廩生的兒子，被稱為「父子四案首」。
- 27 古物古蹟辦事處：「鄧氏宗祠」，[https://www.amo.gov.hk/tc/historic-buildings/monuments/new-territories/monuments\\_83/index.html](https://www.amo.gov.hk/tc/historic-buildings/monuments/new-territories/monuments_83/index.html)。瀏覽日期：2022年4月18日。
- 28 "Report on the New Territory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British Administration", in *Papers Laid Befor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kong 1900*, <https://sunzi.lib.hku.hk/hkgro/view/s1900/1667.pdf>, p. 251. Date of Access: 17 April 2022.
- 29 羅慧燕：《藍天樹下：新界鄉村學校》（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頁56。
- 30 阮柔：《香港教育——香港教育制度之史的研究》（香港：進步教育出版社，1948年），頁84。
- 31 游子安：〈香港關帝信仰與崇拜——以山嘴協天宮為例〉，載蕭國健、游子安主編：《鑪峰古今：香港歷史文化論集2013》（香港：珠海學院香港歷史文化研究中心，2014年），頁97。亦見於王廣武：《香港史新編（下冊）》（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頁419。
- 32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Tin Hau Temple, Leung Shuen Wan, Sai Kung",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617\\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617_Appraisal_En.pdf). Date of Access: 17 April 2022.
- 33 游子安：〈香港關帝信仰與崇拜——以山嘴協天宮為例〉，載蕭國健、游子安主編：《鑪峰古今：香港歷史文化論集2013》（香港：珠海學院香港歷史文化研究中心，2014年），頁101。
- 34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Tin Hau Temple, Nga Yiu Tau, Shap Pat Heung, Yuen Long",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668\\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668_Appraisal_En.pdf). Date of Access: 17 April 2022.
- 35 羅慧燕：《藍天樹下：新界鄉村學校》（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頁85。See also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Kwan Ah School (formerly Pan Lam Study Hall), Sheung Tam Shui Hang, Sha Tau Kok",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873\\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873_Appraisal_En.pdf). Date of Access: 17 April 2022.

- 36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Yan Wah Lo, Kwu Tung, Sheung Shui, N.T”,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884\\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884_Appraisal_En.pdf). Date of Access: 17 April 2022.
- 37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Shun Tak Kui, No. 171 Shung Ching San Tsuen, Shap Pat Heung, Yuen Long”,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205\\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205_Appraisal_En.pdf). Date of Access: 17 April 2022.
- 38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Pak Mong Watchtower, Pak Mong, Lantau Island”,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577\\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577_Appraisal_En.pdf). Date of access: 29 August 2022.
- 39 古物古蹟辦事處：「屏山文物徑」，[https://www.amo.gov.hk/filemanager/amo/common/download-area/pamphlet/PSHT\\_Pamphlet.pdf](https://www.amo.gov.hk/filemanager/amo/common/download-area/pamphlet/PSHT_Pamphlet.pdf)。瀏覽日期：2022年4月19日。亦見於蕭國健：《鑑古尋根：香港歷史與古蹟尋蹤》（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21年），頁89。
- 40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Memorandum for Members of the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 Tsui Shing Lau, Ping Shan Pagoda” (Board Paper AAB/14/77)(Date of Meeting: 17 August 1977).
- 41 1921年，中華民國政府仿效美國推行「六三三」學制，即六年小學、三年初中及三年高中。香港的漢文學校亦跟隨內地學制，方便學生到內地升學。
- 42 1921年，政府規定所有鄉村學塾必須註冊。由於註冊必須命名，很多本來沒有名字的鄉村學塾，都被冠以學校之名。見於羅慧燕：《藍天樹下：新界鄉村學校》（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頁97及218。
- 43 達德學校取名於愈喬二公祠的門聯「達期兼善，德修於身」。
- 44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Tung Yik School Lin Fa Tei, Pat Heung, Yuen Long”,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519\\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519_Appraisal_En.pdf). Date of access: 19 April 2022. 亦見於王齊樂：《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香港：波文書局，1983年），頁341。
- 45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Kai Choi School and Hip Tin Temple Kuk Po, Luk Keng”,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1105\\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1105_Appraisal_En.pdf). Date of access: 19 April 2022.
- 46 1858年《天津條約》簽訂前，西方教士不能在華自由傳教，活動亦受限制。
- 47 王齊樂：《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香港：波文書局，1983年），頁94。
- 48 黃棟才、劉亮國、香港教育大學香港教育博物館：《搖籃地：中西區教育今昔》（香港：中華書局，2020年），頁20。
- 49 陸鴻基：《從榕樹下到電腦前：香港教育的故事》（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03年），頁47。
- 50 王齊樂：《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香港：波文書局，1983年），頁108。
- 51 丁新豹、盧淑櫻：《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頁52。
- 52 阮柔：《香港教育——香港教育制度之史的研究》（香港：進步教育出版社，1948年），頁71至72。
- 53 St. Paul’s College, “About Us”, <http://www.spc.edu.hk/content.php?id=166&mid=1-15>. Date of access: 25 April 2022.
- 54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Bishop’s House, No. 1, Lower Albert Road, Central, Hong Kong”,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9\\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9_Appraisal_En.pdf). Date of access: 25 April 2022.
- 55 王齊樂：《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香港：波文書局，1983年），頁107。
- 56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St. Paul’s Church, No. 76 Glenealy Road, Central, H.K.”,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49\\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49_Appraisal_En.pdf). Also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Church Guest House, No. 1 Upper Albert Road, Central, H.K.”,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194\\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194_Appraisal_En.pdf). Date of access: 25 April 2022.
- 57 僅次於跑馬地香港基督墳場教堂及舊三軍司令官邸（旗杆屋）。
- 58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Old S.K.H. Kei Yan Primary School (alias, Kong Kit Building), Glenealy Road, Central, H.K.”,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710\\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710_Appraisal_En.pdf). Date of access: 25 April 2022.
- 59 王齊樂：《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香港：波文書局，1983年），頁105。
- 60 黃棟才、劉亮國、香港教育大學香港教育博物館：《搖籃地：中西區教育今昔》（香港：中華書局，2020年），頁92。
- 61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Ying Wa Girls’ School, Kindergarten Block, No. 76 Robinson Road, Mid-Levels, H.K.”,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N41\\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N41_Appraisal_En.pdf). Date of access: 25 April 2022.
- 62 該處曾先後作羅富國師範學院及聯合書院校舍。
- 63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Main Building, Diocesan Boys’ School No. 131 Argyle Street, Mong Kok, Kowloon”,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410\\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410_Appraisal_En.pdf). Date of access: 27 April 2022.
- 64 阮柔：《香港教育——香港教育制度之史的研究》（香港：進步教育出版社，1948年），頁93。
- 65 黃棟才、劉亮國、香港教育大學香港教育博物館：《搖籃地：中西區教育今昔》（香港：中華書局，2020年），頁102。
- 66 該寄宿學校運作至1907年結束，而孤兒院則原址擴充並繼續營運。見於Sala, I. (1997), *History of Our Canossian Missions, Hong Kong 1860-1910*, (Hong Kong: Daughters of Charity of Canossa), pp. 333-334.
- 67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Caritas Ling Yuet Sin Kindergarten No. 54 Pok Fu Lam Road, Hong Kong”,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798\\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798_Appraisal_En.pdf). Date of access: 27 April 2022.
- 68 王齊樂：《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香港：波文書局，1983年），頁187-188。
- 69 1907年的視學報告顯示，當時官立學校共有14間。“Report of the Inspector of Schools for the Year 1907”, in *Papers Laid Befor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y Command of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23 July 1908*, <https://sunzi.lib.hku.hk/hkgro/view/s1908/2025.pdf>, pp.316-389. Date of access: 30 April 2022.
- 70 李志剛：《基督教與香港早期社會》（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頁75。
- 71 黃棟才、劉亮國、香港教育大學香港教育博物館：《搖籃地：中西區教育今昔》（香港：中華書局，2020年），頁57。
- 72 古物諮詢委員會：「香港般咸道63A號英皇書院文物評估報告」（委員會文件AAB/15/2011-12）（會議日期：2011年6月15日），<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154meeting/AAB154-15-Annex-A-chi.pdf>。瀏覽日期：2022年5月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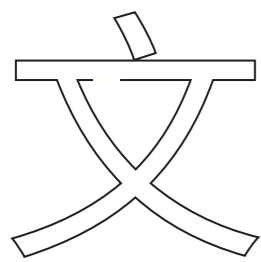


- 73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Cheung Chau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 Old Block & Caretaker's Residence No. 5B School Road, Cheung Chau”,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536\\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536_Appraisal_En.pdf). Date of access: 1 May 2022.
- 74 長洲官立中學：「流年似水 百年校史掠影」，<http://class.ccgss.edu.hk/doc/ccghis.pdf>。瀏覽日期：2022年5月1日。
- 75 馬禮遜學校於1839年在澳門成立，為基督教在華的首間學校，1842年遷往香港，校址所在的灣仔摩利臣山因而得名。
- 76 陸鴻基：《從榕樹下到電腦前：香港教育的故事》（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03年），頁65。
- 77 黃棟才、劉亮國、香港教育大學香港教育博物館：《搖籃地：中西區教育今昔》（香港：中華書局，2020年），頁20。
- 78 李子建、劉瑩、陳智德、鄭保瑛、鄧穎瑜、香港教育大學香港教育博物館：《承教·城傳：九龍學校的故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1年），頁7-17。
- 79 丁新豹、盧淑櫻：《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頁44。
- 80 聖士提反書院書院大樓為法定古蹟；馬田宿舍、舊實驗室及一至五號平房為二級歷史建築；聖士提反堂、附屬小學A座、教學樓及伍華紀念堂為三級歷史建築。
- 81 古物諮詢委員會：「香港赤柱東頭灣道22號聖士提反書院的書院大樓文物評估報告」（委員會文件AAB/14/2011-12）（會議日期：2011年6月15日），<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154meeting/AAB154-14-Annex-A-chi.pdf>。瀏覽日期：2022年5月2日。
- 82 古物古蹟辦事處：「聖士提反女子中學」，[https://www.amo.gov.hk/tc/historic-buildings/monuments/hong-kong-island/monuments\\_46/index.html](https://www.amo.gov.hk/tc/historic-buildings/monuments/hong-kong-island/monuments_46/index.html)。瀏覽日期：2022年5月2日。亦見於李子建、劉瑩、陳智德、鄭保瑛、鄧穎瑜、香港教育大學香港教育博物館：《承教·城傳：九龍學校的故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1年），頁86。
- 83 阮柔：《香港教育——香港教育制度之史的研究》（香港：進步教育出版社，1948年），頁71。
- 84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School building of 1927, St Paul’s Co-educational College No. 33 MacDonnell Road, Hong Kong”,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408\\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408_Appraisal_En.pdf). Date of access: 2 May 2022.
- 85 古物古蹟辦事處：「瑪利諾修院學校」，[https://www.amo.gov.hk/tc/historic-buildings/monuments/kowloon/monuments\\_84/index.html](https://www.amo.gov.hk/tc/historic-buildings/monuments/kowloon/monuments_84/index.html)。瀏覽日期：2022年5月2日。亦見於李子建、劉瑩、陳智德、鄭保瑛、鄧穎瑜、香港教育大學香港教育博物館：《承教·城傳：九龍學校的故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1年），頁21。
- 86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St. Mary’s Canossian College, No. 162 Austin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490\\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490_Appraisal_En.pdf). Date of access: 2 May 2022.
- 87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Heep Yunn School – Main Building and Chapel of St. Clare of Assisi No. 1 Farm Road, Kowloon”,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609\\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609_Appraisal_En.pdf). Date of access: 2 May 2022.
- 88 黃棟才、劉亮國、香港教育大學香港教育博物館：《搖籃地：中西區教育今昔》（香港：中華書局，2020年），頁81-82。
- 89 陸鴻基：《從榕樹下到電腦前：香港教育的故事》（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03年），頁98。
- 90 東華三院百年史略編纂委員會：《東華三院百年史略（上冊）》（香港：香港東華三院庚戌年董事局，1970年），頁139-140。
- 91 古物諮詢委員會：「上環荷李活道124至126號、128號及130號文武廟文物評估報告」（委員會文件AAB/47/2009-10）（會議日期：2010年6月24日），[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147meeting/AAB-47\\_Annex\\_B\\_Chi.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147meeting/AAB-47_Annex_B_Chi.pdf)。瀏覽日期：2022年5月6日。亦見於方美賢：《香港早期教育發展史》（香港：中國學社，1975年），頁159。
- 92 東華三院百年史略編纂委員會：《東華三院百年史略（上冊）》（香港：香港東華三院庚戌年董事局，1970年），頁139-160。
- 93 古物諮詢委員會：「九龍油麻地天后古廟及其鄰接建築物文物評估報告」（委員會文件AAB/17/2019-20）（會議日期：2020年6月11日），<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154meeting/AAB154-14-Annex-A-chi.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189meeting/aab\\_17\\_2019-20-c-tc.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189meeting/aab_17_2019-20-c-tc.pdf)。瀏覽日期：2022年5月6日。
- 94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Kwun Yam Temple Station Lane, Hung Hom, Kowloon”,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122\\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122_Appraisal_En.pdf). Date of access: 5 May 2022.
- 95 古物諮詢委員會：「香港跑馬地山光道15號東蓮覺苑文物評估報告」（委員會文件AAB/9/2017-18）（會議日期：2017年6月8日），<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178meeting/aab-9-annex-a-b5.pdf>。瀏覽日期：2022年5月21日。
- 96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No. 18 Tai San Street Cheung Chau”,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506\\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506_Appraisal_En.pdf). Date of access: 21 May 2022.
- 97 羅慧燕：《藍天樹下：新界鄉村學校》（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頁76-79。
- 98 鹽田仔村民於1866年聖誕節當天集體受洗，不歡迎非教徒在當地居住。見夏其龍：《香港天主教傳教史，1841-1894》（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頁111及261。
- 99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St. Joseph’s Chapel, Yim Tim Tsai, Sai Kung, New Territories”,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368\\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368_Appraisal_En.pdf). Date of Access: 17 April 2022.
- 100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St. Joseph’s Church, Ma On Shan Tsuen Road, Sha Tin, N.T.”,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N103\\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N103_Appraisal_En.pdf). Also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Lutheran Yan Kwong Church, Ma On Shan Tsuen Road, Sha Tin, N.T.”,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N102\\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N102_Appraisal_En.pdf). Date of Access: 17 April 2022.
- 101 周正偉：〈晚清改革與香港高等教育的發展〉，載蕭國健、游子安主編：《鐘峰古今：香港歷史文化論集2013》（香港：珠海學院香港歷史文化研究中心，2014年），頁107。
- 102 Ng Lun, N. H. (1984), *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Development of Public Education in Early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p. 128.
- 103 Endacott, G. (1962), “The Beginnings”, in Harrison, B. (ed.)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First 50 Year, 1911-196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29.
- 104 當時香港社會普遍稱「中文」為「漢文」。
- 105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No. 26 Kennedy Road, Central, Hong Kong”,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72\\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72_Appraisal_En.pdf). Date of access: 14 April 2022.
- 106 英文學校由最低的第八班 (Class VIII) 起步，至完成第二班 (Class II) 即中學畢業；第一班 (Class I) 為大學預科，以應考香港大學入學試。入讀第八班的學童，通常已就讀四年小學，或在學塾浸淫了一段時間，故具備一定的學業基礎。

- 107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Pui Ching Primary School, Gateway No. 80 Waterloo Road, Kowloon”,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1003\\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1003_Appraisal_En.pdf). Date of access: 21 May 2022.
- 108 西貢香港三育書院暨三育中學中學部、行政樓、男生宿舍、教員宿舍及五家教員宿舍均已評為二級歷史建築。
- 109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Hong Kong Adventist College & Sam Yuk Middle School Staff and Teaching Building of Sam Yuk Middle School No. 1111 Clear Water Bay Road, Sheung Yeung, Sai Kung, New Territories”,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392\\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392_Appraisal_En.pdf). Date of access: 21 May 2022.
- 110 丁新豹、盧淑櫻：《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頁4至5。
- 111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Former Quarry Bay School No. 986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829\\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829_Appraisal_En.pdf). Date of access: 1 May 2022.
- 112 陸鴻基：《從榕樹下到電腦前：香港教育的故事》（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03年），頁78。
- 113 阮柔：《香港教育——香港教育制度之史的研究》（香港：進步教育出版社，1948年），頁75。
- 114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Memorandum for Members of the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 Former Kowloon British School at Nathan Road, Tsim Sha Tsui” (Board Paper AAB/6/90)(Date of Meeting: 8 March 1990).
- 115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King George V School No. 2 Tin Kwong Road, Ho Man Tin, Kowloon”,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414\\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414_Appraisal_En.pdf). Date of access: 1 May 2022.
- 116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Former Peak School (Victoria Peak Fire Station) No. 7 Gough Hill Path, The Peak, Hong Kong”,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489\\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489_Appraisal_En.pdf). Date of access: 8 April 2022.
- 117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Former Quarry Bay School, No. 986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829\\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829_Appraisal_En.pdf). Date of access: 8 April 2022.
- 118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Ex-Portuguese Community School (Escola Camões) No. 7 Cox’s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N206\\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N206_Appraisal_En.pdf). Date of access: 30 April 2022.
- 119 丁新豹、盧淑櫻：《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頁79-80。
- 120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No. 26 Kennedy Road, Central, Hong Kong”,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72\\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72_Appraisal_En.pdf). Date of access: 30 April 2022.
- 121 1914年，政府在香港官立實業專科學院開設漢文師範科，於晚上開課，稱為「夜師」。至1920年，政府借用荷李活道文武廟中華書院頂層開辦官立漢文師範學堂 (Vernacular Normal School for Men)，培訓男教師；又在庇理羅士女書院開辦官立漢文女子師範學堂 (Vernacular Normal School for Women)，兩者皆在日間上課，分別稱為「日師」及「女師」。及至1926年，政府創辦首間漢文官立中學，同時附設漢文師範班。
- 122 羅慧燕：《藍天樹下：新界鄉村學校》（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頁44。
- 123 鄺啟濤、香港官立鄉村師範專科學校同學會：《鄉村情懷：香港官立鄉村師範專科學校校史 (1946-54) 及活動》（香港：香港官立鄉村師範專科學校同學會有限公司，2004年），頁10。
- 124 鄺啟濤、香港官立鄉村師範專科學校同學會：《鄉村情懷：香港官立鄉村師範專科學校校史 (1946-54) 及活動》（香港：香港官立鄉村師範專科學校同學會有限公司，2004年），頁16。
- 125 當時名為香港師資學院 (Teachers’ Training School)，至1941年遷往新校舍時才易名羅富國師範學院。
- 126 即葛量港教育學院 (1951年)、柏立基教育學院 (1960年)、香港工商師範學院 (1974年) 及語文教育學院 (1982年)。
- 127 古物諮詢委員會：「香港西營盤般咸道9A號般咸道官立小學文物價值評估報告」(委員會文件 AAB/3/2021-22) (會議日期：2021年3月11日)，[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192meeting/aab\\_3\\_2021-22-a-tc.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192meeting/aab_3_2021-22-a-tc.pdf)。瀏覽日期：2022年4月23日。
- 128 政府於1937年在灣仔活道創辦香港官立高級工業學院 (Government Trade School)，是香港理工大學的前身。
- 129 黃棟才、劉亮國、香港教育大學香港教育博物館：《搖籃地：中西區教育今昔》（香港：中華書局，2020年），頁28, 106。
- 130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East Wing, St. Louis School No. 179 Third Street, Sai Ying Pun, Hong Kong”,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528\\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528_Appraisal_En.pdf). Date of access: 7 May 2022.
- 131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Aberdeen Technical School, No. 1 Wong Chuk Hang School, Aberdeen, Hong Kong”,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740\\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740_Appraisal_En.pdf). Date of access: 7 May 2022.
- 132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Tang King Po School No. 16 Tin Kwong Road, Kowloon”,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598\\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598_Appraisal_En.pdf). Date of access: 7 May 2022.
- 133 趙雨樂：《近代南來文人的香港印象與國族意識》（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6年），頁140。
- 134 危丁明：〈抗戰烽火中的香港華人傳統宗教〉，載蕭國健、游子安主編：《鐘峰古今：香港歷史文化論集 2013》（香港：珠海學院香港歷史文化研究中心，2014年），頁65-66。
- 135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Confucius Hall No. 77 Caroline Hill Road, Causeway Bay, H.K”, [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N349\\_Appraisal\\_E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en/N349_Appraisal_En.pdf). Date of access: 6 May 2022.
- 136 古物諮詢委員會：「屯門何福堂會所馬禮遜樓的歷史與建築特色評估」(委員會文件 AAB/18/2003-04) (會議日期：2003年9月9日)。

# 3

## 應用於文物建築保育 和教育的新科技



# 文物建築的科技保護 ——以廣州陳家祠為例

歷史學博士，研究館員，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館長。從事博物館及文物保護27年，擅長廣州地方史研究、廣東民間工藝史及保護傳承研究、古建築與文物保護研究等領域。



黃海妍 博士

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文物保護管理部主任，主要從事嶺南文物建築的保護和研究，致力於探索文物建築的動態安全監測體系在文物建築中應用，實現文物建築的預防性保護。



石浩斌

本文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廣州陳家祠安全動態監測系統的建設為例，圍繞系統建設過程中北斗監測系統、白蟻活動監測以及多項數據監測後台的搭建、技術特點和數據分析情況，結合實際監測的成功個案，證明在文物建築中引入科技保護手段，運用動態安全監測系統有著重要的意義，為發現文物建築潛在的各種安全隱患、延緩珍貴文物的壽命起到積極的作用。

陳

家祠，匾額書「陳氏書院」，位於廣州中山七路，籌建於清光緒十四年（1888），光緒十九年（1893）落成，是當時廣東省72縣陳姓宗族合資興建的合族祠堂，是廣東現存規模最大、裝飾華麗、保存完好的傳統嶺南祠堂式建築，1988年被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陳家祠佔地面積15,000平方米，主體建築面積為6,400平方米，由大小19座單體建築組成，每座建築之間以青雲巷相隔，長廊相連，被譽為「嶺南建築藝術明珠」（圖1）。



圖1 陳家祠外觀

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以下簡稱「我館」）以陳家祠為館址，成立於1959年，2017年被評為國家一級博物館。建館六十多年來，我館一直肩負著保護、管理和合理利用陳家祠的重任，對於如何保護利用陳家祠進行了多方的探索。從2016年開始，我館引入科技保護手段，建設陳家祠安全動態監測系統。以下就系統建設過程的實施情況以及取得的成效進行論述。

## 一、系統建設前陳家祠的保護及安全狀況

對陳家祠實施科學和有效的保護一直是我館工作的重中之重。經統計，自1959年建館至今，針對陳家祠的修繕保護工程合共22次，主要分為全面性修繕、週期性維護和針對性修繕三種，使得文物建築原有的佈局和風貌得到了較好的保護和復原。但是，城市的發展和周邊環境的歷史變遷還是不可避免地給陳家祠帶來了較大的安全隱患：

1、原來位於清代廣州城外的陳家祠，現在已位於廣州市中心城區，城市的主幹道中山路在陳家祠的正前方經過，周邊高樓林立，人流量和車流量暴增（圖2）。

2、由於周邊地勢的提高，陳家祠變成區域環境中的窪地，建築首進地面低於城市主幹道1.08米，地下水位很高，排水形勢嚴峻。

3、各種環境污染如大氣污染、土壤污染等持續地對陳家祠造成影響。

4、廣州地鐵一號線自1999年開通以來，在古建築前方的中山路地下穿行。2015年開始，廣州地鐵八號線北延線在陳家祠的東側地塊開始圍閉施工，開挖與地鐵一號線的交換空間並鋪設地鐵軌道，開挖深度達25米，基坑位置距離陳家祠建築本體最近處（東圍牆）僅13米。隨著地鐵八號線的開通運營，兩條地鐵線在陳家祠附近地下穿行，對陳家祠結構安全的影響需要進行長期監測和評估。

5、白蟻危害加劇。陳家祠是磚木結構的大型祠堂式建築，建築大量採用坤甸木、柚木、杉木等材料，庭院內也有大量綠植，非常容易遭受白蟻侵蝕。2013年至2017年期間，我館共發現白蟻破壞22次，其中在古建築木構件發現上10次、木質展櫃內發現5次、堆放的雜物上發現5次、綠化植物上發現2次。面對上述多種白蟻危害，我館加強文物建築木構件巡查，加強白蟻的防治。但因深藏地下的白蟻蟻巢和零星的散白蟻難以發現和預防，一段時間後依然會發生白蟻危害情況，無法有效控制文物建築、綠化樹木等被蛀食破壞的風險。

受限於古建築保護、安防和消防安全等多方面的規定，我館以往對陳家祠安全的監測手段一直只限於傳統的人工測量和人工巡查，對古建築的牆體結構、木石構件、基礎情況等缺乏科學系統和預防性的監測，對古建築的安全狀況和發展趨勢難以準確探知。



圖2 陳家祠周邊現狀鳥瞰圖

## 二、動態監測系統的建設

在近幾年陳家祠的保護利用中，我館特別重視把科技保護的手段引入到陳家祠的搶救性和預防性保護之中，做到「在保護中發展、發展中保護」。

2016年至2021年，我館在陳家祠的保護中有針對性地引入了「三維掃描和古建築檢測監測系統」、「建築震動監測系統」和「白蟻病害監測系統」，古建築的動態監測按計劃有序開展。

### (一) 三維掃描和古建築檢測監測系統

2016年,我館針對陳家祠的安全,引進並實施了「三維掃描和檢測監測專案(第一期)」,對古建築部分廳堂實施三維掃描;同時採用有線傳輸的方式對部分廳堂進行了裂縫、溫濕度、形變、沉降等監測。但是,該專案採用有線傳輸的佈設方式,需要在古建築中大量走線,存在方案論證時間長,施工和維護難度大等實際問題,難以在全館範圍內推行。

隨著北斗衛星導航在國家大力支持下在民用領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相關技術已經十分成熟。《國家北斗精準服務網應用指南》指出:

利用北斗精準位置服務結合佈設在歷史建築和文物建築附近的多個監測站,可以在歷史建築和文物建築周圍部署一張形變監測網,而在監測站結合無目標激光測距設備...獲得建築體牆體指定定位的精準位置資訊,從而實現對古建築的即時形變監測...還可以對古建築周圍地面的沉降情況做整體監測。<sup>1</sup>

也就是說,可以在不破壞文物建築外觀及整體建築結構的情況下,將北斗系統先進的定位和監測技術應用到古建築的安全隱患監測中,包括形變監測和沉降情況的整體監測。

2017年,經過前期的深入調研和多方論證,我館開始建設「三維掃描和檢測監測專案(第二期)」,引入北斗衛星導航系統作為安全監測系統的基礎,配套能實現無線訊號傳輸的動態監測設備,避免在陳家祠建築上佈線,形成針對陳家祠安全狀況的動態監測系統,在不破壞文物本體(包括外觀及結構)的前提下,對陳家祠實施監測。系統主要組成如下:

#### A. 北斗監測站:

北斗監測站(圖3)由GNSS監測墩和北斗接收機組成,可以接收監測站點的經緯度和高程數據(精確到毫米級),通過後台軟體計算形成形變監測網;同時實現位移和沉降數據的讀取。

#### B. 裂縫計:

裂縫計(圖4)可以通過對現有裂縫的監測,即時了解裂縫的暫態變化情況(精確到0.1毫米)。

#### C. 傾斜計:

傾斜計(圖5)通過對建築廳堂山牆的傾斜監測,即時了解廳堂的傾斜變化情況。



圖3 北斗監測點和監測點分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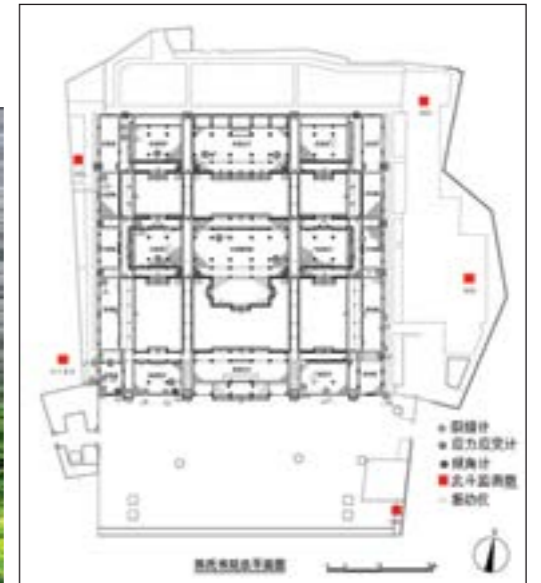


圖4 裂縫監測點和監測點分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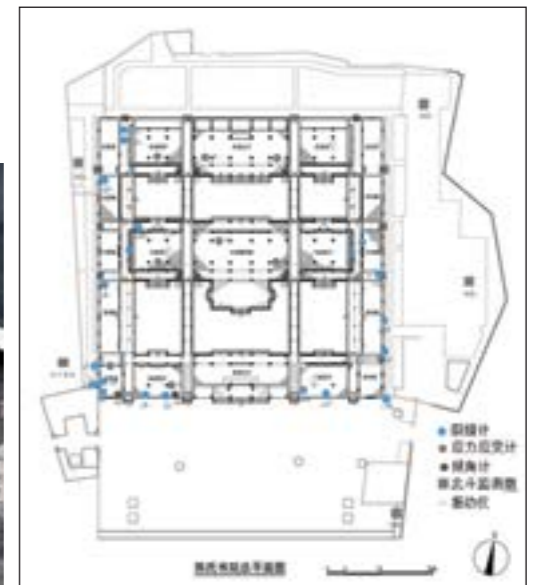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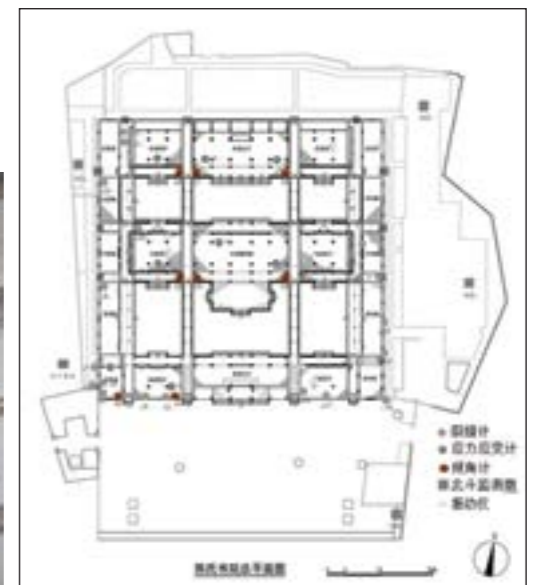


圖5 傾斜監測點和監測點分佈



#### D. 應力應變計：

應力應變計（圖6）通過對建築樑架的應變監測，即時了解樑架的應力變化情況。

#### E. 三維掃描

對陳家祠建築進行了系統性的精確測繪，採用三維激光訊息採集，無人機傾斜攝影和相機照片建模技術，根據難易程度，對古建築的各個廳堂分期實施三維數碼化訊息採集，最後完成陳家祠的三維點雲模型及現狀向矢量正攝圖，形成各個廳堂、平立剖面CAD圖（圖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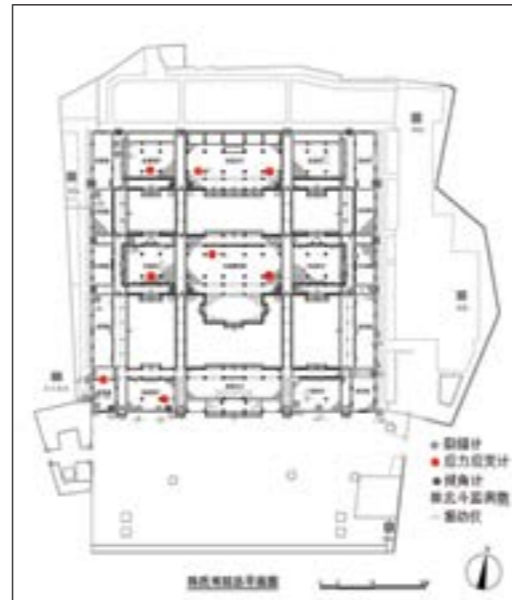


圖6 應力應變監測點和監測點分佈



圖7 古建築整體三維掃描成果圖

#### (二) 建築震動監測系統

2018年，我館引入了建築震動監測系統，根據GB/T 50452-2008《古建築防工業震動技術規範》等規範的要求，監測陳家祠局部區域受外部震動影響而產生的震動速度，將所承受的包括來自周邊和地鐵運營中產生的震動作用進行分析處理，形成具有震動監測、安全預警的局部動態監測系統，為進一步擴展到整個陳家祠的震動安全監測體系，完善文物保護措施奠定了科學基礎，同時為後續要採取的抗震措施提供實測數據。

該系統首先在陳家祠前東廳、後東廳、後東齋及中進西廳等建築廳堂實施（圖8）。通過系統可以確定古建築的抗震性能，快速獲取周邊施工、地鐵運營時及其他震源所導致的受損資訊，為制定修復方案、減震措施和後期的保養維護提供有力依據。

在系統實施過程中，設備終端的安裝固定針對磚木結構古建築不能隨意佈線、打釘開洞等文物保護的要求，使用有線傳輸和無線傳輸相結合方式，利用經試驗可行的黏貼、輕薄銅片箍緊等可逆的方法，實施儀器的安裝和固定。同時配套高品質的蓄電池保證儀器24小時供電，在確保古建築安全的情況下，保證儀器不間斷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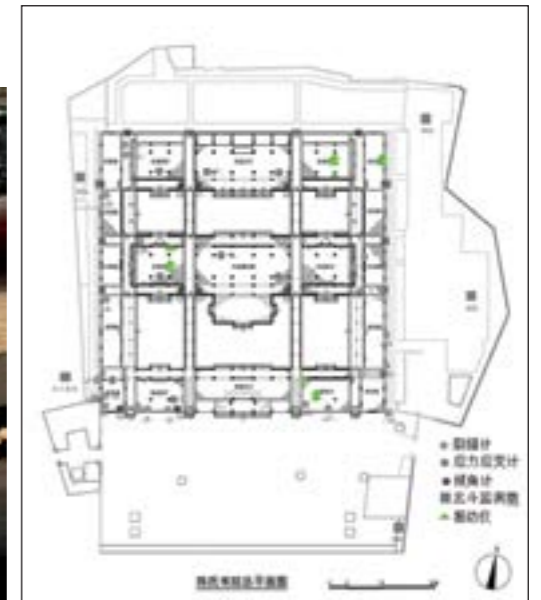


圖8 震動監測點和監測點分佈



### (三) 系統平台的整合

2018年，我館委託專業運維機構將上述監測系統和建築震動監測系統整合成統一的平台（圖9）。該系統以北斗衛星導航系統為基礎，將古建築內外安裝的裂縫監測、傾角監測、應力應變監測和震動監測終端的數據（共52個），通過無線傳輸的方式收集匯總到統一的可視監控後台，形成古建築動態監測系統（圖9、10）。

動態監測系統後台操作介面結合古建築三維場景進行展示，即時查詢所有監測點的數據訊息和巡檢記錄資訊；根據相關技術規範（如《古建築防工業振動技術規範》GBT 50452-2008）確定數據的報警閾值，觸發系統警報；可隨時翻查各監測點的歷史訊息，便於對比掌握各個監測點或區域問題的歷史變化情況和發展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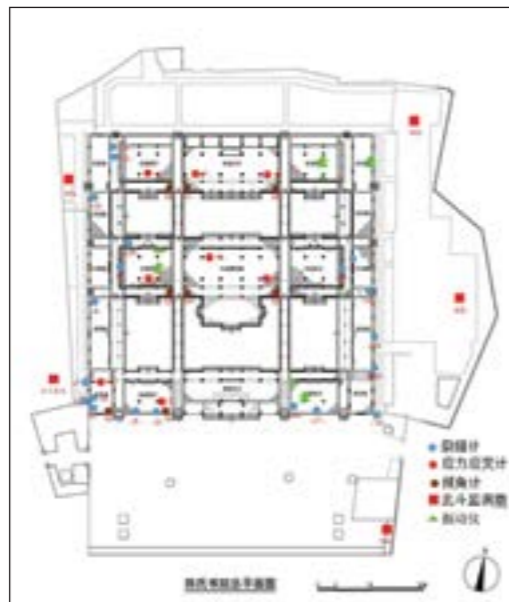


圖9 建築監測點分佈圖



圖10 整合完成的監測後台

### (四) 白蟻病害監測系統

2017年，針對館內白蟻危害，我館引入白蟻病害監測系統；2020年又對系統進行升級，布點由122個增加到160個。系統主要由白蟻監測裝置、網路監測站、監測訊息管理平台等部分組成，該系統改變了傳統白蟻監測必須用人工進行監測和檢查的方式，實現了24小時全天候自動監測，定時上傳監測結果，監測準確率可達到95%以上。

#### A. 白蟻監測裝置

白蟻監測裝置（圖11）由塑膠外殼、監測電子元器件（訊息採集模塊）、內芯木材組成。內芯木材能夠引誘裝置周圍的白蟻啃食，並把啃食的情況即時通過裝置內的訊息採集模塊，通過無線傳輸的方式向網路監測站傳送訊息。我館現有監測裝置160個（圖12），分佈在陳家祠內部及周邊綠化區域內，每個監測裝置間距為1-3米。



圖11 白蟻監測裝置

## B. 網路監測站

網路監測站(圖13) 監測裝置傳輸訊號的來源,是監測資訊集中與傳輸的裝置,最遠讀取監測裝置的距離可達3,000米,它可第一時間準確獲取監測裝置內白蟻入侵訊息,並即時上傳到監測訊息管理平台。

## C. 監測訊息管理平台

平台(圖14) 可查看監測裝置安裝地圖、歷史監測數據訊息、監測裝置運行狀態,可在PC端網頁、手機APP、微信小程序等查詢監測訊息。

當監測發現白蟻時,工作人員首先根據平台回饋的監測訊息找到發出警報的監測裝置編號,再根據平台地圖確定監測裝置安裝位置,然後使用特定工具打開監測裝置進行檢查。工作人員要觀察裝置內引誘到的白蟻活體數量,當引誘到足夠數量(通常為數百頭以上)的白蟻時,先取出監測電子元器件(訊息採集模塊),然後對裝置內芯木材上的白蟻噴施滅蟻粉劑,讓白蟻帶回巢內,通過白蟻群體相互間的交哺、舐吮等行為傳遞藥效,以達到白蟻群體中毒死亡、殺滅整個蟻巢內白蟻的效果。

在噴粉後一到兩周左右白蟻會被滅殺,白蟻滅殺後再將原有監測電子元器件和新的外殼、內芯木材進行組裝,在原監測安裝位置半徑0.5米範圍內新挖一個深約20厘米的坑,重新安裝監測裝置,恢復即時監測。



圖12 白蟻監測點分佈圖(2020年)



圖13 網路監測站

## 三、動態監測系統的成果

陳家祠安全動態監測系統自2017年10月至今已運行4年多,具體的成果包括:

### (一) 動態監測系統

動態監測系統實施至今,形成了監測月報36份,年報3份,專案總體監測報告1份。各種監測評估所得結果是:

**傾角監測:** 8個監測點的傾斜在監測期間均基本穩定,沒有明顯的傾向性變化,監測值變化範圍在 $\pm 0.06^\circ$  (接近於感測器的精度),不影響被監測結構的安全。

**應變監測:** 監測期間建築結構受天氣等外界因素影響,結構應力在不斷地產生變化,變化量主要在 $\pm 60\mu\epsilon$ 之間,不影響被監測結構安全。

**裂縫監測:** 監測期間各監測點裂縫均呈一致性規律變化,變化量主要在 $\pm 4$ 毫米之間,平均值-2.4毫米,裂縫總體上呈閉合趨勢,監測結果表明結構是安全的。

**震動監測:** 監測期間暫無發現古建築內部有明顯結構安全問題,基於監測數據判斷,陳家祠古建築結構的前進東廳、中進西廳、後進東廳和後東齋結構基本穩定。



圖14 監測訊息管理平台

## (二) 白蟻病害監測系統

據《白蟻病害發現情況圖》(圖15)所示,從2017年底白蟻監測系統引入至2020年底,共發現白蟻有效警報41次,對比系統引進之前,同期(對比2015-2017年)白蟻病害的發現增加了310%,其中綠化位置的監測裝置點發現白蟻佔比飆升,比同期增長22倍;古建築發現白蟻迅速減少至原來的30%;病害發現總量在專案實施首年(2018)出現增加後,呈逐年快速下降的趨勢,至2020年只發現3次。

監測數據證明,白蟻病害在監測系統實施期間逐年快速下降,得到了有效的遏制,白蟻危害的發現也由古建築內轉移到古建築外圍,成功把白蟻拒之門外,這個監測系統起到了很好的保護屏障作用。

根據監測的結果,我館基本摸清了館內白蟻危害的分佈和變化狀況,判斷出三個地下白蟻巢的位置,並實施了蟻巢的誘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時根據白蟻危害的分佈情況對館內白蟻危害進行了風險分區(圖16),有針對性地根據風險等級實施滅殺和控制措施,達到有效的滅殺效果。

根據風險區域圖(圖17),2020年10月我館將白蟻監測系統進行針對性的升級,合理調整監測點佈局,加密高風險區域的監測裝置佈設,從高風險源頭對白蟻危害進行綜合治理(圖18)。

實踐表明,該監測系統在即時訊息監測查詢、特定時間訊息查詢和訊息保存方面有著優秀的表現,有效防止了因異常訊息收集滯後引起的隱患,使白蟻安全隱患得到及時消除和緩解,達到預期的效果。系統對白蟻病害進行即時監測並報警,使得古建築內的白蟻危害得到及時控制。

綜上所述,陳家祠安全動態監測系統的建設和運行為我們提供了即時、詳細的建築變化情況數據,發出多次古建築的形變、裂縫、白蟻等異常情況的警報,使我館得以迅速掌握古建築的各種狀況,協調周邊工程的施工方式和方法,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周邊工程施工對古建築所造成的不良影響;同時,各項監測數據如裂縫變化和白蟻監測訊息有利於我們及時發現古建築潛在的各種隱患,為我館制定針對性的古建築保護方案,延緩珍貴文物的壽命,有計劃、有依據地實施預防性保護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為陳家祠的科學保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圖15 2013-2020年白蟻病害發現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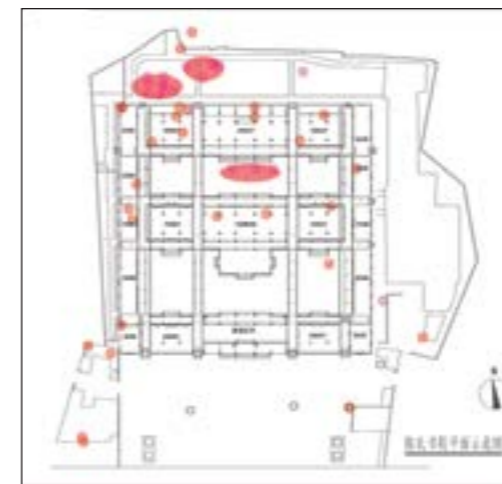


圖16 白蟻蟻巢位置估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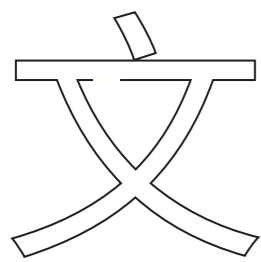


圖17 白蟻危害風險區域圖



圖18 2017年和2020年監測佈點調整圖

1 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國家北斗精準服務網應用指南2017版》,2017年,第43頁。



# 物保育的教育新趨勢

## ——如何以傳統技法 創建可持續未來

葉健雄教授為悉尼科技大學科學學院文物保育哲學博士，一直在澳門文化局擔任首席保育和文物科學專家，負責保育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澳門歷史城區內的文物建築。她目前是澳門科技大學的助理教授，指導研究生探索文物建築的保育和活化再利用。

葉 健雄 教授



# 摘要

當今世界正面臨氣候變化帶來複雜而嚴峻的危機，其破壞程度不但無法估量，更持續並迅速地損害環境和生命。官員和政策制訂者試圖把這些損害限制於可控範圍；同時，來自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士也在參與這個拯救過程。最新的研究顯示，建造業及現代建築的運行正製造大量碳排放，這促使專家們加快重新審視傳統建築材料和技術，因為這些材料和技術被認為是人類祖先創造可持續環境條件和健康生活方式的秘訣。本文介紹澳門文物建築保育中一些常用的本地材料的獨有特性，同時闡述將傳統方法和技術融入教育課程的新方法，為可持續及碳中和的未來做好準備。

## 引言

### 歷史



澳門歷史城區於2005年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第31處世界文化遺產。自500年前葡萄牙人前來定居以來，澳門一直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葡萄牙人曾在澳門開展大規模建設，包括軍事防禦工事系統，如碉堡、炮台、燈塔，以及連綿數百公里的防禦圍牆（圖1）。首批外國海員抵達後不久，教堂、住宅樓宇、公共建築及設施相繼落成。隨著該半島進一步殖民化，澳門由以往寧靜的漁村演變成生動多彩的城市，形成跨文化城市的雛型。今天的澳門，從建築風格、節日慶祝、烹飪藝術，甚至官方語言，都展現了混合的文化元素。澳門因擁有和諧的環境氛圍、寬容的文化及創作的自由而聞名，是一個獨特的城市。

### 傳統被動式的建築設計

在地理位置上，澳門位於廣東省，是中國南部的嶺南地區。當地屬典型亞熱帶氣候，冬季短暫溫和，夏季漫長炎熱潮濕，熱帶季候風和颱風相對頻繁。<sup>1</sup>為應對夏季令人窒息的悶熱天氣，前人特意將各種被動式系統納入建築的設計和施工，嶺南地區的传统建築模式及今天澳門許多歷史建築，都反映了這一點，針對被動式通風和採光系統，會利用庭院、天井、採光井、冷巷、蠔殼窗、對流式門窗等元素，營造一個舒適的生活環境。此外，傳統建築材料如木框結構、中國青磚、熟石灰砂漿、石灰洗及土質材料，也因其滲透性和可重複使用等特質而被廣泛使用。這些材料各有特性，要在澳門這悶熱環境中維持傳統建築結構的堅固性與完整性，它們發揮著關鍵作用（圖2）。

### 現狀

澳門在過去一百年經歷高速城市化，透過填海將10平方公里的農田逐步擴展至33平方公里的商業樞紐。<sup>2</sup>作為中國的兩個特別行政區之一，澳門以其獨特的文化、傳統及身份地位，吸引世界各地遊客，成為世界級的旅遊休閒中心。儘管澳門的經濟地位、國際聲



圖1 澳門舊地圖中顯示的防禦圍牆（紅色）與城市建築  
註：安東尼奧·博卡羅 Bocarro, António: 《東印度國城堡、城市和村鎮的平面圖集》  
*O livro das plantas de todas as fortalezas, cidades e povoações do Estado da India Oriental* (里斯本：國家出版局—鑄幣局 Imprensa Nacional-Casa da Moeda, 1992年)



圖2 鄭家大屋的採光井、蠔殼窗及對流窗  
註：由陳顯耀拍攝

譽及生活水準獲得大幅提昇，但城市的急速發展也造成許多意想不到的負面影響。例如為收藏電話線槽和水管等現代設施，街道平面必須升高，導致歷史建築「埋沒」在地面以下；地面鋪設不透水的混凝土，破壞了連接整個城市的傳統花崗岩鵝卵石街道所形成的自然排水機制（圖3）。過去幾十年來，建築材料的急劇變化也對歷史建築的堅固度構成負面影響。事實證明，使用不透水的水泥抹灰、塑料塗層、混凝土地基及高密度複合材料等來修復歷史建築，會對本來已脆弱的結構帶來不可逆轉的破壞。此外，目前活化傳統建築的策略聚焦於遊客的舒適度與提昇建築美感，例如為使用空調而把庭院和採光井用玻璃封閉，基於保安需要而安裝現代門窗，結果阻礙空氣流通，故此近年歷史建築的鹽害、濕氣凝結及生物性危害等現象正不斷惡化。

澳門氣象局資料顯示，在過去一百年間，澳門的平均氣溫持續攀升（0.71°C/100年）。儘管與世界上許多國家相比，澳門氣溫的升幅並不明顯，<sup>3</sup>但當前全球的氣候危機已帶來明顯的負面影響。近年熱帶颱風、暴雨及海水倒灌的嚴重程度與頻率都急劇增加，如2017年颱風「天鴿」和2018年颱風「山竹」均造成了嚴重的財產損失與人命傷亡（圖4）。歷史建築最容易受到這些方面的影響，因為它們處於低地、沒有建築地基，以及過去曾使用不當的修復材料。

## 計劃目的

現代建築是當今全球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最大的行業。<sup>4</sup>由於水泥的生產過程碳排放量非常大，許多國家（特別是歐洲）已減少甚至取締水泥生產。<sup>5</sup>國際領袖已立法禁止大規模的清拆工程，轉而選擇活化現有的建築物。因此，活化舊建築已成為實現全球碳中和目標、保護環境，以及達致可持續發展的可行方法之一。建築師和相關專業人士一直研究如何在現代建築加入「綠色」元素，而保育專家和研究員則專注將被動式設計理念及低碳傳統建材重新引入修復和建築領域。要實現可持續的建築修復，不僅需就各種建材的特質和反應進行詳細的科學研究，更重要是要將這些傳統知識和技能傳承下去。使用傳統材料的修復方法、傳統的建造技術及工藝為可持續發展所作的貢獻，與過去數十年來社會一直關注的物質和非物質遺產保護同樣重要。本文將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將探討澳門歷史城區曾進行的兩個修復專案，帶出地方知識解決地方保育問題的重要性；第二部分將介紹為培養未來保育專業人員而設的嶄新教育課程。

## 第一部分

### 案例1：傳統石灰洗的製作——沙梨頭圖書館

#### 背景：

沙梨頭圖書館位於澳門沙梨頭海邊街69-81號，是內港及周邊地區的聚會場所，受各年齡層居民歡迎。該圖書館建於20世紀初，由7座兩層並排的鋼筋混凝土騎樓式唐樓組成。<sup>6</sup>澳門文化局於2011年展開其修復工程，至2016年底正式對外開放（圖5）。<sup>7</sup>



圖3 澳門傳統鵝卵石路  
註：作者拍攝



圖4 颱風「天鴿」期間，澳門受到水浸和海水倒灌影響  
註：陳顯耀拍攝

在這個活化項目中，修復人員面對的主要挑戰是該建築靠近內港，結構容易遭受海風和潮濕帶有鹽分的大氣環境破壞。每年季候風和颱風季節，海水倒灌經常造成水浸，長期積水致使鹽份滲入建築物，原有的鋼筋混凝土嚴重腐蝕，每座唐樓都出現結構性裂縫。此外，可溶性鹽在牆內結晶，散佈在外牆和內牆表面，對牆身造成壓力，導致現代不透氣的修復物料（如聚合物防水乳液、丙烯酸塗料及磁漆塗料）從石灰砂漿塗層剝落。<sup>8</sup>由於結構不穩，唐樓的一半結構已經倒塌，只剩下立面和露台仍然殘存。

世界各地的文物保育研究人員均指出，保持傳統建築物的透氣能力十分重要。當各政府部門在尋求解決海水倒灌的辦法，沙梨頭圖書館的保育策略是恢復其對鹽濕環境的免疫力。方法是重新採用傳統建材，盡量提高建材的透氣度，使濕氣能穿透牆體流動。傳統石灰砂漿及石灰洗是專門調製，容許牆壁表面適當「呼吸」，消除內部壓力。外部石灰洗加入礦物石粉後，可調配至接近原色，至於內部顏色則使用礦物色素調配。

#### 修復方法：

除去牆壁表面所有不透水物料和結晶鹽後，使用傳統熟石灰進行修復。熟石灰由保育團隊根據石灰石的化學反應，按照傳統方法溫製而成。熟石灰會按其最終所用之處，決定是否添加禾稈草或礦物石粉。以下是兩種石灰製品：

1. 禾稈熟石灰砂漿：在中國傳統石灰砂漿中加入禾稈草，以強化堅固度。
2. 有色石灰洗：在白灰水加入礦物石粉，作表面塗層。

熟石灰是一種高鹼性砂漿，一方面具有高透氣性，另一方面可延緩混凝土牆內鋼筋的侵蝕。加入禾稈草不僅能增加砂漿表面積和孔隙率，使之具有更高的透氣性，更能減少灰砂漿固化後的裂紋。此外，由熟石灰製備的石灰洗能有效黏附在相容的石灰砂漿上。原始的石灰洗顏色與添加的礦物石粉相容，不會損害其透氣特性（圖6）。儘管每年都會發生幾次海水倒灌，但沙梨頭圖書館的牆壁結構至今仍然完整和堅固。

#### 案例2：防潮層的注入——中西藥局舊址

##### 背景：

中西藥局舊址位於澳門草堆街80號，由孫中山先生於1893年建立，為澳門居民提供醫療服務和供應西藥（圖7）。<sup>9</sup>該建築是典型以中國青磚建成的唐樓，附帶許多嶺南建築風格的裝飾特點，同時融入了西方建築元素，例如彩繪玻璃、天花板玫瑰花裝飾及木製假天花。

在澳門文化局購入前，中西藥局舊址建築物的狀況甚差。主樓的金字瓦頂已經塌陷，樓板十分殘破，後面獨立的副樓完全倒塌，磚塊和瓦片散落一地。雖然主樓部分的原有裝飾，如中國灰塑（包括從前的灰塑招牌）、壁畫、蠔殼窗及木樓梯仍保存完好，但不同程度的結構性裂縫遍佈整座建築，前後立面的連接牆裂縫較大。

當時附近的草堆街78號正在清拆重建。數百塊青磚被搶救下來，重用於中西藥局舊址的修復工程。此外，與草堆街82號共用的側牆地基部分缺失，令青磚直接與底土層接



圖5 沙梨頭圖書館的正立面  
註：作者拍攝



圖6 添加礦物石粉後的石灰洗  
註：作者拍攝

觸。當82號在三十多年前改建成樓高4層的建築物時，部分新牆嵌入原來的雙層磚牆，加劇了濕氣及鹽害，對青磚造成不可逆轉的破壞。毗鄰的建築物滲出可溶性鹽，更對主樓造成進一步損害。該處地下還發現有考古遺蹟，也有地下水問題，水浸時有發生。

#### 修復方法：

中西藥局舊址的活化工程包括重建後面的副樓，以容納樓梯、電梯、浴室、母乳餵哺室及儲藏室等現代設施。新舊建築之間的連接需要仔細規劃，考慮如何配合新用途、建材的相容性及工藝上的連繫。修復策略之一是透過加固牆基鞏固主樓的整體結構，防止裂縫增加，並在地基缺失部分加入花崗岩細石。此外，透過添加矽酸鹽防潮層，消除因牆基不穩、地下水及共用牆阻隔而造成嚴重的鹽害問題。具體方法是依靠重力，將溶液注射到牆基底部，防止毛細管作用進一步發生，然後以紙漿除鹽法清除牆基內部的鹽害（圖8）。用混合磚灰的石灰砂漿將已損壞的青磚修復，或直接以現場回收的青磚替代。考古遺址以透氣夯土側牆保護，用自動水泵將多餘地下水排走。原本屋頂接縫中易裂的水泥填縫材料則以彈性較好的稻草灰漿來代替，可以容納因地基的輕微移動而產生的變化。

為適應澳門的亞熱帶氣候，並確保與石牆相容，牆面上的灰塑和壁畫都使用高透氣度的傳統禾稈熟石灰砂漿、石灰紙漿及石灰洗進行修復。為保持足夠通風，原有的庭院和採光井保持開放，自然光能通過修復後的蠔殼窗玻璃透進室內。採用這種建築安排和被動式設計，不僅使人與環境和諧共處，在當前的全球氣候危機下更是一種負責任的營造方法。

#### 挑戰

文物保育屬所有專業中最講求跨學科知識的應用，而且具高度地方特性，需要不同背景的專業人士齊心協力，才能取得全面成果。來自工程、建築、歷史、計算機科學、管理、物理、化學、材料科學等傳統學科的專家和其他相關專業人員多年來攜手合作，作出了重要貢獻。然而，文物保育在許多國家仍然未被承認為一門獨立學科，對培養新一代文物保育專業人員造成障礙。保育行業近年面臨嚴重的傳承問題，人員缺乏本土知識和技能。由於傳統的師徒制消失，很多依靠工匠代代相傳的專業技能正逐漸失傳。

面對氣候變化帶來災難性的威脅，世界頂尖氣候專家和專業人士正呼籲各行業致力減少碳排放和溫室氣體。文物保護組織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和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ICOMOS）最近聯同國際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致力探討文化遺產和氣候科學之間的聯繫，目的是推進能適應氣候變化和達致碳減排的文物與文化行動。這些組織幾乎一致認為人們必須重新利用本土知識和傳統建材及技術，以應對氣候危機。因此澳門的保育教育工作者和研究人員正馬不停蹄開展傳統工藝和技能培訓課程，以連繫資深師傅與年輕一代之間的經驗傳承。我們相信，將傳統建築知識重新引入相關學科，可促進本地文化遺產可持續發展，並緩解世界性的氣候危機。



圖7 中西藥局舊址的正立面  
註：陳顯耀拍攝



圖8 通過針對性滴定系統注入防潮層  
註：作者拍攝



## 第二部分

建築遺產反映該地區的歷史、技藝及文化演變。建築遺產的保育包括物質與非物質遺產，是後世必須承擔的責任，因此我們必須將跨學科的理論和實踐，納入文物建築保育及相關研究領域的教育體系。保育是一門建基於記憶、身份認同、生活方式及人與地方之間關係的跨領域的科學，<sup>10</sup>為此，文物保育不僅僅是一個技術範疇，或者僅是保育一些瀕危的建築物；它需要長遠的技術傳承，包括建立一系列的策略、方法及對相關專業人員的教育。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們將總結目前國際有關文物建築教育的策略和要求，檢視和評估澳門現行採用的手段。

### 世界各地的文物保育教育

20世紀初以來，UNESCO、ICOMOS及歐洲理事會（CoE）已發表達30多份關於文化遺產保育和管理的建議，<sup>11</sup>其中許多都關注如何教育年輕一代。歐洲理事會在歐洲建築遺產大會發佈的《阿姆斯特丹宣言》（1975年），一再強調優質培訓及知識經驗和技術交流的重要性。該宣言進一步倡議提高年輕人對遺產保育的興趣及推進公眾教育。此外，大會還指出「建築遺產只有在公眾層面，特別是年輕一代懂得欣賞的情況下才能生存。因此，我們需要向所有年齡層推廣這個主題的教育。」<sup>12</sup>

1993年，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通過《保育古蹟、遺址教育及訓練指引》，為教育和培訓內容提供綱要。該文檔指出「有需要發展出一套全面的遺產保育方法，這方法需要以文化多樣性為基礎，並獲得專業人士、工匠及行政人員的支持。保育講求觀察、分析及整合能力。保育人員要具備文化意識，採取靈活而務實的方法。此意識應滲透所有實際的工作、教育及培訓，具備良好的判斷能力和恰當地了解社區需求。」<sup>13</sup>

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阿姆斯特丹召開「聯繫地方與普世價值」會議，得出如下結論：「世界文化遺產必須對當地有高重要性，同時獲得國際認可。如該遺產未能承載對當地人的價值，那麼其普世價值亦無從談起。」<sup>14</sup>此後，保育教育工作者認識到需要在當地、國家及國際層面上開展培訓，通過跨學科的方法培養下一代優秀的保育專業人員，使他們具有敏銳的解難判斷能力、批判性思維及良好溝通技巧，許多國家都在實踐這種教育方案。

### 澳門的文物保育教育

澳門一直是東西方文化交流平台，能融合地區知識和國際專業知識，培訓未來的保育專業人員。這座城市大部分建築遺產都展現中國傳統工藝與葡萄牙殖民時期工藝的結合，需要特定的地方技能與技術才能令它們保持原好。保育人員及其他相關人員，包括建築師、工程師、承判商、專家及其他從業員等，都應掌握傳統知識和技能，以便更好地了解整個保育流程，妥善保護這些寶貴的文化遺產。另一方面，與公眾分享地方知識與技能亦相當重要，這除了有助推動文物保育、協助民眾保育自己的文化遺產，亦可栽培未來的保育專業人員。個別由政府部門和高等教育機構制訂的保育計劃，已有顯著成



圖9a 文化特攻計劃：在玫瑰堂進行的修復灰塑工程  
註：作者拍攝。



圖9b 文化特攻計劃：第15屆威尼斯雙年展建築展覽中展出的夯土建築  
註：作者拍攝。



圖10a 學士後課程的保育培訓：中國青磚牆工作坊  
註：陳顯耀拍攝



圖10b 學士後課程的保育培訓：夯土工作坊  
註：陳顯耀拍攝



圖11a 文物建築修復職業培訓課程  
註：鄭嘉欣拍攝



圖11b 嶺南屋頂鋪瓦技巧工作坊  
註：曹凱雲拍攝

果和持續成效。近來許多教育機構、地方政府及社區團體均舉辦類似的培訓計劃，確保傳統知識能夠傳承，從而建立跨世代的聯繫和深化文化認同感，最終達致可持續發展。

## 文化特攻計劃的開展

「文化特攻」培訓計劃的對象是澳門社會和學業上的弱勢青年。該計劃由文化局牽頭，由文化局、社會工作局及法務司三個政府部門開展。從2013至2017年，共有約30位學員（全部來自基督教青年戒毒所——澳門青年挑戰中心）參加。該計劃旨在幫助有偏差行為的青少年尋找生活目標，向他們傳授基礎技能，同時讓他們承擔社會責任。導師為來自不同的專業領域且擔當公職的志願者，包括文物建築修復、考古、紙張修復、攝影、舞台製作、燈光設計等，為受訓者提供在職指導。計劃採用傳統的學徒制度，由較具經驗的學員教導新人掌握初級技能。在計劃展開期間，學員參與了絕大部分由文化局開展的修復和活化項目（圖9a和9b），並掌握了傳統建材知識與技能，許多畢業生至今仍任相關範疇工作。計劃開始前，只有不到5%青年成功改過自新，現在這個百分比卻是100%，更有三分之一學員其後完成文物建築保育相關課程，這些都證明計劃取得莫大成功。計劃的成功亦協助家庭與子女重建和諧關係，販毒與毒品相關罪案有所減少。不過由於政府政策轉變，該專案於2017年宣告終止，令人感到十分遺憾。

## 高等教育中的保育課程——學士後及建築學碩士課程

傳統學科教育的框架往往限制學生獲得核心學科以外的知識，現代的教學方法則鼓勵教師與學生開拓跨學科和跨領域的交流學習。澳門科技大學建築系最近開設的學士後課程，特別在建築學碩士課程為學生提供兩個專業學習範疇：1. 濱水都市建築與設計；2. 建築遺產保護。建築遺產保護專業範疇的學生除了需學習保育原則和理論等，還需進行傳統建築技術實踐，包括建造夯土和中國青磚牆（圖10a和10b）。實踐不僅使學生掌握建築保育的知識和技能，還讓他們體驗實際的保育過程。這種經驗能促進保育人員與工人或工匠之間的溝通，也有利於監督或管理建築保育項目。

## 專業人員的在職培訓——本地建築工匠、承判商及教育工作者

政府部門、大學、專業團體及社區團體全年均有開辦保育研討會、工作坊、短期課程及體驗營。每年舉辦的恆常課程旨在介紹和加強相關人士的傳統建築技能，主要對象包括當地居民、工匠及建築承判商。文化局、勞工事務局及澳門工程師學會則共同舉辦「文物建築修復職業培訓課程」與「技術培訓工作坊系列——嶺南屋頂鋪瓦技巧」等培訓課程（圖11a和11b），被錄取學員必須從事建築修復、建造業及教育行業，這些培訓將有助他們的專業發展。此外，還有有關傳統材料、建築技術、修復方法及古代工藝等方面的專題研討會，旨在為有興趣的工匠和居民提供深度培訓。這類培訓計劃受到保育承判商和工匠們的歡迎和支持，帶動更多建築工人主動參與相關培訓。

## 基礎項目——學生、家庭及公眾人士

澳門政府每年都會在《文化遺產保護法》推廣嘉年華中舉行一系列活動，包括參觀、遊戲及實踐工作坊等，旨在提高公眾意識，特別是青少年對不同文物保育範疇的興趣與認識（圖12）。暑假和寒假期間，澳門的教育及青年發展局、科學館及其他青年協會亦舉辦類似活動，讓年輕人了解本地傳統產業，包括漁業、建築業、煙花製造、造船業及海產加工業等。這些活動令澳門居民的文物保育意識逐年增加，取得正面的成果。活動展示有關澳門歷史和文化遺產方面的知識，亦增加學生從事文物相關職業的興趣。

## 保育展覽——公眾人士

中西藥局舊址的保育工程完成後（見第一部分案例2），部分防潮層注射裝置被保留下來，在原址展示，向公眾揭示「神秘」的修復方法（圖13）。該展示以創新視覺化的呈現方式，並輔以文字說明，協助公眾了解修復原理，如濕氣和鹽害問題，以及通過針對性滴定系統注入防潮層的過程。該展示模式成功引起了公眾對保育的興趣。

## 結論

文化遺產的保育與修復需要不同學科的專業人員參與和合作。年輕一代對傳統技能和地方知識缺乏興趣，導致他們採用一些錯誤的保育方法，其破壞性在當前的氣候變化危機尤為明顯。國際領袖、氣候專家及教育專業工作者已攜手合作，重新引入傳統的建築知識和實行地方為本的方法，期望提高年輕人對保育的熱忱和興趣，同時運用前人智慧應對氣候變化。目前澳門和世界許多其他國家在這方面已經取得初步成功，但仍需強化資源投入及公私營部門合作，建立更有效的培訓體系。以國際組織為首的保育力量將全力以赴，建設可持續發展的美好將來。



圖12 參加2021年《文化遺產保護法》推廣嘉年華的家庭註：澳門文化遺產網（2021年11月1日）。「文化局舉辦《文化遺產保護法》推廣嘉年華，週六日在瘋堂舉行」。https://www.culturalheritage.mo/cn/detail/2982



圖13 防潮層的注入——中西藥局舊址註：鄭嘉欣拍攝

## 參考文獻

### 英文

- Cody, J., & Fong, K. (2007), “Built Heritage Conservation Education”, *Built Environment*, 33(3), pp. 265-274.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Kecia-Fong/publication/250139515\\_Built\\_Heritage\\_Conservation\\_Education/links/5cb4dcb04585156cd79adcde/Built-Heritage-Conservation-Education.pdf](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Kecia-Fong/publication/250139515_Built_Heritage_Conservation_Education/links/5cb4dcb04585156cd79adcde/Built-Heritage-Conservation-Education.pdf).
- De Merode, E., Smeets, R., Westrik, C. (Eds.) (2003), *Linking Universal and Local Values: Managing a Sustainable Future for World Heritage: A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the Netherlands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UNESCO,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Netherlands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and Science*.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re.
- Fong, S.K., Wu, C.S., Wang, A.Y., He, X.J., Wang, T., Leong, K.C., Lai, U.M. & Leong, B.Q. (2010), “Analysis of Surface Air Temperature Change in Macao During the Period 1901-2007”, *Advances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1(2), pp. 84-90. <https://doi.org/10.3724/SP.J.1248.2010.00084>.
- Ginzarly, M., Houbart, C., & Teller, J. (2019), “The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approach to urban management: a systematic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5(10), 999-1019. <https://doi.org/10.1080/13527258.2018.1552615>.
- Macao Government Tourism Office (24 November 2021), “The Patane Library”, <https://www.macaotourism.gov.mo/en/sightseeing/other-attractions/the-patane-library>.
- Macao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9 December 2016), “Patane Library was inaugurated”, <https://www.icm.gov.mo/en/news/detail/14477>.
- Jokilehto, J. (2007),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to Conservation Education”, *Built Environment*, 33(3), pp. 275-286. <http://www.jstor.org/stable/23289556>.
- Juarez, R. I. C. & Finnegan, S. (2021),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cement production in Europe: A holistic review of existing EPDs”, *Cleaner Environmental Systems*, 3, 100053. <https://doi.org/10.1016/j.cesys.2021.100053>.
- U.N. Environment Programme’s Global Alliance for Buildings and Construction (2021), *Towards a Zero-Emissions, Efficient and Resilient Buildings and Construction Sector*. [https://globalabc.org/sites/default/files/2021-10/GABC\\_Buildings-GSR-2021\\_BOOK.pdf](https://globalabc.org/sites/default/files/2021-10/GABC_Buildings-GSR-2021_BOOK.pdf).

### 中文

- 葉健雄：〈傳統材料在澳門文物修復中的應用〉，《文化雜誌》第95期，頁129-140。 <http://www.icm.gov.mo/rc/viewer/10095/2439>。
- 澳門特別行政區地球物理暨氣象局 (20 February 2020)「澳門氣候簡介」，<https://www.smg.gov.mo/zh/subpage/124/page/28>。
- 澳門特別行政區地圖繪製暨地籍局(22 April 2022)「澳門地理位置/堂區分佈」，[https://www.dsc.gov.mo/zh-hant/geographical\\_location.html#scroll](https://www.dsc.gov.mo/zh-hant/geographical_location.html#scroll)。
-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22)「被評定的不動產(建築文物)：MM042中西藥局舊址」，<https://www.culturalheritage.mo/cn/detail/2369>。

- 1 澳門特別行政區地球物理暨氣象局 (2020年2月20日)「澳門氣候簡介」，<https://www.smg.gov.mo/zh/subpage/124/page/28>。
- 2 澳門特別行政區地圖繪製暨地籍局 (2022年4月22日)「澳門地理位置/堂區分佈」，[https://www.dsc.gov.mo/zh-hant/geographical\\_location.html#scroll](https://www.dsc.gov.mo/zh-hant/geographical_location.html#scroll)。
- 3 Fong, S. K., Wu, C. S., Wang, A. Y., He, X. J., Wang, T., Leong, K. C., Lai, U. M. & Leong, B. Q. (2010), “Analysis of Surface Air Temperature Change in Macao During the Period 1901-2007”, *Advances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1(2), pp. 84-90. <https://doi.org/10.3724/SP.J.1248.2010.00084>.
- 4 U.N. Environment Programme’s Global Alliance for Buildings and Construction (2021), *Towards a Zero-Emissions, Efficient and Resilient Buildings and Construction Sector*, [https://globalabc.org/sites/default/files/2021-10/GABC\\_Buildings-GSR-2021\\_BOOK.pdf](https://globalabc.org/sites/default/files/2021-10/GABC_Buildings-GSR-2021_BOOK.pdf).
- 5 Juarez, R. I. C. & Finnegan, S. (2021),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cement production in Europe: A holistic review of existing EPDs”, *Cleaner Environmental Systems*, 3, 100053. <https://doi.org/10.1016/j.cesys.2021.100053>.
- 6 Macao Government Tourism Office (24 November 2021), “The Patane Library”. <https://www.macaotourism.gov.mo/en/sightseeing/other-attractions/the-patane-library>.
- 7 Macau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9 December 2016), “Patane Library was inaugurated”. <https://www.icm.gov.mo/en/news/detail/14477>.
- 8 葉健雄：〈傳統材料在澳門文物修復中的應用〉，《文化雜誌》第95期，2015年，頁129-140。 <http://www.icm.gov.mo/rc/viewer/10095/2439>。
- 9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2022)「被評定為不動產(建築文物)：MM042-中西藥局舊址」，<https://www.culturalheritage.mo/cn/detail/2369>。
- 10 Cody, J., & Fong, K. (2007), “Built Heritage Conservation Education”, *Built Environment*, 33(3), pp. 265-274.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Kecia-Fong/publication/250139515\\_Built\\_Heritage\\_Conservation\\_Education/links/5cb4dcb04585156cd79adcde/Built-Heritage-Conservation-Education.pdf](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Kecia-Fong/publication/250139515_Built_Heritage_Conservation_Education/links/5cb4dcb04585156cd79adcde/Built-Heritage-Conservation-Education.pdf).
- 11 Ginzarly, M., Houbart, C., & Teller, J. (2019), “The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approach to urban management: a systematic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5(10), pp. 999-1019. <https://doi.org/10.1080/13527258.2018.1552615>.
- 12 Jokilehto, J. (2007),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to Conservation Education”, *Built Environment*, 33(3), pp. 275-286. <http://www.jstor.org/stable/23289556>.
- 13 Jokilehto, J. (2007),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to Conservation Education”, *Built Environment*, 33(3), pp. 275-286. <http://www.jstor.org/stable/23289556>.
- 14 De Merode, E., Smeets, R., Westrik, C. (Eds.) (2003), *Linking Universal and Local Values: Managing a Sustainable Future for World Heritage: A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the Netherlands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UNESCO,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Netherlands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and Science*.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re.

# 應用創新科技對香港 高地歷史景觀進行特徵研究 和測年及保護

英國紐卡素大學  
麥考德景觀中心

我對考古的興趣，主要涉及古時人類如何應對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和周遭自然環境的互動，從而衍生不同層次的社會意義，建立我們今天見到的歷史遺蹟和景觀。



Dr Mick ATHA 范旻濤 博士

我的研究範疇聚焦農村、城市及海洋的歷史景觀（包括其規劃和管理）和中世紀考古學，最近從事的合作項目涵蓋比利時、巴西、英國、中國、法國、希臘、愛爾蘭、意大利、阿曼、西班牙和土耳其。

我在紐卡素大學的景觀學中心，領導一個由約30名博士和博士後研究員組成的團隊。我們的專長包括地理信息系統、遙感探測、地質考古學、地質年代學，以及為歷史建築進行數碼化調查。



Prof Sam TURNER

在東亞與東南亞，傳統的聚落和土地利用方式曾創造出極具特色的歷史景觀。如今，由於社會經濟及人口結構的變化，這些景觀正面臨著日益增加的發展壓力，並且越來越備受忽視。在香港，由於區域遺產管理主要集中在開發較密集的低地遺址、古蹟及建築物，加上景觀考古學和基於地理資訊系統（GIS）研究的應用非常有限，因此考古學家幾乎沒有研究重要的高地文化遺產，人們對其瞭解相對較少，但這些遺產可能已處於瀕危之中。然而，高解析度空中遙感探測資料的出現，已開始揭示香港高地過去人類活動的真實範圍與特點，當中通過這種方式，可識別也許是最耐人尋味，而一般認為與從前茶業相關位處高山兩側殘存的梯田遺蹟。

由歐盟委員會資助的研究專案「CaDHoKUHl」（香港高地歷史景觀特徵和測年），旨在利用基於GIS的創新跨學科方法，結合景觀考古學、地球科學、歷史研究、遙感探測、科學測年及數字地理空間分析，闡明高地（>300米）前殖民地時期聚落和土地利用的特徵，以彌補研究和知識方面的空白，同時還提供一種建模和解釋景觀隨時間變化的方法。該項目還將作為一項試點，研究一種適用於廣泛的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的歷史景觀方法。

我們首先會將專案研究置於其區域歷史、考古及保護管理的背景中；接著會介紹用於地物測繪和空間分析的GIS方法，以及歷史景觀特徵（HLC）技術，並使用OSL-PD（光釋光分析和測年）來建立高地土地利用的年代框架；最後，會概述兩項應用該專案結果的比較研究，其一是與香港土力工程師的合作研究，其二是對高地梯田的區域性研究。之後則為本文的結束語。



圖1 香港研究區域<sup>1</sup>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 前言



大部份人而言，香港這名字容易讓人聯想到典型東西方交融、高樓大廈林立的商業大都會。但維港南北兩岸、主要城市化的香港島與九龍地區，僅占全港1106平方公里面積中14%。有大片土地統稱為新界於1898年納入殖民地，範圍由九龍以北至接壤中國大陸深圳河以南，當中包括200多個大小島嶼，其中最大的為大嶼山。在殖民地發展同時以及之前的多個世紀，新界低地的水稻種植社群，塑造了與城市截然不同的景觀，並以可持續的方式管理 (Atha 2012, 129-130)。

香港的自然地理複雜多變，有避風深港、眾多島嶼、狹窄沿海平原、豐沃溪流，不過優質能灌溉的土地有限，加上陡峭的山區腹地，為一片被淹沒的景觀 (Fyfe 等人2000, 29)。這種基本結構強烈影響聚落和土地利用的模式。兩個最大的島嶼是香港島和大嶼山島，平坦農地有限，且以中央山脈為主，最高峰分別為太平山 (552米) 和鳳凰山 (934米)。與其他沿海地區相同，群山環繞的維港地區土地，已被集中開發為住宅和商業及基礎設施，充份展現出臨海城市現代化特徵 (參見Empson 1992地圖)。新界西部和北部，以前是水稻種植中心地帶，其周邊是圍繞著香港最高峰的大帽山 (957米) 的高地。

配合過去半個世紀城市不斷發展，考古調查已建立頗詳細的6,500年以來香港沿海地域人類活動序列 (Atha和Yip 2016, 5)。在內陸山谷與平原地區，宋、明、清時期建立的水稻農耕聚落仍存在，周圍環繞著昔日的稻田，這些村落和田間系統，都已用現代大比例地圖記錄。相比之下，在郊野公園內受保護山野高地，通常被視為「自然」、而非「文化」景觀，幾乎沒有因現代發展需要而進行影響評估，故此考古學家對其情況仍然知之甚少<sup>2</sup>。

本研究採用地理資訊系統 (GIS) 創新跨學科方法，結合景觀考古學、地球科學、歷史研究、遙感、科學測年及數字地理空間分析，以彌補香港歷史景觀的知識空白。研究旨在闡明高地 (>300米) 聚落與土地利用的特徵，同時驗證和增強現有的低地歷史景觀地圖，並提供一種建模及解釋景觀隨時間變化的方法。由此先導研究產生的全港歷史景觀特徵 (HLC) 和研究方法，將推展至東亞和東南亞地區歷史景觀的研究。

論文下一部分將討論，香港市區以外的低地和高地歷史景觀形成的基礎，然後闡述研究方法，重點強調HLC的整體重要性和OSL-PD的關鍵貢獻。

## 香港鄉村景觀史

我們研究香港過去的農村土地利用、聚落及經濟，資料來源廣泛，包括舊照片 (見圖2)、殖民時代官方檔案、中國和英國歷史地圖 (Empson 1992)、族譜、地契 (Hase 2013)、1688年和1819年清代地方志 (Ng 1983)，以及清代以前有關本地區的零星資料。亦有大量社會史學家和人類學家於上世紀五十至八十年代，通過參與觀察及採訪村民長者

的方式，記錄新界前水稻中心地帶的傳統生活方式，一些村民曾親身經歷晚清時期農村生活 (例如: Johnson 2000; Hayes 2006; Hase 2013)。

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新界西部和北部水源充足的沖積平原，仍然是一片廣闊的稻田，其間分佈著強大的本地宗族聚落，例如錦田鄧族和河上鄉侯族，兩族祖先可追溯至宋朝 (Baker 1966, 26)。宋明兩代，朝廷將新界大片土地賜予鄧氏和侯氏的先祖顯赫人物。就景觀歷史而言，此類賞賜屬重大事件，因意味著朝廷認為該土地為未開墾荒地。賞賜既改變了土地所有權的模式，並開啟了一個景觀劇烈變化時期 (Palmer 1987, Hase 2013, 31)。大地主開始主宰新界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當大量客家農民在十七、十八世紀遷入該地區時，被迫於新界東北和東南山區高地邊緣及較小的山谷中，作為佃戶定居。幾個墟市散佈在平原與海岸周圍，農民可在那裡將剩餘農產品轉換為現金購買雜貨、建築材料及商品。古道網絡連接各主要水稻種植區和墟市，在1902年英國地圖上，古道記錄為「大約4英尺寬中國道路，大部分鋪設路面」 (ERM 2013, 8)。到十九世紀後期，Hase (2017) 所說的「土地饑荒」，導致每一片可灌溉的低山坡地均改為梯田種植水稻；由於擴展需求迫切，旱地也被開闢成梯田種植其他作物，並提供水箱來收集雨水以進行人工澆水。從風水角度出發，一些坡地會被農民用作葬地。在較高的山坡 (>300米)，林地、灌木及草地區域被用作燃料收集 (Hase 2011)，以及季節性採集野生茶葉和藥材地區 (Hase 等人 1984)。

新界鄉村歷史景觀仍然反映長達數百年水稻種植的影響，儘管愈來愈多土地被後農業時代的再生林地和灌木叢、城市擴展、露天集裝箱存放及輕工業場所掩蓋，這些設施往往建在用碎石或泥土填埋的舊田上。此外，現代大比例的地形圖，仍準確地描繪低地農業景觀的殘存部份：包括古老村屋及曬穀場、祠堂、書室、廟宇、土地廟、風水林地 (儘管可能無正式標註)、池塘 (有些屬風水用途，其他則是為養魚或養鴨)、谷地稻田和水利設施、低山坡梯田及山坡墳墓。大部分殘存<sup>3</sup>田間系統的準確測繪 (見Rippon 2004, 29-33) 可追溯到1898年租借新界，當時英國實施所謂《集體官契》(BCL) 調查 (1899至1904年)，記錄用於評估地稅的每棟房屋、附屬建築物及田地 (Hayes



圖2 Hedda Morrison新界稻田照片  
© 哈佛燕京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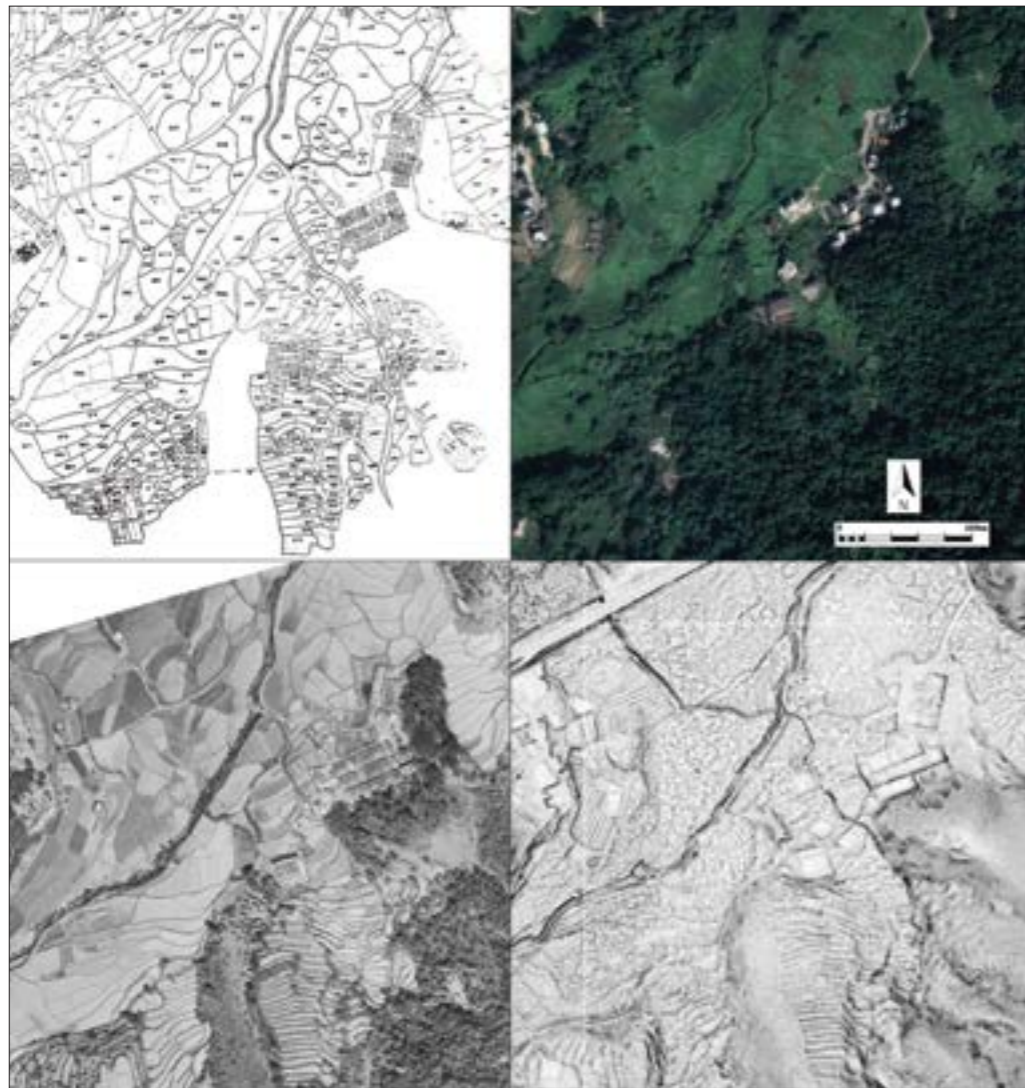


圖3 CBL測量圖下禾坑蒙太奇；1963年DOP；2020年LiDAR視覺化；2022年Google衛星圖像

2006, 32-33)。下禾坑BCL測量圖樣本如圖3所示，連同現代衛星圖像、1963年航拍照片及LiDAR數位地形模型。

香港政府長期致力全面準確地測繪低地的自然與人工地貌，記錄高山地區 (>300米) 的人工地形卻相對較少，因為香港可開發的土地價值很高，特別是新界低地，其土地業權的出售、徵收，以及轉換為其他用途均會一一被詳細記錄。另一方面，高地幾乎全屬政府土地，近代以來，幾乎無私人土地或開發的歷史。地圖上記錄的一類高地常見人工地形是廣闊的引水渠、管道及水壩網路，隨著殖民地的發展和擴張，該供水網絡先延伸至九龍，然後再擴展到新界（水務署，未註明日期）。另外，1902年測繪的中國道路，部份仍可與現代地圖上的高地步道相關聯（ERM 2013）。此外，馬鞍山鐵礦等舊礦區也有部份繪製地圖，進一步的工業遺產研究，會加深我們對這些景觀的瞭解（Yeung和Ng 2020）。最近，由於市民對二戰遺址的興趣日益濃厚，促使政府廣泛地正式確認這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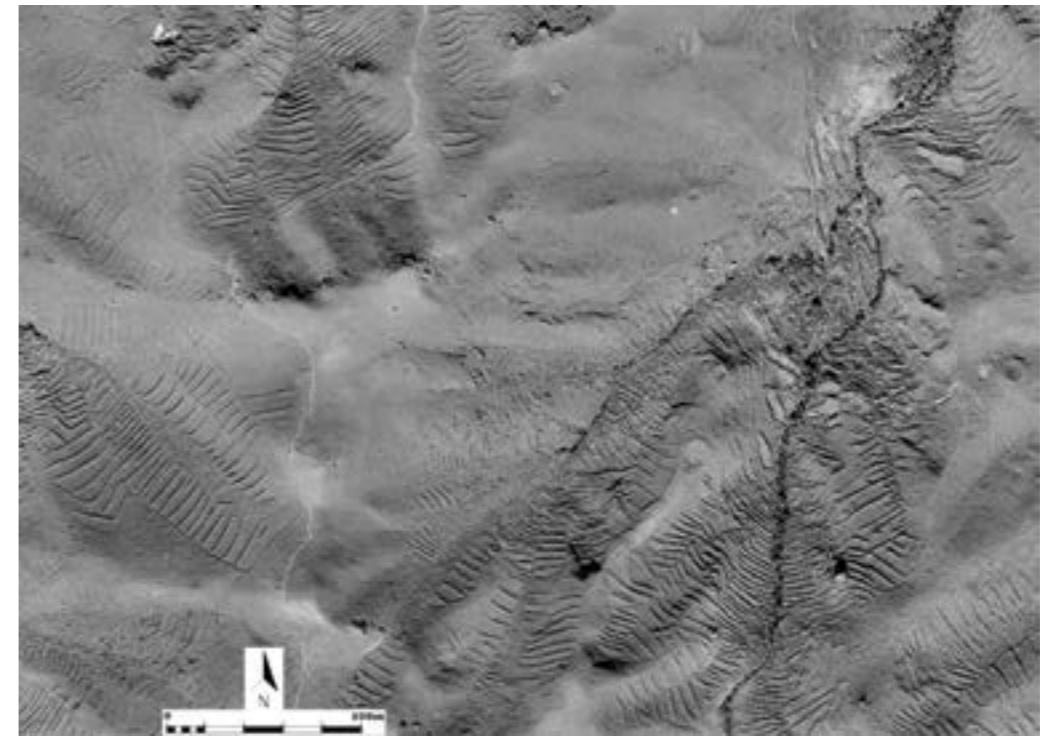


圖4 1963年大帽山耕作梯田DOP

遺址，其中一些現已被繪製在地圖上（儘管是未經確認遺蹟），但還有許多遺址仍未有記錄。然而，本研究的中心焦點是從未出現在地圖上的高地梯田，是考古學家從未研究過的一種人工地景，在香港最高峰的大帽山北坡草原上卻可看到（圖4）。

在地圖上被遺漏的原因，可能是它們的建造、使用、廢棄都發生在殖民時代之前，因而未被詳細測繪。梯田通常認為是與曾經繁榮的茶業有關，清代1688年版《新安縣志》中便提到大帽山的茶葉種植（Hase等人 1984, 271），而1819年版《新安縣志》也提到大帽山、青山及鳳凰山的茶葉種植。此外，政府在1906年《植物及林業局報告》指村民在城門、大老山、水牛山等新界高地有種植茶葉，「灌木在狹窄的、新近從肥沃的坡地上砍伐樹木開闢出來的臺階或梯田上成排生長，或是沿著分隔菜地的田埂生長，兩種情況只見於較高山地」（香港政府 1907, 221）。在Hase等人對新界茶葉種植的研究發現，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村民仍偶爾會進行野生茶葉採摘，但他們「聲稱他們祖先…對[殘存的高地梯田]無甚興趣，今天也無人會聲稱擁有這些梯田的」（1984, 271）。

上述1907年的報告，似乎記錄在香港可能曾有過刀耕火種，屬非常古老的做法。據宋元時期（約西元1200至1400年）文獻記載，本區除了有農耕的漢民族之外，還存在被稱為瑤族或越族的土著居民，他們從事製鹽、捕魚、狩獵及刀耕火種，並常與政府發生衝突（Hase 2017, 103-105）。有香港歷史學家認為，高地梯田可能與這些原住民有關，他們可能因漢族農民到來而被逼退入山區（SHKH 2011, 23）。但這假設與高地茶業問題一樣，有待考古學驗證。

## 項目研究方法

迄今為止，嘗試全面地瞭解香港全境過去聚落和土地利用的演變和特徵，受到三個主要因素限制：第一，過時的文化遺產法例（HKSARG<sup>4</sup> 1976；Sun 2011），只優先考慮個別遺址、建築物及古蹟，而非整體環境或景觀（Du Cros等人 2007，41）；第二，考古和研究工作，由發展而非研究目標所主導；第三，很少採用跨學科方法去研究人類的過去，這卻是景觀考古研究的重點。因此遺產管理當局的歷史遺蹟清單，地理上存在偏差且不完整，對總體歷史景觀瞭解有限，對高地過去土地利用更缺乏瞭解。不過，有學者已嘗試對香港過去的人類活動和歷史景觀採取更多跨學科及整體的研究方法（Atha 2012；Atha和Yip 2016 & 2018；Atha，未註明日期）。現在的研究專案，是對較早前工作的繼承與擴展，其重點是高地的土地利用，這是與香港土力工程界成員的跨學科合作討論的成果。

約十年前，一組地質學家和土力工程師使用1963年的高解析度數位正射影像（DOP）進行山坡風險評估<sup>5</sup>時，注意到山坡高處有殘存的梯田和其他人工遺蹟，例如在大帽山的北側，大嶼山的鳳凰山周圍、昂坪高原及大東山上（Wong等人 2006；Sas等人 2012，圖7c；風格和規律 2012，圖6；Ho和Roberts 2016）<sup>6</sup>。在大帽山等地的高地梯田位於草原上，可見於現代衛星圖像（如Google地圖），附近山徑上的行山人士亦能看到，但許多其他山坡上的人工遺蹟，往往被茂密植被所掩蓋。應用機載鐳射掃描<sup>7</sup>（LiDAR）可為考古學家提供巨大價值的補充資料，因該技術可穿透樹木和叢林，揭示人工改造的地表。把遙感數據與GIS結合，將提供非常寶貴的資料，給考古學家系統記錄、分析香港歷史景觀的特徵。

項目工作分為兩個主要階段。基於對歷史背景的充分瞭解，ArcGIS將部署最先進的遙感工具（數位正射影像、LiDAR及衛星圖像），對高地（海拔>300米）所有歷史景觀地物進行詳細考古調查和記錄，同時覆檢和擴充先前低地測繪地物的記錄。新測繪的高地資料及覆檢的低地歷史地物資料，會成為香港首個全港性歷史景觀特徵（HLC）的基礎。基於由GIS確定的四個梯田的OSL-PD現場採樣，通過與地質年代學分析相整合，可進一步增強歷史景觀特徵（HLC），以闡明高地長期的景觀變化。

下面三個部份中，我們將會進一步闡釋歷史景觀特徵，如何用來繪製歷史特徵，以及其在景觀變化可持續管理中的作用；然後會概述如何利用OSL-PD去建立高地土地利用的年代框架；最後會介紹在項目後期進行的兩項比較研究。

## 歷史景觀特徵（HLC）

儘管此前未曾在東亞或東南亞使用過，但HLC已成功用於繪製英國、西班牙及地中海的景觀特徵（Bolòs 2010；Turner和Crow 2010；Štular 2013；Turner等人 2018），還支援了景觀的可持續保護和管理（Herring 1998；Turner 2006）。目前，香港的考古遺址、古蹟及建築物清單資料，都存儲在資料庫中，並與GIS相連，這系統以點、線、

面形式，呈現過去人類活動的遺蹟，及其相關資訊，但每個遺址因此和相鄰地物以及將它們包括在內的周邊歷史景觀脫節（Turner和Crow 2010，219）。相比之下，HLC使用一種定性形式化的方法繪製整個歷史景觀的時間發展與空間複雜性。採用GIS有助於對HLC應用使用龐大且多樣化的資料進行空間比較，如數位地圖、航拍照片、機載鐳射掃描及衛星圖像。從本質上講，HLC方法是全面，因它考慮特定研究區域內具歷史意義的所有事物，不僅於傳統遺產清單中列出「特殊」地物，還包括更常見的地點元素，如田地、梯田、林地及村舍。故此，與傳統的考古遺址點分佈圖不同，例如顯示香港具考古研究價值地點的地圖（AMO，未註明日期），歷史特徵地圖中互聯多邊形之間無間隙，這些多邊形包含反映特定人類活動與發展歷史的地物。香港下禾坑的基本HLC地圖，如圖5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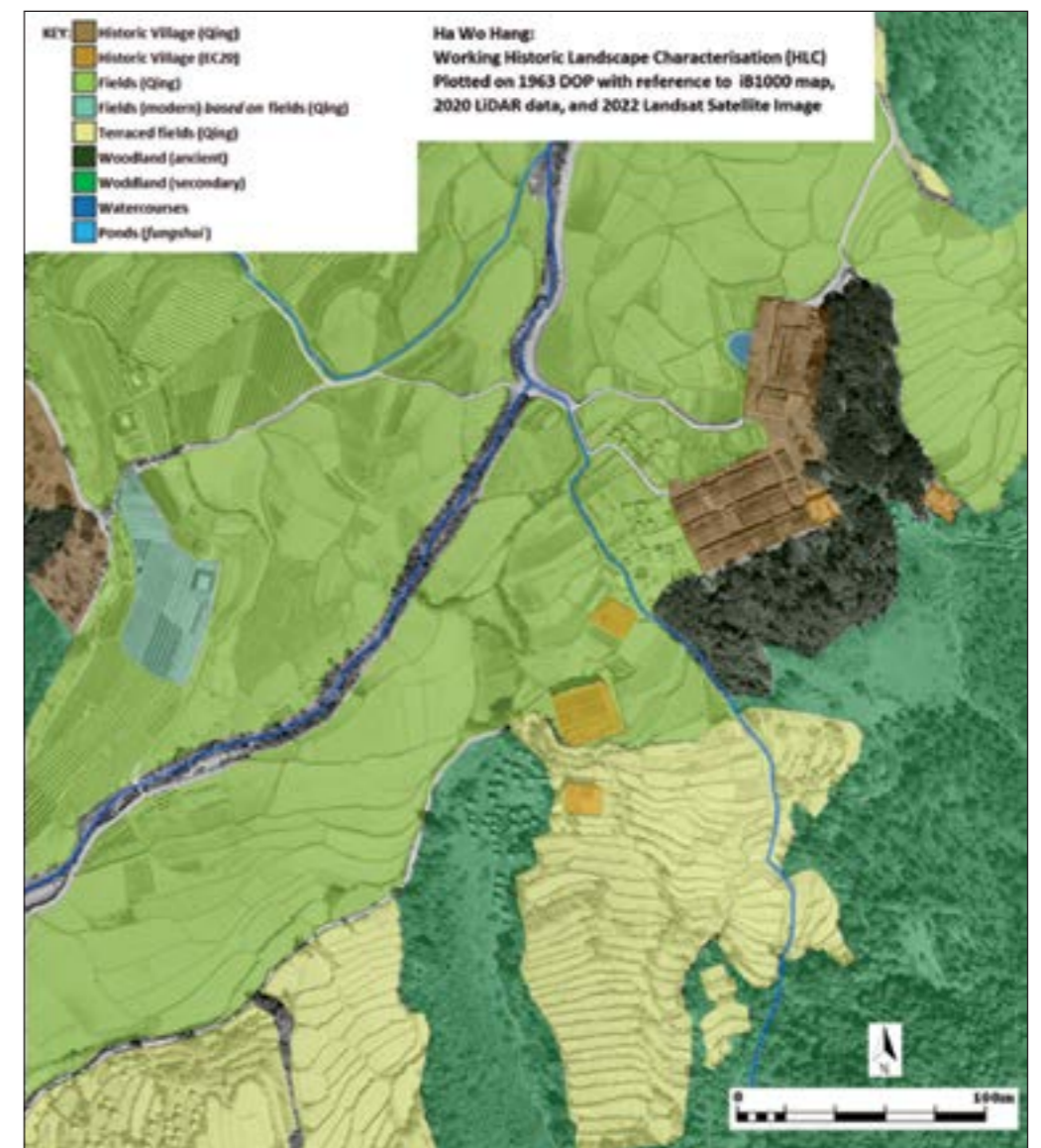


圖5 下禾坑HLC地圖



據一位研究先驅的說法，HLC對自然地貌進行詳細檢視，識別「在整個…[研究區域]…反復出現的特定模式與組成部份，可看作是由相似的歷史活動所產生」(Herring1998，11)。因此，可利用一組固定和預設的HLC特徵類型(同上)，去繪製和描述歷史景觀。表1列出一份草擬的香港歷史特徵類型的清單，這清單將隨著研究的進展而不斷更新。

表1：香港HLC類型

<b>低地田地</b>	<b>粗糙地面<sup>8</sup></b>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田地(現代)，基於田地(清<sup>**</sup>)</li> <li>田地(清)</li> <li>同軸田地(現代)，基於田地(清)</li> <li>同軸田地(清)</li> <li>梯田(現代)，基於田地(清)</li> <li>梯田(清)</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粗糙地面(自然地形)</li> <li>具有梯狀階地的粗糙地面(直)</li> <li>具有梯狀階地的粗糙地面(等高線)</li> <li>具有曲線或環狀地形的粗糙地面</li> </ul>
<b>水體</b>	<b>林地</b>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池塘(Q/CP)</li> <li>水庫及相關設施(殖民時代)</li> <li>沿海基圍(清至殖民時代)</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古代(風水)</li> <li>次生林地</li> <li>種植園</li> </ul>
<b>聚落</b>	<b>工業</b>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歷史村落/墟市(20世紀初/清/明/宋)</li> <li>寮屋聚落(現代)</li> <li>市區(19世紀/20世紀初/20世紀後期至21世紀初)</li> <li>市區填海(19世紀/20世紀初/20世紀後期至21世紀初)</li> <li>宗教團體</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礦山(20世紀初/20世紀後期)</li> <li>採石場(清/20至21世紀)</li> <li>鹽田(清/20世紀Q/C20)</li> <li>鄉村工業(20世紀後期)-集約化牲畜飼養/露天集裝箱存放/輕工業</li> <li>香港牛奶牧場(19至20世紀)</li> <li>垃圾堆填區(20至21世紀)</li> </ul>
<b>軍事</b>	<b>娛樂</b>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兵營</li> <li>機場</li> <li>防禦裝置(20世紀初)</li> <li>民防(20世紀初)</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公園</li> <li>植物園</li> <li>運動場</li> <li>露營地</li> </ul>

<sup>\*\*</sup>註：諸如「田地」等特徵類型所用的時期很廣泛，當新界成為香港一部份時，英國人在1899年至1904年之間進行了第一次準確地測繪田地，所有農民擁有和使用的田地，在丈量圖上都被標記為「清」。但根據社群的歷史，有些田地可能在宋明時期就已經開墾，尤其是在早期村落周邊的田地。在與GIS連接的專案資料庫中，對特徵類型的每一塊田地的年代問題，均會有詳細說明。

與之前的HLC研究一樣，目前這研究會在GIS中對製圖資料和遙感資料進行空間比較，以識別有鮮明特點的「歷史景觀特徵類型」；又會引用LiDAR和OSL-PD這兩種尖端科學的資料，以增強辨認1963年DOP中所記錄的地貌，同時也辨認其他地形，尤其是植被茂盛的地區，並可首次實現對高地梯田的準確測年。在按類型(例如：低山坡梯田)分組進行GIS測繪的同時，個別類型的單元(或稱HLC「單元」)的屬性也會記錄於相關的資料庫內，令資料使用者可輕鬆地瞭解景觀歷史的發展(Turner和Crow 2010，220)。

然而，要把一套由英國開發的歷史景觀特徵研究方法應用到中國，顯然需要對中國文化和歷史，及其自然環境哲學和價值體系有專業知識(Zhao等人 2020)。幸運的是，本文其中一位作者曾在香港生活達14年，他在研究、教授、撰寫有關考古和景觀的同時，也積極地解決跨文化的問題，以確保HLC方法能適當地、有意義地應用於香港的研究之中。在進行高地景觀徵研究時，我們還需要瞭解其歷史發展，這正是OSL-PD能提供解決方案。

## 光釋光分析和測年(OSL-PD)

眾所周知，梯田的歷史是很難確定的，而考古學家對其演變知之甚少。在本專案中，當在GIS和HLC程式中確定了合適的梯田後，將會通過「地面實況調查」選擇精確的採樣位置，通常會選擇已塌陷或侵蝕的梯田沿線，這樣的考古採樣對環境之影響會減至最小。接下來會在每個採樣點挖掘一條貫穿梯田的狹窄探溝(通常約0.75米寬)，以確保在清理最深的面石、填料或鬆散沉積物後，能獲得一個乾淨的剖面。然後會應用由蘇格蘭格拉斯哥大學SUERC<sup>9</sup>開發的OSL-PD創新技術(Sanderson和Murphy 2010)，利用可攜式光釋光(OSL)設備進行現場採樣，「現場實時將光釋光採樣層位，直接與考古地層聯繫起來」(Kinnaird等人 2017)<sup>10</sup>。根據初步的田野「OSL分析」結果(圖6)，便可在地層序列中定出幾個時間點作為假設，以反映例如梯田的建造、使用、修復的年代等。然後，會對這些時間點進行採樣，在實驗室中通過OSL篩選、研究、測年，對其年代假設進行測試(Turner等人 2021，圖2)。故此，使用OSL-PD可重建梯田的整個形成過程，從而可瞭解高地土地利用隨著時間的變化。若果將OSL-PD與土壤微形態學和植物微化石研究(同上，787)互相結合，則可能會有更深入的發現。

為進一步探討這專案對跨學科和跨地域研究的影響，專案的主要測繪、HLC及OSL-PD結果，會用於下述兩項比較研究之中。



圖6 OSL-PD在西班牙格拉納達現場應用

## 香港跨學科與跨區域研究

為進一步強調以景觀為重點的考古研究的益處，本項目將涉及兩項比較研究：第一項是跨區域研究，第二項是在香港進行跨學科研究。

在第一項研究中，本專案的考古發現會與中國和東南亞高地梯田的兩項研究進行比較。菲律賓伊富高水稻梯田的研究工作，包括考古發掘、地面及空中調查、OSL/C14測年、空間分析等產生的各種資料，已能夠挑戰現有的論述，並對梯田和水稻農業的起始年代，提出一個較晚的日期，並與西班牙殖民統治有關 (Acabado等人 2019)。中國四川的九寨溝在民族志學研究的支持下，進行了考古調查、挖掘及OSL/C14測年，發現當地曾進行刀耕火種農業，其後為畜牧業，因而創造了當地獨特的「小型階地」特徵，最後，廢棄的耕地出現局部侵蝕和滑坡 (Henck等人 2010)。與這兩項研究的比較，將使我們的研究結果更能弄清背景問題的脈絡，並識別研究的潛力。

第二項比較研究，涉及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土力工程處 (GEO) 合作，該處慷慨分享其斜坡風險資料庫及事件記錄<sup>11</sup>，以進行與殘存高地梯田的GIS比較和空間分析。這項工作將有助評估香港長期廢棄的高地梯田，與過去、現在及未來的滑坡風險之間的潛在關係，而考古學提供的時間深度，也可以讓我們檢視，香港山區景觀在利用和可持續管理方面的機遇和風險，是如何隨時間而變化。

## 討論與結論

在東亞和東南亞，水稻和其他作物的梯田農業系統，仍然主導著傳統聚落和土地利用的模式 (UNESCO 1995)，對高地景觀地貌和歷史特徵影響深遠。然而，高地梯田需持續監測和維護，面對社會經濟與環境變化，梯田的可持續性一直是當地人與區域/全球遺產組織關注的問題 (Gullino等人 2015)。此外，梯田對於在動態的熱帶環境中，長期的土壤保護及地貌穩定性至關重要，廢棄的梯田可能會加速土壤侵蝕，但如果灌木/林地能再生，侵蝕的情況便會減少 (Xiong等人 2019)，香港的情況便似乎一直如此。

在過去的兩千年裡，雖然梯田農業系統對本區域十分重要，但考古學家對高地聚落和土地利用的歷史仍知之甚少。這主要是由於兩個因素：其一是研究側重於史前時代、都市主義、主要建築物、古蹟及高地位喪葬行為；其二是學術界持續存在離散的學科「孤島」，這阻礙景觀考古學所必需的跨學科發展 (Zhang 2010, 16; Storozum等人 2019)。CaDHoKUHL專案旨在通過採用全港性GIS的跨學科景觀評估來打破這些障礙，這將首次對香港歷史景觀的特徵和演變產生一個連貫與全面的認識。

面對不斷增加的發展壓力和氣候變化的影響，香港歷史環境的管理者，與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的同儕一樣，需用新的方法來更好瞭解景觀遺產，以確保有效和可持續的管理。本研究項目將可大力擴充考古知識，並提供一個強大的新工具，供香港與更廣泛地區的考古學家、文化遺產管理者、景觀規劃師、土力工程師等使用，以能夠持續並整體地管理自然和文化景觀的變化。

## 致謝

「香港高地歷史景觀特徵和測年」專案已根據101023818號的Marie Skłodowska-Curie撥款協議，獲歐盟「地平線2020」研究和創新計劃資助。感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古物古蹟辦事處職員邀請我們為2022年大灣區文物建築高峰論壇撰寫本文。

- 1:200,000 香港地圖
- 過去研究偏向可從208個香港具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SAI) (AMO nd.)之分佈上反映出來，當中大部分遺址位於低地，尤其是沿海地區，但只有三個遺址位於新界高地，包括兩條石砌古徑及一處刻有「棋盤」之石刻，年代均不詳。
- 不要與「遺蹟」混淆，「遺蹟」用於指明任何古代遺蹟或遺物；在歷史景觀使用中，「遺蹟」指是倖存下來的古代遺蹟不再使用，但仍有助於經常定義一個地區歷史景觀特徵。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 有效斜坡風險 (山體滑坡) 管理在人口稠密、多山、易受季節性暴雨及颱風影響的地區 (如香港) 至關重要。
- 2012年發表的兩份報告提醒 Mick Atha 這些高地地區的考古潛力，並促成了這個項目。日本佔領期間，山坡上樹木被砍伐用作燃料，戰後仍繼續用於收集燃料。1963年，他們還未有重新植被。
- 香港政府土木工程發展署 (CEDD) 岩土工程處 (GEO) 負責LiDAR測量和資料管理，他們提供本研究所使用資料。
- 「粗糙地面」是 HLC 研究中應用於未經改良山丘的常用術語，但香港岩土工程文獻中通常稱之為「自然地形」。我們會指出許多標籤為「自然」的情況，實際上是「文化」景觀，有明確的人類改造的證據，因此，「自然」可能有誤導性，並可能延續現有的錯誤觀念，即高地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沒有受到任何人類的影響。
- 蘇格蘭大學環境研究中心
- 為確保沉積物累積發光信號，在樣品收集過程中，不會因暴露在光線下而「漂白」，溝槽覆蓋有黑色防光片，並使用紅光收集樣品。
- 增強自然地形滑坡清單 (ENTLI)、大型巨石位置及滑坡事件記錄。

## 參考書目

- Acabado, S.B., Koller, J.M., Liu, C-h., Lauer, A.J., Farahan, A., Barretto-Tesoro, G., Reyes, M.C., Martin, J.A. and Peterson, J.A. (2019). The short history of the Ifugao Rice Terraces: A local response to the Spanish conquest.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 44(3): 195-214.
- Atha, M. (nd.) ANTH3770/5770 *Making Places: Landscapes, Culture and Society* (BA/MA course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Atha, M. (2012). A Neglected Heritage: Towards a Fuller Appreciation of the Landscapes and Lifeways of Hong Kong's Rice Farming Past. *Asian Anthropology* 11(1), 129-156.
- Atha, M. and Yip, K. (2016; 2018\*). *Piecing Together Sha Po: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and Landscape Reconstruct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Chinese version.
- Atha, M., Howard, P., Thompson, I. and Waterton, E. (2019). Introduction, in Howard, P., Thompson, I., Waterton, W. and Atha, M.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andscape Studies*. 2nd Edition. Routledge.
- Baker, H.D.R. (1966). The Five Great Clans of the New Territori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JRASHKB)* 6 (1966): 26.
- Bolòs, J. (2010). PaHisCat: A project to discover the landscape of the past and manage the countries of the future. *Territori i Societat* 5, 371-407. Štular, B. (2013). Historična karakterizacija krajine. *Varstvo Spomenikov* 46, 116-144.
- Du Cros, H., Lee, Y.S.F., Sauvignain-McClelland, A., Chow, E., and Lung, D. (2007). The Pearl River Delta: One Region, three systems. In Du Cros, H. and Lee, Y.S.F. (eds.)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in China: Preserving the Cities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pp.40-45). Routledge.
- Empson, H. (1992). *Mapping Hong Kong: A historical atla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ervices (HK).
- ERM (2013). *Study on old trails in Hong Kong – final desk-top study*. Unpublished research report.
- Fyfe, J.A., Shaw, R., Campbell, S.D.G., Lai K.W., & Kirk P.A. (2000). *The Quaternary Geology of Hong Kong*.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 Gullino, P., Beccaro, G.L. and Larcher, F. (2015). Assessing and monitor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rural World Heritage sites. *Sustainability* 2015: 7, (14186-14210; doi:10.3390/su71014186).
- Hase, P.H., Hayes, J.W. and Iu, K.C. (1984). Traditional Tea Growing in the New Territories. *JRASHKB*, 24 (1984): 264-281.
- Hase, P.H. (2011). Rules on the protection of village trees in the New Territories and associated matters. *JRASHKB*, 51 (2011): 31-56.
- Hase, P.H. (2013). *Custom, Land and Livelihood in Rural South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Hase, P.H. (2017a). Land hunger and emigration from the New Territories area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In XXXX (Ed.), *Studies in Hong Kong history and society* (pp. 130-153).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Studies of Hong Kong's History and Society.
- Hase, P.H. (2017b). Some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Lamma Island. In Siu, K.K. and Yao, T.O. (eds) *Hong Kong Past and Present, 2nd Ed.* (pp. 98-184). Chu Hai College.
- Hayes, J. (2006). *The Great Difference: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and Its People 1898-2004*.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Henck, A., Taylor, J., Lu, H., Li, Y., Yang, Q., Grub, B., Breslow, S.J., Robbins, A., Elliot, A, Hinckley, T., Combs, J., Urgenson, L., Widder, S., Hu, X., Ma, Z., Yuan, Y., Jian, D., Liao, X. and Tang, Y. (2010). Anthropogenic hillslope terraces and swidden agriculture in Jiuzhaigou National Park, northern Sichuan, China. *Quaternary Research* 73: 201-207.
- Herring, P. (1998). *Cornwall's Historic Landscape. Presenting a method of historic landscape character assessment*. Truro.
- Ho, H.Y. and Roberts, K.J. (2016). *Guidelines for natural terrain hazard studies. GEO Report No. 138* (2nd Ed.). GEO.
- Hong Kong Government (1907). Report on the Botanical and Forestry Department 1906, in *Sessional Papers*.
- HKSARG (1976). *Cap. 53 Antiquities and Monuments Ordinanc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 Johnson, E. (2000). *Recording a rich heritage: Research on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Government,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 Kinnaird, T., Bolòs, J., Turner, A., & Turner, S. (2017). Optically stimulated luminescence profiling and dating of historic agricultural terraces in Catalonia (Spain).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78: 66-77.
- Ng, P.Y.L. (1983). *New Peace County: A Chinese gazetteer of the Hong Kong reg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Palmer, M.J.E. (1987). The surface-subsoil form of divided ownership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ome examples from the New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 *Modern Asian Studies* 21(1): 1-119.
- Rippon, S. (2004). *Historic landscape analysis: deciphering the countryside*. CBA Practical Handbook 16.
- Sanderson, D.C.W. and Murphy, S. (2010). Using simple portable OSL measurements and laboratory characterisation to help understand complex and heterogeneous sediment sequences for luminescence dating. *Quaternary Geochronology* 5(2-3): 299-305. (<https://doi.org/10.1016/j.quageo.2009.02.001>).
- Sas, R.J., Yu, J.P., Pau, C.Y.Y. and Styles, K.A. (2012). Detection of old agricultural terraces in steep, vegetated terrain using airborne LIDAR: Case studies from Hong Kong. *Proceedings of the 33rd Asian Conference on Remote Sensing*.
- Society of Hong Kong History (SHKH) (2011). *Exploring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Society of Hong Kong History.
- Storozum, M., Zhang, J., Wang, H., Ren, X., Qin, Z. and Li, L. (2019). Geoarchaeology in China: Historical trends & future prospect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19) 27: 91-129.
- Štular, B. (2013). Historična karakterizacija krajine. *Varstvo Spomenikov* 46, 116-144.
- Styles, K.A. and Law, M.H. (2012). Some observations about man-made features on natural terrain in Hong Ko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ngineering Geology and Hydrogeology*, 45: 131-138.
- Sun, K.T.W. (2011). The unclaimed baggage: Who owns Hong Kong's archaeological heritage? *Huaxia Kaogu* (Cathaysian Archaeology) 1: 139-145.
- Turner, S. (2006). Historic Landscape Characterisation. *Landscape Research* 31 (4), 385-98
- Turner, S., and Crow, J. (2010). Unlocking historic landscapes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Antiquity* 84 (323): 216-29.

- Turner, S., Bolòs, J., and Kinnaird, T. (2018). Changes and continuities in a Mediterranean landscape: a new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historic character in western Catalonia. *Landscape Research* 43(7), 922-938
- Turner, S., Kinnaird, T., Varinlioglu, G., Serifoglu, T.E., Koparal, E., Demirciler, V., Athanasoulis, D., Ødegård, K., Crow, J., Jackson, M., Bolòs, J., Sánchez-Pardo, J.C., Carrer, F., Sanderson, D. and Turner, A. (2021). Agricultural terraces in the Mediterranean: medieval intensification revealed by OSL profiling and dating. *Antiquity* 95(381): 773-790.
- UNESCO (1995). *Asian rice culture and its terraced landscapes*. Report on the Regional Thematic Study Meeting, Manila (Philippines)
- Wong, H.N., Ko, F.W.Y. and Hui T.H.H. (2006). *Assessment of landslide risk of natural hillsides in Hong Kong, GEO Report No.191*.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Office (GEO),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AR (HKSARG).
- Xiong, M., Sun, R. and Chen, L. (2019). A global comparison of soil erosion associated with land use and climate type. *Geoderma* 343: 31-39.
- Zhang, H. (2010). Landscape Archaeology: Theory, Method & Application. *Cultural Relics in Southern China* 4: 8-17.
- Zhao, Y., Harvey, D.C., and Gao, C. (2020). Identifying Shan-Shui characteristics for national landscape heritage: Reconciling western and Chinese landscape characterisation from a trans-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86: 300-313.

## 網上資料

- Antiquities and Monuments Office (AMO) (nd.). *List of Sites of Archaeological Interest in Hong Kong*. [https://www.amo.gov.hk/filemanager/amo/common/form/list\\_archaeolog\\_site\\_eng.pdf](https://www.amo.gov.hk/filemanager/amo/common/form/list_archaeolog_site_eng.pdf) (Accessed 08/08/22).
- GHKSAR (nd.) 1:200,000 map, downloaded from Data.Gov.HK (<https://data.gov.hk/en-data/dataset/hk-landsd-openmap-b200k-topographic-map-of-hong-kong>) .
- The Industrial History of Hong Kong Group (nd.) *Ma On Shan Iron Mine 1906-1976 – biggest mine in HK -further information*. (<https://industrialhistoryhk.org/shan-iron-2/>) (Accessed 27/03/22)
- WSD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Nd.) *Milestones and waterworks monuments*. (<https://www.wsd.gov.hk/en/about-us/our-milestone/index.html>) (Accessed 29/03/22) .
- Yueng, T.C. and Ng, M.K. (2020) *Conservation of the Ma On Shan Iron Mine: Information pack for public engagement*. Institute of Future Cities, CUHK: (<https://en.maonshanironmine.net/>) .

# 都 爹利街石階及 煤氣路燈修復工程



江 詠雯

2016年加入古物古蹟辦事處，負責協助審批及監管法定古蹟的活化及修繕工程；曾參與的重要項目包括中區警署建築群(大館)活化項目、前法國外方傳道會修繕工程及都爹利街石階及煤氣路燈修復工程。

# 摘要

2018年9月超強颱風「山竹」襲港時，吹倒一棵生長於法定古蹟都爹利街石階及煤氣路燈旁邊的石牆樹，塌樹嚴重壓毀這座百年古蹟。修繕團隊堅持以原工藝及原材料為原則，輔以先進的三維掃描、打印和鑄鐵技術，成功令古蹟回復舊貌。

本文介紹百年古蹟在天災後的嚴重損毀情況、修繕團隊如何制定保育方案、修復工程中遇到的挑戰、團隊如何運用原工藝及先進技術修復古蹟，以及怎樣透過不同渠道將成功的修復經驗與不同持份者分享。

## 簡介



位於香港中環的都爹利街石階及煤氣路燈(下稱「古蹟」)是一條歷史悠久並設有路燈照明的街道，具有極高的文物價值，於1979年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香港法例第53章)刊憲成為法定古蹟，受法定保護。

2018年9月16日，超強颱風「山竹」襲港時，一棵生長在古蹟旁邊石牆的大樹倒塌，嚴重壓毀古蹟(圖1)。古物古蹟辦事處(下稱「古蹟辦」)、路政署及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下稱「煤氣公司」)在意外發生後，立即成立修復團隊，務求修復香港這項珍貴的文化遺產。因它屬法定古蹟，項目團隊力求依循國際文物保育原則及標準修復古蹟，並採用傳統工藝，盡力重用收集到的古蹟碎件。在修復過程中，項目團隊還採用三維掃描和打印技術，對有效及準確地修復古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項修復工程是首次結合先進三維掃描技術及打印技術，結合使用傳統工藝和物料，修復嚴重損毀的古蹟的成功例子。經過一年多的努力，修復工程於2019年12月23日完成並回復舊貌。

本文概述古蹟的損毀情況、如何制定保育方案、項目團隊面對的挑戰和解決方法。筆者進一步闡述項目團隊如何在修復過程中遵循文物保育原則，並突出三維掃描和打印技術在修復工程的貢獻。最後本文亦簡介項目團隊為傳承修復知識而與公眾和專業人士分享修復經驗的工作。

## 都爹利街石階及煤氣燈的文物價值

雖然古蹟佔地只有約80平方米，但卻有極高的文物價值。它原本只是一條有路燈照明的通道，但卻將本地石雕工藝與先進西方煤氣路燈技術完美融合。



圖1 2018年9月超強颱風「山竹」襲港時，都爹利街石階及煤氣路燈被嚴重壓毀。



圖2 修復後的都爹利街石階及煤氣路燈。

根據政府部門歷史文件記載，由都爹利街至雪廠街花崗石階和欄杆是由工務局於1882年委託一個命名為「TSANG KING」的承建商修建。建造工程於1883年8月27日完成，工程費用為港幣1,750元。(圖3和圖4)

古蹟的石階設計別樹一幟，是香港少數保存完好主要由花崗石建造的歷史街道構築物。兩組欄杆共有12支具裝飾元素的望柱，以及花崗石扶手，扶手之間裝有101支水泥欄杆柱。石階兩端的望柱共安裝了四盞煤氣路燈。

這四盞歷史悠久的煤氣路燈，屬於「雙燈泡羅車士打」型號，由英國威廉·塞有限公司（下稱「威廉·塞」）在英國製造。這四盞煤氣路燈相信約於二十世紀初安裝。根據煤氣公司的記錄，煤氣路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倖存，並於1948年2月29日重新點燃。與其他裝置在地面的煤氣路燈不同，這四盞煤氣路燈燈柱的長度比一般煤氣路燈燈柱短，是為安裝在石階上度身訂造。

從前，「點燈人」負責在日落前及在黎明時用竹梯爬高按下煤氣路燈的開關來點亮及關閉街燈(圖5)。後來，煤氣路燈加設發條裝置的時間控制器，能夠自動開關路燈。

時移勢易，電力逐漸取代煤氣成為家居和街道照明的主要能源。自1967年起，都爹利街的四盞歷史煤氣路燈成為香港僅存仍然運作的煤氣路燈，照亮都爹利街石階一個世紀。

古蹟是香港人重要的集體回憶。它是熱門的電影拍攝場地，多部香港電影和不計其數的電視劇都在該古蹟取景拍攝，包括1994年由張國榮主演的《金枝玉葉》、1999年由周星馳、張柏芝主演的《喜劇之王》，以及梅艷芳歌曲《夢伴》與張國榮歌曲《有誰共鳴》的音樂錄像。由於多次成為取景地點，古蹟在本地人心中具有無可取替的地位，亦為海外遊客所熟悉。該處已漸漸成為港人和遊客心目中最具代表性的香港地標之一。另外，古蹟已被古蹟辦納入中西區文物徑。至今它仍是行人從中環通往半山的便捷通道。

隨著《古物及古蹟條例》於1976年生效後，都爹利街石階及煤氣路燈因其具極高文物價值，於1979年被列為法定古蹟，是中環最早受法例保護的歷史構築物。

## 2018年古蹟損壞情況

在2018年9月16日超強颱風山竹吹襲香港期間，破紀錄的強風吹倒一棵生長在古蹟旁石牆的大樹，塌樹倒落在古蹟上，造成嚴重破壞。翌日，即使因塌樹阻路令交通極度混亂，古蹟辦的職員在8號颱風信號除下後兩小時內迅速趕到現場，並對受損古蹟進行初步檢查。看到眼前一切，我們都感到驚訝悲痛。

古蹟破壞非常嚴重，石階一側花崗石扶手和水泥欄杆柱幾乎完全被毀。水泥欄杆柱斷成多塊碎片。四盞煤氣路燈中，有三盞倒下，煤氣燈燈頭嚴重損毀變形。更糟糕的是其中一盞路燈的鑄鐵燈柱斷成六段(圖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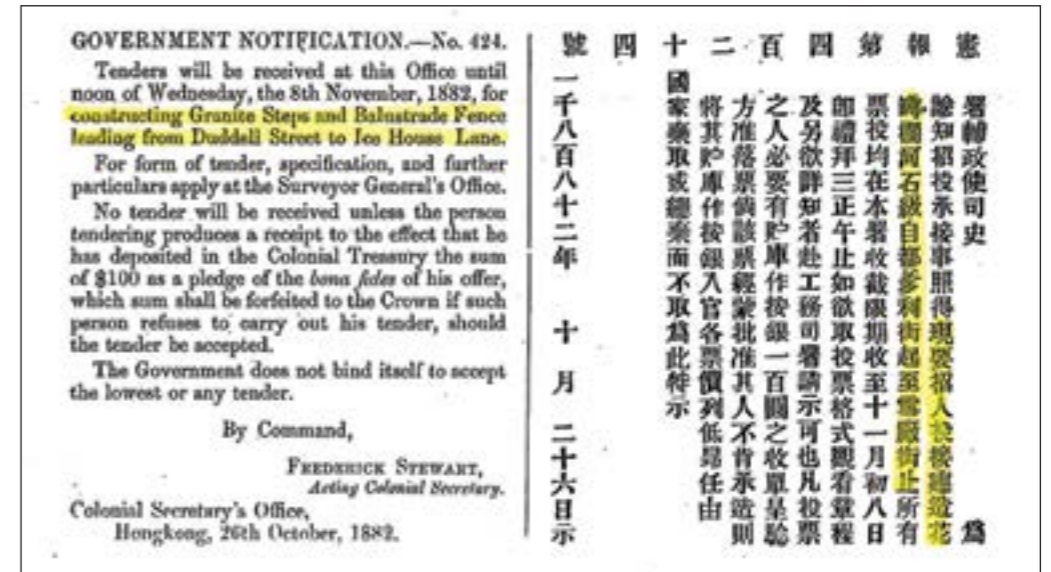


圖3 1882年10月26日政府憲報第424號，邀請投標者興建從都爹利街至雪廠街的花崗石台階及欄杆。(《香港政府憲報》)

Date of Contract.	Description of Work.	Name of the Engineer for the Contract.	Amount of Tender.	Name of the Contractor.	Contract Amount.	Contract Date of Completion.	Remarks.
1st November.	Repairing the first level of Queen's Road, between Wan Street and Holywood Road.	Ho Yee, ... Ching Lai-ai, ... Yung Pak, ...	\$ 300.00 300.00 300.00	Tung Pak, ...	\$ 300.00	14th November, 1882.	
1st November.	Repairing the temporary Wash Pan Hospital.	C. Lee, ... Sun King, ... Yan Ping, ...	100.00 100.00 100.00	C. Lee, ...	100.00	14th November, 1882.	
1st November.	Repairing, etc., the Government Civil Hospital.	C. Lee, ... Sun King, ... Yan Ping, ...	200.00 200.00 200.00	Sun King, ...	200.00	11th December, 1882.	
1st November.	Repairing the Western end of Flax Street between Queen Street and Western Street.	Ho Yee, ... Ching Lai-ai, ... Lin Yee, ...	1,000.00 1,000.00 900.00	Ching Lai-ai, ...	900.00	11th December, 1882.	
22nd November.	Constructing school, and adjoining, etc., 120 feet level of Road in the North end of the village of Shek-o Wan.	Ho Yee, ...	---	Ho Yee, ...	200.00	1st January, 1883.	C.S.O. retaining the names of the Engineer attached to the Colonial Secretary's Office.
22nd November.	Building retaining Walls, and adjoining the lower end of the Road to the Civil and Lock Hospital.	Ho Yee, ... Lin Yee, ... Ching Lai-ai, ... Tung Pak, ...	5,000.00 5,000.00 5,500.00 1,750.00	Tung Pak, ...	1,750.00	24th February, 1883.	
22nd November.	Constructing sewer pipes, and intercepting drains, leading from District Street to the Green Lane.	Ho Yee, ...	---	Yung King, ...	1,000.00	21st August, 1883.	
22nd November.	Constructing a new Lodge to Civil and Lock Hospital.	Sun King, ... C. Lee, ... Tung Pak, ... Yung King, ... C. Lee, ... Wang Yee-ling, ...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C. Lee, ...	1,000.00	6th February, 1883.	
22nd November.	For transport of Machinery to Wang-mat Chung and Tai-foo.	---	---	A-sheng, ...	600.00 675.00	22nd December, 1882.	

圖4 《1882年公共工程合約列表詳情》記錄承建商名稱，以及由都爹利街通往雪廠街石階和欄杆建造費用。

在事件發生後，由古蹟辦、路政署及煤氣公司組成的項目團隊立即抵達現場，收集和記錄散落在現場的古蹟碎件(圖7)，仔細記錄每塊碎件，並收集起來，以使用於日後修復。團隊總共尋回、整理和登記了280件碎件。在這280件碎件中，204件來自水泥欄杆柱，42件來自花崗石欄杆，34件來自煤氣路燈。這些碎件暫時存放在路政署及煤氣公司的倉庫內妥善保存，以便作詳細檢查與日後的修復(圖8)。

在清理現場後，為儘快重開道路供行人使用，路政署立即檢查石階結構是否穩固。石階結構確認良好後，路政署在受損欄杆處架設臨時防護圍欄，石階於2018年10月23日局部重開。



圖5 用以支撐點燈人以竹梯進行點燈及關燈的構件(見紅色圓圈部份)仍然保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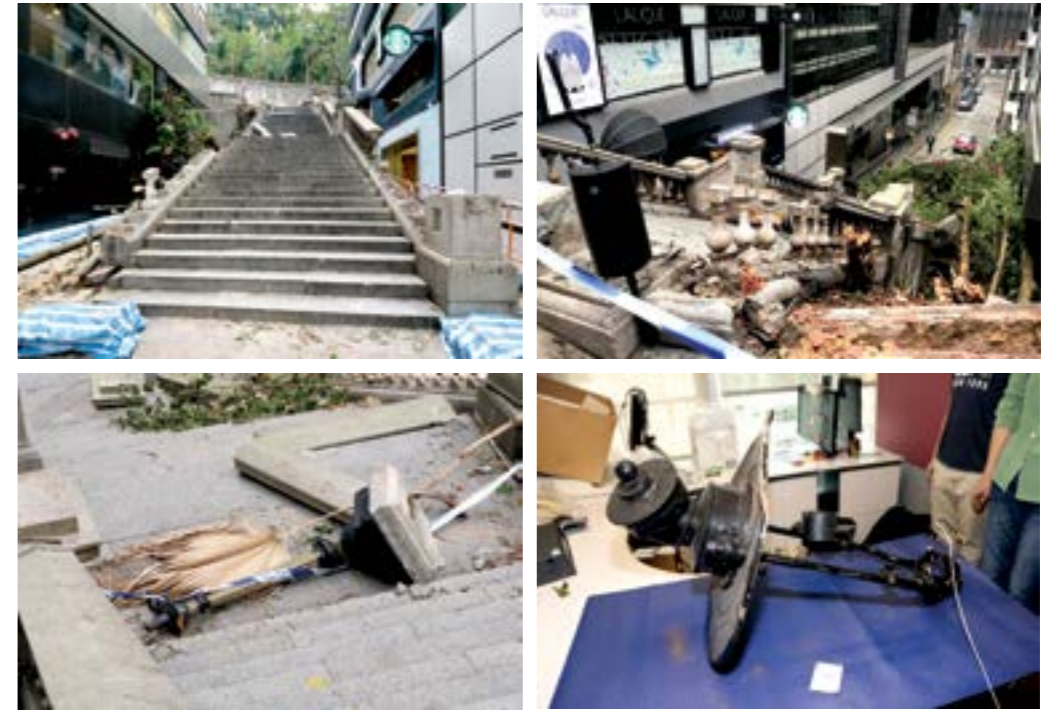


圖6 古蹟被倒塌的大樹嚴重壓毀，煤氣燈頭變形，鑄鐵燈柱斷成多段。



圖7 事故發生後，古蹟辦、路政署及煤氣公司立即在現場尋回及記錄古蹟碎件。



圖8 尋回的碎件臨時存放在路政署和煤氣公司的倉庫內。



## 古蹟修復工作

修復工程最終目標是盡可能將古蹟修復至颱風損毀前的狀態。項目團隊為修復工程制定以下指導原則：

1. 確保古蹟如實修復，修復工程遵照國際文物保育標準進行；
2. 將傳統工藝、原材料與先進科技互相融合；
3. 為古蹟進行詳細研究，作為修復工程的依據；
4. 詳盡記錄整個修復工程；
5. 確保修復工程期間的公眾安全，以及古蹟在修復完成後的結構安全；
6. 縮短現場施工時間，務求對古蹟使用者的干擾減到最少；
7. 與公眾及各持份者分享修復經驗。

## 面對的挑戰

雖然古蹟面積不大，但項目團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首先，古蹟被塌樹嚴重壓毀，碎成280塊，一般認為古蹟無法修復。

其次，修復石階和煤氣路燈所需的技術、技能、工藝及物料截然不同。香港亦缺乏修復煤氣燈頭及鑄鐵燈柱的技術，項目團隊需要進行廣泛研究及準備工作。

第三，古蹟位於香港的繁忙市區核心位置，項目團隊在進行修復工程時面對多樣限制，大大影響修復進度。

最後，項目團隊備受關注團體及政客批評，指修復進度緩慢。甚至有人建議使用複製品來替換已損壞的古蹟部件。項目團隊所承受的壓力實在難以言喻。

縱然面對上述嚴峻的挑戰，項目團隊在進行修復工程時仍然堅持遵守文物保育的指導原則和最高的專業水平，不會因為趕工而犧牲修復的質量。

## 文物修復原則

鑑於古蹟的身份，在整個修復過程中，項目團隊一直嚴格遵從國際文物保育憲章中的保育標準，包括《1964年保護和修復古蹟遺址的國際憲章》(以下簡稱《威尼斯憲章》)、《巴拉憲章》、《中國文物古蹟保護準則》(以下簡稱《中國準則》)和《詮釋與展示文化遺產憲章》(以下簡稱《艾蘭姆憲章》)。修復工程採用的主要保育準則包括：

### a) 修復工程應採納多元意見

《巴拉憲章》第4條原則提倡採納跨學科知識進行保育<sup>1</sup>。項目團隊由約40名成員組成，包括建築師、歷史學家、文物保育師、屋宇保養測量師、土地測量師、工程師、工匠及攝影師等。他們憑藉各自經驗和專業知識，為修復工程作出互補和貢獻。

### b) 強調對修復的各方面都需作研究

根據《中國準則》第5條和《巴拉憲章》第19條，研究是各項保育工作的基礎，在進行任何修復工程之前，必須充分掌握古蹟早期物料的狀況<sup>2</sup>。因此，項目團隊特別注重研究和準備工作，翻查歷史資料、舊照片、地圖及保養記錄；同時亦為古蹟各部份，包括花崗石扶手的勾縫物料和欄杆等進行物料的成分分析，作為修復工程的參考。

### c) 採用傳統工藝和物料

根據《巴拉憲章》第4條和《中國準則》第14條，應使用傳統工藝和物料修復重要文物；在某些情況下，亦適合使用可為保育帶來莫大效益的現代技術和物料<sup>3</sup>。為回復古蹟舊貌，項目團隊嚴格遵守以上原則。例如在現場尋回所有花崗石欄杆的碎件及重用，煤氣路燈由英國原供應商以傳統技術和部件進行修復。另一方面亦採用先進的三維掃描和打印技術協助修復。

### d) 新的部件可識別於原部件，但兩者需要和諧相融

根據《威尼斯憲章》第9條和第12條，任何無可避免的新建部分必須有別於舊有部分，但同時亦必須與整體古蹟和諧融合<sup>4</sup>。本文稍後將會講述項目團隊如何依從這原則進行修復。

### e) 強調記錄與詮釋的重要性

《巴拉憲章》第32條和《艾蘭姆憲章》第5條確認記錄和詮釋的重要性<sup>5</sup>。為將修復工程的經驗傳承下去，整個修復過程以三維掃描、文獻記錄、攝影、錄像及書面等方式作記錄。這些記錄現已保存在古蹟辦的檔案庫中。此外，項目團隊在古蹟現場及其他地方作不同形式的詮釋工作，將修復工程所得的知識和經驗與相關人士分享。

## 石階和欄杆的修復

此項目的目標是將古蹟修復至被超強颱風破壞前的狀態。為實現這目標，項目團隊使用尋回的原物料，竭盡所能利用傳統工藝修復石階及欄杆。通過重用所有受損花崗石碎件，使花崗石扶手恢復到原本的狀態。

古蹟辦與路政署在石階和欄杆修復方面緊密合作，除監督和記錄整個修復過程外，亦從文物保育角度對修復計劃和過程提供專業建議。路政署聘用一位資深的文物保育顧問及一間擁有豐富修復歷史建築經驗的專門承建商開展修復工作，確保修復工藝質素，且符合最佳的保育準則。

## 應用三維掃描和打印技術

由於花崗石碎件數量甚多且體積龐大，項目團隊決定應用三維掃描和打印技術協助進行修復工作。古蹟辦於2016年成立三維掃描小組，目的是利用最新技術對法定古蹟進行精確測量和記錄，以建立香港歷史建築的三維測量資料庫。

都爹利街石階及煤氣路燈在2018年初被選為其中一個最先進行三維掃描的古蹟，我們因而取得該古蹟的整體測量數據，對日後古蹟的監測、保養、修復及教育工作大有幫助。

三維掃描小組使用兩種掃描儀，即地面激光掃描儀和手提式三維激光掃描儀對古蹟進行掃描。地面激光掃描儀是一種中程相位偏移掃描器，向物體發射雷射光束並接收其反射，適用於記錄建築物所處環境，收集其整體測量數據。所取得的「測量點群集」資料會以「雲點」方式記錄。

手提式三維激光掃描儀能夠測量微小細節，適合記錄小型物件或建築構件。先將反射貼貼在物件或其周圍，掃描器向物件表面射出激光，並以鏡頭來尋找反射光，藉此建立物件表面的三角網格或雲點數據。

由於在2018年1至2月時曾使用這兩種掃描儀掃描石階，我們取得了古蹟損壞前的數據，項目團隊可參考這些三維測量數據，對古蹟按原樣進行修復。

意外發生後，三維掃描小組在清理現場後再次使用地面激光掃描儀掃描受損古蹟，以獲取殘存古蹟狀況的數據；亦以手提式三維激光掃描儀，記錄欄杆剩餘結構的狀況(圖9)。

所有臨時儲存在路政署倉庫裡的花崗石碎件，也以手提式三維激光掃描儀進行掃描，收集其形狀和尺寸等準確資料，特別是破損表面(圖10)。為縮短設置時間和加快掃描速度，反射貼不是貼在花崗石表面，而是貼在一塊手提式框架上，將框架直接放在花崗石碎件上掃描，完成後可將整個框架放到第二塊碎件進行掃描，無需逐粒移動反射貼。



圖9 古蹟辦的三維掃描小組使用地面激光掃描儀(左)和手提式三維激光掃描儀(右)在現場進行三維掃描。



圖10 對花崗石碎件進行掃描，以獲取其形狀和尺寸等準確資料。



圖11 損壞後台階的點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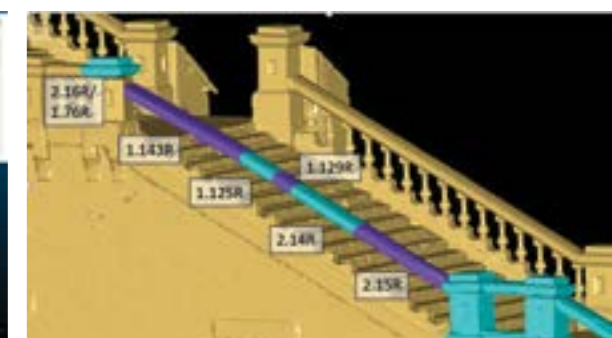


圖12 在電腦上模擬組裝破碎花崗石碎件。



圖13 運用三維打印技術製作已編號花崗石碎件的微縮模型，並在古蹟辦的辦公室重新併合。



圖14 以編號號碼的三維打印花崗石碎件完成組裝的古蹟模型。

當收集了現場和花崗石碎件的雲點和三角網格數據後，三維掃描小組再使用例如 CloudCompare、Geomagic及3DReshaper等電腦軟件，進一步處理這些數據(圖11)。

根據在電腦上構建的三維數碼模型，工作人員製作花崗石碎件的微縮三維打印複製品，並編上與其花崗石原件相同的編號(圖12)。這些微縮複製品能方便項目團隊進行桌面研究，在辦公室重構古蹟，加快在現場重組石階碎件(圖13與圖14)。工匠參照項目團隊在辦公室建造的模型，在現場排列花崗石原件的位置和次序進行組裝。故此，修復工程能夠準確有效地進行，大大減少現場施工所需的時間和費用。更重要的是在現場進行修復工程期間，行人仍可使用道路，大幅減低對古蹟使用者造成的不便。

## 欄杆柱的修復

在101支水泥欄杆柱中，有47支嚴重受損。經多番努力，項目團隊成功拼回其中34支並重新安裝在欄杆上，其餘13支因無法拼合或拼合後結構不穩固，需換上新鑄造的水泥欄杆柱。

在項目團隊成員監督下，承建商進行多次試驗，製造出無論外觀、材料、顏色、質感及工藝都與原欄杆柱相配的新水泥欄杆柱(圖15)。

為區分新鑄造和原本的水泥欄杆柱，工匠在每支新製欄杆柱的隱蔽位置印上生產年份「2019」(圖16)，使新的水泥欄杆柱與整體融合，同時仍可與原來的區分開來，以符合國際保育標準。

工匠為加強欄杆柱的結構穩定性，將不銹鋼杆裝在欄杆柱內，在欄杆底部進行加固(圖17)。

欄杆柱安裝完成後，工匠按照三維模型的順序，使用鏈式起重器和手動工具將大型的花崗石原件，仔細地重新組裝(圖18)。

為符合現今結構安全要求，工匠在新鑄造的水泥欄杆柱頂部安裝U型不銹鋼板，重新連接和加固受損的花崗石扶手(圖19)。這些U形不銹鋼板藏在隱蔽位置，避免影響古蹟外貌。這種加固方法是參考古蹟之前曾採用的加固方法。

## 煤氣路燈的修復

修復煤氣路燈比修復石階和欄杆複雜困難得多。項目團隊很快意識到香港沒有修復嚴重損毀的煤氣路燈所需要的技術和經驗。經過多番努力，項目團隊最終與煤氣路燈原供應商英國的威廉·塞取得聯繫。該公司同意派出一名專家檢查三個損壞的燈頭，並根據使用原工藝原物料的原則，討論如何修復煤氣燈頭和折斷的鑄鐵燈柱。



圖15 為確保欄杆柱在外觀、物料、顏色、質感及工藝方面與原來欄杆柱一致，項目團隊檢查和監督新水泥欄杆柱的製作。



圖16 在新鑄造的水泥欄杆柱隱蔽位置印上生產年份「2019」。



圖17 將不銹鋼杆裝在欄杆柱內進行加固。

經過詳細檢查，威廉·塞公司的英國專家Mark Jones認為三個煤氣燈頭和折斷鑄鐵燈柱可以修復(圖20)。其餘兩支倒下的鑄鐵燈柱，煤氣公司聘請專業承辦商進行非破壞性檢測，以確定燈柱是否有任何損壞(圖21)。幸好檢測結果顯示它們沒有受損。2019年9月，受損的燈頭及折斷的鑄鐵燈柱運往原供應商英國的工場進行修復。

原供應商的專家按照項目團隊的相同目標，盡最大努力使用原部件，以確保能如實修復歷史路燈。原供應商保存了與香港相同款式的「羅車士打款式」煤氣燈頭草圖和平面圖，作為修復都爹利街煤氣路燈燈頭的參考(圖22)。

古蹟辦職員曾三次前往英國，檢查並記錄修復工程進展，搜集有關煤氣路燈的歷史資料，並與專家和工程師交流意見(圖23)。古蹟辦職員更有幸能與公司創始人的玄孫Christopher Sugg見面，他向我們分享了大量有關都爹利街煤氣路燈和其他型號煤氣燈的資料。我們亦記錄了整個修復過程，確保修復知識在香港可持續傳承。通過到英國考察，項目團隊對歷史煤氣路燈的製造、維修及保養等工藝有更深入的认识。這對掌握煤氣路燈歷史發展和建造過程，及今後維修和保養香港這四盞獨特煤氣路燈來說十分難能可貴。

## 鑄鐵燈柱的修復

修補破損鑄鐵構件一般被認為是不可能的任務。然而項目團隊委託了一位在英國有豐富修復鑄鐵構件經驗的焊接專家修復折斷的鑄鐵燈柱。燈柱的碎件被小心翼翼地拼合，並以專家的「秘方」熔接程序重新連接起來(圖24)，將所有焊接位打磨，塗上一層紅氧化鐵底漆，最後塗上黑色面漆。焊接專家並發出證書，保證修復後的燈柱結構上比原來更加堅固。這次修復經歷令我們大開眼界，並為日後修復香港其他鑄鐵器物提供新方法。

修復後的煤氣燈頭和鑄鐵燈柱於2019年11月運回香港。煤氣公司為煤氣路燈進行安裝前檢測，包括氣體洩漏測試，然後將它們重新安裝到現場。2019年12月23日，四盞煤氣路燈重新燃亮，繼續照亮百年花崗石階(圖25)。

## 記錄及傳承修復知識

項目團隊瞭解到記錄和傳承文物保育知識給公眾和其他相關人士例如專業團體、文物保育業界和古蹟保育機構是十分重要的一環，因此項目團隊特別重視研究，並集合三維掃描、攝影及錄像等技術，將整個修復過程記錄下來。



圖18 工匠使用鏈式起重器和手動工具重新安裝欄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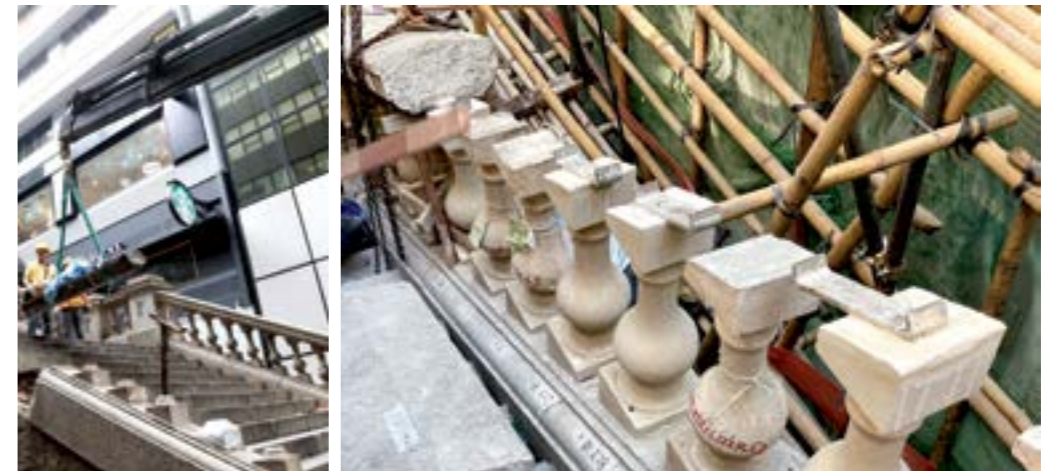


圖19 參考之前曾採用的加固方法，新鑄造的水泥欄杆柱上安裝U型不銹鋼板，重新連接和加固受損的花崗石扶手。



圖20 威廉·塞公司的專家Mark Jones抵達香港，與古蹟辦、路政署和煤氣公司代表會面，並對損壞的煤氣路燈進行詳細檢查。

團隊亦策劃了不同的詮釋及展示項目，以便將修復工程獲得的知識及經驗傳揚開去。

2020年9月香港文物探知館舉辦古蹟修復工程的展覽(圖26)，同年11月在南豐紗廠亦舉辦展覽(圖27)。展覽吸引了不少公眾關注，拓闊公眾對古蹟保育工作的瞭解，亦提高公眾對文物保育的認知。

古蹟辦製作了一條3分鐘短片介紹修復工程，並上載到古蹟辦網頁。古蹟說明牌和在古蹟不同位置均加設連結短片的二維碼，方便公眾瀏覽(圖28)。

我們亦透過各種線上及線下渠道，例如電視、電台節目、YouTube、發展局局長隨筆等，向公眾宣傳古蹟修復經驗。

項目團隊成員竭力透過講座和研討會，向不同層面的人士分享修復經驗(圖29至圖32)。例如，於2021年國際文化遺產記錄科學委員會(「CIPA」)舉辦的全球雙年會上，以「應用三維掃描技術於受天災損毀的文物修復工程」為題作演講。雙年會參與者包括本地及海外保育專家及工作人員，以及博物館館長。演講論文亦已在國際期刊上發表，<sup>6</sup>從而進一步向本地和海外人士分享經驗。

項目團隊還參加由專業團體舉辦的文物保育比賽，通過這些平台積極傳達文物保育的經驗、傳揚部門合作和公私營團隊合作的精神。各專業組織對此修復工程予以肯定，至今已獲得四個獎項。<sup>7</sup>

## 結論

經過項目團隊15個月的努力，古蹟於2019年12月23日重獲「新生」。儘管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但項目團隊堅持秉持文物保育的專業原則，不為加快進度而犧牲修復質量。雖然我們可用現代複製品替代損壞的欄杆柱、煤氣燈頭及鑄鐵燈柱以快速完成修復，但這完全違反團隊的保育原則和修復古蹟舊貌的目標，因此我們根本沒有考慮過這捷徑。

在三維掃描技術出現之前，建築文物的修復和保養僅僅依賴傳統測量方法和目測檢查，準確度較低又費時。三維掃描和打印技術的應用能對古蹟作精確和仔細的測量，為古蹟監測和修復工作打好基礎。在都爹利街石階及煤氣路燈修復案例中，三維掃描和打印技術的應用至關重要，令修復工程得以順利並符合國際保育標準進行。這次寶貴的經驗，為香港未來的文物修復工作提供參考。

另外，對古蹟進行的研究、整個修復過程的各種詳細記錄，和竣工後的詮釋策略，都增加了古蹟有形及無形的價值，使知識經驗能代代相傳。



圖21 專業承辦商在煤氣公司倉庫對兩支鑄鐵燈柱進行非破壞性檢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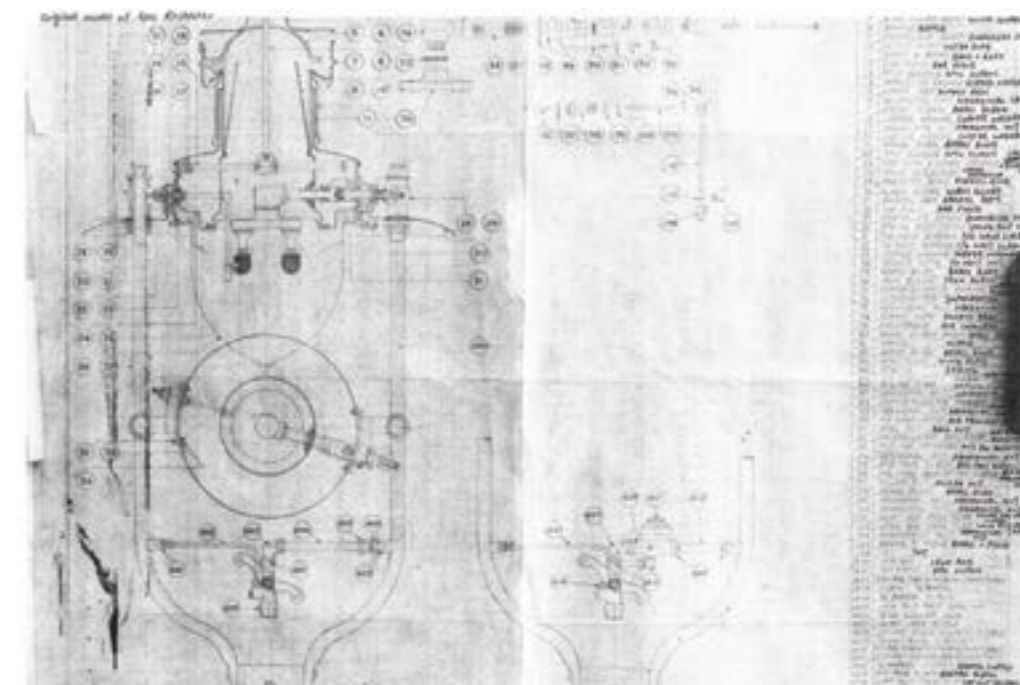


圖22 從原供應商檔案中找到「羅車士打款式」煤氣路燈設計圖。



圖23 專家和工程師在英國工場修復損毀煤氣路燈燈頭。



圖24 焊接專家在英國工場修復折斷的鑄鐵燈柱。



圖25 2019年12月23日，石階全面重開，煤氣路燈重新燃點。



圖26 「都爹利街石階及煤氣路燈修復工程」展覽於2020年在香港文物探知館開幕。



圖27 2019/2020香港建築師學會年度大獎的獲獎項目，包括都爹利街石階及煤氣路燈修復工程，在南豐紗廠展出。



圖28 在古蹟說明牌及古蹟不同位置展示了修復工程短片的二維碼。



圖29 古蹟辦代表出席公開講座「大館對談」，與公眾分享古蹟修復經驗。



圖30 由古蹟辦主持的煤氣公司員工分享會。



圖31 古蹟辦代表為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館長職系人員主辦分享會。



圖32 古蹟辦和路政署代表出席香港建築師學會的會員線上分享會。



圖33 修復工程迄今已獲得四個獎項。

## 參考文獻

器創作有限公司：《都爹利街石階及煤氣路燈修復工程保育方案》，2020年10月，未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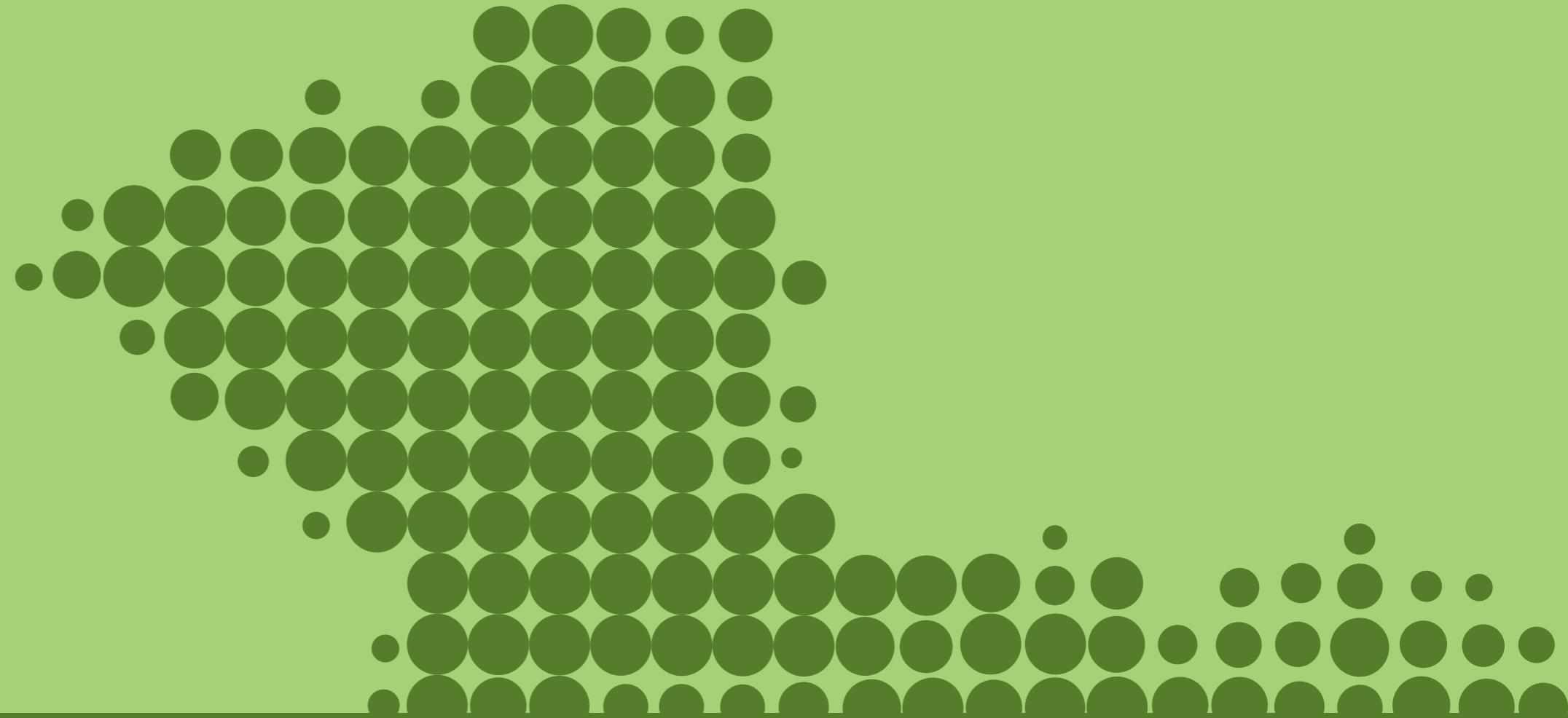
中國古蹟遺址保護協會：《中國文物古蹟保護準則》，2015-10(最後檢索日期：2022年4月1日)[https://www.getty.edu/conservation/publications\\_resources/pdf\\_publications/pdf/china\\_prin\\_heritage\\_sites\\_2015.pdf](https://www.getty.edu/conservation/publications_resources/pdf_publications/pdf/china_prin_heritage_sites_2015.pdf) .

澳洲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巴拉憲章：2013年度澳洲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澳洲分會保護具文化意義地方的憲章」》，2013-10(最後檢索日期：2022年4月1日) <http://australia.icomos.org/wp-content/uploads/The-Burra-Charter-2013-Adopted-31.10.2013.pd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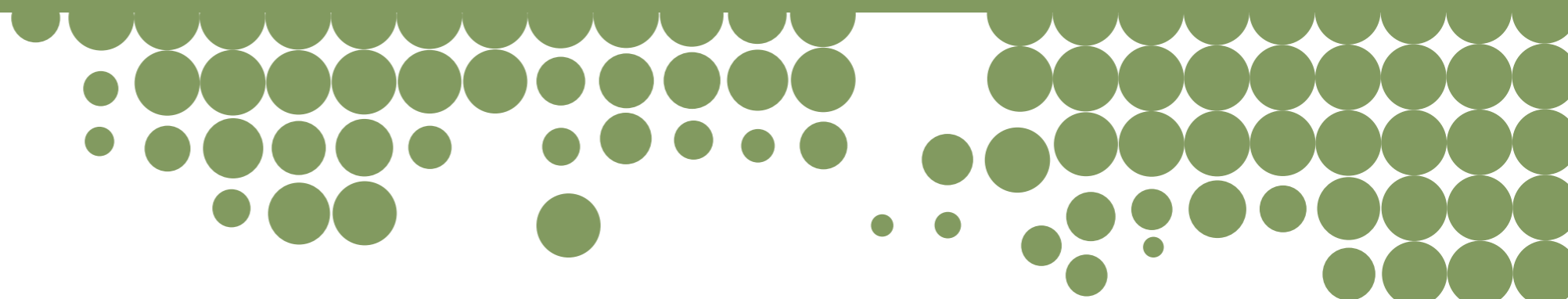
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維護與修復憲章「1964威尼斯憲章」》(最後檢索日期：2022年4月1日) [https://www.icomos.org/charters/venice\\_e.pdf](https://www.icomos.org/charters/venice_e.pdf).

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詮釋與展示文化遺產憲章》(最後檢索日期：2022年4月1日) [http://icip.icomos.org/downloads/ICOMOS\\_Interpretation\\_Charter\\_ENG\\_04\\_10\\_08.pdf](http://icip.icomos.org/downloads/ICOMOS_Interpretation_Charter_ENG_04_10_08.pdf).

- 1 《巴拉憲章》第4條：「保育應擅用多元知識、技能及學科內容，為古蹟進行研究及保育。」
- 2 《中國準則》第5條：「研究應當貫穿在保護工作全過程，所有保護程序都要以研究的成果為依據。」；《巴拉憲章》第19條：「進行修復工程前，必須具備充分的古蹟早期建築結構狀況證據。」
- 3 《巴拉憲章》第4條：「採用傳統工藝及物料保育歷史古蹟為佳。在某些情況下，或適合採用能為保育帶來莫大效益的現代技術及物料。」；《中國準則》第14條：「...獨特的傳統工藝技術必須保留。所有新材料和新工藝都必須經過前期試驗和研究，證明是最有效的，對文物古蹟是無害的，才可以使用...」
- 4 《威尼斯憲章》第9條：「...任何不可或缺的新建部分必須有別於舊有的建築元素，並蓋上現代印章以茲識別。任何修復工程進行前後，必須就古蹟進行考古及歷史學研究。」；第12條：「取代古蹟遺失部分的新建元素必須與古蹟整體和諧融合，同時亦要有別於舊有的建築元素，確保修復工程不涉及偽造藝術或歷史證據。」
- 5 《巴拉憲章》第32條：「古蹟保育的相關記錄檔案，應該要永久保存，並按照安全及私隱規定，將記錄檔案開放予公眾觀賞，以配合文化傳承所需。」；《艾蘭姆憲章》第5條：「詮釋及展示乃保育過程的一部分，能促進公眾在實地了解古蹟的具體保育問題，以及保育人員為保護古蹟的物理完整性及真確性所付出的努力。」
- 6 該論文發表在《國際攝影測量、遙感和空間訊息科學檔案》第XLVI-M-1-2021卷：第28屆CIPA研討會「大學·數感」，2021年8月28日至9月1日，中國北京。
- 7 修復項目至今榮獲香港建築師學會2019/20年年度中兩項主題建築獎，分別是「文物建築」及「建築學研究」，香港建築文物保護師學會（HKICON）舉辦的2020年香港建築文物保護師學會保育大獎「修繕組別」的特別表提獎，以及香港測量師學會2021年建築測量師大獎「保養及修復工程」組別的優異獎。



# 跨地域合作





# 粵港澳大灣區 文物建築跨地域協作



蔣志豪

蔣志豪先生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學士，1995年加入政府任職政務主任，處理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相關事務。他於1998年調任香港駐布魯塞爾經濟貿易辦事處，出任香港駐歐洲聯盟助理代表。

蔣先生在2002年返港後加入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負責一般收入及稅收政策。他在2007年調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負責監督選舉制度與立法工作，其後他出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政務助理，專責香港政制發展。

蔣先生於2012至2016年擔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負責處理電訊政策，期間積極參與促進創意產業的發展。

蔣先生於2016至2020年出任香港駐三藩市經濟貿易辦事處處長，代表特區政府與美國西部19個州份磋商，加強彼此的經濟聯繫。

蔣先生自2020年11月起出任發展局文物保育專員一職。

# 摘要

由1976年訂立《古物及古蹟條例》至2008年成立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及其後的政策措施，香港在推行文物建築保育方面一直不遺餘力。透過2019年發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及2020年啟動《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和旅遊發展規劃》，香港可發揮國際視野、配合其中外共融的歷史背景，成為大灣區與海外地區接軌的橋樑。

通過粵港澳大灣區的跨地域合作和交流，各城市可以互相配合、互補不足，在文物建築保育上產生協同效應，宣揚中華文化，並增強香港與大灣區內人民的身份認同。

2019年2月，國務院發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政策範疇包括帶動經濟、改善民生、發展及創新等措施，其中一個重點是「共建人文灣區」，著重精神層面的發展，以文物古蹟及世界文化遺產等彰顯獨特的文化魅力，從而提升大灣區人民的身份認同及文化修養，以推動文化繁榮發展。《綱要》發佈之後，廣東省政府及多個部委於2020年12月啟動《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和旅遊發展規劃》（以下簡稱《規劃》），以凝聚與傳承中華文化，推動大灣區在文化建設上的合作。香港作為與國際接軌的都會，有著中外共融的文化背景，有責任肩負起對外推廣中華文化的使命。

## 前言

# 香

港的文物建築保育至今已有四十多年，相關的賦權法—《古物及古蹟條例》（香港法例第五十三章）於1976年生效，比內地於1982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來得還早。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而成立的古物諮詢委員會（以下簡稱「古諮會」）和古物古蹟辦事處（兼任古物諮詢委員會秘書處，以下簡稱「古蹟辦」），與古物事務監督（現時為發展局局長）及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共同肩負保護和保存香港考古及建築文物的責任，透過研究及宣傳工作，增進市民對文化遺產的認識和興趣。

香港特區政府於2007年成立發展局，將文物保育政策由當時的民政事務局撥歸發展局，並於2008年成立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檢視和推行文物保育政策，以平衡文物保育與發展的需要。直至2022年11月，古物事務監督已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將132項歷史建築或考古遺址列為法定古蹟作永久保護；古諮會在古蹟辦的專業協助下，已確認1,534座歷史建築的評級。此外，208處具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亦獲得保護。

保存歷史建築固然重要，然而，如何為已失去原來功能的歷史建築透過活化而注入新生命並融入現代生活，亦是重要的保育議題。由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牽頭的「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由2008年至今已成功批出26項歷史建築活化項目，不少項目，例如大澳文物精品酒店、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保健中心—雷生春堂（圖1）、美荷樓旅舍（圖2）、綠匯學苑（圖3）等已成為香港旅遊熱點；活化項目中，五項已榮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項，其中藍屋建築群更榮獲卓越大獎，成績斐然。

香港雖為彈丸之地，文物資源卻非常豐富。在1,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有132項法定古蹟、1,534項已獲確認評級的歷史建築、208處考古遺址、超過150萬件出土文物；我們的數據庫已有超過60萬張照片/幻燈片/影片、有40項法定古蹟及歷史建築立體掃描數據、超過5,800冊與考古、歷史建築及文物保護的藏書及接近2,400項期刊，以及超過3,350項歷史建築的資料檔案。此外，我們的文物之友和青少年文物之友已分別有接近2,100及520位。



圖1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保健中心—雷生春堂

## 粵港澳大灣區跨地域協作

粵港澳大灣區包括廣東省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九個城市，以及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區內人民的歷史、傳統、文化一脈相承，在血脈上同宗同源、在文化上是共同體；然而，近代歷史的發展，讓粵港澳三地出現獨特的文化古蹟，各具特色，值得整體、全面和深入研究和推廣。《綱要》及《規劃》肯定了香港為大灣區內最國際化的城市，有著國際視野及中西合璧的魅力，可以成為大灣區與海外地區接軌的橋樑，宣揚中華文化及傳統。同時，大灣區內的其他城市亦能補充香港的不足、從而增強香港與灣區內人民的身份認同。

換言之，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跨地域合作和交流，不但能互補不足，更能透過十一個城市的獨特性，互相配合，產生協同效應，達致共贏局面。就文物保育而言，大灣區的交流可幫助規劃、研究、保育及善用文物，增強大灣區人民的歸屬感、文化身份認同和保存地區特色，亦可以推動文物旅遊和經濟發展，讓灣區成為「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改善灣區人民的生活質素。

## 跨地域協作建議

粵港澳大灣區的文物保育協作，可以從以下方面試行：

### (一) 人才培訓

在人才培訓方面，粵港澳三地均培養出不少在文物建築維修、復修、保養、活化及管理等的專業人才。各地的人才因應當地建築特色及近代歷史文化差異而令其累積的經驗有所不同。我們建議可以透過實地考察、研討會、工作坊等交流，提升彼此的專業知識及交換經驗及意見。

此外，《規劃》中亦提到推廣特色旅遊，當中包括開拓新型文物旅遊路線。為配合有關的人才需求，大灣區城市可推動專業人員（例如文化遺產保育、旅遊及服務業的從業員）互訪，結成合作伙伴。受訓後的文物旅遊專業人員，除了可把大灣區的歷史文物向本地介紹，更可於每年的國際古蹟遺址日，於十一個城市同時進行實地古蹟導賞，呈現大灣區一脈相承的歷史和文化。

青少年交流和培訓方面，由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澳門高等教育局及香港民政事務局於2009年開始合辦的「粵港澳青年文化之旅」，為18至35歲的青年人提供機會，讓香港、澳門及內地的學員能透過交流、參觀及座談會等加深對三地的認識，計劃至今已有過千名香港青年參與，是《規劃》中點名提及的項目之一。我們建議古蹟辦旗下的「文物之友」和「青少年文物之友」亦可安排與灣區內的文物義工一同進行考察和交流活動，促進了解和合作。受訓後的文物義工可於「一程多站」的文物旅遊路線互相配合，在各自熟悉的區域及範疇擔任導賞講解，把不同城市的文物建築串連起來作介紹，講好文物建築背後的故事。



圖2 美荷樓旅舍



圖3 綠匯學苑

## (二) 研究及出版

大灣區背靠嶺南大地、面向南中國海，是內陸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交匯地。從新石器時代中期開始，嶺南先民與嶺北長江流域先民已有交往，至青銅時代交往更加頻繁，嶺南越族受嶺北楚文化影響較深，直至秦始皇統一全國後，便開展嶺南與中原文化的融合過程；另一方面，環南中國海諸民族互相交往有超過一萬年的歷史，海洋文化也是合適的研究主軸，當中包括海島、海防、海上貿易、香港沙中線出土的貿易瓷器、水下考古、以至近現代從西方輸入的宗教、制度、建築、舶來品等，都是大灣區歷史和文化的重要部份。

過去多年，香港與廣東和澳門的文化遺產保護專業人員，曾多次共同進行研究，例如香港曾於2001年聯同內地考古團隊於西貢沙下進行搶救發掘，發現大批由新石器時代至明代的文物，然後再由跨地域學者團隊從不同的學術角度探討史前環境變遷與先民的生活面貌。研究讓人領略到華南地區史前漁獵採集社會的多樣性，亦有助探索中國史前時期黃河及長江地區農業社會與周邊地區的關係。到2013年，粵港澳三地又共同籌辦「嶺南印記：粵港澳考古成果」巡迴展覽，把三地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向大灣區內的民眾介紹。

我們建議大灣區的專家、學者和文化遺產保育專業人員，可進一步加強研究方面的合作，制訂一系列跨地域的合作研究框架和課題，包括出土文物研究、應用於文物保育及考古發掘的科技、古蹟活化及創意教育和公眾參與手法等，一起攻關；並定期舉行學術會議，交流研究成果，把研究成果盡早結集出版，照顧不同年齡層和背景的讀者，共同提升大灣區各城市的研究水平，為「共建人文灣區」奠定良好基礎。

## (三) 教育及推廣協作

要深化大灣區人民的身份認同，可試行下列多元化的教育和推廣策略，讓市民了解及感受何謂「同根同源」：

- i. 舉辦跨地域巡迴文物展覽，將大灣區的重要的出土文物、重要歷史建築和文物，生動地呈現大灣區觀眾眼前；
- ii. 透過網上文物展覽，生動便捷地展示研究成果和提升大眾對中華文化的了解；
- iii. 設立超越地域的專題文物徑，例如教育文物徑、華僑華人文物徑、工業文物徑等，透過不同主題，講述嶺南歷史和文化的演變；並透過網上平台，發佈文物徑的最新資訊，包括文物徑上的歷史文化地點、分段路徑、導賞安排、交通和住宿資訊等，讓參觀人士自行選擇文物徑，或設計適合自己的參觀路線，以深入了解嶺南歷史和文化的變遷；
- iv. 應用嶄新科技推廣歷史建築和考古文物，讓大眾有更多機會接觸文物建築，感受這些建築的獨特魅力所在；及
- v. 共同製作電視節目、推出媒體專欄、舉辦多類型以文物古蹟為主題的比賽（例如短片、動漫、徵文、攝影、標誌設計、問答比賽、古蹟碑記書法比賽等）、於假期為就學青少年舉辦文物考古研習班與考察團、為弱勢社群和少數族裔舉辦專題文物教育活動及參觀等，都可以推動大灣區跨地域協作。

#### (四) 訊息交流

現今通訊發達，跨地域訊息交流已成為市民的日常生活模式。我們可研究建立「大灣區文化遺產」微信帳號，適時發放大灣區內文化保育活動的訊息；公眾亦可透過帳號，分享他們拍攝文物建築的照片、參觀點滴、改善建議等，推動及落實公眾參與策略。

#### (五) 古蹟文物資源數據共享

近年多以三維激光掃描、航空攝影及全景攝影等技術，為文物建築進行測繪和全面記錄歷史建築的空間訊息，包括富有特色的建築構件及其與周邊環境的空間聯繫等。所採集的資料可作多方應用，例如配合虛擬實景（VR）或擴增實景（AR）於歷史建築或考古遺址重構昔日先民的生活型態，亦可配以裸眼3D及動畫等科技，搭建互動平台，使文物建築不受地域限制、在屏幕上「活起來」。

在香港，古蹟辦於2016年成立的三維掃描小組，專責為歷史建築和考古文物採集精準的三維測量數據。這些數據可協助繪製精準圖則，有助監察歷史建築狀況及修復出土文物；小組亦製作實體打印模型，作為日後修繕時參考、研究和徵引的憑據。數據亦用作建立本地歷史建築和出土文物的三維數據檔案庫。三維掃描小組自成立以來已為40項法定古蹟及歷史建築進行立體掃描，這些數據廣泛應用於古蹟修復、文物教育和推廣方面。我們建議香港的檔案庫可以與大灣區各地的文物數據庫對接，為學者、研究生及業界人士提供一站式的數據資料，方便他們以大灣區作整體研究。雖然文物數據不能取代實地考察，卻必定能減省資料及數據收集的時間，並有利於大灣區內的跨地域研究。

知識共享已是大勢所趨，特別是面對曠日持久的新冠疫情，民眾出行受阻，對線上知識的需求殷切。未來香港會加快歷史文化資源的數碼化工作，並希望與內地協調文物建築測繪的統一規範，最終建立一個共用的區域性文物建築資源數據庫，這些數據同時可應用於歷史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或簡稱GIS），亦有助將現時的歷史地理資訊系統由二維展示提升至三維。此外，歷史及航拍照片、短片、古蹟及歷史建築的評估報告、考古發掘報告、保育歷史建築基金贊助的研究報告等資料，也應加進數據庫，讓公眾查閱；也可以邀請公眾提供資料，共同參與建立數據庫，使其成為真正全民共享的文化資源。

#### (六) 文物文創產品

文物旅遊是《規劃》的重點，遊客選擇到大灣區旅遊，除了體驗地方的文化風情，亦會有興趣購買富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文創產品。文化遺產要於自己的區域、甚至跨區域發揮效用，不應只停留在學術及歷史研究層面，應該生動地融入大眾的生活。我們建議開發及營銷文創商品，除可培育創意、推廣文物，亦可推動經濟發展，提高地方百姓的生活水平。

#### 先導計劃

##### (一) 簽署粵港澳大灣區合作意向書

為加強大灣區城市的聯繫和協作，我們已簽署合作意向書，當中涵蓋歷史建築及考古研究、出土文物整理、古蹟修繕、文物教育及推廣、公眾參與等範疇。

##### (i) 文物建築保護

文物建築的保護及修繕需要多方面的人才和技術配合。去年國務院已發佈《「十四五」文物保護和科技創新規劃的通知》，致力在文物領域的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而香港文物建築的修復工程亦達到國際認可水平，而且屢獲國際殊榮，成就值得肯定。合作框架有助推動各地的技術交流，特別是傳統建築材料的生產和修繕技藝的傳承，提升文物保育水平。

##### (ii) 考古技術和研究

考古方面，香港可借力於國家文化遺產科技創新中心和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南海基地等國家級機構，加強對遺址發掘的技術、遺址環境資料的採集、遺蹟遺產記錄、出土文物整理和研究等關鍵技術的研發，以提升灣區內考古研究的整體水平，並透過考古遺產說好嶺南的故事。

##### (iii) 文物建築資源管理

在文物建築資源管理方面，香港致力研發於文物建築應用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或簡稱BIM），有關技術正趨向成熟，其中「618上海街」項目更獲得首個全面應用BIM的國際大獎。香港可分享如何在設施管理階段發揮BIM的功能，特別是將它與物聯網技術（Internet of Things，或簡稱IoT）結合，使文物建築管理推向智慧化。

##### (iv) 文物元宇宙

合作框架可利用現有文物資源研究將實體文化遺產推廣至元宇宙（Metaverse），例如運用文物數據建構歷史建築，然後於虛擬世界「築」起舊建築及考古遺址，讓大眾遊走當中，在虛擬世界中感受當時中華先民的生活。

##### (v) 展覽互換

香港與內地歷年舉辦不少以文物建築和考古文物為題材的展覽。我們建議大灣區城市增加展覽互換，並加入先進科技作為策展手段，務求塑造嶄新的互動和沉浸式體驗，將區內文物建築和出土文物的歷史內涵作更有效的教育及傳播。

##### (vi) 增加三地青年學子交流

香港特區教育局課程發展議會價值觀教育常務委員會於2021年11月30日公佈「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當中重複強調以「中華文化」作主幹、以「中華文化」培養學生的價值觀及協助學生欣賞「中華文化」。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於2021年發表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亦提及內

地考察專題研習。上述兩項教育發展議題與《綱要》中建議的「加強粵港澳青少年交流」有著相輔相成的作用，而安排學生參觀大灣區的文物建築及考古遺址便是實踐方法之一，特別是不同主題的大灣區文化遺產遊徑，以增進彼此的認識和交流；亦可安排學生及青少年文物之友擔當導賞員，介紹文物建築的歷史背景和建築特色，增加年青人對當地歷史的代入感。此外，又可以舉辦與文物建築相關的多元比賽，開放予大灣區的學生參加，讓他們發掘地方歷史文化的異同；也可以為學生於暑期或假期舉辦文物研習班，參與考古發掘、出土文物整理和研究等，以增進年青人對歷史文物的興趣和認識。

## (二) 輪流定期舉辦遺產保育高峯會

為促進大灣區內十一個城市的交流，以及提高各市的研究和保育水平，我們建議於灣區各市定期舉辦文化遺產高峯會，主題由歷史建築，擴展至考古、文物教育、公眾參與等；打造成為學者和文物工作者分享經驗和研究成果的平台，亦是公眾參與的平台。會議期間，可安排考察當地文化遺產的保育情況，了解文化旅遊與地方經濟的發展。像這次在香港舉行的首屆大灣區遺產保育高峯會，得到國家文物局和大灣區各市的鼎力支持，使大家能聚首一堂，交流研究成果和保育經驗，肯定會對人文灣區的建設有所貢獻。我相信輪流定期舉辦遺產保育高峯會，可鼓勵更多學者和業界人士參與大灣區地域的研究和文化遺產保育。

## (三) 於粵港澳大灣區設立教育文物徑

《綱要》及《規劃》均以建立人文灣區為發展的重點，要運用粵港澳的地域優勢，彰顯及發揚嶺南文化，從而提升大灣區內人民的文化素質及增強歸屬感。把散落在嶺南大地的文物文化資源串珠成鏈，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省自然資源廳及省住房城鄉建設廳早前已發佈兩批大灣區文化遺產遊徑，涵蓋八大主題，實體遊徑共有四十四條之多，目的是以歷史為紐帶，以遊徑為「線」，將大灣區的歷史文化資源連起來，向公眾展示文化遺產保護成果。這也和香港文物保育「點·線·面」的理念不謀而合。文物建築不再局限於一個城市，不同的「線」可以編出嶺南文化的發展，亦同時可顯出不同地域的獨特性。

我們建議發掘香港與內地共有的主題元素，將之串聯起來，與現有的大灣區文化遺產遊徑協同發展，從而突出香港與廣東地區的歷史淵源。其實，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不久前發佈的大灣區文化遺產遊徑，所涵蓋的八大主題，包括孫中山文化遺產遊徑、海上絲綢之路文化遺產遊徑、華僑華人文化遺產遊徑、古驛道文化遺產遊徑、海防史蹟文化遺產遊徑、近代商埠開放文化遺產遊徑、西學東漸文化遺產遊徑、非物質（粵劇）文化遺產遊徑，都可以在香港找到相關的古蹟文物，而且十分豐富，這八大主題的遊徑，絕對可以延伸至香港。

此外，我們建議於大灣區設立教育建築文物徑。香港已率先成立香港大學文物建築群，並計劃推展至其他教育類建築，以說明香港的教育發展。另外，香港亦有其他發揚中華文化的教育建築，例如一級歷史建築孔聖講堂，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儒學建築，亦是宣

揚儒家學說和抗日思想的一個要點。如與內地的儒學建築連成一線，必有助儒家思想發揚光大。

《規劃》指出應大力推動新興海洋旅遊與「海洋—海島—海岸」、跨島遊立體開發，這方面香港的資源可說得天獨厚，香港有長長的海岸線，又有眾多的離島如南丫島、長洲、大嶼山等，島上村落星羅棋佈，都保存了濃厚的傳統文化，例如大嶼山西端的大澳，是著名的漁港，當地保存了大片漁民居住的棚屋，又有鹽田遺蹟，幾間著名的廟宇已有幾百年歷史，其中的楊侯古廟已列為法定古蹟；也有歷史建築活化優秀例子—大澳文物精品酒店；漁民在端午節進行的龍舟遊涌活動，也列入了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大澳深厚的傳統文化沉澱，是重要的文化資源，可開發多條文物徑，也可聯合大灣區的城市，開發跨島遊徑，使遊客體驗海洋文化和海洋風情。

除此以外，香港中西文化交匯並存，既得嶺南風氣之先，亦深受西方文化影響，很多文物建築都呈現文化交融的特點和感染力。內地嶺南地區亦以不同文化為主體，包括廣府文化、客家文化和潮汕文化等，文物建築紛陳多樣。不同主題的文物徑也可凸顯出每個地域的獨特歷史痕跡，讓大眾更加了解自己的地區在大灣區所扮演的角色。

## (四) 文物文創產品開發

香港與內地均十分注重文化創意，文創產業發展蓬勃。「粵港澳大灣區（廣東）文創聯盟」於2020年成立，旨在推動區內文創產業的協同發展。為更好利用大灣區內豐富的歷史古蹟資源，我們建議為不同主題的遊徑，開發一系列文物文創產品，產品必須多元，以迎合不同年齡、性別、地方遊客的喜好，使購買文創產品成為文化旅遊體驗中重要的一環，例如配合大灣區教育建築文物徑的開發，我們可發掘大灣區教育文物建築的特色，配合各地文物點的主題，應用於本地文創產品，既可推動大灣區教育文物徑，又可推動區內文創產業發展，讓人知道文物建築並不刻板、可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綱要》中多次提及香港的國際地位，加上香港擁有完善的知識產權保障制度及國際行銷經驗，可與內地攜手打造國際級的大灣區文創產業鏈，將嶺南文化推向世界。

## 結語

《綱要》頒布至今已有三個年頭，大灣區內不同基建及發展項目亦已陸續開展，是次大灣區文物建築高峯論壇是三地歷史文化協作的一個里程碑，也是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的重點項目之一。粵港澳三地更應齊心協力，把大灣區塑造成國際級的人文灣區，共同展現中華文化優秀的傳統。

# 亞洲文化遺產 保護行動助力 亞洲文明交流互鑒

——以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  
在亞洲地區的文化遺產  
國際合作實踐為例

畢業於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學歷，高級職稱，現任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院長、黨委書記。長期從事文化遺產保護利用研究與管理，在文物政策理論、文物綜合保護利用、遺產申遺與監測、文旅融合與活化利用等方面具有豐富經驗。



李 六三 院長

# 摘要

2019年5月，習近平主席提出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行動重大國際倡議。2021年10月，國家文物局主辦的亞洲文化遺產保護對話會為搭建亞洲文化遺產合作平台注入積極動力。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積極踐行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行動，已在柬埔寨、烏茲別克斯坦、尼泊爾等國家形成了多元合作格局和獨特的合作理念，獲得了國際社會的認可。未來，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將圍繞新時代文物工作方針，與國內外同行攜手提升亞洲文化遺產保護利用水準，展現燦爛的亞洲文明。

## 2

2019年5月15日，習近平主席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主旨演講中，提出了「中國願同各國開展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行動，為更好傳承文明提供必要支撐」的重大國際倡議，為中國在亞洲區域開展文化遺產國際交流合作，促進中外文明交流互鑒、助力構建亞洲人類命運共同體擘畫了宏偉藍圖，指明了前進方向。

國家文物局高度重視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行動，自2019年起，從頂層設計、機制平台、國際共識、務實合作、理論研究等多方面入手，推進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行動縱深開展。在國家文物局的領導下，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積極踐行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行動，先後參與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行動國內外調研、編寫《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行動前期國內調研報告》、搭建亞洲文化遺產合作網路、組織中國阿富汗巴基斯坦線上石質文物保護專業人員高級研修班等多項基礎性工作。

2021年10月27日至28日，由國家文物局與北京市人民政府主辦、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政府、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政府、中華文物交流協會承辦的亞洲文化遺產保護對話會以線上線下相結合的形式在北京召開。來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5個國際組織的高級別代表，亞洲36國的20位文化部長、19位駐華使節等高級別官員及多國專家、學者參會。在對話會上，中國與亞洲9個國家共同發起成立「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聯盟」，設立「亞洲文化遺產保護基金」，啟動「亞洲文化遺產保護青年大使」計劃，發佈《關於共同開展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行動的倡議》。這一系列凝聚亞洲國家文化遺產保護利用國際共識的務實之舉為傳承弘揚亞洲國家璀璨輝煌的文明成果，搭建文明互學互鑒、共同發展的平台，增強亞洲文化自信，促進亞洲協作互信，激發亞洲創新活力注入了積極動力。

### 一、 深入理解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行動

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地理解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行動，需要從新時代文明觀、亞洲觀、發展觀等多個角度入手。

**在新時代文明觀中理解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行動。**2014年，習近平主席在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發表演講時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2022年，習近平主席在向「義大利之源——古羅馬文明展」開幕式致賀信時強調，相互尊重、和衷共濟、和合共生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正確道路。中國願同國際社會一道，堅持弘揚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衝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新時代文明觀突破了「文明衝突論」、「歷史終結論」等二元對立思維範式的桎梏，針對當今世界發展現狀與需要，指出文明具有多樣性與差異性，強調通過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的方式進行平等對話與交流。亞洲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亞洲各國山水相連、人文相親，遍佈亞洲的眾多文化遺產實證了人類歷史上多元文明和諧共存、交流互鑒的進程。亞洲國家攜手保護亞洲文化遺產既是對亞洲多樣地域文化共生共榮的歷史傳統的延續，也是順應世界文明發展潮流的時代要求。

**在新時代亞洲觀中理解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行動。**當前，受城市發展、氣候變化、新冠肺炎疫情及戰爭衝突等影響，亞洲文化遺產保護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世界遺產中心亞太地區第二輪定期報告》明確指出，亞太地區遺產面臨著非人為因素和人為因素的雙重破壞。<sup>1</sup>亞洲地區跨國遺產眾多，根據世界遺產中心統計，亞洲區域共有5處跨境世界遺產。<sup>2</sup>另有，海上絲綢之路、萬里茶道等橫跨亞洲國家的文化遺產尚處於申報籌備階段。考慮到文化遺產保護和利用專業性強，更好地保護利用遺產資源、挖掘研究遺產價值，需要各國突破國家界限，廣集智慧、群策群力、各取所長。

**在新時代發展觀中理解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行動。**亞洲是世界上最上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大洲，也是世界上發展速度最快的地區。聯合國發佈的《2018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報告》指出，東亞和南亞是世界上最具發展活力的地區。<sup>3</sup>文化遺產作為社會文化和經濟發展的重要資源，是帶動亞洲文明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力量。聯合國大會通過的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已將文化遺產視為賦能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實現的重要動力。在此背景下，開展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行動，不僅是亞洲人民共同建立亞洲命運共同體的職責使命擔當，更具有現實意義。

### 二、 深耕細作 多點開花：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在亞洲區域的文化遺產國際合作實踐

為配合國家外交大局，在國家文物局的指導下，自1950年代在蒙古國烏蘭巴托興仁寺及夏宮開展修繕工程以來，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在亞洲國家開展了多項文物保護項目。經過多年的深耕細作，目前已在「一帶一路」沿線的柬埔寨、烏茲別克斯坦、尼泊爾等亞洲國家形成了多點開花的合作格局。在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積累了大量的工作經驗的同時，注重積極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為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行動進一步縱深開展提供了有力抓手。



## (一) 實踐案例

### 1. 柬埔寨文物保護修復專案

吳哥古蹟保護是一項文物保護國際合作的成功範例。1993年，中國參與了由柬埔寨政府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吳哥古蹟保護國際行動，明確表示將參加拯救吳哥古蹟工作。1997年，國家文物局派出專家組赴柬，並選擇周薩神廟作為中國參與吳哥保護的專案。1997年，中國文物研究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前身）正式組建「中國吳哥古蹟保護工作隊」，拉開了中國吳哥古蹟保護和考古工作的序幕。

目前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負責實施的柬埔寨文物保護專案已開展了三期，涉及柬埔寨暹粒省、柏威夏省的五處文化遺產。

#### (1) 一期文物保護專案：周薩神廟（1998-2008完成）

周薩神廟由11座單體建築組成，建築損毀嚴重，部分建築僅基座尚存，其他建築也出現不同程度的傾斜、歪閃。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對坍塌情況嚴重的8座建築進行了整體維修。經過了十年努力，於2008年完成了周薩神廟保護項目。經維修後的建築不僅全部排除了險情，而且將大部分塌落的構件歸安復位。周薩神廟單體建築的結構、形式得以展現，整座建築的真實性和完整性得以提升，再現了昔日的風采。（圖1、2）

#### (2) 二期文物保護專案：茶膠寺（2010-2018完成）

2006年，在援助柬埔寨吳哥古蹟一期周薩神廟保護工程進入尾聲之際，中柬兩國政府正式確認茶膠寺為中國援助柬埔寨二期吳哥古蹟保護專案。2010-2018年，實施了建築復原研究、病害調查、保護修復、考古研究及輔助設施建設工程。修復後的茶膠寺，文物險情排除，整體安全狀況得到改善，展現出原有的歷史風貌。修復整體效果良好，達到了保護修復專案要求。（圖3、4）

#### (3) 三期文物保護專案：王宮遺址、柏威夏寺和崩密列寺（2016—今）

為深入加強吳哥古蹟保護與考古國際合作，在周薩神廟和茶膠寺保護修復過程中，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還對吳哥古蹟王宮遺址、柏威夏寺和崩密列寺開展了一系列前期研究和考古等工作。2016年起，對王宮遺址、柏威夏寺開展初步勘察測繪工作，收集相關基礎資料，梳理歷史沿革，獲得了建築測繪資料，對建築結構、基礎和殘損現場進行初步調查及評估，為後續保護工作提供資料支援。與柬埔寨吳哥古蹟保護與發展管理局簽署關於崩密列研究與保護的諒解備忘錄。中柬雙方成立了聯合考古工作組，共同開展崩密列的考古與研究工作。（圖5、6）

### 2. 烏茲別克斯坦希瓦古城保護修復專案

2013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烏期間，中烏兩國簽署關於進一步發展和深化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宣言。2014年4月，中烏雙方決定由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負責希瓦古城內阿米爾·圖拉經學院、哈桑·穆拉德庫什別吉清真寺保護修復。該專案成為中國在中亞地區實施的第一個文物保護修復項目。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迅速組建項目團隊，並先後



圖1 周薩神廟南藏經殿維修前  
來源：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



圖2 周薩神廟南藏經殿維修後  
來源：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



圖3 茶膠寺二層台西北角及角樓修復前  
來源：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



圖4 茶膠寺二層台西北角及角樓修復後  
來源：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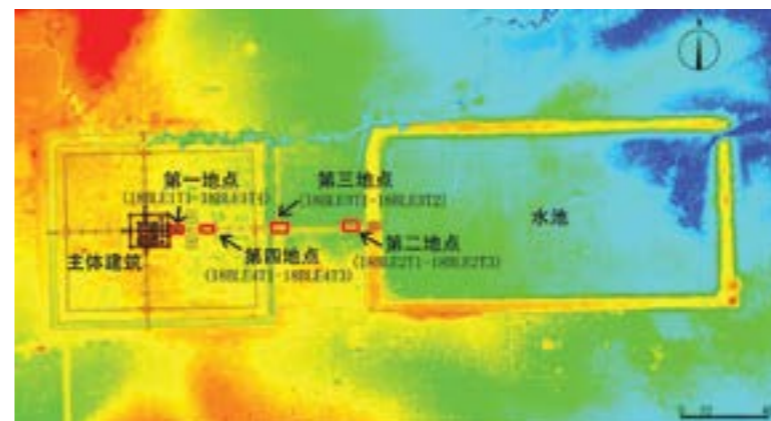


圖5 崩密列整體高程及東神道發掘位置示意圖  
來源：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



圖6 王宮遺址出土瓷片  
來源：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

完成現場調研勘察、保護修復、周邊環境整治等工作，於2020年1月通過初步竣工驗收。(圖7、8)

### 3. 尼泊爾文物保護修復專案

杜巴廣場九層神廟是尼泊爾世界文化遺產加德滿都谷地的重要組成部分，在2015年地震中局部倒塌，受損嚴重，其修復工作被列入中國政府援助尼方實施的災後重建專案，成為中國在尼泊爾開展的首個大規模文物援外專案。該保護修復專案由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承擔，2017年8月正式開工，目前已按計劃完成震後坍塌的東北角塔6層及西南角塔(九層塔)7、8層復原維修。與此同時，2017年8月，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還開展了努瓦科特杜巴廣場王宮及周邊附屬文物建築的初步調查。(圖9、10)

#### (二) 理念與方法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在二十餘年的亞洲文物保護實踐中，逐漸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國際合作理念與方法。

一是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兼顧國際社會公認的保護理念和中國特色的文物保護修復原則，始終遵循最小干預、不改變文物現狀、真實性、完整性原則，基於不同文化遺產的殘損現狀和建築特點，採用不同的保護策略和修復方法。例如，針對柬埔寨周薩神廟周邊散落4,000餘塊砂石構件的情況，保護修復著重「遺址保護、搶險加固、重點修復」；面對周薩神廟散落構件拼對難題，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借鑒國際經驗，結合中國文物保護技術，摸索出一套構件拼對方法，取得良好效果。再如，針對茶膠寺建築巨大體量和險情現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採用傳統施工工具、吊裝設備等傳統施工機械，提高保護修復效率；因地制宜地使用鋼結構支護、錨杆、拉杆等保護措施。既保證了建築結構的安全，又尊重了原有建造技術特徵以及材料特性。

二是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始終堅持將文物保護工作融入當地社會經濟發展。例如，在尼泊爾九層神廟保護修復過程中，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聘用當地工人，學習尼泊爾傳統木建築建造和雕刻工藝。在尊重了當地的傳統做法和工藝、最大限度地保留歷史資訊的同時，帶動了當地就業與職業能力建設。在茶膠寺保護專案實施中，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與柬埔寨金邊皇家藝術大學考古系師生聯合開展了考古工作，共同研究探討茶膠寺及相關古蹟的保護與研究。培訓了一批柬埔寨從事文物保護的專業人員與技術骨幹，有效促進了中柬專業隊伍的交流和友誼。再如，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在開展烏茲別克斯坦希瓦古城保護專案過程中，注重對周邊環境的整治，增加了排水、照明等基礎設施，助力當地民生改善。

三是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始終堅持研究與實踐並重，圍繞文物保護工程，開展了大量前期勘察測繪與相關研究。研究涉及建築學、歷史學、考古學、地質學、材料學、結構科學、岩土科學和保護科學等多學科，為文物價值評估和價值特徵的確定、病害機理研究、保護工程的設計、保護技術和材料的選擇奠定了基礎。同時，虛心學習借鑒國際成功經驗，推動深化國際學術研究和實踐交流。相繼出版有《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援外文物保護工程項目成果集：2017-2019》、《中國國際合作援外文物保護研究文集》、《茶



圖7 希瓦古城經學院修復前  
來源：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



圖8 希瓦古城經學院修復後  
來源：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



圖9 杜巴廣場九層神廟東北側修復前  
來源：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



圖10 杜巴廣場九層神廟東北側修復後  
來源：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

膠寺廟山建築研究》、《茶膠寺修復工程研究報告》、《柬埔寨吳哥古蹟茶膠寺考古報告》等系列學術研究著作成果。

四是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始終注重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助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例如，2017年由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建造的中國吳哥古蹟保護中心在柬埔寨暹粒落成，中心展示了中國政府援助吳哥古蹟保護的工作歷程和成果，成為對外展示、交流中國保護文化遺產理念、方法的重要視窗。同時，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積極與當地專家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專家等開展技術研討，分享文物保護技術理念、方法和經驗。在每年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吳哥古蹟保護國際協調委員會大會和柏威夏寺保護國際協調委員會大會上，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技術人員與來自法國、日本、美國、德國、義大利等國專家在柬埔寨暹粒齊聚一堂，共同研討文物保護的理念、方法和經驗。2016年，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承辦的第二屆「加德滿都文化論壇」在尼泊爾加德滿都舉辦。2018年，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和烏方合作舉辦「『一帶一路』文物保護技術國際研討會——希瓦古城保護與利用國際交流」，來自中國、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薩克與土耳其的文化遺產專家齊聚烏茲別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共同分享文化遺產保護與研究的經驗。

### (三) 收穫與意義

在文物保護與考古國際合作中，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的文物保護理念、技術和方法以及實踐獲得了所在國當地政府和國際社會的認可與肯定。柬埔寨吳哥古蹟保護與發展管理局出具的《吳哥古蹟茶膠寺保護修復項目對外驗收證明函》曾指出，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的「工作受到了認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吳哥古蹟保護國際協調委員會專家組也曾高度評價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工作團隊一直堅持的做法，認為中國隊的理念是「保護」而不僅僅是「修復」，意味著最大限度的保護文物歷史資訊，盡可能採取可逆措施，最小擾動文物。ICC機制創始人之一、負責ICC專家組、秘書處與柬埔寨政府間協調工作的阿澤迪納·貝肖克院士評價說：「中國隊在塔門入口處設置鋼結構支撐措施，專家組一致認為有效保證了遊客安全與建築安全，沒有傷及文物，為日後更先進的技術應用留有餘地。這種使用新材料加固而不傷及文物的做法，完全符合《吳哥憲章》，不僅有效地保護了文物，也是對吳哥古蹟保護理念方法的完善。」柬埔寨文化藝術大臣彭薩格娜曾對新華社記者說：「非常感謝中國幫助柬埔寨保護吳哥古蹟。我認為中國專家修復文物的水準非常高，得到國際認可。柬埔寨的文物修復人員通過和中國專家的合作也增加了學習交流的機會。」

## 三、再續新篇 篤行致遠：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踐行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行動

2022年，全國文物工作會議提出「保護第一、加強管理、挖掘價值、有效利用、讓文物活起來」的新時代文物工作方針，進一步強化了文物多重價值挖掘和有效利用在今後文物工作中的關鍵地位，為新時代文物事業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接下來，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將從五方面踐行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行動。

一是以柬埔寨、烏茲別克斯坦、尼泊爾文物保護修復合作項目為抓手，通過「借船出海」的形式拓展合作縱深。力爭形成集文物基礎研究、價值挖掘、不可移動文物保護修復、館藏文物保護修復、世界遺產、人才培養、文物闡釋利用、展覽展示於一體的全鏈條式國際合作模式，通過文化遺產品牌效應驅動區域旅遊、文創研發，增進包容性產業聚集，從而提升文化遺產國際合作的綜合效益，促進民心相通。近期，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擬在尼泊爾加德滿都杜巴廣場九層神廟修復專案現場設立永久紀念標識及展覽。

二是做好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聯盟秘書處籌建工作。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聯盟是面向國際社會的亞洲政府間文化遺產專業性交流合作機制，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聯盟秘書處將承擔聯盟運行、管理、聯絡、協調等工作。目前，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正在全力推進與亞洲國家商簽《關於協同開展「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行動」的聯合聲明》，籌備擬於2022年底召開的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聯盟發起國會議等工作。

三是開展亞洲文化遺產保護青年大使計劃。青年是共同提升亞洲文化遺產保護利用水準，助力亞洲文化遺產的長效保護與經濟社會、文化旅遊、環境保護等協同發展的重要力量。亞洲文化遺產保護青年大使計劃旨在搭建青年交流互鑒平台，通過遴選專業青年大使、傳播青年大使開展聯合科研、人才交流訪問、合作基地建設等務實專案，為亞洲文物國際交流合作和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培養有生力量。

四是在國家文物局的領導下，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正在籌建國家文化遺產科技創新中心。該中心致力於建成國家文化遺產保護科學和關鍵技術研發創新中心，國家文化遺產保護監測平台，國家文化遺產交流合作平台和國家文化遺產保護科技成果轉化平台。未來擬建成國家文化遺產交流合作平台及功能齊全、設備先進的多種實驗室。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秉承開門辦院的合作理念，歡迎大灣區相關院校、機構構建戰略合作關係，搭建亞洲合作平台，攜手為亞洲文化遺產保護利用事業添磚加瓦。

五是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已成立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北京）基金會，為有志於參與文化遺產保護利用的社會力量搭建慈善平台，歡迎大灣區相關企業、機構支援基金會發展。

過去的二十餘年，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在文化遺產保護國際合作領域經歷了從小到大、由點到面、由淺入深的發展歷程。從東南亞燦爛輝煌的吳哥文明，到中亞古老悠久的伊斯蘭文化，到尼泊爾加德滿都谷地建築獨特的藝術風格，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的工作者們，迎接了無數的機遇挑戰，創造了眾多的輝煌成果。以持之以恆的努力實踐，推動了亞洲文化遺產保護的國際交流合作，也促進了中國與亞洲各國文明的交流互動。未來，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願與國內外同行共同提升亞洲國家文化遺產保護研究與展示傳承的能力與水準，共同努力向世界展現精彩燦爛的亞洲文明。

1 UNESCO: Periodic Reporting 2nd Cycle: Asia & Pacific, 2012, 頁3-4。

2 <https://whc.unesco.org/en/list/?&transboundary=1>

3 UN: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18, 2018, 頁vii。

# 中 國的「海絲」遺產 與遺產管理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原副總工程師、研究員。從事文物建築保護、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近40年，主持文物建築保護設計和保護規劃數十項，參與多項世界文化遺產申報工作，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



沈 陽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中國世界文化遺產中心主任、研究館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世界文化遺產，代表性成果包括哈尼梯田、大運河、花山岩畫申遺文本和規劃等。



趙雲

從文化交流、文明互鑒的角度考察，海上絲綢之路既是古代世界海洋交流的跨區域網絡，也是中國海洋—農耕文明融合發展的互動系統。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發展及其遺產概念的建構是一個不斷豐富的文化過程。結合近年參與「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史蹟」申遺工作的經歷和成果，闡釋中國「海絲」，提出「海絲」遺產面對的問題和對策。在國家推動大灣區建設發展的大背景下，借力實現面向南海的大灣區「海絲」遺產的培育、保護和管理。



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海上絲綢之路研究成為國內考古學、歷史學以及文化遺產領域的一大熱點。國際上，諸如印度「季風計劃」、印尼的「香料之路」，以及美國「重返亞太」等概念或戰略的提出，也使海上絲綢之路成為全球海洋文明史研究和當下國際政治文化的焦點議題。「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是發展基礎設施和商業關係，具有深厚的古代貿易網路和文化傳播基礎。<sup>1</sup>但由於「海絲」命名的浪漫化意味和海上貿易體系缺乏實際「線路」遺存的固有特徵，海上絲綢之路概念還存在一定的再解讀空間。在此過程中，如何還原與海上絲綢之路相關的歷史原貌，達成國際層面的一致認識，講好絲路故事、傳播中國智慧，是尤為關鍵的。本文在「遺產」的語境下討論海上絲綢之路的概念體系、中國的海絲遺產特徵、體系建構和保護管理策略。

## 一、海上絲綢之路的概念體系

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發展及其遺產概念的建構是一個不斷豐富的文化過程。國內外學術界從遺產角度對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可以追溯至20世紀50年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啟動的「關於東方與西方文化價值交融的東西方合作項目」，<sup>2</sup>之後更有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該組織開展的為期十年的「絲綢之路整體研究：對話之路」，以及圍繞申報世界遺產，由該組織和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共同推進的絲綢之路「概念性文件」和「主題研究」。儘管這些研究已取得重要成果——2014年「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也都明確將海上線路作為絲綢之路體系的重要構成，為「海絲」申遺奠定了理論基礎。2016年，中國開展「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史蹟」的主題研究和申遺工作，從文化交流、文明互鑒的角度考察，所提出的遺產定義以及板塊、交流活躍區、節點等核心概念，在國際學術研討中獲得廣泛認可，目前已成為遺產語境下「海絲」論述的核心基礎。

## 1. 「海絲」遺產定義

海上絲綢之路是在西元前2世紀至19世紀中後期蒸汽動力取代風帆動力前的漫長時段裡，古代人們借助季風與洋流等自然條件，利用傳統航海技術溝通世界中低緯度主要海域及沿海地帶，開展多領域交流的海路網絡。

這一網絡因其時間、空間之廣闊，涉及人群之眾多，而滙聚了海量「資訊、事物、發明的交換與傳播，以及人類對此所作出的各種反應」，<sup>3</sup>在塑造人類歷史的各種相互交往的網絡中具有突出價值。

## 2. 空間框架：板塊、節點片區與交流活躍區

作為一個複合的交通體系，海上絲綢之路東至東亞的日本列島，西達地中海西岸，根據地理空間特質及歷史發展進程，其所涉及的區域可分為六大板塊：東亞、東南亞、南亞、西亞、東非、地中海。

「海絲」在形態上呈現為一個以重要港口為基礎，由連接各港口的眾多航線交織而形成的海路網絡。以港口為核心，以重要水道交通、航海基礎設施為基礎，結合海上貿易品的生產設施及/或貿易和人文交流活動相關產物在內的整個廣闊區域，成為構成海上絲綢之路整體形態最重要的節點片區(nodes)。

在海上絲綢之路的整個交流網絡中，有一些節點片區，在物資、技術、人口、購買力等方面為跨板塊的航行提供了尤其重要的支撐和保障，這些節點的地理分佈也相對比較集中，其所連接的區域成為海上絲綢之路所承載的商貿、文化、技術交流的核心地區，同時它們也是這些交流的物化見證分佈最密集的區域，成為一系列「交流活躍區」(spheres of active interaction)，是海上絲綢之路獨特價值最重要、最典型的載體。

此外，從海陸互動的角度來看，腹地的「海絲」遺產也是構成遺產網絡的重要內容。客觀方面，絲綢、瓷器、香料、茶葉等船貨並非完全產於海洋或海上，宗教文化交流也往往呈現海陸一體的局面。主觀方面，「海陸一體化」並不是現代人需要的「創新」，如中國歷代中央政府都將陸地與海洋、內地與海外發展一併納入國家制度建設與「日常行事」。<sup>4</sup>因此，海上絲綢之路也是包括中國在內的諸多沿線國家和地區海洋——內陸文明融合發展的互動系統。

## 3. 空間框架：四個主要時期

西元前2世紀之前，各個板塊內部及一些相鄰板塊之間已經形成了一定的海上貿易交往。但是，在古典時代之前，遠距離貿易存在很大的風險。隨著古典時代的統治者大力修建基礎設施，並建立起彼此相連的龐大帝國，遠距離商貿的成本降低了。<sup>5</sup>到西元前2世紀左右，隨著各條線路的發展，商業規模的擴大，連接各大板塊的海上絲綢之路正式形成。

在長達兩千年的歷史中，海上絲綢之路又呈現出特徵鮮明的四個主要時期。第一個時期(西元前2世紀到6世紀末)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肇始期，此前地區性的貿易網路相互聯

繫，初步形成全球的貿易體系，並在此體系之上帶動了人員與宗教的交流。第二個時期(西元7世紀初到10世紀末)為海上絲綢之路的成熟期，貿易與文化交流網絡進一步體系化發展。第三個時期(西元11世紀初到15世紀中期)為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期，形成了文明間、人群間的多元和諧共處的繁榮景象。第四個時期(西元15世紀中期到19世紀中後期)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轉型期和繼續發展時期，隨著新航線的拓展和貿易規模的增長，貿易主體和貿易方式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但以季風為主要動力這一點卻在相當長時間內未發生變化，因此仍可視為海上絲綢之路傳統聯繫的繼續。<sup>6</sup>

19世紀中後期以後，蒸汽輪船取代木帆船成為海上貿易的主要交通工具。一些歐洲國家在海上貿易線路沿線的大部分地區建立了廣泛的殖民統治。至此，傳統的海上貿易線路完成了向近代海上貿易線路的過渡。

## 二、中國的「海絲」遺產

### 1. 中國的「海絲」申遺工作

從沙畹1903年提到「絲路有海陸兩道」算起，「海上絲綢之路」概念誕生距今只有120年的歷史，中國學者在20世紀30年代也開始關注並研究這一觀念。1934年，向達先生在其所著《中西交通史》一書中表述的觀點已經包含了後來出現的「海上絲綢之路」的含義。60年代以後，饒宗頤、陳炎等先生則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使這一觀念得到廣泛的認可。海上絲綢之路遺產的保護也逐漸引起相關方面的重視，相繼開展了力所能及的保護工作。

2016年，中國國家文物局正式啟動「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史蹟」的申遺工作，以廣州、泉州、寧波、南京等9座城市的31處遺產點為重點，開展遺產內涵、價值和保護管理措施研究，完成主體報告、申遺文本和保護管理規劃。

2017年，面對泉州「刺桐城」單獨申遺的負面影響，「海絲」申遺項目進入2.0版階段，在國家文物局統一部署和相關各省市的支持下，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世界文化遺產中心全面開展「海絲」遺產資源調研，對相關各省提交的170多處具有或可能具有相關內涵和價值的申報點進行評審覆核，進一步研究「海絲」遺產構成，建構遺產體系和申遺策略；開展國際機構和遺產專家的合作研究，以期獲得更多的國際認可。由海絲遺產點所在城市組建的「海絲」申遺城市聯盟涵蓋了沿海多個城市及內陸城市長沙和香港、澳門特區，成員總數擴展到28個。

目前，此項工作仍然在國家文物局統一部署下，持續推進，並尋求更廣泛的國際合作。

### 2. 「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史蹟」的遺產構成

借鑒國際國內一百多年來對「絲綢之路」的研究成果，「海絲」遺產從「物產、貿易、文化」三個方面考慮遺產的構成要素，涉及古代海洋貿易活動的有碼頭、航標塔、庫房遺址，物產方面包含窯址、聚落等海洋貿易物品的生產設施和相關人群的生活設施，佛



「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史蹟」遺產點分佈圖（自繪，底圖審圖號 GS(2019)1824號）

教、天主教、伊斯蘭教以及民間信仰等文化遺蹟、海外來華人員的墓地等，作為與貿易活動伴生的文化交流活動的重要見證，也必須納入構成要素。

基於這樣的思考，歷經幾輪修改，2020年10月，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中國世界文化遺產中心完成了《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國體系主題研究報告》，提出包括56處遺產點和14處關聯點的「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史蹟」名單。在這70處遺產點中，包含了港口、碼頭、航標、船廠、運河等與航運直接相關的遺存14處，管理設施8處，祭祀設施6處；產品曾銷往海外的製瓷窯址（生產設施）10處；由海外貿易活動衍生的宗教場所、墓葬、聚落和特殊標誌物32處。基本涵蓋了中國古代海洋貿易及文化交流活動的各個方面。

### 3. 溝通世界交流的文明之路

海內外學者對「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證實，這條活躍了幾千年連接東西方的海上大通道，是一條貿易之路、文化交流之路和友誼之路，這也是我們構建「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史蹟」遺產體系的基本理念。

從經濟角度看，船舶運輸是一種經濟實惠的貨運形式，從古至今持續發展壯大，由此建立起連通世界經濟的海上交通幹線，海上絲綢之路也由此連起一個世界範圍的貿易體系，而中國從兩千多年前起就一直這一貿易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

借助古代史籍和地圖、「海絲」沿線的考古成果和博物館的藏品，不難認知中國在古代世界海洋貿易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國生產的大量瓷器、茶葉、絲綢、漆器、金銀鐵器、工藝品，甚至糖果、食品，通過水路東渡朝鮮、日本，向南通過東南亞運往南亞、非洲、歐洲，不僅是炙手可熱的商品，還是對身份地位的加持。香料、珠寶等大量外國的特產也通過這條交通線，進入中國，極大地豐富並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

海上絲綢之路不僅僅是貿易之路，它更是一條串聯了中華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埃及文明、羅馬文明的文化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在頻繁的商貿活動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把各自的文化、信仰帶到其他地方，把不同地區連接起來，極大推進了文化方面的傳播與交流。印度教、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通過海路廣泛傳播到中國的東南、西南沿海地區，中國的儒家思想、關聖文化和媽祖崇拜也被帶到世界各地。在相互尊重、相互溝通、相互交通的基礎上，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社會背景的文化交匯包容和融合，促進了人類文明的繁榮與進步。由此可以認為，海上絲綢之路見證了風帆航行時期，東西方文明和以瓷器為代表的生產工藝沿海路傳播與交流的歷史，是古代人類價值跨海交流的典範。

古代的海洋貿易活動，不僅包含造船技術、航海技術、航路航線、港口設施等與海洋航行直接相關的內容，也包括貨物貿易、航海事務和人員往來管理等活動，還涉及國家政治與外交、宗教信仰、語言溝通、生產製造和生活習俗等社會活動。在風帆航行時代，維繫這條海上貿易和文化交流之路，不僅需要航海參與者冒險、探索的勇氣，也離不開國家、地區、人民包容開放的博大胸襟和團結協作，因此，海上絲綢之路在見證人類沿海上絲綢之路歷史悠久的風帆航行與貿易和相關的祭祀與信仰傳統的同時，也見證了前人在世界文明發展中的共建、共用、共贏的合作精神。

在海上絲綢之路幾千年的發展進程中，誕生了類似鄭和下西洋、「伊斯蘭先賢來華」等對國家、地區甚至世界發展有積極影響的歷史事件，也湧現了鑿真和尚、伊本白圖泰、馬可波羅等許多勇於探索、促進不同文化溝通交流的重要人物。一些重大的祭祀和節慶傳統流傳至今，並對當今世界各國的和平交往做出了積極貢獻。

## 三、「海絲」遺產體系的建構

雖然經過地方申報、現場覆核、評估遴選的工作過程，提出了一份「海絲中國史蹟」遺產點推薦名單，但是距離完成一項滿足世界遺產標準、讓國人和世界認同的世界遺產成品還有很大差距。相較於「陸絲」，海絲遺產點普遍存在分佈零散、規模不大、可觀性差、保存狀態不佳的問題。把這些點有效地組織成為有關聯體系的集合體，建構「海絲」遺產的構架體系是不容忽視的重要步驟。

建構中國的「海絲」遺產體系，首先應依據古代海洋貿易活動的基本規律和特點：把一件產品，不管哪一類物產，變成一件商品，再通過陸路、內地水路轉運到海洋貿易的集中地，然後再搬運至海船上，漂洋過海輸送到東南亞、南亞、中東和歐洲。「海絲」遺產應能夠通過自己擁有的內涵價值印證這一系列活動的歷史場景，也應該按照這種活動規律整合那些具有關聯性的「海絲」遺產點。

建構中國的「海絲」遺產體系，還要結合與海洋貿易活動相關的歷史地理空間特點。從海洋的視角看，依託南海、東海和黃渤海的古代海洋貿易活動，承擔著不同的功能作用，提供了不同地區獨特的物產，也顯示了不同的物資需求，順其自然地實踐了互通有無、各取所需的社會職能。通達海洋的江河水系是運輸貨物的主要交通途徑，長江、珠

江、閩江等大江大河自然就成為聯繫古代海洋貿易活動的重要紐帶，再加上支線河流的支援，使內陸地區的各類貨物有可能以比較實惠的價格和相對輕鬆的勞動形式轉運至海邊，這是古代海洋貿易的前提條件。

建構中國的「海絲」遺產系列，還應該尊重古代歷史事實，代表重要的歷史事件，弘揚古人為實現人類文明交流發展勇於付出的崇高精神。

根據這樣的思考，我們一方面以驛道、江河為骨幹，以重要的港口為重心，串聯起周邊零散的遺存點，並把這些遺產點各自擁有的原功能和內涵價值綜合考慮，基本組合出若干個局部區域古代海洋貿易活動的完整面貌。另一方面，把這些以水系為基礎建立的區域遺產物件放置於海洋空間，從而構成南海、東海、長江流域和黃渤海四大「節點片區」，最終完成中國「海絲」遺產構成體系的架構。基於這樣的架構體系，除了有序組織與海洋貿易直接相關的遺產點外，也可以將與海洋貿易伴生的各種文化交流遺存順理成章地納入遺產構成。

基於這一體系構架，對已列入的70項海絲遺產點進行組合，使遺產構成變得更加清晰。以福州地區的「海絲」遺產為例。從福州歷史、文獻和已確認相關遺產點看，閩江作為一條連接山、海的生活線，把多處遺產點串聯在一起，形成包含瓷器生產、運輸、貿易、航行到管理各環節的古代海洋貿易活動面貌。其中最突出的歷史事件是鄭和七下西洋，都是從福州正式出發，這也成為福州「海絲」遺產的價值亮點。在遺產認知上，一方面，要強化福州作為鄭和下西洋出發地的價值地位，整合與之有關的聖壽寶塔、羅星塔、船塢等史蹟；同時，也要思考為什麼鄭和要選擇福州作為下西洋的起點。千年的造船、航海、貿易歷史為福州奠定了東南沿海重要的海洋貿易中心地位，提供了籌備大型船隊遠洋所需各類資源的基礎條件。由此，把懷安窯址、閩王祠、邢港碼頭等史蹟納入



福州市羅星塔老照片（福州市歷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員會提供）



「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史蹟」福州地區遺產點分佈圖（自繪，底圖審圖號 閩S〔2021〕46號）



福州市羅星塔（拍攝者：侯文瀾）



福州市福建船政一號船塢（拍攝者：馮遠）



作為鄭和下西洋史實的歷史支撐，也就順理成章了。同時，也要將與鄭和下西洋有關的南京市、太倉市聯繫在一起，並且各自定位在這一歷史事件中的特殊價值，從而形成相對全面的「鄭和下西洋」系列遺產點，將散亂的點變成一個有組織的群體。

## 四、「海絲」申遺與遺產的管理

### 1. 「海絲」遺產的管理

儘管如前所述，我們對「海絲」遺產點做了比較謹慎的選擇，並且通過搭建體系，儘量強化「海絲」遺產的價值，但是，各遺產點的現狀不佳，也是客觀事實。

對照交河故城、張掖大佛寺等陸上「絲綢之路」遺產點，「海絲」遺產點除了零散、規模小、後期破壞或改動過大等普遍問題外，還有基礎工作薄弱、考古不到位、內涵和價值認知不到位甚至不準確等問題。為此需要依照世界遺產相關管理要求，通過必要的考古發掘、深入的學術研究和不可或缺的管理手段，進一步釐清遺產點的內涵和價值，辨識其真實性和完整性，向社會和公眾展示相對清晰又可觀賞的古代遺存。

經過了幾百上千年的環境變遷，很多古代海洋貿易的遺蹟或埋在地下或沉於海底，僅憑一些文獻的記載，很難說清這些遺蹟到底反映了哪個時代、哪些人群的哪些活動，也就沒辦法準確認知其原有形態和歷史作用。只有依靠有針對性的專業考古探查或發掘工作，才有可能解決這一基本問題。

加強管理是提高「海絲」遺產品質必不可少的手段。《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遺產公約》）強調，為集體保護世界遺產，要「建立一個依據現代科學方法組織的永久性的有效制度」《實施〈世界遺產公約〉操作指南》（《操作指南》）要求，「世界遺產的保護與管理須確保其在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時所具有的突出的普遍價值以及完整性和/或真實性在之後得到保持或加強」，<sup>7</sup>不僅設置專章，闡釋遺產的「保護與管理」，而且通篇把保護管理作為遺產工作的核心內容。「海絲」遺產分散、不起眼的缺陷除了使社會各界忽視其價值，也導致相關管理工作不到位甚至缺失。

### 2. 規劃是管理的必要手段

制定文化遺產的管理規劃，是依據《遺產公約》和《操作指南》中強調的加強遺產保護管理的要求所採取的一種有效措施。著名遺產保護專家伯納德·費爾頓爵士牽頭組織編寫的《世界文化遺產地管理指南》特別強調制定管理計劃、操作程式和預算管理的作用。通過管理規劃，對遺產資源進行組織，協調相關各方面的行動，特別是在歷史區域保護、改造、復原工作中指導保護工作以避免降低相關居民的生活標準。<sup>8</sup>針對「海絲」遺產的特點和不足，編制保護管理規劃，還有助於進一步建構遺產的價值體系並在保護管理過程中，採取有效的實施步驟，以使遺產價值得到最大力度的闡釋和展示。針對遺產現狀和保護、管理要求，通過管理規劃，有序組織各類保護專項工作，建立健全管理機制，配合遺產的展示合理配置基礎服務設施，維護利益相關者的合理權益，為全民

提供享受遺產福利的機會，都是「海絲」遺產保護必須承擔並通過管理規劃實現的工作內容。

### 3. 申遺策略

「海絲」申遺對國際遺產界是富有很大吸引力和開放性的議題，也是一個可謂「眾望所歸」的話題。近年來數次國際學術研討活動都不斷呼籲「海絲」遺產申遺，並提出了建設性的見解。我國在積極開展國內「海絲」遺產保護和研究的基礎上，圍繞「海絲」申遺的國際交流合作，在國際層面積極推動海絲主題研究，深度參與研究進程。同時，探索區域性合作和雙邊合作機制，爭取促成聯合申遺項目。

- 1 (英) 羅瀾：〈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李伯重、董經勝主編：《海上絲綢之路：全球史視野下的考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頁306-307。
- 2 趙雲、燕海鳴：〈海上絲綢之路：一個文化遺產概念的知識生產〉，《故宮博物院院刊》，2021年11月，頁21-29。
- 3 (美) 約翰·R·麥克尼爾，(美) 威廉·H·麥克尼爾著，王晉新等譯：《人類之網：鳥瞰世界歷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1。
- 4 葛美珠：〈中國古代海洋文化的「海陸一體」〉，曲金良主編：《中國海洋文化發展報告（2015年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頁170-176。
- 5 (美) 本特利，齊格勒著，魏鳳蓮等譯：《新全球史：文明的傳承與交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309-323。
- 6 劉迎勝：《海路與陸路：中古時代中西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56。
- 7 《實施〈世界遺產公約〉操作指南》2019年中文版。
- 8 費爾登·貝納德·朱卡·朱可托著，劉永枚、劉迪等譯：《世界文化遺產地管理指南》（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4。

## 參考文獻

[瑞典]斯文·赫定著，江文、李紅娟譯：《絲綢之路》（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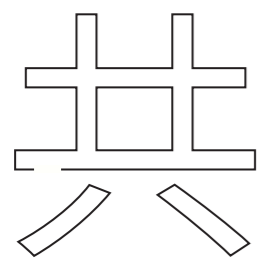
[法]沙畹著，馮承鈞譯：《西突厥史料》（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陳炎：〈略論海上「絲綢之路」〉，《歷史研究》，1982（3），頁17。

《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引言，1972年10月，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大會第十七屆會議通過。

費爾登·貝納德·朱卡·朱可托著，劉永枚、劉迪等譯：《世界文化遺產地管理指南》（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8年）。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駐華代表處：《世界文化遺產管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文物局資助，中國古蹟遺址保護協會翻譯製作。



## 共同的記憶 共同的遺產

###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 教育文化遺產遊徑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建築學博士，研究館員。  
中國古蹟遺址保護協會理事，廣東省古蹟保護協會理事  
事長。廣東省政協委員。長期從事文化遺產保護理論研  
究和實踐工作。主持或參與了粵港澳大灣區文化遺產  
遊徑、抗戰時期華南辦學舊址、南粵古驛道、海上絲綢  
之路申遺等重點專案。國家文化和旅遊部優秀專家，廣  
東省宣傳思想文化領軍人才，國家文物局專家庫專家，  
住建部名城委專家庫專家。



曹勁 博士

中山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碩士，廣東省古蹟保護協會副秘書長。自2019年起參與華南教育歷史研學基地建設，進行抗戰教育歷史研究及辦學舊址保護和活化利用工作。



張羽

抗戰時期，為躲避戰火，我國眾多學府曾踏上艱辛的遷徙辦學之路。粵港澳地域相連，文脈相通，三地文化教育機構在烽火中守望相助，留下了共同的教育記憶。自2019年起，廣東省依託南粵古驛道保護利用工作，以深挖抗戰時期粵地教育歷史為基礎，開展了華南教育歷史研學基地的建設，至今已初具規模。對抗戰辦學遺址進行保護和修繕，融合自然地理與人文歷史資源打造教育文化遺產遊徑，舉辦豐富的文化體育活動，引起了廣泛的社會關注。當下，粵港澳正聯動建設大灣區文化遺產遊徑，容納進三地抗戰辦學史蹟，關聯我們共同的教育遺產，將豐富遊徑系統的歷史內涵，提供更加多元的文化體驗，同時也是凝聚民族精神、共建人文灣區的助力。

## 一、 抗戰中粵港澳三地文化教育的守望相助

**1** 1937年8月31日，廣州第一次遭到日機空襲，隨後，廣東各縣市的轟炸聲漸漸密集，文化教育機構遭受損失的消息頻頻見諸報端和政府報告。港澳與廣東毗鄰，經濟、文化緊密相連，中文教育也深受內地影響。當時，香港的私立中學雖依照港英政府的規定註冊、辦理，但也向國民政府教育部以及華僑委員會立案，粵港澳三地青年學子異地求學深造十分常見。抗戰爆發後，很多在廣東讀書的港澳學生回家避難，而廣東的許多院校則為繼續辦學，同時也利於接收港澳學生就讀，紛紛設立港澳分校，與內地同時教學；或直接關閉內地校舍，遷往港澳復課。

### (一) 遷辦港澳的廣東院校

根據目前史料梳理所見，抗戰全面爆發以來，廣東遷辦港澳辦學的專科以上學校（高等學校）有私立嶺南大學、私立廣州大學、私立廣東國民大學、私立光華醫學院等校。國立中山大學雖未遷港澳，但將古籍善本和部分設備儀器寄存九龍以避戰火，另將農林植物研究所移至九龍開辦。中等教育方面，有省立執信女子中學、私立培正中學、培道中學、真光中學等30餘所，職業學校則有省立廣州農工業職業學校和私立仲愷農業職業學校等。

彼時，港澳為內地院校提供了較為安穩的環境，而隨著內地文化教育資源和大批文化名人的流入，香港的文化教育活動也活躍起來。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成為文化盛會的中心，曾舉辦「漢代木簡展覽會」、「廣東文物展覽」和「古代法書展覽」等<sup>1</sup>。抗戰爆發前香港只有兩所專科以上學校——羅富國師範學院和香港大學，隨著嶺南大學、國民大學、廣州大學等校內遷，還有在港新創辦的私立南華學院，粵港高等教育的交流也密切起來。當時報載：香港的教育進入蓬勃的時期<sup>2</sup>。

## (二) 太平洋戰爭後內地對港澳學生的收容

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帶來粵港澳學生流動的轉向。1941年至1942年，內地學校紛紛回遷，大批港澳學生也穿過淪陷區，從水路、陸路一路艱難跋涉回內地求學。為救濟香港大學師生，教育部與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和香港大學聯合成立了香港大學臨時協濟委員會，積極與國內各公私立高等學校聯繫，請求准予收容回國的港大學生借讀。根據港大臨時協濟委員會常務委員杭立武的報告，至1942年12月25日，由該會介紹的港大歸國僑生借讀於國內各大學者計276人，其中在國立中山大學借讀的有78人，在私立嶺南大學借讀的有30人<sup>3</sup>。香港大學近600名在學學生，內地借讀人數約佔了一半<sup>4</sup>。

1942年，廣東省教育廳頒佈《廣東省救濟港澳及海外回國之學校員生暫行辦法》，說明：為救濟由香港澳門及海外回國之學校員生，及省內各校依賴僑匯接濟而現在經濟來源斷絕之學生（僑生）起見，特制定本暫行辦法…除發放救濟費外，沿海24縣市應特別注意接濟港澳及回國員生的工作，登記之後就近介紹服務或就學去處，或指引到韶關，向省教育廳報導、登記、介紹就業就學；各學校應盡力收容，甚至增班收容。廣東省教育廳統計，僅1942年7至8月，在該廳登記的香港僑生即有共553人，1942年12月登記的僑生有中學生325人<sup>5</sup>。

## (三) 共同的教育記憶

抗戰烽火中，粵港澳命運緊密相連，三地文化教育機構之間的交流與互助，共同承托起重任，為中華青年留下了希望和未來。在今日粵港澳三地的院校中，許多院校的校史中都記載著這段歲月，只是，八十載過去，已經少有人提及。在今日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國家戰略背景之下，在共建共用人文灣區的願景之中，回溯抗戰時期粵港澳三地文化教育共同走過的烽火歷程，是我們情感相攜與價值相連的紐帶。

## 二、 華南教育歷史研學基地

廣東省自2016年起開展了南粵古驛道保護利用工作，對散佈在南粵大地上的古道進行調查、保護、研究和利用，經過數載深耕，成果斐然。今天，南粵古驛道已經成為廣東文化遺產的一張名片，並由此衍生出文化、體育、旅遊等領域中的許多品牌項目。

華南教育歷史研學基地建設就是近兩年來南粵古驛道保護利用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抗戰時期，眾多粵港澳院校這一段悲壯的遷徙辦學歷程，在中國的教育史和抗戰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頁，也在南粵古驛道及沿線留下了眾多史蹟和故事。華南教育歷史研學基地以歷史文化為基礎，以古驛道及周邊抗戰辦學史蹟為載體，營造可供今人徜徉於歷史情境的場所。它由點及面，覆蓋地域廣泛，目前在韶關、清遠、梅州和雲浮四市五地已經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建設進展。其中，韶關的樂昌坪石研學基地和滇江大村研學基地，分別是國立中山大學和私立嶺南大學抗戰辦學舊址，兩處的建設成果具有示範效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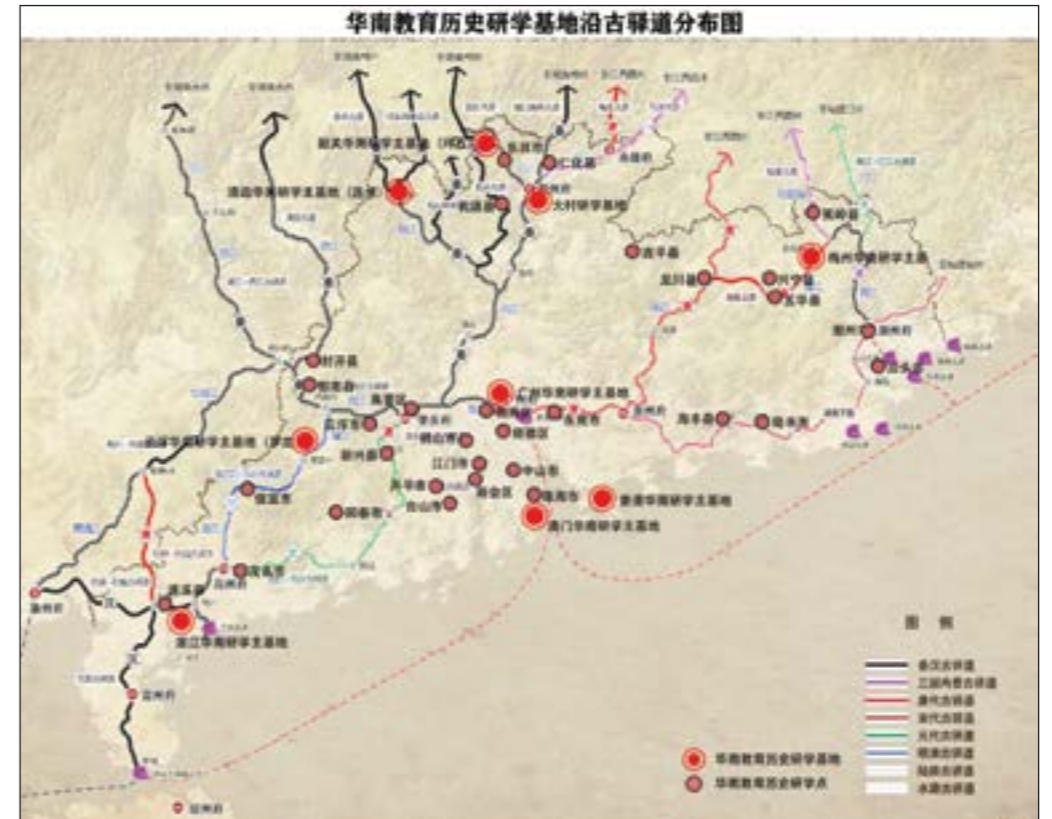


圖1 華南教育歷史研學基地沿古驛道分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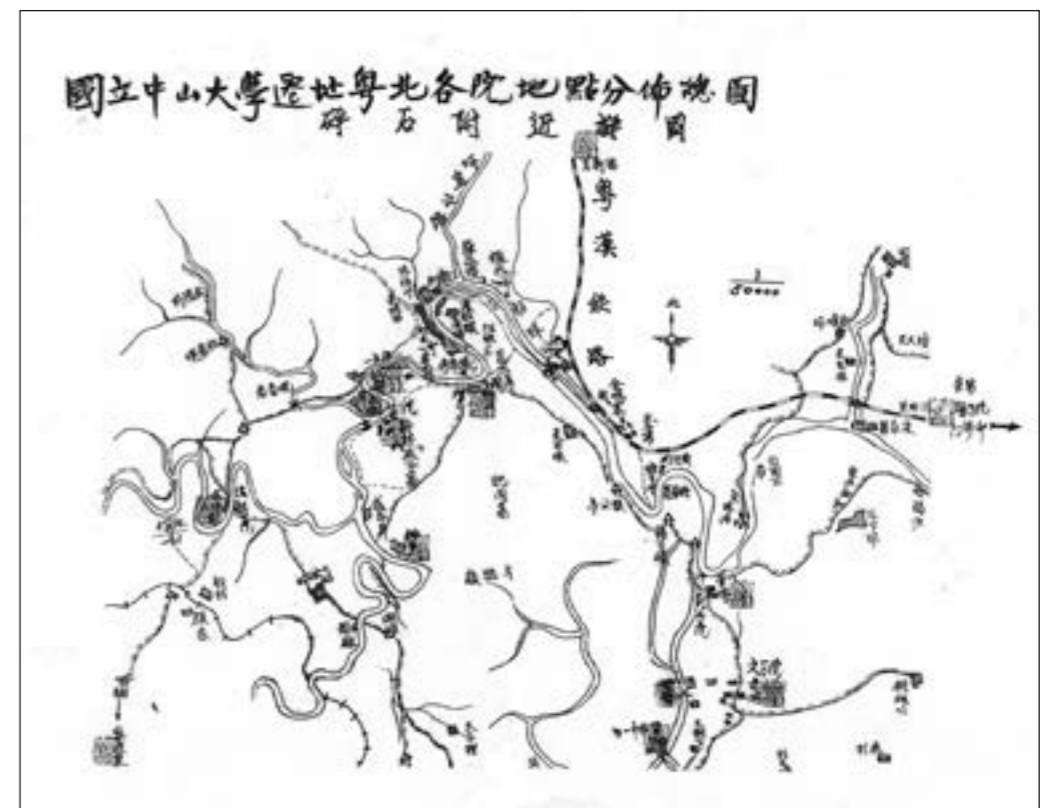


圖2 國立中山大學遷址粵北各院地點分佈總圖（虞炳烈先生手繪）  
坪石研學基地以國立中山大學各學院的辦學舊址紀念園地為基本組成部分。

### (一) 樂昌坪石研學基地

韶關市樂昌坪石鎮地處湘粵交界，西京古道沿線，有武江蜿蜒而過。1940年，國立中山大學遷徙至此，辦學四年。學校的中樞設在坪石老街上，各學院則沿武水分佈於兩岸山村之中。文學院先是位於清洞，後遷到老街附近的鐵嶺，當年向粵漢鐵路租用的小樓至今還保留著。法學院先在靠近湖南宜章的武陽司，後遷至車田壩，兩座村落中都遺留著師生住過的房舍。理學院位於塘口村，這裡有形制優美、保存較好的古建築群，尤為值得注意的是，附近小山崗上還留存著戰時校園天文台的遺址。工學院在新村和隔江相望的三星坪村，這裡保留著始建於清代的三星坪碼頭，是西京古道的重要節點，也留存著許崇清校長舊居和工學院曾租用來教學的祠堂和民居。師範學院位於管埠村，環境清幽，留存著「清泉里」等辦學舊址。此外，坪石還有私立嶺南大學農學院、培正培道聯合中學、仲愷農業職業學校以及國立第三華僑中學等校的辦學舊址。坪石這個古道邊上的交通要地，抗戰時期成為多所院校的棲身之所。

工作人員細緻搜尋辦學遺存，經過科學的保護和修繕，循序漸進的規劃設計，配合以環境景觀和基礎設施的提升，目前已經呈現了坪石研學基地的全貌，基本完成了各處重要節點和學院紀念園地的建設。自2019年起，就有一批批社會各界公眾到訪，參觀史蹟和主題展覽，參加各類文化體育活動。



圖3 抗戰時期私立廣州培正培道中學坪石分校的牌坊



圖4 坪石長尾洞中學紀念園今景，攝於2021年。  
長尾洞中學紀念園是抗戰時期由港澳內遷粵北的培正、培道中學設立聯校的舊址，今天，分散於三地的學校仍有相同的名字，在紀念園中，三地的學子可以親身踏足他們校史中記載的地方。

## (二) 滇江大村研學基地

滇江大村位於韶關市犁市鎮。1942年，私立嶺南大學從香港回遷內地，落腳於此。校園坐落於小山丘上，校舍是竹織批蕩的簡易建築，以「懷士堂」為中心，大學部和附屬中學分列東西兩側。嶺大師生們仍以廣州康樂園中建築的名字為這座山村校園的校舍命名，以志不忘來處。原址蘇州的東吳大學也曾在戰時遷徙至韶關，與嶺南大學為鄰。

竹織批蕩的簡易建築無法經受數十年歲月，大村研學基地建設啟動之初，山丘上草木扶疏，已經沒有任何建築遺存。工作者經過細緻的文獻考證，結合田野踏查和考古發掘，逐步推測出大村校舍佈局，並根據史料記載的建築形制和材料，在原有位置復原出「懷士堂」、校道「文士路」等重要校舍和設施，作為研學基地活動開展的場所。在大村山腳下的村落中，工作者從歷史中提煉思路，擇老建築進行修繕和再利用，營造了「玉清書舍」、「四姑醫務室」、「大村小舞台」、「大村飯堂」等方便當地村民生活的場所。村落中古井、古橋和古驛道等歷史遺存豐富，正逐步進行保護修繕，通過提升環境景觀的歷史氛圍，將研學基地與其周邊歷史地理情境融於一體，為來者提供沉浸式的體驗。



圖5 遠望嶺南大村校園，攝於1942年。  
(來源：<https://library.yale.edu/>)



圖6 歷史照片中的大村懷士堂  
(來源：<https://library.yale.edu/>)



圖7 復原的懷士堂室內，多功能的研學活動場所。



圖8 玉清書舍  
「嶺南才女」冼玉清先生從澳門冒著戰火來到大村執教，曾自述在學校的圖書館中「掛單」。此處擇村中舊建築改造為書室，是方便村民閱讀的地方。



圖9 四姑醫務室  
四姑是嶺南大學的校醫，抗戰時期，不僅給學校的師生看病，也為附近的村民開藥。如今的四姑醫務室也是村民求醫問藥的場所。

### 三、 華南教育歷史研學基地歷史文化遊徑

抗戰辦學史蹟分佈的地理空間廣泛，類型、價值與闡釋方式多樣，只有將它們串聯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才能共同支撐粵地教育歷史的宏大敘事及內在統一的價值核心，為公眾提供完整的、聯通的體驗，並且提升研學基地的整體影響力。因此，以古驛道、碧道、綠道等實體線路為載體，聯結各個教育文化遺產資源節點，配合以基礎設施、遊憩設施及歷史文化景觀的建設，打造融合自然地理與人文歷史資源的華南教育歷史文化遺產遊徑。

2021年，廣東省公佈的第二批6條歷史文化遊徑中便包括華南教育歷史研學基地歷史文化遊徑，以抗戰時期院校遷徙足跡為主線，跨越韶關、清遠、雲浮、梅州四市，串聯起了省內各主要辦學史蹟，呈現出華南抗戰教育歷史的概貌及不同城市、地區間的關聯。具體到不同地市，辦學史蹟又融於各自不同的鄉土民俗及自然地理環境中，提供了豐富多樣的體驗。從兩個層次來看，是統一主題下多元化的呈現。



圖10 華南教育歷史研學基地歷史文化遊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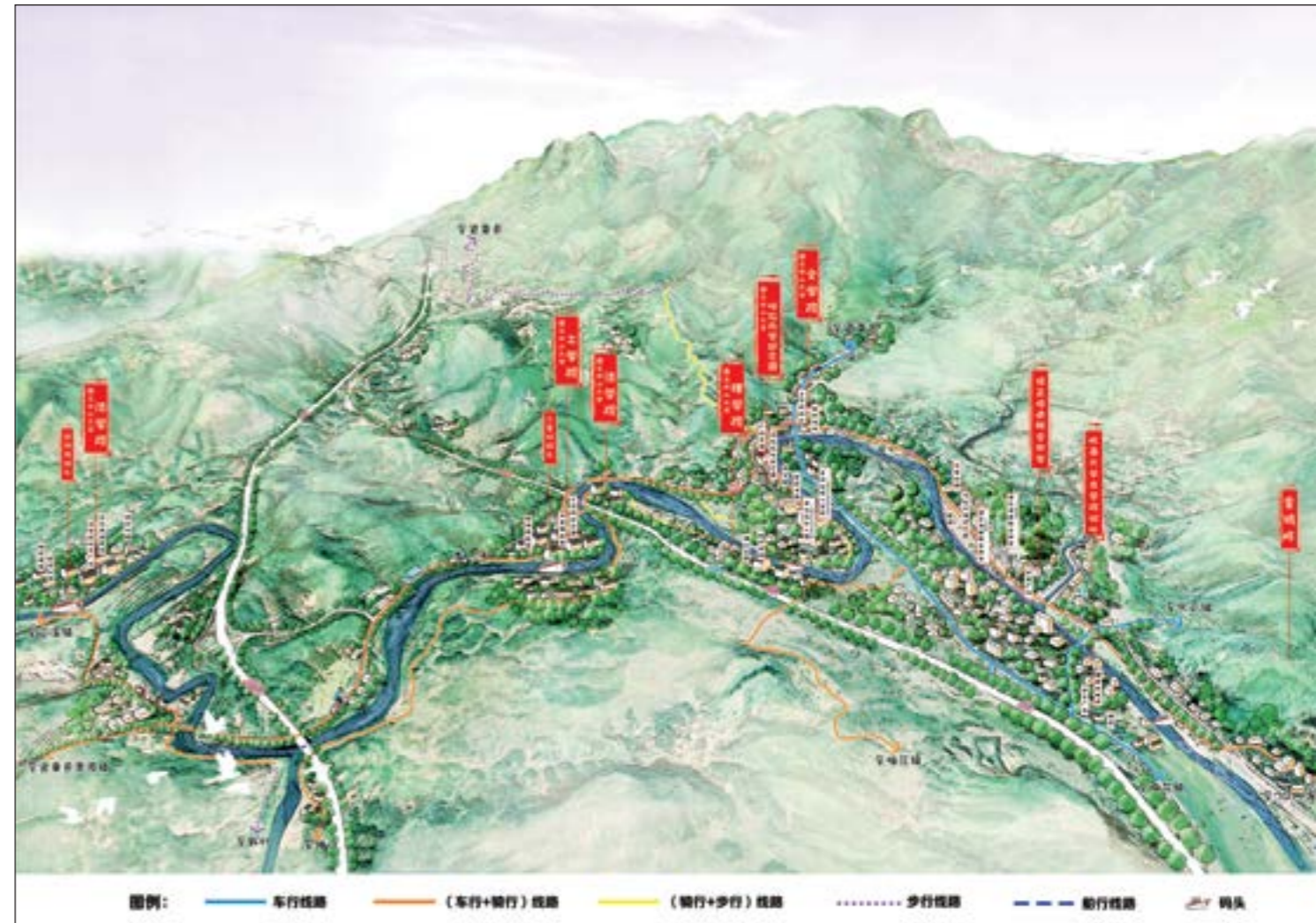


圖11 坪石研學基地遊徑圖  
武江水、古驛道、村道和現代公路串聯起各學院的辦學舊址紀念地。

以韶關坪石研學基地為例。坪石倚山面水，有丹霞地貌的紅色岩系和種類繁多的植被資源，西京古道在山野間留下毛細的路網，歷史村落仍保存著地方傳統文化的閃光。研學基地的眾多節點懷抱於這樣的自然和人文環境之中，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結合史實與人物事蹟，便可打造各具特色的遊徑。

### (一) 武陽司讀書小徑

武陽司村是古驛道沿線的特色村落，也是國立中山大學法學院曾經的辦學地，《資本論》最早中文全譯本譯者在抗戰時生活、執教的地方。村中保留的碉樓和傳統民居已經過保護和修繕，文化站製作了長期的主題展覽。貫穿武陽司村的是一條以原先村道為基礎修葺的讀書小徑，人們沿著江水和岸邊密植的竹林漫步，能感受到傳統村落的歷史氛圍和生活氣息，可以像村民一樣步下碼頭親近江水，也可以瀏覽沿途法學院的各處辦學舊址、參觀主題展覽。

### (二) 長崗嶺古道遊徑

長崗嶺古道是西京古道的支線，可將湖南境內的栗源堡、坪石的武陽司村和三星坪村相連，因此，抗戰時期，位於這三地的國立中山大學農學院、法學院及工學院師生們去往坪石老街校本部，都要經過這條古道，它也被虞炳烈先生標注在手繪的學院分佈圖中。長崗嶺古道也是朱德領導工農革命軍取得「坪石大捷」的主戰場，是一處有著紅色記憶的古道。經過修葺的長崗嶺古道，已經成為一條全長約4公里的遊徑，行走於山水之間，踏過石橋，在涼亭下小憩，彷彿看到師生們當年駐足的身影。

### (三) 新村在望 壯士不留

從理學院所在地塘口村沿江西行，會經過法學院另一處辦學舊址車田壩村，穿過菜地田埂，再沿著古道小路翻越起伏的山丘，便能通往工學院建工系所在地新村。在當年學生的回憶中：「走到最後一個山頭，可望見新村，山頂有小亭子可供休息。有人在亭子上掛了個橫匾，上寫著：『新村在望、壯士不留』」。建工系的陳維屏等學生曾在這裡留下了珍貴的合影。通過實地探訪，這座驛亭今天重回人們的視線，雖然屋架已經殘破，但石柱保存完好，仍見當年模樣。而古道另一端的塘口村，則是中國核子物理研究、教學的啟蒙之地，「中國核能之父」盧鶴紱先生抗戰時期便曾執教於此。在塘口村，還有戰時中國唯一的校園天文遺址，講述了數學天文系師生烽火中觀天的故事。如今，古道與驛亭已修整完成，成為連接坪石研學基地兩大紀念園地的遊徑，人們登頂遠眺河山，也會湧起「新村在望，壯士不留」的豪情。



圖12 沿著江水和竹林延伸的武陽司讀書小徑



圖13 長崗嶺古道的紅砂岩石板路



圖14 抗戰時期建工系同學在古道驛亭上的合影



圖15 今日重現的「不留亭」



圖16 經過修葺的「不留亭」



圖17 在遊徑上眺望江水之景



#### (四) 詩音漫步道

管埠村是抗戰時期國立中山大學師範學院的辦學地，也因為眾多知名學者和藝術家到此執教而成為學術與藝術的高地。這其中便有音樂家馬思聰先生和詩人許幸之先生。許幸之先生晚年的追憶文章中記敘了兩人在羅家渡松林中漫步的場景：在松木、古柏和紅葉掩映的小路上，在松濤與溪水的伴響中，從詩歌到繪畫，從音樂到戲劇，一路暢談。詩人的文章將我們帶回到那條回蕩著詩歌與音樂的小路，數十年過去，這裡風景依舊。詩音漫步道本身是一條保存狀況較好的古道，它所承載的歷史資訊不僅包括抗戰時期高校遷徙辦學的經歷，還包括左聯文化運動、文藝抗戰及香港文化名人營救等眾多相關史實，是一條內涵豐富的歷史文化遊徑。



圖18 許幸之先生創作於1943年的水彩《紅葉山村》



圖19 詩音漫步道上，音樂家現場演奏馬思聰先生的《思鄉曲》

## 四、 華南教育歷史研學基地的活化利用

華南教育歷史研學基地遵循邊保護、邊建設、邊利用的原則。隨著節點建設的次第完成，聯結節點的遊徑漸漸也成型，研學基地的活化利用也有了更加多樣的形式。

### (一) 研學與調查研究

抗戰中粵港澳院校烽火辦學的歷史，在今天三地乃至全國的文化教育系統中留存了文脈。研學基地建設以來，已經吸引了粵港澳大灣區眾多院校到此進行追憶校史、緬懷先師的尋根之旅。省內各專業院校及社會機構也積極參與，利用研學基地的自然和人文資源，面向各年級學生開發寓教於樂的研學課程，為孩子們帶來豐富多彩的活動。

研學基地也為開展研究、科普及現場教育提供了場所。在抗戰年代，先輩學人曾在粵北的山水間進行了多個領域的調查研究，如陳國達、吳尚時先生對丹霞地貌的研究，蔣英先生對植物分類的研究，侯過先生對森林學的研究，楊成志先生對粵北少數民族進行的人類學研究等等，這些研究是留給今人的學術財富，同時也有待今天的學人去繼承和深入。2020年至今，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丹霞山管委會、廣東工業大學等機構、院校開展了丹霞山文化遺產調查研究課題，細緻尋訪散落於陡崖峭壁之上的文物史蹟，為丹霞自然和文化遺產的保護利用提供基礎的學術支撐。華南農業大學的師生多次行走於古道之上，對沿線植物進行考察和分類研究，為粵港澳大灣區生態屏障的研究和保護貢獻專業力量。



圖20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機構聯合開展丹霞山文化遺產調查

## (二) 文體、公益活動

南粵古驛道定向大賽是近幾年活躍在古驛道上的知名賽事，吸引了國內外眾多愛好者參與。2020年6月，定向大賽走進了華南教育歷史研學基地，第一站為樂昌坪石，參賽者在坪石老街上的辦學舊址廣同會館前鳴鑼出發，奔跑於江岸和田疇，沿途在辦學舊址紀念地打卡。研學基地為戶外運動提供了新的路徑和場所，並賦予體育以更多歷史人文體驗。在定向大賽開幕當天，廣州與樂昌兩地兒童在三星坪碼頭上共同唱響了歌曲《為了明天的綻放》，「華南教育歷史坪石研學基地留守兒童幫扶基金」揭幕成立，用於當地教師補貼、外請老師到當地學校支教和組織地方教師到廣州參加培訓等，研學基地成為開展教育扶貧的實踐場所。

## (三) 促進三地文化交流

2020年「粵港澳青年文化之旅」和2021年「港澳與內地大中小學師生交流計畫之發現之旅——嶺南文化與湖湘文化」活動中，來自香港和澳門的青年到訪坪石研學基地。他們探訪抗戰辦學舊址，第一次了解到在粵北的山區，在抗戰年代，三地的文化教育曾共有一段值得銘記的歷史，也為先輩學人在艱苦的戰爭中堅守使命而感慨。研學基地成為一個平台，三地青年在人文歷史情境和自然風光中認識祖國的歷史和文化，萌生彼此情感的親近和認同。

華南教育歷史研學基地建設以來，圍繞其開展了文創大賽、實踐成果大賽、研學課程設計大賽等各類文化賽事和活動，通過報紙、電視等傳統媒體以及新媒體進行了多管道宣傳，並且以華南教育歷史為主題拍攝了電影和紀錄片等影視作品，覆蓋了更廣泛的受眾。隨著研學基地在社會公眾間的知名度提升，大批社會力量被吸納進來，參與共建共用。在古驛道沿線，至今仍有許多村落生活在貧困之中，華南教育歷史研學基地聯結散佈各處的抗戰辦學舊址，打造整合的愛國主義教育和文化旅遊目的地，這種建設資源的集中，與物質、精神文化需求的導引，為鄉村振興、地方經濟文化發展輸入了新鮮血液。

## 五、 串聯粵港澳大灣區共同的文化教育遺產

香港和澳門在文化遺產保育方面有較為成熟的經驗，廣東省通過交流與借鑒，也通過不斷探索和總結，一直在進行文化遺產保護利用及文旅融合發展的積極實踐。在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發展、共建人文灣區的背景之下，2020年和2021年，廣東省連續發佈兩批大灣區文化遺產遊徑，涵蓋八大主題44條實體線路，包括孫中山文化遺產遊徑、海上絲綢之路文化遺產遊徑、華僑華人文化遺產遊徑、古驛道文化遺產遊徑、海防史蹟文化遺產遊徑、西學東漸文化遺產遊徑、近代商埠開放文化遺產遊徑和非物質（粵劇）文化遺產遊徑。遊徑體系以不同主題，在珠三角九市內將散落的文化遺產資源點串珠成鏈，展現了嶺南地區歷史文化特色及粵港澳三地文化交融的歷史淵源。



圖21 2020年6月南粵古驛道定向大賽樂昌坪石站賽場



圖22 三星坪碼頭唱響《為了明天的綻放》  
(來源：南粵古驛道網)

同時我們也看到，大灣區文化遺產遊徑還有廣泛的發展空間。首先，不論是在文化主題層面還是在文化遺產資源連結的實體路徑層面，對於歷史文化的挖掘與提煉都有擴展和深化的需要。擴展是為多元文化的呈現，深化則為加深對歷史文化價值的理解，這決定著遊徑規劃及資訊闡釋，也直接關係到公眾的體驗與收穫。其次，當下的大灣區文化遺產遊徑在廣東省和港澳之間更多的是歷史文化層面上的呼應，缺少地理空間的對接。在大灣區規劃發展進程中，交通連結的便利，「一程多站」旅遊產品的開發和市場培養，都為實現遊徑在三地間，特別是與港澳地區的實體連接創造了條件。在未來後疫情時代，面對龐大的市場需求，這是不可錯失的發展機遇。

近兩年，華南教育歷史研學基地進行了大量基礎性工作，在文化遺產保護利用、社會力量共建共用、以文旅融合帶動鄉村振興等方面提供了有益思路。如能以粵港澳教育歷史為線索，關聯三地的教育文化遺產資源，納入到大灣區文化遺產遊徑系統中，將豐富遊徑系統的價值內涵，為三地公眾提供更加多元的文化體驗，也有助於灣區人文精神的凝聚。三地可以在以下方面進行交流合作。

首先，加強三地在歷史挖掘和研究方面的交流。分享高校、圖書館、檔案館等史料保存機構的歷史資訊資源，交換有價值的研究線索，為彼此的研究提供助力。通過交流合作，我們可以共同還原更加有血有肉的教育歷史，深化對三地教育文化遺產的認知，有益於教育文化遺產保護利用及遊徑系統的規劃建設，也有益於歷史學者、機構進行研究工作。

第二，梳理並關聯三地的教育文化遺產資源，規劃建設可相互呼應的遊徑線路，並逐步實現實體的對接。三地的故事跨越空間彼此延續，公眾循著線索輾轉，仿佛回到歷史的時空，對於抗戰時期粵港澳文化教育的守望相助將有更加深刻的體認。三地的文化遺產又擁有各自獨特的人文歷史肌理，公眾沿著遊徑可有機會了解同中有異、豐富多元的地方特色。

第三，協同推動三地教育文化遺產的活化利用。促進知識與技術資源交流，加強文化遺產遊徑規劃和建設的合作，並在宣傳推廣、公眾導引等方面建立協同機制。以此為基礎，創建粵港澳大灣區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示範專案，打造青少年交流、嶺南傳統文化交流的平台，讓文化遺產成為大灣區精神連結的紐帶。

1 朱陳慶蓮：《馮平山圖書館金禧紀念論文集[M]》（香港：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1982年）。

2 碧海：〈香港的教育[J]〉，《華商報》，1941年第9期。

3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民國政府教育部檔案

4 金應熙：《金應熙史學論文集：近現代史卷[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

5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民國政府教育部檔案



圖23 2020年粵港澳青年文化之旅走進華南教育歷史基地，在坪石老街定友圖書館前合影



圖24 2021年「發現之旅——嶺南文化與湖湘文化」活動中，三地青年在坪石長尾洞培聯中學紀念園地前合影



# 以 開創性思維構建 香港成為大灣區 文化遺產樞紐

鄭志剛為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行政總裁，掌舵集團旗下地產發展、基建項目、建造工程、酒店及其他消費與科技業務。自2006年加入本集團後，他策動「The Artisanal Movement」重新打造品牌個性，將工匠手藝、傾心歷史、獨特設計及匠心獨運滲透至集團旗下所有業務。

2008年，鄭志剛創立了全球首個以文化零售概念主導的K11品牌，為新世代打造嶄新購物體驗。除了旗艦項目K11 MUSEA、11 SKIES及K11購物藝術館，K11集團主要營運的商業項目包括K11 ATELIER、K11 ARTUS及K11 Select。



鄭 志剛 博士, JP

# 摘要

自2019年至2021年，國家頒佈多項政策支持粵港澳大灣區，明文支持灣區文化遺產的保育與發展。香港作為區內高度國際化的重要城市，有條件成為灣區文化遺產樞紐。本文前瞻性地為構建香港成為灣區文化遺產樞紐提供了建議，其中包括利用香港地域與人文優勢，並以創意理念賦能香港本地歷史建築遺產的保育與活化，及推動建立大灣區「9+2」城市間文化合作機制等。期望本文可以為構建香港成為大灣區文化遺產樞紐提供發展方向，並在未來演變成可行的政策措施，為落實將香港建設成為大灣區文化遺產樞紐，勾劃出一個具可塑性的藍圖。

## 2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強調：「共同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發揮粵港澳地域相近，文脈相親的優勢，聯合開展跨界重大文化遺產保護，合作舉辦各類文化遺產展覽、展演活動，保護、宣傳、利用好灣區內的文物古蹟、世界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支持弘揚以粵劇、龍舟、武術、醒獅等為代表的嶺南文化，彰顯獨特文化魅力。」<sup>1</sup>之後，2021年1月，國家文化和旅遊部（文旅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及廣東省人民政府聯合公布了《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和旅遊發展規劃》（《文旅規劃》），當中的「共建人文灣區」章節特別提到「要做好重要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sup>2</sup>。同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公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後稱《十四五規劃》）確立了「支持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目標；此項舉措在國家政策層面為香港文藝事業的發展指明了方向，為香港提供了史無前例的歷史機遇；文化遺產的保育與傳承作為其重要組成部分，也迎來了全新的發展契機，為構建香港成為大灣區文化遺產樞紐奠定了堅實的政策基礎。

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為控制疫情，各地實施不同程度的旅遊限制以阻擋病毒的傳播，但隨著疫苗接種率的提高，疫情有放緩的趨勢。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相較於其他國家和地區，大灣區內大部分城市對於疫情的控制已經取得階段性成果。展望未來，隨著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大灣區各個城市之間將具備互聯互通的條件，而香港將以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傳統，逐步實現向內輻射內地，向外聯接境外的優勢，從而順應《十四五規劃》中確立的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sup>3</sup>。

## 一、香港成為大灣區文化遺產樞紐的優勢

### 1. 獨特的地緣與經濟優勢

香港作為東南亞的門戶，是至關重要的交通樞紐和商業中心。香港背靠祖國內地，面向全世界的優越地理位置，為大灣區文化遺產的宣傳及影響力的提升提供了絕佳的窗口。同時，香港是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策略性門廊，地處「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關鍵點，是國家開放格局中的重要門戶<sup>4</sup>。回歸25年來，香港兼收「一國」與「兩制」之利，在經歷了全球經濟與政治變革的挑戰之後，其作為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貿易中心以及航運中心的地位依然穩固，發展勢頭氣勢如虹，風采依舊。

### 2. 獨具一格的城市人文魅力

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文化傳統在此源遠流長。因歷史原因，香港汲取了豐富的西方文化，成為中西文化交融之地。香港回歸祖國以後，文化事業迎來了發展的春天，不僅已與20個國家簽署文化合作諒解備忘錄<sup>5</sup>，還建立了世界級的文化設施及多元空間：西九龍文化區，將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M+視覺文化博物館以及戲曲中心囊括其中。此外，香港還擁有蜚聲國際的展覽中心及演藝場地，比如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亞洲國際博覽館以及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等；以上都是構建香港成為大灣區文化遺產樞紐的良好前提。

## 二、以創意理念賦能香港本地歷史建築文化遺產的保育與活化

根據古物諮詢委員會的資料，截至2022年6月，全港共有132項法定古蹟，199項一級歷史建築，396項二級歷史建築，以及600項三級歷史建築<sup>6</sup>。在這些歷史遺存當中，不乏非常成功的保育案例，例如：分別於2017及2019年榮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卓越獎項的藍屋建築群及大館，以及於2022年被列為法定古蹟的由香港浸會大學成功改建的中醫藥學院雷春生堂等等。由此可見，香港在歷史建築遺產方面有豐富的資源，而如何利用好這些資源便成了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新世界集團於2020年10月投得已有70年歷史的一級歷史建築北角皇都戲院（圖1-2）的100%業權，本文以此項目的保育理念為例，來探討香港本地歷史建築的活化與重生。

皇都戲院前身名為璇宮戲院，位於英皇道及電廠街交界，是香港現存最古老的戰後戲院建築，是香港娛樂業鉅子歐德禮（Harry Oscar Odell）的心血結晶，於1952年建成。建築設計由建築師劉新科及George W Grey主理，採用現代主義建築的美學設計

理念。天台上俗稱「飛拱」的拱型混凝土桁架結構是皇都戲院的標誌，當年的建築師為了提升戲院觀眾的觀看體驗，利用外部骨架結構系統以造就室內無柱空間。戲院外牆正門上方的弧形立面的最顯眼位置刻有嶺南畫派大家梅與天的巨幅浮雕作品。皇都戲院有過非常輝煌的過往，多個國際級大師及藝術團體都曾經在此演出，包括英國作曲家 Benjamin Britten、男高音 Peter Pears、小提琴家 Isaac Stern，以及歌后鄧麗君等。此外，多部經典外語電影，如《仙樂飄飄處處聞》（*The Sound of Music*）、《沙漠梟雄》（*Lawrence of Arabia*）等，都曾於皇都上映<sup>7</sup>。

鑒於皇都戲院的歷史文化價值，新世界發展將竭力保育獨特的天台結構及劇院，致力讓這座一級歷史建築重現昔日風采，打造香港先鋒文化地標。為致力保育及活化，集團集結了具有豐富建築保育經驗的國際及本地團隊，包括曾負責倫敦國王十字儲氣罐改造項目的英國著名建築事務所 WilkinsonEyre；負責復修香港「大館」的英國建築事務所 Purcell；以及曾參與雷生生活化的香港創智建築師（AGC）有限公司。

我們建議對於香港本地歷史建築的保育和活化需要關注以下幾個要點：

### 1. 以創新力量引領歷史建築的活化和保育

歷史建築的保育不僅僅是為城市保留靜態的歷史留存，而是通過創新性的活化將讓建築遺產在城市人文環境的構建中發揮重要的作用；我們建議在保育與活化歷史建築的過程當中以創意理念提供全新的文化體驗讓這些歷史建築重獲新生。另外，我們認為在將這些歷史遺存「古為今用」過程當中須重視新生代的價值觀與消費習慣，尤其是千禧世代與Z世代的對於文化體驗的追求，從而獲得經濟與社會影響力的最大化。

### 2. 將建築設計、保育活化以及文化交流相結合促進社區共融共生<sup>8</sup>

當一座歷史建築失去其最初的用途和目的時，可以制定實施創新計劃以保護其歷史結構，同時將其活化為新的具有兼容功能的建築。在工程開始之前，應對建築物進行詳細研究以了解並評估其遺產價值，包括歷史、建築和社會價值。通常情況下，歷史背景和科學價值也被認為是全面了解歷史建築價值的重要因素。以皇都戲院的保育為例，新世界發展發起了一項收集與戲院相關的收藏品和文物的計劃，目前已經搜集了數百件舊物，包括舊戲票、戲院員工制服、舊戲院座椅、舊皇都戲院大廈樓書等，這些舊物之後被用於2021年舉行的戲院重建之前的沉浸式展覽，以重現戲院的鼎盛時期，並為戲院過去70年的運作和發展提供主張<sup>9</sup>。因戲院對表演藝術行業和附近社區的文化和社會意義，有關北角地區的歷史正在研究中，在皇都戲院建成的時候，北角曾被稱為「小上海」。該研究通過對歷史有形遺產的分析，為活化皇都戲院的設計提供了很好的啟示，同時，所有這些努力都必須與廣泛的社區參與及倡議並行，因為他們的支持將是建築遺產成功保育的關鍵。

### 3. 善用科技手段支持歷史建築的保育與發展

近年來，虛擬現實、三維（3D）掃描和人工智能技術的廣泛使用大大推動了文化產業的發展。建築遺產可能因各種因素（包括疏忽）和自然災害而遭到損毀，而新技術的出現，可以恢復甚至防止其造成的破壞。在保育歷史悠久的皇都戲院的過程中，採用了最新的BIM建模、3D掃描和模擬的建築技術，目前正在考慮將3D打印等更新的技術用於修復工作。

技術創新對於香港的建築遺產保護支持是毫無疑問的，如，VR（虛擬現實）、AR（增強現實）甚至XR（混合現實）等虛擬現實技術可以讓公眾如身臨其境般自由地欣賞和觀賞建築遺產<sup>10</sup>。特別是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旅行限制仍存在的期間，數字檔案和在線展覽平台是特別有用的數字資源，使策展人能夠向世界各地的觀眾展示主題性的臨時節目。

### 4. 充分利用一國兩制優勢，以數字化傳播手段宣傳香港本地建築遺產項目

以往，香港的許多遺產每年吸引了數百萬的遊客。在旅遊業受到新冠疫情影響的時期，政府可以研究建立一個網上平台，深入挖掘文物古蹟的文化內涵，以「說好香港故事」為開端從而達至「說好中國故事」的目的，讓文化愛好者無論是否能到香港，都能了解到更多的歷史古蹟。

建議政府建立機制促進建築文化遺產的保育融入現代生活，如通過研究、教育等手段使建築文化遺產獲得新生，建立文化生態圈，為社會創造共享價值體系，從而真正做到對香港建築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可持續發展。

K11 Craft & Guild Foundation (KCG) 由新世界發展於2018年創立，致力於保育各種中國傳統工藝。其中包括廣東瓷器「廣彩」、用寶石鑲嵌木製品的古老工藝「百寶嵌」、螺鈿、灰塑、木建築，以及支持中國古典小說《紅樓夢》的研究。KCG已經在中國多個城市與工匠進行合作，通過一系列的保育工作坊令傳統得以延續，並支持相關的出版工作，將各項工藝的歷史與製作過程詳盡記錄，為中國傳統工藝建立學術庫。

為保護建築和文化遺產，新世界發展在北京復建了曹雪芹（《紅樓夢》作者）故居，並於2022年7月重新開放。KCG將打造一個文化交流的平台，推出一系列主題展覽和公共教育活動，通過互動體驗、語言革新等手段，鼓勵人們重新發現經典文學；鼓勵當代學者、工匠和藝術團體加深入了解中國傳統工藝和文化，並從中獲得啟發對這些傳統進行現代改造。KCG將整合國內和國際資源，將傳統文化注入現代生活，吸引更多的紅學愛好者、市民和世界各地的遊客來體驗歷史傳統和文化復興的魅力<sup>11</sup>。

政府應通過建立機制，調動企業界的力量，與非營利組織合作<sup>12</sup>，探索建築遺產背後深刻的文化內涵，促進可持續發展，並通過展覽和文化交流給歷史建築帶來新的生命力。

### 三、 推動建立大灣區「9+2」城市間文化合作機制

#### 1. 利用「中國國家自然文化遺產日」積極開展文化遺產推廣活動

2005年12月22日國務院發佈了《國務院關於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規定自2006年開始，每年6月的第二個星期六定為「文化遺產日」<sup>13</sup>。

自那時起，全國各省市都會利用此機會宣傳推廣本地文化遺產。例如：2022年「中國自然和文化遺產日」就匯集了6,200多項展示活動，大灣區很多城市也借此機會開展了豐富多彩的推廣活動，如澳門舉行了「2022年中國文化和自然遺產日嘉年華」，廣州則舉辦了「2022年『中國文化和自然遺產日』廣東主會場（中山）暨石岐龍舟文化週」等。香港亦可以利用「國家自然文化遺產日」的機會舉辦相關活動宣傳推廣香港的文化遺產項目，另可聯合大灣區其他城市，以「國家自然文化遺產日」為契機合作開展推廣活動，利用香港獨特的區域與文化優勢對整個大灣區的文化遺產項目進行推廣，吸引更多的海內外遊客。

#### 2. 加強文化遺產教育，促進大灣區文化教育資源共享機制

在香港各級學校設立文化遺產相關課程，通過手工藝工作坊、導賞團、體驗營等形式，讓新生代了解香港文化遺產傳統。通過相關的學習，提升新生代的文化素養，追尋民族根源，以鞏固文化認同。除了加強香港本地的文化遺產教育以外，政府亦可以考慮制定相關政策支持本地教育機構與大灣區其他城市教育機構合作，在教育層面建立穩定合作機制，擴大香港在文化遺產教育方面的影響力。

#### 3. 推動建立大灣區文化遺產資源共享機制

大灣區11個城市都有各自的文化遺產項目，同時，這些城市都受到嶺南文化的深遠影響，有較為統一的文化認同。構建香港成為文化遺產樞紐，首先應該解決文化資源的共享<sup>14</sup>，香港應該先行一步促進大灣區城市間的文化融合和產業協作。在中央《十四五規劃》「將香港建設成為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的政策支持下，香港應該利用自身的優勢與大灣區其他10個城市合作，建立更為緊密的文化聯繫。香港可以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簽訂文化合作協議，而大灣區其他城市可以利用香港的「窗口」優勢將自己的優秀文化遺產推廣出去，同時也吸引海外文化遺產地在香港進行推廣，發揮真正的樞紐作用。

### 四、 我們對於香港成為大灣區文化遺產樞紐的願景

一直以來，香港在地理位置、經濟環境及文化傳統上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近年來，香港又在《十四五規劃》中獲中央支持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從此，香港在文化發展方面擁有了獨有的地緣經濟文化及國家政策層面的優勢，加上大灣區各項優惠政

策的支持，香港完全有條件成為大灣區文化遺產樞紐。

展望未來，香港應利用自身獨特優勢，在保護和發展好本地文化遺產的基礎上促進大灣區城市之間的文化合作，將創意科技元素引入到文化遺產的發展和保護當中去，利用新的傳播手段對文化遺產項目進行宣傳，吸引海內外更多遊客，積極發揮樞紐優勢，推動經濟與文化發展並行，充分利用「一國兩制」優勢為建設國際一流灣區做出更大貢獻！



圖1 1981年的皇都戲院（來源：星島新聞集團）



圖2 2021年的皇都戲院 (來源: Chester Ong)

- 1 中華人民政府網，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http://www.gov.cn/zhengce/2019-02/18/content\\_5366593.htm#6](http://www.gov.cn/zhengce/2019-02/18/content_5366593.htm#6)。
- 2 《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和旅遊發展規劃》，<https://www.bayarea.gov.hk/filemanager/sc/share/pdf/mainland-policies-measures-20201230.pdf>。
- 3 「內地『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與香港的角色」，<https://research.hktdc.com/tc/article/NTM4NTM0NTI3>。
- 4 劉佳俊：「發揮香港優勢，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https://cdo.developress.com/?p=7211>。
- 5 「循五大方向成就中外文藝交流中心」，[https://www.news.gov.hk/chi/2022/05/20220527/20220527\\_124301\\_712.html](https://www.news.gov.hk/chi/2022/05/20220527/20220527_124301_712.html)。
- 6 「古物諮詢委員會備忘錄 歷史建築評估工作」，[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198meeting/aab\\_25\\_2021-22-cover-tc.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198meeting/aab_25_2021-22-cover-tc.pdf)。
- 7 香港摩登：「皇都戲院」，<https://modernarchitecture.hk/%E7%9A%87%E9%83%BD%E6%88%B2%E9%99%A2/>。
- 8 Culture for tomorrow：「關於我們」，<https://www.culturefortomorrow.org/tc/#about>。
- 9 「尋找你我他的皇都」，[https://www.culturefortomorrow.org/wp-content/uploads/2021/04/%E5%B0%8B%E6%89%BE%E4%BD%A0%E6%88%91%E4%BB%96%E7%9A%84%E7%9A%87%E9%83%BD\\_TC.pdf](https://www.culturefortomorrow.org/wp-content/uploads/2021/04/%E5%B0%8B%E6%89%BE%E4%BD%A0%E6%88%91%E4%BB%96%E7%9A%84%E7%9A%87%E9%83%BD_TC.pdf)。
- 10 姚美康、吳堯：「虛擬仿真技術在建築遺產保護中的研究與實踐」，《遺產與保護研究》，2018年第5期第3卷，<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YCBH201805017.htm>。
- 11 「曹雪芹故居紀念館隆重開館，新世界助力打造文化新坐標」，<https://www.prnasia.com/story/370078-1.shtml>。
- 12 「鄭培凱：香港是復興與推廣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一扇最好的窗」，<https://www.hkwl.org/article/7513-%e9%84%ad%e5%9f%b9%e5%87%b1%ef%bc%9a%e9%a6%99%e6%b8%af%e6%98%af%e5%be%a9%e8%88%88%e8%88%87%e6%8e%a8%e5%bb%a3%e4%b8%ad%e5%9c%8b%e5%84%aa%e7%a7%80%e5%82%b3%e7%b5%b1%e6%96%87%e5%8c%96%e4%b8%80%e6%89%87/>。
- 13 中國文化和自然遺產日，<https://www.icm.gov.mo/chd/2022/cn/>。
- 14 中國傳媒大學謝倫燦：「文化樞紐建設要解決好文化資源的共享」，[https://www.sohu.com/a/451999477\\_655607](https://www.sohu.com/a/451999477_655607)。



# 作者 名 錄

(按姓氏筆劃序)

石浩斌	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陳家祠) 文物保護管理部主任	馮紫珊	香港特別行政區建築署總工程策劃經理
江詠雯	香港特別行政區發展局古物古蹟辦事處 一級助理館長	葉健雄	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助理教授
朱蓉	江南大學設計學院教授	趙雲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中國世界文化遺產中心主任
李六三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院長	鄭志剛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行政總裁
呂舟	清華大學國家遺產保護中心主任	蔣志豪	香港特別行政區發展局文物保育專員
呂澤強	澳門特別行政區建築師	蔡宏興	華懋集團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沈陽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原副總工程師	蔡健龍	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文化遺產廳廳長
周穎	香港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	劉思詠	香港特別行政區發展局古物古蹟辦事處一級助理館長
林社鈴	薄鳧林牧場有限公司董事	劉淑瑜	惠州市文化廣電旅遊體育局文化遺產保護科負責人
冼昭行	薄鳧林牧場督導委員會成員	蕭麗娟	香港特別行政區發展局古物古蹟辦事處執行秘書
高永康	薄扶林村文化地境保育有限公司創始主席	鍾妙芬	大館古蹟及藝術館文物事務主管
張羽	廣東省古蹟保護協會副秘書長	羅嘉裕	Ptah Heritage Limited董事
曹勁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	蘇彰德	香港特別行政區古物諮詢委員會主席
黃文德	深圳市大鵬新區大鵬古城博物館副館長	Mick ATHA (范旼澔)	紐卡素大學歷史、古典和考古學院 Marie Skłodowska-Curie研究員
黃海妍	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陳家祠)館長	Carlos MARREIROS (馬若龍)	婆仔屋文創空間主席
馮江	華南理工大學建築學院教授	Sam TURNER	紐卡素大學景觀學中心主任





主辦單位



發展局  
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  
Commissioner for Heritage's Office  
Development Bureau



古物古蹟辦事處  
Antiquities and  
Monuments Office

獨家贊助機構



香港賽馬會

支持單位



古物諮詢委員會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保育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  
Advisory Committee on Built Heritage Conservation

ISBN 978-962-7312-94-9  
非賣品